

近代的 墮落史

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

國共卷

著

劉仲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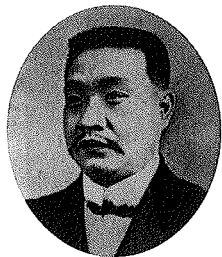
次目

- 一、聰明的士大夫，不合格的土豪——譚延闓 4
- 二、「國民黨的替罪羊」——孔祥熙 19
- 三、業餘搞政治的詩人——汪兆銘 28
- 四、總是錯估歷史位置的道德家——蔣介石 40
- 五、製造幻覺的憲法專家——張君勱 55
- 六、「革命外交家」顧維鈞 65
- 七、「仁俠之風」杜月笙 73
- 八、「老實人」李宗仁 81
- 九、列寧主義世界化的典型標本——戴季陶 86
- 一〇、蔣家天下陳家黨——陳果夫、陳立夫 101
- 十一、紅色國母——宋慶齡 114
- 十二、誤入東方的西方工程師——宋子文 125

- 十三、技術官僚——傅作義 139
- 十四、無原則的「新疆王」——盛世才 144
- 十五、左派知識分子——張國燾 152
- 十六、被扼殺的史達林——劉少奇 167
- 十七、紅太陽身後的暗星——康生 187
- 十八、黨的化身——周恩來 202
- 十九、「老兒子」——張學良 233
- 二〇、紅色文宣教父——陳伯達 242
- 二一、紅色孤將——林彪 255
- 二二、遠東的幽暗之心——蔣經國 266
- 二三、東方的馬基維利——毛澤東 278
- 二四、老列寧主義者——鄧小平 303

一、聰明的士大夫，不合格的土豪

——譚延闓



譚延闓（1880-1930，湖南茶陵人）的父親譚鍾麟¹度過了士大夫階級所能指望的最圓滿人生，從進士到翰林，從翰林到總督，做人功夫面面俱到。譚延闓口銜銀匙出生，自幼以神童著稱。當然，這一切少不了家庭教育的貢獻，他在回憶中特別提及²。他的八股文造詣突飛猛進，連帝師翁同龢都為之歎服。翁本人就是應試專家，不大會在自己的日記裡說外行話：「訪文卿，見其第三子，秀發，年十三，所作制義奇橫可喜，殆非常之才也。」（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譚延闓在長沙參加鄉試，中舉的成績排在湖南省第九十九名。

一九零四年的會試是科舉廢除前的最後一屆大考，從考試內容就可以看出朝廷舊瓶裝新酒的掙扎與無奈³。陳夔龍⁴的《夢焦亭雜記》回顧當時的情景，說主考官張百熙選

中譚延闓的試卷，主要是出於衛護本土的驕傲：「我們湖南自從國朝定鼎二百六十來年，

1 譚鍾麟（1822-1905），曾任戶部左侍郎、工部尚書、閩浙總督、四川總督、兩廣總督、直隸總督。

2 「余始九歲，是歲丁亥，先公方以目疾乞假，每上燈獨坐簽押房，使人讀公事文牘畢，呼余及亡姊亡弟共坐室隅，各作破題一或試帖二句，間日互易，皆先公口授，無所謂作也。有時不知書寫，則先兄從旁代書之，複誦無訛，則各與錢十文，乃起就睡……吾十歲時，始學為文。皆先公於燈下口授，次日書之，而張寶齋先生評點之，及己丑至陝西從姚先生世貞。」

3 當年考試分三場，每場題目如下：

第一場 史論五篇：一、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論。二、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嘗用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于，其說未嘗不效論。三、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四、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請於私第見客論。五、北宋結金以圖燕趙，南宋助元以攻蔡論。第二場 考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一、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須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二、泰西外交政策往往藉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蓋繚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三、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四、周禮言農政最詳，諸子有農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制，列為專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之策。五、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

第三場《四書》《五經》。首題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義。次題為：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義。

三題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義。

4 陳夔龍（1857-1948），末代直隸總督，清亡後居上海，所撰《夢蕉亭雜記》為著名史料筆記。

狀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齊全，解元也得了不少，就只差一位會元。正好我在場中看到湖南省舉子的一卷，寫作俱佳，確實夠得上會元之選。……科舉將停，機會難再，所以我特地跟裕相（指協辦大學士裕德）情商，請他將這本卷子作為會元，也好免使我湘科名有個會元的缺陷。承蒙裕相允讓，你看，這一本就是會元卷子了。」湘綺樓主王闈運聞訊後，湘人愛國主義的情緒同樣溢於言表：「看京報，文卿兒得會元，補湘人三百年缺憾，龔榜眼流輩也。」譚延闓殿試名列二甲第三十五名，以進士出身點翰林院庶起士，超過了經世楷模左宗棠，站到了父親當年的同一條起跑線上。

晚清的風氣強調儒家的經世致用一面，體現在科舉的命題偏好上，恰好對湘人有利。湘人以船山之學、曾左之業為認同符號，嘲笑皖、吳漢學宗師的經世能力還不如他們的「鄉里粗才」。譚延闓入世之初，就得享內外因緣的配合。幸運女神從他出生開始，似乎一直對他情有獨鍾，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但他應對順境的圓滑和節制，不能不說是良好的家教和修養所致。他和譚嗣同、陳三立並稱「湖湘三公子」，顯然不患無才，但他最終選擇的道路，仍然是依靠家傳的「做人學」。對朝廷、立憲派和革命黨都表示感激的人，為數不多，而他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湖南興辦明德學堂，為黃興的華興會提供了保護傘⁵。朝廷對他的急公好義同樣滿意，命他「以辦學勞績，免考散館，

以編修留館，仍辦湘學」。湘人組織立憲公會，還是少不了讓他做發起人。湖南諮議局成立後，他順理成章地當選議長。

保路運動的主力雖然在巴蜀，但湖湘的立憲派士紳同樣積極支持。譚延闓以各省諮議局議員聯合會會長的名義，通電朝廷和各省，要求嚴懲罪魁禍首盛宣懷和趙爾豐，釋放他們的同儕蒲殿俊和羅綸⁶。武昌兵變以後，革命黨人焦達鋒依靠哥老會、洪門的力量奪取了政權。軍政府幾乎變成了草莽英雄的香堂，「焦大哥」的呼聲不絕於耳。周震鱗⁷懷著階級報復的快感，「編查富民，定為百分捐十之法，共籌得三百餘萬元。」譚延闓和他的紳士朋友嚮往「巨室世族、軍政長官」攜手共進的「文明革命」，都督府和議會形同水火。好在梅馨⁸的兵變及時解除了流氓無產者專政的危險，將譚延闓推上了

5 「甲辰，克強先生為明德學堂教習，密謀革命，所謂華興會也。事覺，乃匿龍英溪（龍絨瑞）家，揚揚若無事，臥讀書不輟。每飯三碗，其所刻印章名籍，皆在長沙府中學。英溪乘輿往，盡取納輿中以歸。數日稍懈，乃入聖公會。居久之，方喬裝東去。」（《近代湘賢手劄書後》）

6 蒲殿俊和羅綸，二人分別為四川諮議局正副議長，保路同志會正副會長，被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

7 周震鱗（1875-1964），寧鄉人，華興會創始人之一，同盟會老會員，徐特立的老師。湖南獨立後他帶兵勒索富戶籌款，後被譚延闓制止。一九四九年後曾被毛澤東接去北京。

8 梅馨（1878-1928），湖南新軍五十二標一營管帶，率叛軍先後殺死副都督陳作新、都督焦達峰，後被譚延闓委任為湖南第五師師長。

都督的位置。變軍的初衷大概是為了索餉，不大可能是譚延闓本人策劃的。譚延闓那種圓融周到的「甘草」性格，更不大可能把自己放在必須承擔責任的位置上，但他一上臺就開始有條不紊地清理階級敵人，一點都不像勉為其難的維持會長。他做人的本領爐火純青，居然能夠一面清洗援鄂湘軍內的激進分子，一面跟黃興結成緊密的政治聯盟，一面又利用私人關係發動各地湘人響應革命。他通過外交手段贏得的省分，比黃興通過軍事路線丟掉的地盤多得多。王芝祥⁹、蔡鍔、孫道仁¹⁰的獨立，都跟譚延闓的幕後策動有關。革命如果由焦達鋒和詹大悲¹¹之流領導，朝廷其實不難鎮壓；但黎元洪和譚延闓之流一旦倒戈，朝廷就完了。

湖湘「兵多、紙幣多、革命偉人多」，都督並不好做。諸將「視官長為無物，各營皆自選代表，直接都督。軍中事故，皆由代表議決，交師旅長執行，中初級官皆仰士兵之鼻息以苟全。」（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第一卷，臺灣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一年）都督府依靠濫發債券，勉強敷衍隨時可能二次、三次、N次革命的軍隊。故南北議和對負責籌餉的紳士階級而言，無異於解脫。譚延闓抓住這次難得的機會，裁減了六分之五的軍隊，只留下巡防營。這項任務並不簡單。梅馨的軍隊認為譚延闓忘恩負義，差一點再次譁變。譚延闓經歷了這次折騰，再也不願領教革命。他暗中支持宋教

仁競選，將湖南九成以上的選舉人（囊括了當時的有產階級）交給了國民黨，但二次革命爆發後，他和這些紳士都不願意看到籌餉局捲土重來。湖南的獨立是象徵性的，很快就在黎元洪的斡旋之下撤銷。英國領事報告本國政府說：湖南人民把北京政府看作法律與秩序的保護者，不願意認真抵抗。這裡所謂的人民當然就是人民一詞的本意——有產階級。譚延闓作為湖湘人民的代表，可謂當之無愧。

袁世凱赦免了譚延闓，但不准他回鄉。他在青島和上海的租界，度過了幾年流亡生涯。湯鄉銘在曹錕遠征軍的支持下，用鐵腕統治湖南。護國戰爭爆發後，「湘人治湘」的呼聲再度響徹雲霄。黎元洪出任大總統，立刻召回了階級和黨派上的雙重難兄難弟。譚延闓第二次督湘，試圖故伎重演，將軍隊裁減一半，興辦實業和教育。結果護法戰爭爆發的時候，湖南再一次處在極度軟弱的狀態。儘管湘軍的軍事傳統比桂軍更加雄厚，

9 王芝祥（1868-1930），直隸通縣人，廣西布政使兼巡防營統領，辛亥革命中反正，一度任廣西都督，因根基不牢，不敢戀棧，率部北上援鄂。一九一二年，國務總理唐紹儀與國民黨協議，提名王任直督，袁世凱先虛與委蛇，後以軍界反對為由，改派王赴南京任職。唐對王的委任拒絕副署，袁以未副署的委任交王，導致唐辭職而去。

10 孫道仁（1863-1935），一九一零年任福建提督，辛亥革命時反正，成為福建都督。

11 詹大悲（1887-1927），湖北革命黨人，早期辦報，先後參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討伐陳炯明、國共合作，在清黨中被殺。

這時卻不得不仰仗桂軍的鼻息。譚延闓向南軍發出求援電報：「大局拯救，全賴西南。西南門戶厥為湘省，故非法政府首先竊伺軍權。……桂湘關係，無異齒唇，奏廷乞師，請助指臂，纓冠披髮，諒有同情，務即下令動員，即出桂境以作後盾。庶使北方聞風膽塞，則湘省受賜良多，西南之保障益固矣。」他離開長沙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從湖南教育基金中撥出專款，給陳寅恪留學用¹²。

譚延闓一走，湖南就淪為東亞的主要戰場。桂軍趕走了段祺瑞派來的傅良佐¹³，自己又被吳佩孚趕走。段祺瑞素乏知人之明，將吳佩孚的戰果交給自己的朋友張敬堯¹⁴。張敬堯的統治以不負責任著稱，極大地刺激了湘人的共同體意識。北軍強迫商民接受無法兌現的紙幣，給譚延闓苦心經營的實業和教育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湖南父老和軍官的代表前後相繼，邀請譚延闓回湘主持大局。譚延闓隨即假粵入桂，在永州建立大本營，等待節點來臨。湖湘輿情鼎沸，山雨欲來。毛澤東當時是個無人理睬的小人物，但因為沒有任何派系牽掛和既得利益的緣故，反而能夠忠誠地充當父老同胞情緒和流行輿論——湖南獨立——的傳聲筒¹⁵。

一九二零年五月，譚延闓覺得同胞的民情和內外的形勢都已經接近成熟，尤其是吳

佩孚對段祺瑞的不滿已經無法抑制，索性揮軍北上，解除了湘軍最大的危險。他在衡陽成立了湘軍司令部，號召各地士紳圍攻長沙。一九二零年夏天的湖湘重演了保路運動的歷史。各地民兵臂纏「救國救鄉在此一舉」的白布，向侵略者集結的中心湘潭挺進。湘潭變成了湘人的邦克山¹⁶和約克鎮¹⁷，土豪指揮的民兵打敗了軍校畢業生指揮的正規軍。張敬湯的主力第七師在土著的圍攻下，倉皇逃回長沙。張敬堯明白，整個湖湘人民都在跟他作對，他喪失了背水一戰的決心，向商團勒索了十萬元現款以後，主動撤離湘境。

12 一九一七年八月，譚延闓下野前，專門從湖南教育基金中撥出一萬四千元為時任省公署總務科長林伯渠、教育科長熊崇煦、交涉股長陳寅恪赴美留學公費。

13 傅良佐（1873-1924），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剛」之一，一九一七年八月被任命為湖南督軍，被桂軍擊敗，十一月退出湖南。

14 張敬堯（1881-1933），一九一八年三月被任命為湖南督軍，因為非作歹激起「驅張運動」，一九二零年六月撤離湖南，其弟張敬湯被殺。

15 毛澤東在《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湖南建設的根本問題》等文章裡，鼓吹湖南獨立。「吾人主張『湘人自決主義』，其意義並非部落主義，又非割據主義，乃以在湖南一塊地域之文明，湖南人應自負其創造之責任。……湘人自決主義者，門羅主義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可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八）

16 邦克山戰役（Battle of Bunker Hill）或譯碉堡山戰役，是美國獨立戰爭波士頓之圍期間的一場軍事衝突，發生於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七日查爾斯頓北部山地。英軍雖然獲勝，但損失慘重，因此鼓舞了各地美國民兵。

17 一七八一年八月至十月，喬治·華盛頓將軍率領的美軍和法軍聯手圍攻困守約克鎮的英軍，使英軍陷入絕境，被迫投降。並最終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美國獨立戰爭中，通常認為這場戰役是最後一場陸上大型戰鬥。

常德商團以同樣的價格，將馮玉祥的侵略軍禮送出境。

如果說湘潭的戰役酷似美洲，長沙的就職典禮就彷彿是直接從封建歐洲的歷史當中摘錄下來的。一九二零年六月十二日，譚延闓乘坐的輪船駛入長沙碼頭。各界代表身穿紙幣縫製的衣服，向譚延闓和他的還鄉團哭訴外來統治者的殘酷和不義。譚延闓不得不向他們謝罪：「我譚延闓不能保障三千萬人民的財產，使張敬堯在湖南橫徵暴斂，實在是我譚延闓的罪過，萬分對不起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代表們接受他的誓言以後，才收起紙幣衣服，迎接他入主督府。資產階級專政在東亞的勝利，在此刻達到最高峰。即使他們在日本和上海的同儕，都沒有贏得如此光榮和徹底的勝利。毛澤東見證了湘人的英雄氣概，以年輕人特有的慷慨和無私，呼籲上海市民階級效法自己的同胞，團結起來趕走北方的侵略者，建立本土的商人政府。然而，上海資產階級沒有抓住轉瞬即逝的機會。

一九二零年八月十六日，譚延闓通電呼籲各省自行憲政。八月二十八日，他收到了梁啟超為湖南起草的《基本法》。上海的湖南僑民成立了湖南改造促進會，宣佈「以湖南地域之文明，湖南應自負其創造之責任……往後舉措，一以三千萬平民之公意為從違……三千萬人都有言論出版之自由，此國人之所最希望也……以後南北武人一律退出

湖南境地以外，永毋再入湖南境地與湖南人為敵。」（黃士衡：《趙恆惕的省憲活動》，《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九月十三日，譚延闓召集行政—立法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會由十名政府代表和十一名議員組成，決定採取四項措施：（一）湘人治湘，決以軍政府所定之縣自治制為藍本，酌加參訂，詳細研改；（二）籌設市政廳，以為推行市自治制之準備；（三）由省署設立全省地方自治籌備處，曾繼梧兼任處長，各項人員，亦由省署人員兼任，籌辦一應事宜；（四）通令各縣知事，將各縣自治經費，詳細查明呈報。十月四日，湖南各界聯合會呼籲譚延闓召集制憲會議。十月十日，毛澤東的朋友和盟友彭璜¹⁸，在湖南商會、農會、工會、教育會、湖南改造促進會、律師公會、青年會、女青年會、湘社、旭日學會、教職員聯合會、自治期成會、俄羅斯研究會、基督教聯合會、學生聯合會的支持下進行了要求《湖南憲法》的大遊行，直到譚延闓表示同意召開「人民制憲會議」，才解散示威群眾。譚延闓為了安撫這個難以對付的支持者，甚至屈尊為毛澤東的文化書社題字——譚延闓是著名的書法家，不會

18 彭璜（1896？），湖南湘鄉人，湖南學生聯合會會長，與毛澤東等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並組織俄羅斯研究會，該會介紹劉少奇、任弼時等去上海外國語學社，後赴蘇聯學習。一九二二年失蹤，一九四九年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為閑人浪費時間的。毛澤東當時的主要社交資源，就是身為彭璜的小朋友和湘獨運動的積極分子。

孫文這時派周震麟、黃一歐¹⁹來湘遊說，希望譚延闓加入他的北伐計劃。譚延闓是辛亥英雄和名義上的國民黨員，不願意直接拒絕他們，就邀請蔡元培、章太炎、張繼等反孫的國民黨元老，製造支持南北和談的空氣，企圖化解外力干預的威脅。譚延闓和湖南的不幸在於，他們的地緣形勢過於惡劣。湖南處在東亞勃艮第的位置上——四周都有力量虎視眈眈，沒有任何領袖能夠圓滑到足以杜絕群雄覬覦的程度。譚延闓的老練是人所共知的，部分就體現於他能夠精確判斷自己能力的界限。他發現程潛和魯滌平的部下開始接受國民黨代表的遊說，就果斷決定讓位給職業軍人趙恆惕。譚延闓在袁世凱時代，對趙恆惕有知遇和保護之恩。趙恆惕解決了驕兵悍將，大體維持了譚延闓的政策，尤其是保護了譚延闓功成身退的形象。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趙恆惕宣佈成立根本法籌備處。十二月二十一日，他通電各省：「西南倡義護法，於茲四載，既無正當解決之方，已陷治絲益棼之境。湘省地當要衝，迭遭變故，犧牲至巨，創痛甚深。欲謀永久之和平，唯求真實之民治。曾經電

主聯省自治並於湘省劃分軍民兩政，民選臨時省長，趕制省自治法，以開先路而肇根基。深唯內治之壞，在於中央之集權。國是之紛，由於軍閥之擅政。苟省自治，則地方有各自發展之能。苟省相聯結，則舉國有提挈並進之道。欲順世界之新潮，解積年之糾紛，捨此幾無他途可由。恆惕不敏，以為民意所趨。即大計所在，應先由西南各省會樹之風聲，推而至於全國以達刷新之建設……」（《京聞誌要》，上海《時報》，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滇、桂、蜀、秦、浙通電響應，實際上瓦解了國民黨企圖爭取的大部分對象。國民黨的仇恨落在趙恆惕頭上，卻放過了真正的始作俑者譚延闓。譚延闓事後居然還能以辛亥元老的身分，跟國民黨握手言歡，做人的手段之高，實在無與倫比。

一九二二年三月，李劍農、王毓祥、王正廷、蔣方震、彭允彝、石陶鈞、向紹輯、陳嘉勳、皮宗石、黃士衡、董維鍵、唐德昌、張樹聲等名士組成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湖南憲法》經湖南公民投票通過：「湖南為中華民國之自治省，以現有土地為區域，省自治權屬於省民全體；全省公民凡年滿卅歲以上，皆得被選為省

19 黃一歐（1892-1981），黃興長子，一九二零年奉孫指示，協助周震麟來湘活動。一九二九年參與了一系列倒蔣活動，後投共。

議員，省議員任期三年，設議長一人，副議長二人，閉會時設常駐委員會；省長由省議會選出四人交由全省公民總投票決選，以得票最多數者為當選，當選後得受國政府之任命；凡湖南公民年滿卅五以上在湖南居住五年以上者得被選為省長，現職軍人被選為省長時，須解除本職方得就任，省長任期四年，期滿改選，可連選連任一次；省長之職權包括：公佈法律及發布執行法律之命令，統率全省軍隊管理全省軍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省長有重大犯罪行為，議員可提出彈劾；省務院下設內務司、財政司、教育司、實業司、司法司，省長為省務院長，各司長為省務員；中華民國現行法律及基於法律之命令與本法不相抵觸者，仍得適用於本省；國憲未實施以前，應歸於國之事權，得由省議會議決執行。」湘人如果根據立陶宛和芬蘭的標準編撰歷史，完全有權利認為自己的族群已經具備國族的資格。

譚延闓第三次流亡期間，做出了畢生最精確也最可悲的選擇。他明白自己沒有嫡系軍隊，只能以榮譽性職位終老。一九一二年的歷史紀錄給他保留了國民黨元老資格，一九二零年的歷史紀錄給他保留了湖湘國父的資格。隨著國民黨的列寧主義化，他周旋各方的餘地日益減少。國民黨的革命軍只准他選擇服從或敵對，趙恆惕的護憲軍卻不會強迫他做出選擇。他最後選擇了國民黨，宣佈從此以後只知「服從主義」。一九二六年

七月，北伐軍攻陷長沙。國民政府宣佈廢除《湖南憲法》、各級議會和法院，一切權力歸於黨的領導。譚延闓獲得了「伴食宰相」的酬庸，一再出任名義上的黨政軍最高領導，從總司令、國民政府代理主席、主席到行政院長，但實際權力可以忽略不計。蔣介石成功以前，他在各方之間調停。蔣介石成功以後，他一心一意用自己的名望為蔣介石提供保護傘。蔣介石習慣於應付野心勃勃、甚至恩將仇報的元老，覺得譚延闓實在太好相處了，盡可能讓老人心滿意足。譚延闓是知趣的人，顯然不會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他老了，沒有機會重新開始，只能盡可能合理利用過去積累的資源，給自己爭取榮華富貴的晚年。他如果做出任何其他的选择，都會落到類似吳佩孚晚年的下場。

他自幼富貴、聰明、軟弱，喜歡隨波逐流，避免承擔責任。他生命的最後十年，為著名的譚家菜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書法留在中山陵，蔣介石的書法留在他的陵墓上。前者保存至今，卻很少有人知道是他的手筆。後者毫不令人意外地遭到毀壞²⁰，彷彿冥冥之中自有定數。他本來可以名垂青史，只要真正相信自己的話語，用生命活出

20 譚延闓陪葬中山陵側，靈谷寺東北。鼯鼠馱墓碑上蔣介石親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前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譚公延闓之墓」。墓旁山坡上還有一通國葬命令碑，據說碑額為國民黨徽，正中刻著「功在黨國」四字。原墓在「文革」中被毀。

自己的原則，但他面對真正的考驗，暴露了士大夫和聰明人的底色，更關心及時用不能變現的話語兌換實惠。他不珍惜自己的歷史，為短暫而瑣細的享受犧牲了自己；歷史也沒有珍惜他，將他挪到了無足輕重的八卦人物當中。

二、「國民黨的替罪羊」

——孔祥熙



孔祥熙（1880-1967，山西太谷人）和宋查理——宋氏三姐妹的父親——的家族類似，都是基督教傳教士撒在東亞的種子。他小時候患流行性腮腺炎，求中醫不癒，卻被傳教士治好。他的家庭從此信任教會，送他去教會興辦的華美小學讀書。他小學畢業後，轉到美國華北公理會的潞河學院，在此期間皈依基督教。庚子拳亂，山西教民受害獨重。孔祥熙奔走善後，撫慰教友。教會感謝他所做的義工，送他去美國留學。他在耶魯攻讀礦物學，回家鄉太谷建立了銘賢中小學，任用了許多公理會傳教士擔任教員。他積極參加當地的社會活動，很快就變成了士紳界的中流砥柱。

辛亥軍興，太谷商團軍和中學生組成了民團。孔祥熙以此為基礎，出任山西中路民軍總司令。愛沙尼亞和烏拉圭獨立時，當地精英也是以類似方式組織民兵的。民國成立，

孔祥熙辭去了一切官職。他投身煤油生意，獲利豐厚。西洋煤油燈是當時的新技術，比傳統的油燈明亮得多，正在全世界迅速擴展市場。美國首先開發石油，主要的用途就是為煤油燈提煉煤油。孔祥熙精通營銷，經常免費給客戶送煤油燈，既改善了他們的照明條件，又保證了以後的長線銷售。他的生意做大以後，進一步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貨市場，他比未來的親戚蔣介石在商業上內行得多，逐漸變成財經界的頂級精英。

孔祥熙在美國留學期間，結識了孫文。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經費極為窘迫。孔祥熙前往東京為他處理財務，結識了他的英文秘書宋靄齡。一九一四年，孔祥熙和宋靄齡結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於一九一二年病逝）。同年，孔宋夫婦返回山西。他們一面繼續經商，一面推動教育和公益，堪稱一方賢達。閻錫山見孔祥熙擅長教育，想任命他為教育廳長。孔祥熙婉言謝絕，只接受了督軍署參議的職務。一九一九年，山西發生旱災。孔祥熙與華洋義賑會合作，提出以工代賑，貸款百萬救災，由災民修建晉西公路，用公路收益償還貸款，頗受輿論好評。黎元洪大總統贈給他「急公好義」的匾額，他又轉贈給太谷教會。

孔祥熙的家鄉情結甚重，為此謝絕了張作霖和吳佩孚的邀請，直到孫文組織針對曹

錕政府的三角聯盟，他才重新介入政治。一九二四年，孔祥熙和孫文在廣州會合。孫文北上談判時，孔祥熙隨行。孫文去世前，汪兆銘草擬了《總理遺囑》，孫文簽字時，孔祥熙、宋慶齡和孫科都是見證人。孫文住院和喪葬的費用，都是孔祥熙籌集的。後來中山陵在紫金山建成時，孔祥熙擔任總理奉安委員會辦公處總幹事，並親手撰寫祭文。

一九二六年，孔祥熙出任廣州革命政府的廣東省財政廳長。北伐軍攻占武漢三鎮後，武漢國民政府任命孔祥熙為實業部長。蔣介石清黨後，孔祥熙為他遊說宋子文和馮玉祥歸附。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孔祥熙夫婦在宋家為他們代言。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孔祥熙任工商部長。他和宋子文構成蔣介石在財政方面的左膀右臂，但兩人的性格作風相去甚遠。宋子文久居美國，缺乏東方式的圓滑周到，容易給人生硬簡慢的印象。孔祥熙久居內地，性格比較溫厚，經常擔任斡旋和交涉的任務。但從財務政策角度講，孔、宋兩人的差別不大。宋子文去職後，孔祥熙繼任財政部長。他延續了宋子文的路線，依靠公債和中央銀行支持蔣介石政府日益擴大的開支。他徵收白銀出口稅，強迫所有銀行必須用四分之一的存款購買公債。他通過改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大大增加了國家所占股權，將宋子文開始的金融管制推到更高的層次。國民政府控制四大銀行以後，法幣政策就變得順理成章了。從此，十二種紙幣和三億兩白銀停止流通。民國初年的白銀時代

和多貨幣時代結束了，紙幣時代和通貨膨脹時代就此開始。

抗戰爆發後，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身分輔佐蔣介石。四大銀行組成聯合辦事處，推行戰時金融管制。蔣介石任理事會主席，孔祥熙為副主席。上海和天津失守後，海關收入損失過半。孔祥熙通過貨物稅、直接稅和食鹽附加稅彌補虧空，直接稅又包括印花稅、所得稅、利得稅、營業稅、遺產稅。法幣發行量增加了四百倍以上，國有企業在經濟當中的比例上升了三倍。資源委員會變成了小型的國家計委，將半數以上的資本納入國家管制範圍。鹽、糖、菸、酒陸續納入專賣體系，棉紗、糧食實施價格管制。抗戰結束時，國民經濟當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已經大大超過了資本主義成分。

孔祥熙深知量出為入、政重於財的危險性，但也沒有其他的辦法。蔣介石很清楚：戰爭剛剛爆發時，悲觀派的意思是國民政府馬上就會垮臺，樂觀派的意思是國民政府能撐十八個月。後來發生的情況，超過了樂觀派最樂觀的估計，孔祥熙對此厥功甚偉，但對於戰區的居民，實際上則意味著其真實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了最悲觀的預計，孔祥熙實在是用慢刀活剮的方式延長他們的痛苦。國民政府不能指望勝利，只能指望以拖待變。因此政府越是成功，居民就越是難過。居民的利益其實在於迅速戰敗，但這話只有汪兆

銘敢說。真正的理由既然不敢出口，怨氣就必須以虛偽的方式發洩。金融管制和物價管制自然會造成投機和黑市橫行，但投機和黑市並不是民眾痛苦的根本原因，反而在具體生活細節方面大大緩減了民眾的痛苦。《大公報》堪稱清流知識分子的最高水準，把孔祥熙等人充當了民眾的出氣筒與文人攻擊和汗蔑的對象。他們發表的《晁錯與馬謖》¹，在影射史學界的地位，僅次於〈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²。如果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符合正義原理的話，那麼這些左派文人在垂暮之年落到紅衛兵手裡，一點都沒有什麼不公平的地方。他們渴望根據文革的原則辦事，至少已經幾十年了。毛澤東只是滿足了他們的願望而已。而蔣介石因為沒有完全滿足他們的願望，則被他們罵得一文不值。

這並不是說孔祥熙和他的親屬、部屬沒有問題，一九四六年陳伯達在《解放日報》

1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日軍從廣西打進貴州獨山。十二月二十二日，王芸生在《大公報》發表〈晁錯與馬謖〉，拿晁錯比孔祥熙，馬謖比何應欽，說要「除權相，戮敗將」。「述說以上兩段歷史有什麼意思呢？這說明，當困難當頭，除權相以解除反對者的精神武裝，戮敗將以服軍民之心，是大英斷，是甚必要。」

2 《海瑞罷官》是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的作品。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一「單幹風」、「翻案風」聯繫在一起。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上連載《中國四大家族》，並以單行本出版，說「四大家族獨占的財產至少當在兩百萬萬美元左右」。陳伯達的材料來自日本的特務機關一九三九年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的祕密調查報告，現藏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藏張嘉璈檔案中³。但即使日本人為陳伯達準備的大批詳盡黑材料全部屬實，他們的問題也只不過是技術性違規。這些資訊跟孔、宋家族後來在美國的生活狀況和遺產紀錄相去甚遠⁴。然而重慶和桂林的知識分子搜集材料的本領要差得多，只能滿足於拿生活作風問題編故事。孔小姐和狗狗之類的故事⁵，即使全部屬實，無非就是證明一批年輕人有錢任性、不會表演。如果不是因為讀者和作者事先都懷著發洩情緒的目的，這樣的報導根本不會比輿論場的緋聞八卦更有殺傷力。

孔祥熙做替罪羊，其實是早晚的事情，宋子文代替他理財以後，情況變得更糟，但這也不是宋子文的錯。國民政府在決定抗戰的那一刻，就開始了吃老本和預支未來的歷程，越往後接手的財政家，需要收拾的爛攤子自然越大。知識分子不敢質疑抗戰決斷和經濟管制（後者是前者的必要條件），就拿財政家的生活作風開刀，給民眾造成了危險的錯覺，彷彿只要這些人大公無私一些，抗戰就可以變成合理的決斷；而只要群眾監督得好，完全可以強迫這些人大公無私。

從財政角度講，一九四六年的戰爭只是一九三七年戰爭的延續。爛攤子變得更爛了，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局部的經濟管制天然不能穩定，管制部分和自由部分的衝突，時刻都在撕裂社會。蔣介石無論給公教人員補充多少平價米，讓軍警槍斃多少貪汙投機分子，都完成不了讓滾動的石頭停在山坡的任務。他要麼後退一步，把銀行和國企還給資

3 〈登集團特報內第一號——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聲稱：「蔣介石六千六百三十九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八百零九萬美元，下同）；宋美齡三千零九十四萬元（二百七十七萬美元），宋子文五千二百三十萬元（六百三十七萬美元），孔祥熙五千二百一十四萬元（六百二十五萬美元），宋靄齡一千二百萬元（一百四十六萬美元），陳立夫二千四百萬元（二百九十二萬美元），這些存款均存在當時在上海開業的外國銀行，如花旗、麥加利、大通、友邦、運通、匯豐、荷蘭銀行等。」

4 孔祥熙於一九六七年在美國去世時留給四個子女每人一百萬美元。宋子文於一九七一年在美國去世時留下非固定資產一百萬美元，不動產約四百萬美元，其中不動產部分經過了長期升值。二零零三年宋美齡去世時留下遺產十多萬美元。一九五一年陳立夫赴美定居，以借錢辦養雞場為生，後養雞場因森林大火被毀，改做皮蛋、豆腐乳、辣椒醬、粽子等出售。

5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新民報》發表〈候天外飛機來——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頭〉，暗指孔祥熙用政府的飛機運自己的妻子、女兒、行李和洋狗等等。多家媒體不斷渲染此事，次年一月，共產黨發動昆明學生進行大規模遊行。蔣介石責成交通部長張嘉璈徹查此事。經調查，當時飛機上有二十三人，都是在港九轟炸之際匆忙逃離香港的，沒有人攜帶大批行李。其時香港交通阻絕，電話不通，無法一一通知需搶救人員，因此飛機尚有空餘座位，故有航空公司內部人員搭機，並儘量裝載中央銀行已運到機場的公物，至於四條「洋狗」，則係兩位美國駕駛員見仍有餘位，順便攜帶到渝。孔一小姐一向愛狗，前來接機時逗弄洋狗，不想被人看見誤會，致成一飛機「洋狗」的不實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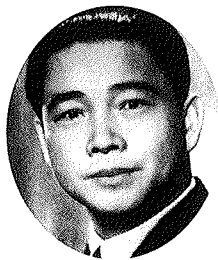
本家；要麼前進一步，把土地、糧食和雜貨鋪也統制起來。從經濟角度講，一九四九年社會主義改造只是一九四五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延續。蔣介石完成了經濟命脈的國有化，將農業和小商品的改造留給了毛澤東。後者涉及的人口更多，但分量還不如前者。整個過程猶如滾石下坡，很難說上半截代表邪惡而下半截代表正義、或是上半截代表正義而下半截代表邪惡。

孔祥熙雖然已經不謀其政，但並沒有因此少挨罵。攻擊和汗蔑取決於你是誰，並不取決於你做什麼或不做什麼。訓練有素的技術人員都清楚：同一個人和同一件事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塑造成正面或反面的典型。你不需要操縱所有讀者，只需要將甄別成本提高到一定百分比的讀者支付不起的地步。你不需要維持無限長久的效果，只需要在預定的時間段造成足夠的錯覺。事後即使敗露，也不會影響計劃的成功。統戰知識分子的問題在於技術能力有限，控制精度不高。毛澤東的秘書、中共文膽陳伯達和他的朋友們製造歷史虛無主義的時候，貪婪地吸納蘇聯的框架和日本的材料，只給國統區的粉紅色小朋友留了一點花絮。無論如何，這一切已經跟遠在美國的孔祥熙無關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孔祥熙在紐約去世。蔣介石為他撰寫了〈孔庸之先生事略〉，為其辯護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即我抗戰結束之初，共匪乃千方百計，造謠惑眾，動搖中外輿論，企圖推倒我國民政府者，必先推倒我財經當局之陰謀，於是其矛頭乃集中於庸之先生之一人，使其無法久安於位，而不得不出於辭職之一途，惟當其正式交卸其後任時，其在國庫者，實存有外匯九億餘萬美元，而其他金銀鎊等各種硬幣，所值美金一億三千萬餘元，尚不在此數之內，以上兩項合計，實值美金十億美元以上，乃可謂中國財政有史以來唯一輝煌之政績。在庸之先生功成身退之時，雖遭中外誹謗，所謂中國政府貪汙無能之共匪謠諑，社會之中，亦竟有受此影響而多存懷疑之心者，至此當可以事實證明，其為貪汙乎？其為清廉乎？其為無能乎？其為有能乎？自不待明辯而曉然矣！然當其辭職以後，國家之財政經濟與金融事業，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於是未及三年，共匪之陰謀達成，而我國家與民族，至今竟蒙此空前之浩劫，政府與人民且遭受如此奇恥大辱，更足證明孔前院長在其任職期間，自北伐剿共以致抗戰勝利為止之二十年中，不辭勞怨，不辯枉屈，而一心竭智盡瘁，報效黨國，其革命之精神，自足為吾輩與後世崇敬難忘者也。」

三、業餘搞政治的詩人

——汪兆銘



汪兆銘是行將滅亡的華夏精英之精英，集士大夫階級最好的品質和最壞的弱點於一身。他出身名門，絕非李宗仁、閻錫山那種出身於需要奮鬥才能進入士大夫階級的小康之家。山陰汪氏自嘉慶年間入粵以來，政績和著述皆有可觀。他的曾祖父汪价是平定苗瑤叛亂的主要功臣，一面鑿平苗人的屏障「天生砦」（寨），一面大力推行文教同化政策，奠定了湘西拓殖的根本，在魏源的《聖武記》當中占據了顯赫的地位，有作品《史億》流傳至今。他的祖父汪雲是妙高書院的名師，「清末四公子」之一的丁日昌為他作傳，稱他深得兩浙士大夫的愛戴：「及卒歸葬，多士送者數十里，有號泣不止者。」

他的父親汪琬是清朝晚期詩界的名家，《省齋先生詩存》代表了他的詩歌理想。清末是江西詩派盛行的時代，義寧陳氏（陳寅恪的家族）在其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江西詩

派的特徵是以文入詩、以哲化詩，極大地拓寬和深化了詩歌的傳統領域，但也把詩歌變成了文人化的遊戲，喪失了原初意義的詩。汪琬企圖跳出「尊唐」和「宗宋」的鬥爭框架，吸取漢魏的雄健和六朝的俊朗。他的追求終於在兒子身上實現了。汪兆銘自幼嫻熟陶潛和陸游，感時傷懷，別開生面，一掃明人偽唐詩的空疏做作和清人偽宋詩的生硬晦澀，成長為民國詩界的擎天一柱。

陳衍（石遺）稱汪兆銘和胡展堂為「粵東二妙」，「慨當以慷，不作一躲閃語」。而錢鍾書〈題某氏集〉（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識易成），其實就是指汪兆銘。錢鍾書雖然是卓越的文學批評家，但他對汪兆銘的理解卻不及石遺老人。原因部分在於性格。陳石遺多少比較接近清末「老新黨」的傳統，習於慷慨悲歌、任俠使氣，模仿明末狂生和東瀛志士的風骨。錢鍾書卻是赫胥黎、蕭伯納的繼承人，以傳統信仰及操守的解構者、諷刺者自居。另一部分原因恰好在於，錢鍾書是更加專業的批評家，將傳統文論的「唐宋之爭」納入了西方文論的框架，樂此不疲，有進無退。這種框架不幸無法容納「古近之爭」，只好忽略「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問題。「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敏銳地把握了汪兆銘詩歌的沉鬱悲懷和慷慨情懷，卻完

全誤解了他的師承。汪兆銘的文人氣太重，學不了詩經楚辭的天真質樸；志士氣太重，學不了郊寒島瘦的慘澹深密。阮嗣宗詠懷、陶淵明任俠的沉雄壯闊才是他的天性和追求。

汪兆銘的作品自身就足以說明問題。他的〈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臺）對照阮籍的兩首〈詠懷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諮嗟），可見胸襟格調之一脈相承。而汪兆銘不世出的傑作〈述懷〉（……哀哉眾生病，欲救無良藥。歌哭亦徒爾，搔爬苦不著。針砭不見血，痿痺何由作。驅車易水傍，嗚咽聲如昨……），更是直接體現了陶公的心、陶公的口、陶公的敦厚，簡直就是陶淵明〈和劉柴桑〉的自然延續。相形之下，蘇軾的〈和陶〉就顯得太機智、太近代了。

建安風骨、晉宋風流滲透了詩人汪兆銘的靈魂，即使在最拘泥形式的填詞當中，阮步兵和鮑參軍的心仍然透過朱彝尊和陳維崧的筆，頑強地流露自我。他的詞也是意高旨遠，功力已入化境。即使他畢生只寫了一首，只要華夏文化和華夏詩歌的傳統不致滅絕，任何忽略汪兆銘的文學史都會像忽略陶淵明的文學史一樣荒謬和不值一讀。

〈虞美人〉

空梁曾是營巢處，零落年時侶。天南地北幾經過，到眼殘山剩水已無多。

夜深案牘明燈火，擱筆淒然我。故人熱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為洗神州。

錢鍾書把汪兆銘視為善於作詩的政治家，其實汪的本性毋寧說是詩人，而搞政治只是業餘。他自幼有神童之稱，鄉試輕取第一名。如果不是科舉突然取消，王漁洋、趙甌北的盛名倚馬可待。他改投東京法政大學，同樣以儒雅風流著稱。他似乎天賦超人一等，屬於錢鍾書描寫過的那種人：他們平時懶洋洋不太起勁，稍一動作就把陳寅恪那種勤懇懇用功的學生甩下去，根本不把李大釗這種鬼混度日的社會活動家放在眼裡。他習慣了崇拜者的前呼後擁，並不喜歡政治的煩勞與骯髒。他仗著自幼養成、社會一直認可的自信心，覺得自己天生做什麼都是出類拔萃，覺得屈尊救國是一種自我犧牲，要不然同樣的時間精力不知道能夠寫出多少傑作。

民國清除老悖，為出身低下的年輕人開闢了無限的空間。蔣介石、李宗仁如果不從政，社會地位肯定會明顯降低。汪兆銘卻不是這種類型。他做大明、大清或日本的士大

夫，猶如探囊取物；做文人或學人，肯定技壓群雄。從政對他意味著降格和犧牲，這是有客觀依據的。他非常討厭事務性工作，既無趣又勞累；隨時都想回到文人的世界，這裡至少比較有趣。他的自我形象是精神領袖或清流領袖，而非政治首腦或行政首腦，希望別人聽了他的高見以後，心悅誠服地鞠躬說：「汪先生的卓見果然高明，我輩定當悉心研究！」一旦政治失去了抽象和浪漫的重大原則問題，他很快就會喪失興趣。

他畢生從政，不是為「救國」、「救黨」而犧牲自己，就是為抱澤之義或任性賭氣。一九二零年，他刺攝政王以前，致書胡漢民說：「我今為薪，兄當為釜。」三十年後，他的自期仍然是：「我失所學無所能，不望為釜望為薪。」用馬克斯·韋伯的話說，「為政治而生」和「靠政治謀生」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前者實際上是貴族政治的特徵，在秦政以後越來越少見。儒家一面強調理想士大夫應該是「為政治而生」的人，一面又無法阻止社會扁平化的趨勢，只有指望修身養性的力量。汪兆銘終生「為愛國而生」，在「吃愛國飯」的民國人物當中非常罕見，因此總是給人留下鶴立雞群的印象。熟悉他的人不懷疑他動機的純潔，也無法勸說他忌憚敵人的毀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雖然是一九八零年代北島寫的現代詩，但汪兆銘並不是不知道。問題在於他驕傲而自信，覺得任何人只要足夠聰明和愛國，肯定能夠理解他的動機，至於蠢

人和壞人，他根本不屑於反駁。

如前所述，辛亥是雞鳴狗盜之徒發跡變泰的大好機會。汪兆銘以刺攝政王的大功，本來不難索取高官厚祿，他居然一介不取。袁世凱不願遷都南京，他振振有辭地爭辯。袁世凱不以為忤，反而有意招徠，他也拒絕了。他認為革命只是人生的插曲，大功告成以後就要返回自己的軌跡，再次出國留學，直到孫文遇到危難。

早期國民黨人大多數都曾在某一個階段背棄孫文，他卻在孫文不需要幫助的時候才會離開。他是國民黨內有數的理論家，陪伴孫文走完人生最後的旅途，為孫文草擬遺囑、編輯遺稿。他有繼承孫文地位的極好機會，如果他願意跟蘇聯人結盟的話，蔣介石和胡漢民都很難跟他競爭。他沒有這麼做，不是因為反對蘇聯，而是因為他缺乏耐心和覬覦大位的決心，也不清楚自己想要採取什麼政策，拂袖而去反倒符合他的自我形象。

汪兆銘對蘇聯的觀感惡化，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暴動¹以後。他在當年

¹ 廣州暴動是國民黨發動清黨後，由共產國際策動的第三次武裝暴動，時間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由瞿秋白率領。

四一二分共以後還反對蔣介石，要求武漢國民政府團結蘇聯，甚至在共產國際試圖奪取兵權以後，仍然禮送出境，自以為很對得起後者，留下了以後相見的餘地。他和張發奎在廣東組織反蔣聯盟²，以為共產黨只是蔣介石的敵人，跟他無冤無仇，因此允許共產黨自由活動。結果蘇聯領事館赤膊上陣，占領廣州後大肆屠殺資本家。經此一役，幾乎所有國民黨左派都覺得共產黨不講道義。等後來蔣介石推行聯蘇反日的政策時，汪兆銘反而變成最堅決的反對者。蔣介石嘲笑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蔣介石為了敷衍他（而不是為了忌憚蘇聯），才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³，但並不認真執行。汪兆銘覺得蔣介石不可救藥，終於徹底決裂。

汪兆銘對蘇聯——日本——國民黨三角關係的看法並不是他個人特有的，當時的知識界普遍持有這種看法。章炳麟以中華民國遺民自居，拒絕承認黎元洪大總統以後的歷屆政府，稱孫文為魏忠賢，視北伐的成功為民國的滅亡，幸災樂禍地表示國民黨一定不會有好下場。因為建設和改革都需要時間，而國民黨已經沒有時間了。汪兆銘承認章炳麟看法的正確性，表示中國自強至少需要三十年時間，然而，他在這裡陷入了國民黨人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如果三十年的和平必不可少，那麼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外交就是錯誤的，而北洋政府的審慎根本不是賣國。北伐本身就是導致遠東勢力均衡體系瓦解的根源，

取消了西方列強在亞洲大陸的條約權利，也就消除了列強干涉遠東事務的動機，將東亞留給蘇聯和日本逐鹿。國民政府破壞了條約體系，也就喪失了條約體系的保護。北洋政府之所以沒有遭到侵略，主要不是因為自己強大，而是因為列強的干涉和條約體系的保護。國民黨撕毀條約所得的利益，就像蠢人違背法院和警察意志而吞沒的贓物，隨時可以被其他違法者黑吃黑，因為後者知道警察不會保護他。

一九二七年以後的東亞變成了國際體系拒絕保護的地區，猶如今天的敘利亞，自然淪為僭主戰爭的戰場。然而對於中國（和敘利亞）而言，這種情況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是改朝換代的正常狀況。僅僅因為帝國主義的存在，大清的瓦解才沒有造成赤裸裸的五代十國狀態。如果其他人有理由抱怨，至少國民黨沒有這樣的理由，因為北伐就是他們發動的。汪兆銘的希望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恢復條約體系就是說國民政府不該存

之前兩次暴動是南昌暴動與秋收暴動。

2 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張發奎與汪兆銘結成聯盟，張發奎所率第二方面軍內部，政治部主任是郭沫若，第二十四師師長是葉挺、第四軍參謀長是葉劍英，皆為共產黨員，此為汪兆銘其後「一朝被蛇咬」埋下伏筆。

3 一九三七年一月，在汪兆銘竭力奉勸蔣介石推行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當其時，反共必然幫助日本，反日必然幫助蘇聯。毛澤東就曾指出，該決議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不利於團結的」。

在，保存國民政府就逃不了國際協調瓦解的後果。他無法魚和熊掌兼得，只是出於對國民黨的情懷，不做最後一次救黨努力，心不能安。國民黨是孫文臨終託付給他的孤兒，因此他畢生擺脫不了白帝城情結。如果國民黨一定要自取滅亡，他至少要死在國民黨前面。他知道做革命黨就是要橫死的。遇刺以後子彈無法取出，醫生早已告訴他只能指望十年壽命。他的烈士情結重新燃燒起來（指建立親日政府），不因歲月而磨滅。烈士的命運就是柴薪的命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他的本分。重慶國民政府對他的親日政府的毀謗，恰好就是他對大清的毀謗、廣州國民政府對北洋政府的毀謗，彷彿冥冥之中自有天道。

汪兆銘覺得和談可以成功，因為日本人占領中國內地的動機不比以色列占領加薩的動機更多，問題在於滿洲。蔣介石無法奪回滿洲，又不肯承認失敗，讓滿洲變成另一個臺灣，於是就乞靈於類似巴解組織和真主黨的手段，依靠違反戰爭規則的襲擊破壞來騷擾日本。日本於是在華北和滿洲之間建立隔離地帶，猶如以色列在南非巴嫩建立保護加利的緩衝區，從《塘沽協定》到盧溝橋事變的一系列衝突都是因此而起，並不是日本貪圖貧困、且無法開發的中國內地。中國如果願意恪守停止襲擊騷擾的承諾，日本人根本無須以戰迫和，九一八策劃者石原甚至主張連緩衝區都放棄。

然而蔣介石並不像汪兆銘想像的那樣蠢，他知道這樣的和平意味著滿洲的永久喪失。東北亞的經濟發展中心在滿洲，華北只是外圍原材料和勞動力基地。時間對蔣介石不利，隨著滿洲的迅速發展，華北的離心力反而增加。他只能在滿洲產生特殊共同體意識以前，抓住最後的機會視窗孤注一擲。他不能指望勝利，只能指望兩敗俱傷。兩敗俱傷就是蘇聯外交的勝利，作為漁翁得利的第三者而繼承亞洲大陸。每個人都看清了形勢，得到了自己應該得到的，失去了自己不該奢望的。汪兆銘這樣的性格，自然不願意活到親眼看見結局來臨的時刻。

下面這幾首詩是明白人為汪兆銘和國民黨所作的悼詞。糊塗人則一如既往地充當犧牲品，至死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犧牲。

陳寅恪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

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誰結宣和海上盟，燕雲得失涕縱橫。
花門久已留胡馬，柳塞翻教拔漢旌。
妖亂豫麼同有罪，戰和飛檜兩無成。
夢華一錄難重讀，莫遣遺民說汴京。

錢仲聯

太息孫胡逝，艱危仗一人。
河山終復漢，志業邁椎秦。
神理資籌筆，先幾在徙薪。
雲霄垂萬古，八表共沾巾。
去國霾黃霧，魂歸降玉棺。
身先諸願盡，病為眾生殫。
填海心終切，回天事已難。
山頽我安仰，空有紙剝肝。

拯溺情難恕，甘心積眾誣。
五年憑赤手，百折奠黃圖。
憂國廬深抱，憐才到腐儒。
淮南雞犬感，無路向清都。

葉嘉瑩

曾將薪釜喻初襟，舉世憑誰證此心。
未擇高原桑枉植，憐他千古作冤禽。

四、總是錯估歷史位置的道德家

——蔣介石



蔣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的生平無須重複，只是性格和環境的互動需要釐清。他的成功不靠敏銳的智力，主要依靠超人的勤勉和忍受逆境的堅韌。「其介如石」確實是他最好的寫照。從好的方面說，他總是堅持得比別人更久。從壞的方面說，他的堅毅往往對自己的事業有害。成也介石，敗也介石。他把自己的性格特徵投射給國民黨，使傲雪凌霜的梅花（國民黨視梅花為黨花，並以三蕾五瓣指代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變成了國民黨的象徵。

他的才智不在思辨方面。辛亥之際，人人胸懷韜略。小人物忘記了自己的無足輕重，恣意享受指點江山的快感。蔣介石在杭州和上海的光復中頗有功績，至少比湖南的師範生毛澤東功勞更大。後者高談闊論民國的理想政體，他卻對抽象原則興趣缺缺。他在北

伐以前的歷次冒險行動中，扮演了衝鋒在前，卻成了遭到筆桿子忽略的角色。他自己缺乏理論創作的愛好和特長，應該為此承擔部分責任。

在此期間，蔣的思想大體屬於外圍追隨者的類型。他懷著模模糊糊的恨，渴望打倒帝國主義，卻沒有明確的愛。黃埔軍校給他提供了機會，使不善言辭的實幹家能夠勝過朝三暮四的空談家。國民黨高層充滿了指手畫腳的文人，缺乏吃苦耐勞的幹才。蔣任性的程度比所有競爭對手都要小得多，在更長的時間內保持了工作的連貫性，因此在每一次鬥爭後都處在比鬥爭前更有利的地位。

作為軍事家，蔣介石沒有超出業餘愛好者的水準。東征和北伐的軍事指揮並不出色，勝利主要是因為對手比蔣更缺乏決心和耐力。蔣介石自己承認，他喜歡打孤注一擲的戰爭。也就是說，打沒有後備軍的戰爭。一旦失敗，就會全線崩潰。失敗才是檢驗科班生的試金石，蔣在這方面的紀錄糟糕透頂。南昌戰役、淞滬戰役和一九四八年的戰爭都是這樣，最精銳的部隊放在前線最危險的地方，最不可靠的部隊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戰線背後留下巨大的真空。他希望依靠嫡系部隊旺盛的革命精神，迅速瓦解意志薄弱的敵人，用聲勢彌補自己不能持久的弱點。然而萬一敵軍深入毫無準備的後方，撤退就會變成無

法控制的潰敗。他的嫡系很容易消耗殆盡，並很難得到充分的補充；非嫡系部隊很容易背叛，卻很少受到應有的懲罰。他酷愛王陽明哲學的原因很像日本海軍將領，唯意志論相當於孤注一擲的突擊。如果突擊失敗，那就只能不成功便成仁。根據這種思路，短期戰役的勝利取決於武德。長期戰爭是工業基礎和經濟基礎的延伸，他不願意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因為他沒有這些基礎，又不願意承認自己打不贏這種沒有基礎的戰爭。

作為政治家，蔣介石的優點和弱點同樣突出。他有強烈的責任心和原則性，有知人之明和容人之量，是最佳的守成之主和中級管理人員。但他非常缺乏掌握複雜格局的敏銳感覺，沒有從紛繁表象中抽取結構的透視力，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始終判斷錯誤，極其不適合處置危險和敏感的外交與地緣問題。他在勝利時不理解勝利的原因，在失敗時也不理解失敗的原因，總是得出錯誤的因果聯繫，吸取錯誤的經驗教訓。他用堅毅不拔和埋頭苦幹贏得的資本與機會，因為盲目和固執而虛擲。他習慣將自己的性格力量 and 道德修養當作主要資源，自負為英雄和聖人，輕視物質環境的約束力量，將自己製造的困難視為有益的考驗，重視過程超過重視結果，因此一再蔑視最英明的警告，一次又一次地置之死地而後生。

做他的敵人，通常並不危險，因為驕傲的寬恕非常符合他的自我形象。做他的朋友，通常極其痛苦，因為他習慣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人，猶如苛刻地訓練自己。誰能不同意抗戰時期的黃埔軍人呢？他們的薪水連大後方的傭人都不如，聽任妻兒死於饑餓。他們如果搞湘軍式的土政策養軍，很可能被作為貪汙犯槍斃；如果兵敗不死，更有可能遭到槍斃。然而，雜牌軍（如韓復榘）和八路軍（如葉挺）做同樣的事情，就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是任何其他黃埔軍人，肯定會在一開始就被槍斃。蔣介石在抗戰時期親自下令槍斃的自己人為數之多，除蘇聯以外絕無先例，非嫡系軍官只是寥寥無幾的點綴，卻占據了後人極不相稱的想像力空間。史達林提醒他要誅殺數百萬動搖分子，才能杜絕中國人民的背叛。他卻嚴懲嫡系，懷柔外人，天真地信任道德感化的力量。

早在東征時期，他就知道自己的任務是驅使最忠誠的朋友去死。北伐勝利後，他哀歎清白之身一去不復返。抗戰時期，他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將非人的待遇強加給部下，而後者只要背叛，就能獲得統戰對象的優待。他一面在日記中請求上帝解救，一面在現實中堅定地拒絕一切能夠減輕負擔的建議，因為這些建議肯定會要求他放棄滿洲，使北伐和抗戰的犧牲都變成徒勞。然而，他拖延越久，面臨的條件就越差。一九二七年的日本仍然非常不願意破壞條約體系，甚至比英國人更不願意干涉南京事件¹，但一九三零年

的日本財團和外交家已經承認，不能指望國民政府信守諾言。一九三五年的外務省再度轉入妥協派手中，但滿洲反蘇堡壘的地位已經確定，除非蔣介石願意加入反蘇聯盟，否則就不會有真正的機會。盧溝橋事變暴露了蔣介石在外交方面的一廂情願，英、美拒絕將戰爭責任放在日本身上。八一三的主動出擊既沒有殲滅日軍，也沒能將列強拖下水。他在這時仍然試圖同時爭取蘇聯、德國和美國的支持，表現的國際常識連普通的報刊專欄作家都不如。從此以後，他已經註定失敗。日本勝利，肯定會留下滿洲國。日本失敗，肯定會將東北讓給蘇聯。蘇聯人、日本人、胡適、汪兆銘、蔣廷黻、章太炎和毛澤東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他拒絕相信。

珍珠港毀了日本，卻沒有挽救他，因為美國人仍然對內亞缺乏興趣，更不會同情他的大中華思想。魏德邁²將軍是美國人當中最同情他的，只能建議列強共管東北，卻引起他歇斯底里的反抗。他堅持國民革命的初衷，要所有列強滾出亞洲，也就是說要跟蘇聯單獨相處，於是就得到了應有的下場。從國際體系的角度看，這種結局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時就已經具備輪廓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努力破壞一切能夠保護他的因素，加速結局的來臨。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宣傳，構建錯誤的因果關係和錯位的解釋——例如：滿蒙危機不是撕毀五族共和的自然反動，而是日本人的單方面陰謀；軍部的勝利

不是他打擊外務省的自然結果，而是甲午戰爭以來的必然發展；蘇聯的干涉不是北伐的組成部分，而是史達林道德敗壞的產物；蘇聯即使得到東北也不會守信，史達林已經在類似的情況下將希臘共產黨出賣給英國人；如果不是國務院的匪諜破壞，美國人本來有可能為內亞而反對蘇聯³；廣州、重慶和臺北沒有什麼不同，革命高潮可以永無止境地重演——這些理論唯一的共同之處，就是全部屬於胡說八道。

尤其可悲的是，他當真相信這些檔次很低的宣傳。史達林的宣傳不比他檔次高，但

1 南京事件，是一九二七年北伐軍隊攻占南京時發生的暴力排外事件。三月二十四日，進入南京之國民革命軍第一、第六軍（第二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共產黨員）開始劫掠。南京城內和下關的外國領事館、教堂、學校、商社、醫院、外僑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和震旦大學預科校長（義大利人）遇害。國民政府與其他各國大多認為，此事件是北伐軍裡潛伏的中國共產黨員所策動。蔣中正在上海清共成功後，發布了通緝南京事件禍首李富春和林祖涵（林伯渠）的通緝令。而日本由於若槻禮次郎首相堅持「不干涉中國內戰、支持蔣介石統一運動」的政策，當時沒有追究責任。

2 魏德邁（1897-1989），美軍上將，二次世界大戰時於東亞服役，一九四四至四六年接任史迪威為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及駐中國美軍指揮官，他曾向美國政府參謀總部建議派遣美軍七個師進駐滿洲，協助國民黨軍接收，對抗蘇聯，但沒被採納。

3 國民黨的神話是，把自己在中國的失敗歸罪於美國的赤色分子。認為如果沒有他們破壞美國政策，美國本來會幫助國民黨打敗共產黨。然而實際情況是，美國人民不想管亞洲大陸的事情，對國民黨的大中華沙文主義也不滿意，赤色分子只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即使沒有他們的破壞，美國在二戰後也會非常傾向於重返孤立主義。

史達林自己始終無比清醒和現實。跟蔣介石後來的遁詞相反，史達林並沒有一以貫之地害他，在抗戰時期和戰後初期反而向他提過許多馬基維利主義的建議，至少可以大大增加他在國內的地位。如果他是因為道德的原因斷然拒絕，至少能為他的原則性增光，但他明顯是根本理解不了馬基維利主義的真正意義。在此期間，毛澤東對史達林一直提心吊膽，覺得自己隨時可能淪為大元帥送給委員長的見面禮。這種可能性沒有實現，主要是因為蔣介石的緣故，而不是史達林的緣故。

他在失敗時顯示人格的偉大，在成功時顯示才能的平庸，不是一次而是一再如此。民國初年充滿了自我吹捧的成功投機者，他卻是有功不求賞的極少數。他主持黃埔軍校，主要暴露了軍事專業水準的低劣。一九二七年的南京分裂政府依靠敲詐上海資本家為生，財政基礎比蘇聯資助的共產黨差得多，本來當時就會上演一九四八年的劇本，在列強和蘇聯的兩面夾擊下崩潰。英、美出於歐洲的因素向他妥協，卻使他相信了大國崛起的可能性，進一步壓迫蘇聯和日本讓步，其結果是只得再次拋棄南京。他在重慶幾乎完全依靠性格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苦撐，依靠奇蹟的許諾維繫越來越少的支持者，默然承受敵方顛倒黑白的宣傳。日本人的宣傳幾乎完全針對他個人和極少數親信，例如英、美帝國主義走狗、四大家族和官僚資本的發明，主要就是為了切割蔣介石集團和大多數潛

在的統戰對象，因為他們相信，一個理性決策者不可能願意打這種缺乏合理目標的戰爭，排除蔣介石就能得到和平。胡適和汪兆銘都不相信的奇蹟居然發生了，他卻用所能選擇的最壞方式，重新犯下了中東路事件以後的一切錯誤，因為在他的認知圖景中，證明自己最終正確非常重要，承認自己的弱點非常不重要。

在一九五零年前後，蔣介石又回到了多次體驗的眾叛親離狀態，又一次表現了超人的毅力和寧靜，除了完全相信自己的正確以外，幾乎不需要任何支援。這時追隨他的知識分子段書怡、谷正綱之流所能指望的，不外乎蔣介石夫婦自己享用的鹹菜、稀粥，以及跟投機分子劃清界線的道德傲慢。與此同時，柳亞子和茅盾正在北京享用六國飯店、魚翅和蘇聯專程送來的特供保健品。他的主要敵人忍不住敬佩他的節操，同時鄙視背叛他的人。毛澤東說：「原本想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幫助整黨。想不到他們這樣不可靠，最壞是民主同盟，他們是男盜女娼。」這些毛口中的「男盜女娼」在一九五七年的下場，主要就是因為這種前緣。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驚訝地發現，北京的內圈要人仍然非常佩服蔣介石的品格，跟他們對外國和群眾的宣傳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戰後的日本。岸信介和保守派元老對蔣介石個人非常敬畏，對蔣介石的政權卻沒有什麼尊重，在一九七二年外交革命以後仍然不改。能夠多次在敵人當中贏

得這樣的反應，絕不是僥倖成名的冒險家和偽君子所能做到的。

他在文武百官不聽號令的時刻，突然又顯露出中級管理人員的幹練之才。他事必躬親，纖毫不差地計算舟山的每一個村落、大陳的每一戶人家（指一九五零年的舟山大撤退和一九五五年的大陳島撤退）。優秀的戰術家和盲目的戰略家奇異地融合在他一人身上。宋美齡和宋子文都不相信的奇蹟居然再一次降臨，獎賞執著，懲罰機智。從朝鮮半島的珍珠港（指韓戰）直到他生命的末日，他一直在期待下一次抗戰勝利日。他知道朋友和部下都不相信，但他早已習慣了大多數人的懷疑和謬誤。歷史一再證明他正確在最後，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華盛頓·歐文的《阿爾罕伯拉》（《大食故宮餘裁》）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老國王的兩個女兒性格不同。大公主膽大放肆，小公主聽話懦弱。老國王起初糊裡糊塗，自由放任。大公主私奔以後，他大為惱怒，然而無濟於事。馬後砲的家規家教全都落到老實的小女兒頭上，使得小女兒後悔當初為什麼沒有跟姐姐一起逃走。蔣介石逃到臺灣

以後，總結歷史教訓的方式，跟這位老國王很有異曲同工之妙。臺灣人得到的待遇，跟這位小公主也頗為神似。歷史應該怎樣全面評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在蔣介石自己的內心中，他是因為太仁慈、太民主、太講道義才吃虧上當的。

他在日記中發洩說，這些仁義道德的美好價值都變成了毀滅的禍根。他一度非常尊重滿口自由和憲法的知識分子，為了贏得這些人的讚美，一再犧牲了自己最忠誠的部屬，然後親眼看到這批法利賽人面不改色地拋棄他，跪倒在根本不尊重任何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主子面前，油腔滑調地嘲笑自由和憲法的虛偽性。在經歷了這一切以後，他居然沒有淪為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者，多多少少還是有些令人佩服的地方。不過，他理解因果關係的能力並沒有什麼進步。我們可以合理地推論，他的理解力天花板跟普通地鐵上的報刊讀者差不了太多。普通人的認知特點就是：對於他理解不了的複雜局面，很快就會退回到舒適的道德判斷上。因為他們都是不講道義的惡人，這就足夠了。

國民黨從整體上講，就是一群拿錯劇本的演員。蔣介石作為這批人的領袖，經常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歷史地位。他在抗戰以後扮演的所有角色、甚至在臺灣的角色，都

充滿了這種悖謬性。由於他後半生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堅守了冷戰鬥士的崗位，往往給粗心的讀者造成誤會，以為他一直是這種人。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九四五年的接收和一九四九年的解放並不是兩條對立的路線，而是國有化的兩個不同階段。打倒官僚資本、擁護社會主義的真實意義，跟打倒資本主義、擁護市場經濟的真實意義是差不了多少。近代史專家的心智柔性已經發展到如此歎為觀止的境界，你就很難指望他們能夠以大致正確的比例感理解二十世紀的基本格局。首先，我們要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都在向左轉，只是程度和方式有差異。大體上講，當然也僅僅是從大體上講，蘇聯最激烈，德國次之，英、美最輕微。在一九三七年以前的遠東，蘇區最激烈，滿洲國次之，國民政府再次之，日本比較輕微，香港和上海租界甚至比歐洲和美國更輕微。戰爭爆發以後，左傾秩序發生變化。國民政府的左傾程度超過了滿洲國，後者又超過了汪兆銘政權。

重慶方面會發生這種變化，大致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宋子文主持的財政改革有階段性。在幣制改革和央行改革以後，金融界已經處在官督商辦的狀態。在資源委員會掌握了少數命脈企業以後，多數但分散的私營企業已經不能逃避柔性計劃經濟的總體部署。即使沒有戰爭，進一步的改革方向也已經沒有多少懸念。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這些

官僚資本或社會主義的改革，國民政府根本不會有考慮抗戰的現實可能性，多半會像泰國一樣默認失地，坐視日本和蘇聯在長城以外龍爭虎鬥。其二，遷都重慶以後，絕大部分的私營企業和幾乎全部的私營金融業留在了淪陷區。內遷的少數企業失去了上海的金融支持，幾乎無法運作。政府的貸款和訂單是他們唯一的生存之道，實際上已經成為準國有企業。與此同時，國府的軍事、交通和建設事業大多以國有企業的形式展開。歷史路徑的慣性和戰爭形勢的逼迫相互支持，造成可想而知的後果。

汪兆銘儘管在戰前代表比蔣介石更左傾的派系，但他的南京政權卻並非如此。主要原因在於形勢的弔詭。汪兆銘政權的財政形勢比戰前和戰後的蔣介石政權更有利，因為他保留了稅收基地所在的膏腴奧區，擺脫了蔣介石必須敲詐上海商人，用重金收買內地各省的路徑。日本人的限制使他無須、或不能供養蔣介石必須供養的大批軍隊。這些軍隊是惡性通貨膨脹和企業國有化的主要刺激因素。再加上汪政權轄區遭到的轟炸比日本本土和重慶少得多，又有上海金融業的近水樓臺之便，相對而言就變成了經濟發展比較有利的地方。法幣和偽幣的比價消長和戰線兩側的走私貿易明顯是有利於南京一方的，而且優勢有逐步擴大的傾向。由於戰爭的勝負取決於汪、蔣雙方都不能控制的國際因素，成王敗寇的邏輯不能允許後人承認一九四五年的實際情況。接收是一次大規模的國有

化，至少比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強占北洋舊人財產的舉措規模大得多。如果你在汪兆銘政權轄區經營企業，那你就很難證明你的企業和敵偽財產有什麼區別。如果你認真察看一九五零年代國有企業的歷史，就會發現它們大部分居然來自一九四五年的東北日資企業和東南華人企業，而冷戰雙方都想讓你相信，國有化肯定出於蘇聯盟友的策劃。

一九四五年的接收和偽幣兌換都是重慶方面對淪陷區居民的惡毒報復，部分出自以下這種讓人不太值得敬佩的心理：我們在山溝裡過了這麼多年苦日子，看到你們在沿海地區這麼舒服，實在難以忍受。傅斯年不假思索地暴露了這種心理——一九四五年回北大時，將所有留京的教職員全部開除，說「漢賊不兩立」——但具備這種心理的人絕不是只有他一個。淪陷區居民並非不清楚，重慶的勝利主要不是因為傅斯年之流自己的努力，看到這種知小而謀強、沐猴而冠帶、器小而易盈、無德而用事的表演，出於政治正確的理由，不便公開說抗戰的壞話，卻不見得不高興看到這些傲慢的征服者在另一方面倒楣。

臺灣作為沒有受到戰爭和戰時社會主義波及的地區，在大正式舊資本主義的籠罩下，民生尚稱小康。國民黨對這塊土地的改造，無論土地改革、接受敵產、金融改革、

基礎建設，都是大大加強了統制經濟的比重，主要以臺灣原有精英階級的犧牲為代價。臺灣人對蔣介石的感受，比較接近上海市民對陳毅的感受，不能簡單地等同於韓國市民對朴正熙的感受。一刀切的威權主義分析法低估了遠東形勢的複雜性，才會得出千奇百怪的結論。

蔣介石對自己扮演的角色，從來就沒有清晰的理解。他晚年越來越深地陷入自己的特殊世界，把臺北當成新廣州和新重慶，等待再一次返回南京的時刻。他從來沒有理解經濟模式的能力，又不能放棄世界四強的愉快幻想，本能地不願關注地方性事務，結果給了臺灣社會發展下一代精英的機會。七十年代以前，政府主持的基礎建設分量較大。七十年代以後，民間企業的發展日益占據主導地位。這其實不僅是臺灣的形勢，也是全世界的潮流。從一九一七年開始的左傾化運動在七十年代達到最高峰，隨即向相反的方向擺動。同上次擺動一樣，也是波及全世界，只是程度和方式有別。由於在臺灣的特殊環境下，國有和民間兩種經濟對應著兩個社會，兩者之間橫互著扭曲的痛苦和記憶，從這次擺動開始，未來的趨勢已經不可能扭轉了。你在越過道路的節點以後，是很難改變道路的方向的，至多只能加快或放慢速度。蔣介石沒有能力理解和預見這條道路的終點，對他而言無疑是一種福佑。這是一個湯瑪斯·哈代式⁴的故事，人類無法擺脫盲目

或誤判的玩弄。當你自以為吸取了歷史教訓的時候，你總是吸取了錯誤的教訓。

4 湯瑪斯·哈代 (Thomas Hardy, 1840-1928)，英國作家。哈代的小說具有濃厚的悲觀色彩。悲劇都是冥冥中由神的意志安排定當的，無論人們怎樣努力和反抗，總逃不脫神的意志的主宰。

五、製造幻覺的憲法專家

——張君勱



張君勱（1887-1969，江蘇寶山人）出身寶山儒醫家庭，十六歲應寶山鄉試中秀才，次年轉到江南高等學堂。一九零六年，他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研究政治經濟學，結識了梁啟超和張東蓀¹。他在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約翰·穆勒議院政治論〉和〈論今後民黨之進行〉，奠定了他在立憲派圈內的最初聲譽。立憲派和革命派正在爭奪東京留學生的支持，文鬥、武鬥兼而有之。研究與實行之間的距離不可思議地縮短了，超過了當事人自己的期望。由於康梁和慈禧太后的私仇，保皇黨在國內無法公開活動。

¹ 張東蓀（1886-1953），曾為進步黨、憲法研究會骨幹，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曾受維經斯基邀請參加組黨，但退出。在科玄論戰中支持張君勱，後一道發起成立國家社會黨。抗戰後期向中共靠攏，最終與張君勱分道揚鑣。一九五一年捲入「美國特務案」，死於秦城監獄。

梁啟超機智地想到一個好主意；敏感人物隱身幕後，徒子徒孫前臺活動。張君勱身為立憲派第二代選手，自然當仁不讓。一九零七年，政聞社²在東京錦輝館成立。張君勱以發起人身分致辭，張繼和大批同盟會員趕來砸場。革命黨人大罵「馬鹿」，立憲派紛紛落荒而逃。這場武鬥似乎預示了今後幾十年的歷史進程，勝利很少屬於缺乏戰鬥意志的一方。政聞社的路徑是依靠肅親王和各省士紳的支持，發動召開國會的請願活動。同盟會的路徑是依靠黑龍會和幫會豪傑的支持，發動排滿革命。朝廷對兩者都不能容忍，實際上等於偏袒後者。因為請願的成功依賴於雙方的同意，革命只需要單方面的決心。

一九零九年，東京立憲派成立了諮議局事務調查會。調查會的宗旨是配合各省士紳的籌備會議，向朝廷施加輿論壓力，爭奪新政的路徑主導權。朝廷所謂的立憲，其實是滿漢勳臣子弟企圖收回湘淮軍士大夫篡奪的權力。九年立憲計劃的關鍵不在於太快還是太慢，而在於這份路線圖是根據親貴培訓計劃量身訂製。李鴻章和袁世凱的集團能夠架空朝廷，關鍵在於他們掌握了「與國際接軌」的要害管道。僧王和端王之所以失敗，關鍵在於他們陷入了自我封閉的小圈子。長此以往，大清勢必落到冬蟲夏草的下場³。

朝廷經庚子之變，痛定思痛，勵精圖治，已非昔日的封閉狹隘。親貴立憲派決心逆

轉保守。八旗和革新。漢官的格局，自己承擔「與國際接軌」的重任，使後者無牌可打。皇族組閣，八旗組成禁衛軍，滿洲子弟留洋學習政治，漢軍子弟留洋學習軍事，都需要時間。等到他們學成回國，徐世昌、段祺瑞之流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袁世凱倒臺只是第一步，吳祿貞、藍天蔚之流只是過渡性質，代幼主看守門戶而已，最後一步必然會將乾隆爺的美好時代和威廉皇帝的美好未來結合在一起，將喪失利用價值的之前的團結對象扔進歷史垃圾堆。

文人或許會被立憲的革新標籤糊弄過去，但湘淮各省實力集團卻不是白痴。清末的分離主義興起，不可能沒有他們的默許。朝廷如果做得過分，這種隱含的威脅就會變成現實。上海《時報》發表的〈論滿洲當為立憲獨立國〉直接針對宮廷集權的立憲新政，提出各省分立的立憲新政，實際意義就是搶奪立憲這面似乎頗有吸引力的大旗。梁啟超

2 一九零七年十月十七日，由梁啟超、蔣智由、徐佛蘇等人在日本發起成立，以配合清政府「預備立憲」。梁啟超等提出「實行國會制度，建立責任政府」等四大政綱，並創辦刊物《政論》，主張君主立憲。政聞社採取維護滿清統治的立場，故遭到革命黨人反對。

3 冬蟲夏草是被真菌從內部侵占的動物，相當於和平演變的意思。士大夫從內部架空大清，一直是滿洲蒙古貴族的憂慮所在。

趕緊宣佈支持聯邦制，正如孫文重申支持美國的合眾政府。梁啟超和孫文的門徒隨即跟進，歐榘甲⁴與楊守仁⁵規畫了廣東和湖南的「獨立自治」方案。張君勱是諮議局事務調查會的靈魂，在報告書中闡述了朝廷的所有反對者所能達成的最大公約數：以現有的地方士紳為選民團，首先籌辦各省立憲；在新軍新政的幹部培訓完畢以前，由各省諮議局產生議院。這是一個「絕地大反攻」的方案，能夠同時滿足北洋舊人和張園名流的欲望，只有載澤⁶、蔭昌⁷的滿洲親貴集團滿盤皆輸。後來的歷史大體從這條路徑展開，儘管從純粹技術角度講，梁啟超和孫文門徒的西學和新學，在親貴立憲派專家面前只能算半路出家的速成班。張君勱是優秀的政治精算師，卻沒有多少宣傳鼓動家的才能，在這一階段已經流露出來，到晚年也沒有改變多少。

一九一零年，張君勱回國，以法政科進士的資格入翰林院，應驗了「愧無齒錄稱前輩，幸有牙科步後塵」的諷刺⁸。袁世凱復出，迅速置親貴於死地。立憲派在一九零九年籌劃的最低綱領，至此已經實現。這時，張君勱的策士天賦再次發揮出來，他建議梁啟超拋棄君主制，借助袁世凱壓制老對手革命黨。梁啟超欣然同意。民主黨和後來的進步黨秉承了這項基本政策。張君勱奔走京滬之間，為梁啟超前驅。梁啟超回國後，為了培養本黨下一代的骨幹，以憲法新聞社名義，安排他赴歐洲遊學。不久，他在柏林大學

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他在歐洲期間，國內經歷了洪憲帝制和法統重光。他回國後，首先在上海編輯《時事新報》。梁啟超在北京組織憲法研究會，大體上續接了舊進步黨的衣鉢。張君勱北上協助，參加了鼓吹對德宣戰和反對張勳復辟的活動。新國會（安福國會）成立後，研究型官員逐步淡出政壇。此後，他在北京大學任教。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和梁啟超再度遊歷歐洲。在此期間，他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密切交往。他後來關於國家社會黨⁹的理論，大體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流行思

4 歐榘甲（1876-1911），廣東歸善人，康有為門生，一九零二年著《新廣東》，主張廣東獨立。

5 楊守仁（1872-1911），湖南長沙人，受《新廣東》影響撰寫《新湖南》，主張湖南獨立。

6 載澤（1868-1929），滿洲正黃旗人，出洋考察五大臣中最年輕的一個人，歷任度支部尚書、籌辦海軍事務大臣、纂擬憲法大臣，宗社黨要人。

7 蔭昌（1859-1928），滿洲正白旗人，清末陸軍大臣，武昌首義後率軍南下鎮壓起義軍，北洋軍不聽指揮，清廷只得起用袁世凱。

8 《國聞備乘》卷二：「王闈運晚年被薦，特旨授檢討，已七十餘矣，時科舉早廢，遊學生返國試高等，有牙科進士亦同時授館職，王闈運因撰聯自嘲云：『愧無齒錄稱前輩，幸有牙科步後塵。』」

9 一九三二年，張君勱組織中國國家社會黨（民社黨前身），一九四六年，中國國家社會黨及中國民主憲政黨於上海市合併，變成民主社會黨，簡稱民社黨。張君勱創國家社會黨，是受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之影響。NSDAP通稱納粹黨，由希特勒領導，在德國議會大選中獲勝，納粹黨執政後，威瑪共和時代結束，德國進入希特勒獨裁時代，俗稱納粹德國或者第三帝國。

潮的回音。他近距離觀摩威瑪制憲的進程，歎為觀止，即使在威瑪共和國滅亡以後仍然不改。這部威瑪憲法非常符合知識分子的口味，吸收了各種最先進的理論，將聯邦制、福利制、比例代表制、人民複決權、總統裁斷權融為一體，從理論上講應該像瑞士一樣民主，像美國一樣自由，像法國一樣集權，結果卻變成了相互矛盾的大雜燴。張君勱從中學到的理論創新大致有三方面。其一，總統緊急權力可以用來遷就中國的強人政治和集權需要。其二，福利主義可以納入漸進改良派的憲法理論。其三，聯邦主義可以用來替換中國的地方主義和軍事割據。他的後半生都用在這三件事上面了。威瑪以前的張君勱基本上是梁啟超的傳聲筒，此後的張君勱進入了梁啟超和所有十九世紀人物都不能理解的層次。如果梁啟超活得更加久一些，很難想像他們的關係會發展成怎樣，不過這種情況沒有發生。梁啟超去世時，舊式的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已經喪失了意義。梁啟超懷著對社會主義和黨治集權的刻骨仇恨，離開了人世。張君勱成立國家社會黨，本身就是迎合二十世紀新潮的舉動。

國民黨沒有忘記袁世凱和段祺瑞時代的宿怨，對梁系人馬非常苛刻，解散了他們的《時事新報》和《新路》雜誌。張君勱在此期間的文章往往被人解釋成自由主義，但這只能說是非常浮泛的權利訴求，適用於所有沒有掌權的社會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國

家社會黨宣言》的基本精神是推動經濟的社會化和教育的國家化，除了人事派系的糾葛以外，在大方向上非常符合國民黨的傾向¹⁰。張君勱在政聞社時代就沒有君統的概念。他願意接受朝廷，僅僅因為朝廷的事實權力。如果事實權力不復存在，他對朝廷就沒有絲毫留戀。而遺老遺少相信正統性具有神祕的力量，不能視為理性計算的對象。凡是能夠站得住腳的立憲君主制，都離不開君統的神祕信念。張君勱在國家社會黨時代，同樣沒有法統的概念。在他看來，任何事實權力都能構成行憲的基礎，袁世凱、曹錕和蔣介石沒有什麼區別。堅持維護一九二三年憲法的吳佩孚和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自稱「中華民國遺民」的章太炎不可能如此理性，但也講不出什麼道理。

張君勱的態度比較接近威瑪的教授和今天的法蘭西斯·福山，但他的運氣比後者壞得多。福山雖然討厭憲法的半宗教性，實際上卻是依靠和消費這種力量為生的。張君勱面臨的社會比他還要理性和現實，早就將任何制度視同廢紙了，因此他連可以消費的對

¹⁰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再生》雜誌上發表的〈我們所要說的話〉是國家社會黨的綱領性文獻。史學界一般認為

此文是由張君勱、張東蓀和胡石青三人共草。文章既反對師從蘇俄共產主義的共產黨，也反對效仿德、義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提出九十八條綱領，包括「修正的民主政治」、「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有計劃的教育」等。

象都沒有。他自己意識不到這一點，總是以為歐洲的新理論可以解決眼前的問題，忘記了能夠管用的憲法都建立在古老和神祕的傳統之上。他討厭的日本天皇像磐石般穩固，他崇拜的威瑪共和國卻像流沙般易逝。凡人的權力和企圖赤裸裸地暴露在同儕面前，是不可能喚起敬畏之心的。他以為中國人不夠聰明，需要他的知識；其實中國人的問題是聰明得過了頭，知識已經不起作用了。極度愚昧的人和極度聰明的人都是只服從赤裸暴力的，前者是因為什麼都不懂，後者是因為什麼都不信。

張君勱在後半生的實際角色更接近政治掮客，用他的憲法理論包裝非常短期的政治交易。他大概希望這些交易條件多多少少能夠形成習慣，弄假成真。後人對他不吝讚美，大概也是希望零成本中大獎。兩者的合力造成了普遍的幻覺，以為國民參政會¹¹、政協會議¹²和一九四六年憲法¹³是失去機會的原因。如果當事人都是認死理的鄉愚，這種可能性倒是不能排除，不過這種情況根本不存在。張君勱的策略實際上是指望說服這些權術家，文本條款不會妨礙他們做一直都在做的事情，因此犯不著認真反對。蔣介石的讓步實際上意味著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不著為這些形式主義浪費太多時間，反正以後總有辦法擱置。毛澤東的支持實際上意味著他相信位於明處的蔣介石不容易逃避約束，而躲在暗處的自己不難賴賬。其實，三個人都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張君勱的晚年在印度

和美國的大學裡度過，失去了政治捐客的地位，因為他和他的黨參加了國民大會選舉，就等於邊邊站了¹⁴。如果他的憲法當真付諸實施，中國的情況確實會比較接近印度：經濟上模仿社會主義，政治上模仿議會制度。國家社會黨擴大合併為民主社會黨以後，隨著國大遷往臺灣，失去了原有的土壤，自然而然地泡沫化了。他本人作為符號或指標的

11 一九三七年八月，張君勱與毛澤東、胡適、梁漱溟等十六人被國民政府聘請為國防參議會首批參議員。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代表國家社會黨與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和副總裁汪精衛交換文件，表示擁護國民黨抗戰。從此，國家社會黨乃由秘密組織而公開活動。不久，「國防參議會」改組為「國民參政會」，他又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2 一九四六年初，張君勱作為民盟的九位代表之一，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對於今後中國應採取什麼樣的憲法，國民黨主張採取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民盟、共產黨和青年黨則傾向於英美式憲法，「以期打破國民黨壟斷政權之局」。張君勱提出以五權憲法之名行英美式憲法之實的方案，即把國民大會從有形改為無形，公民投票運用四權就是國民大會，不必另設國民大會；同時，以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只對立法院負責，而不對總統負責，立法院有權對行政院投不信任票，行政院有解散立法院、重新進行大選之權；限制總統權力，使他僅僅成為一個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而不負責實際政治責任。張君勱提出的這套方案得到在野各黨派支持，並在此基礎上擬定了憲法草案修改的十二條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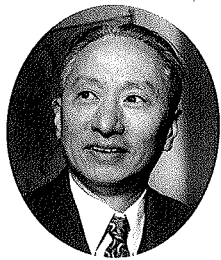
13 政協會議閉幕後，張君勱根據十二條原則，草擬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草案經國民黨方面修改後，在一九四六年底國民黨的制憲國大上通過。

14 民盟聲稱：國民黨不全面履行行政協決議，不停止內戰，民盟就不參加國民黨單方面決定召開的制憲國大會議，不談改組政府。一九四六年底，張君勱率領的民主社會黨（國家社會黨與中國憲政黨合併而成）參加了國民黨召開的制憲國大會議（他本人沒有參加），不久又同意民主社會黨參加改組後的政府，民盟因此令其退盟。一九四八年底，他被共產黨宣佈為最後一名「頭等戰犯」，遭到通緝。

作用，比真實的作用大得多。只要國本鬥爭浮出水面，他這個符號就會吸引大量的期望或誤會。

六、「革命外交家」

——顧維鈞



顧維鈞（1888-1965，江蘇嘉定人）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博士，屬於那種原本能夠融入西方的極少數精英，在中國的地位相當於波羅的海貴族在俄羅斯。如果他的祖國是愛沙尼亞式的邊緣小邦，他的努力早已將祖國納入西方民主大家庭了，以至於後來的憲法制定者和外交家除了蕭規曹隨以外，基本上無事可做。然而作為內陸大國的外交家，顧維鈞的工作註定不會有結果。

一九一二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這時，奠定民國憲制的南北和談剛剛以妥協收場。老外交家唐紹儀組織舉國一致內閣，邀請顧維鈞回國。顧維鈞下車伊始，就出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如果民初的公府秘書長是小內閣總理，大總統的英文秘書就是小外交總長了。袁世凱信任內廷，通常是超過信任閣臣的。顧維鈞本來很可能感於知遇之恩，

變成袁世凱的私黨，然而私人關係改變了這一切。他娶了唐紹儀的女兒，就變成了唐紹儀的黨羽，而唐紹儀和袁世凱很快就鬧翻了。

唐紹儀和袁世凱的衝突與其說是利益問題，不如說是預期錯位的心理問題。袁世凱覺得唐紹儀是北洋自己人，應該不分彼此。唐紹儀覺得自己是唯一能夠協調全國的人，請示大總統只是形式。雙方都覺得對方不僅跋扈，而且不可理喻。多年好友一旦反目，仇恨比原來的敵人更深。在以後的南北和談中，北洋系寧願接受伍廷芳主持舉國一致內閣，也不願意唐紹儀復職，因為伍廷芳一直是南方的人，無所謂背叛不背叛，唐紹儀卻是自己人，吃裡扒外實在難以忍受。顧維鈞為人審慎，在回憶錄中沒有明言自己當時的立場；他的岳父和國民黨正在密謀反對袁世凱，而他自己至少在表面上仍然忠於袁大總統。

北京政府內外充滿了密謀團體和投機分子，誰都不知道當時的陰謀小道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後人只知道顧維鈞捲入了洩漏《二十一條》的活動¹，然而此事並不足以表明他在當時政治鬥爭中的角色。各方都有可能洩漏談判內容。唐紹儀和國民黨可能希望密約洩漏，促使日本和袁世凱決裂，支持他們討袁。袁世凱也可能希望密約洩漏，促使列

強反對日本。老謀深算的英使朱爾典深知中國人陽奉陰違的手腕和美國人理想主義的衝動，並非不可能不著痕跡地鼓勵中國人洩密，刺激美國人跳出來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其實是中國人和英國人都想做，卻都不願意公開得罪日本人而又不能做的事情，在顧維鈞洩密後不久果然就發生了。接下來的事情即使在彌漫魔幻色彩的東亞，也屬於荒腔走板的範圍。中國宣佈接受《二十一條》的前四部分，美國急忙發表聲明：如果中日簽署有損於中國合法權益的條款，美國政府一概不予承認。顧維鈞不久就奉命出使美國。顯然，北京的實力人物認為：他做的事情無論有沒有讓其他方面滿意，至少已經足以讓美國人高興。

巴黎和會是顧維鈞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後的外交風格。這種風格與其說體現了他個人的性格，不如說體現了他所代表的國家。他越過國際慣例和外交官俱樂部

¹ 據顧維鈞對唐德剛教授口述歷史時說，袁世凱決定不顧日本的威脅，把《二十一條》的內容透露出去。陸徵祥離開袁世凱的大總統府後，立即找來了顧維鈞。顧維鈞當時任外務部主事兼英文秘書。顧接受命令後，立即攜帶《二十一條》文本，祕密送往美國公使館。陸徵祥的原意是先交給英國的路透社，而顧維鈞卻將文本首先送往美國公使館。消息傳出後，迅速引起了世界輿論的注意，更是深深地震驚了美國政府，並對一九二一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部的默契，訴諸輿論和群眾情緒。事實上，他將總體戰的原則引入了外交領域，將紳士的交涉變成了群眾的鬥爭，對此後國際體系的崩潰負有極大責任。根據契約和產權至上的十九世紀外交原則，他的要求純屬無理取鬧。中國沒有能力對德國太平洋艦隊構成任何威脅，而後者只要高興就能夷平大沽口。英、日聯軍殲滅了德國艦隊，否則後者可會切斷智利硝石的海運線。日軍攻陷了青島，英國人的支持是象徵性的。協約國在一九一五年承諾，戰後將青島和德屬太平洋各島劃歸日本。中國最後參戰時，並沒有取得協約國的任何承諾，而且也沒有任何值得一打的戰爭了。日本提供貸款，為中國訓練參戰軍。結果中國既沒有出兵，也沒有還錢。最後，在瓜分戰利品的時候，中國出現了，振振有辭地要求日本交出戰利品。

如果協約國是一家私人企業，中、日兩國是企業的員工，太平洋戰爭是績效指標，青島是年終獎，那麼董事會的裁決是沒有任何懸念的。十九世紀的外交俱樂部差不多就是奉行這種原則，日本就是從這家學校畢業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是日本的畢業證書，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日本加入董事會的最後考驗。在日本看來，威爾遜總統的世界大同和集體安全理論²等於要求公司改組為施粥站，將按勞分配改為按需分配，在功臣和無賴之間講平等，其混賬程度已經僅次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明火執仗。歐洲列強

其實也是這麼以為的，但他們沒有列寧那種公然賴債的勇氣，不敢得罪美國債權人，至少在口頭上不敢反對。

對於顧維鈞來說，這就足夠了。他抓住國民外交和民族自決的新學說，將外交家變成了宣傳幹事，繞過他的西方同儕和日本同儕，訴諸全世界國民和媒體。他的鼓動雖然成事不足，至少敗事有餘。他沒能迫使日本交出青島，但至少已經將山東問題從鐵案弄成了懸案。這其實就是中國的勝利和日本的失敗，因為中國在一九一五年是連提要求的資格都沒有的，而日本根本沒有談判的必要。從紳士俱樂部的角度看，這種做法極不費厄潑賴（Fairplay）。如果各國外交官都這樣做，信用和默契還有什麼價值？條約無異於廢紙，君子協定就更不用說了。我們不要忘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條約根本不存在監督問題。外交官要麼不做承諾，否則就必須維持信用。十九世紀國家的契約精神如

2 一般認為，威爾遜主義就是威爾遜關於國際關係和對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它具體體現在一九一八年他對國會發表的「十四點計劃」的演說中，主要強調下列目標的實現：公開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貿易自由、全面裁軍、公正處理殖民地爭議、民族自決等等。威爾遜主義顯然想用集體安全體系替代歐洲古老均勢體系。他好像要告訴歐洲人：「從今以後，國際秩序不應再建立在均勢的基礎之上，而應以民族自決為基礎；各國的安全不應依靠軍事同盟，而應以集體安全為保障；外交活動也不宜由專家秘密進行，而應『公開地達成公開的協議』。」

果跟一戰後的中華民國相同，債權人的艦隊就會打進門。埃及和摩洛哥之所以喪失主權，就是因為他們的君主喜歡借債不還。然而因為最大債權人美國反對，這種做法突然行不通了。幾百年來，債務人的地位第一次比債權人有利。

威爾遜主義產生了一項長期後果，大概是威爾遜和顧維鈞都始料不及的。在二戰以後的國際交涉中，監督問題比談判內容更難解決。原因其實很簡單，抵賴比守信更有利。蘇聯和中國是抵賴外交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和最終受害者。顧維鈞的成功給中日兩國發出了錯誤信息，埋下了盧溝橋、珍珠港和板門店的伏筆。日本人讀到的信息是：西方背叛了遊戲規則。無論日本如何努力，如何遵守規則，他們都不會允許日本加入董事會。日本如果想要爭取平等地位，只能武力推翻整個遊戲規則。中國人讀到的信息是：公理戰勝的時代開始了，也就是說弱者可以零成本分享強者的戰利品。不利於自己的條約義務不必遵守，不會付出任何代價。如果這些設想都沒有實現，那就說明威爾遜主義和殖民主義一樣虛偽。中國如果想要爭取平等地位，只能武力推翻整個遊戲規則。這些解釋將日本驅向二戰，將中國驅向二戰和冷戰。

蔣介石在北伐以後的主要成績，就是將上述認知付諸實施。顧維鈞在北伐以後的主

要成績，就是為蔣介石收拾殘局。革命外交³的初衷就是不付代價地廢除條約體系，證明北洋政府的審慎是賣國和愚蠢的、證明北伐的合理性，結果卻付出了更加慘重的代價。顧維鈞在國聯和西方的遊說活動大體上重演了巴黎和會的故事，產生了很大的輿論宣傳效果，在國內造成了零成本收回利權的幻想，結果最後完全落空。隨著抗戰的爆發和中華實質聯盟的形成，他的外交活動基本上喪失了意義。他完全清楚，這樣一來，蘇聯就占據了漁翁得利的有利地位，他著手跟共產黨代表鄧發祕密接觸，但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他審慎地刪除了密談的紀錄，卻忘記了留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檔案。他和胡適、汪兆銘、章太炎、宋慶齡、儲安平、羅隆基一樣，看清了抗戰會給蔣介石帶來怎樣的下場；同時也看清了胡適和汪兆銘明白、儲安平和羅隆基卻不明白的事情：投靠勝利者比投靠失敗者更危險。

3 一九二八年八月四日，「全國反日總會」呈文建議國民黨「屆五中全會通過『革命外交案』。國際法專家周鯁生於當年十月出版《革命的外交》一書，系統闡述了他在「一九二七年已公之於眾的『革命外交』要義：第一是『對於既存的國際規則、慣例或條約的束縛，都要一概打破』；第二是『利用民眾勢力』；最後，革命外交『必是主動的，攻勢的』。具體言之，就是要『生事』，即『遇事生風』和『小題大做』，中國今日所需不是紳士式外交，『正是流氓式的外交』。一九四九年後，周曾任中共政府外交部顧問、人大代表等職。

冷戰開始後，顧維鈞繼續為蔣介石政府從事對美交涉。然而，他的黃金時代實際上已經結束了。技術和通訊條件的進步大大削減了外交官的自由裁量權。民主的簡單化傾向和冷戰的十字軍精神，剝奪了外交官的大部分政策影響力，日益將他們降格為辦事人員。顧維鈞主要依靠長期積累的資歷和聲望，實際負責的工作已經沒有什麼迴旋餘地，其實由一般業務人員經辦也沒有多大區別。他親身經歷了這種變化，早年的成功本身就是促成這種變化的力量之一；但他有足夠的明智和審慎，知道怎樣區分力所能及的事情和無法抗拒的事情。他很少做出錯誤的選擇，善於掌握必要的分寸，而且不僅僅限於外交方面，因此得以享受尊榮體面的晚年。他留下的回憶錄猶如他本人：絕少說錯什麼，卻從沒有說出他知道的全部真相。

七、「仁俠之風」

——杜月笙



杜月笙（1888-1951，江蘇省川沙廳〔今上海浦東新區〕人）出身於真正的工人階級家庭，自幼父母雙亡，依靠繼母和舅家撫養，十四歲出門打工，做學徒和店員，無家裡家外，隨時都要看人眼色，實實在在地嘗盡了世態炎涼，學會了眼明手快、做低服小。即使削水果的一手絕藝，背後都不知隱藏了多少底層人的妾婦之哀。不習慣受人欺負的富家子弟，很少能夠理解他僥倖逃脫的孤寂深淵。無產階級的子弟習慣於困厄，出於降低刺激和自我保護的天然傾向，流於麻木、無賴、乖戾者十居七八，只有極少數人才有極為強大的精神資源，同時戰勝自我和環境。在風雲變幻的民國初年，無產者發跡變泰並非難事。發跡變泰而不報復社會，能做到的人就不多。杜月笙恰好是其中之一，居然磨練出一套深明世故的仁俠之風。

巴爾扎克曾經在《夏倍上校》當中說過，世界上最多體驗人心黑暗險惡的職業，莫過於教士和律師，而律師又比教士更苦，因為世俗的工作無法依靠彼岸的恩典。其實他如果把律師改成黑社會，或許更接近真實。黑社會和教會才是無產階級的真正組織和保護人，不像革命者、改革者或恐怖分子的組織，其實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或先鋒隊用來動員或消費底層苦難的機構。底層人接近世界的赤裸核心，擁有海量無法翻譯成文字的地方性知識。兩者之間的鴻溝之寬，遠遠超過了隔離巴斯克語¹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漫漫长途。底層人理解人類的黑暗深淵，從不相信制度變革能夠緩解人類的苦難。他們對待知識分子的美好藍圖，就像八個孩子的母親看待八歲女孩的扮家家酒遊戲。他們尊重知識分子，往往超過知識分子相互尊重的程度，但主要出於習慣的敬畏和無知的誤解。義大利的黑手黨可以殺人如麻，卻不敢對修女動一根指頭，總是像君士坦丁大帝一樣保有生前作惡的自由，同時絕不犧牲臨終悔罪的機會。如果有人驅逐或強姦修女，那多半出於國家官吏或共產黨人的解構理性。上海與香港的黑社會對關二哥和江湖道義，往往懷有類似的敬畏。解構一切的革命家蔑視他們的習慣法，經常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杜月笙十九歲拜在黃金榮門下²，同樣通過黃賭毒生意賺錢，但他的黃金時代比師父晚了一代，已經錯過了最狂野的冒險家時代。因此，他投靠體面社會的努力比黃金榮

大得多。他的原則是：自己的起點比體面人低，打回原形的危險更大；誰肯利用我，就是瞧得起我；別人只要存心幫忙，無論結果如何都要感謝。他特別喜歡對士大夫仗義疏財，因此留下的美談格外多。他接濟黎元洪，得到了「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著名對聯。章太炎看誰都不順眼，偏偏覺得杜月笙有太史公《遊俠列傳》之風，為了祝賀他的杜祠落成，專門寫了一篇《高橋杜氏祠堂記》。一九三一年的杜祠落成典禮堪稱杜月笙一生的最高峰，徐世昌、段祺瑞、蔣介石、張學良都送了賀禮匾額³。

杜月笙的事業由盛轉衰，關鍵還是革命家越來越不守江湖道義。從杜月笙自己的角度看，他沒有虧待任何人。共產黨在上海灘活動，一開始是拜在他門下的。李立三、周恩來和汪壽華組織工會和地下武裝，以青幫和杜老闆的名義為保護傘。北洋政府的偵探捉拿共產國際恐怖分子，靠杜老闆保護。革命委員會疏通工部局，由杜老闆出面斡旋。

1 巴斯克語是一種孤立語言，使用於巴斯克地區（西班牙東北部的巴斯克和納瓦拉兩個自治州，以及法國西南部）。巴斯克語的由來到目前仍然是個謎，有些人認為這種語言可能源自高加索，或是非洲北部，也有人類學家和語言學者認為它本來就誕生在伊比利半島，是已消亡的伊比利亞語系的最後火種。

2 杜月笙十四歲時拜青幫陳世昌為老頭子。後由陳世昌等人的關係進入時為青幫上海龍頭的黃金榮公館。

3 徐、段、蔣、張送的匾額分別是「敦仁尚德」、「望出晉昌」、「孝思不匱」、「好義家風」。

遠東局答應維持市面，保護杜老闊的生意和信用，否則一九二七年的上海暴動根本不可能發生⁴，然而革命者一旦得手，立刻就不講信用了。他們在街頭大搞紅色恐怖，在資本家的門口放炸彈勒索經費。對於已經交過保護費的商民而言，這明顯就是要無賴。由於革命者名義上是杜老闊的徒弟，他們自然要向杜老闊投訴。杜月笙如果還想維持苦心經營的仁俠名聲，就非得開刑堂講幫規不可。尤其可怕的是，共產黨還在他的幫會內部做策反工作。他如果聽之任之，就會爆發黑社會版本的南昌暴動。周恩來負責的匪運工作跟帝國主義的衝突還不直接，跟杜老闊就構成了短兵相接的同生態位競爭。所以杜月笙幫助蔣介石清黨，其實也是為了自保。就當時地下社會的力量對比而言，其實也是孤注一擲。工部局評估共產國際的資金和網絡，覺得蔣介石的逆襲沒有多少成功希望。蔣介石居然贏了這一局，杜月笙的合作實在功勞不小。

杜月笙和他的親信經過了這一關，對共產黨、尤其是周恩來的卑鄙狡詐和恩將仇報形成了深刻的成見，晚至一九五零年代在香港仍然耿耿於懷。他和蔣介石的合作一開始是出於形勢所迫，後來又增加了他渴望金盆洗手的願望。他配合蔣介石的反帝革命，為國民黨通過地下組織操縱租界華人盡心竭力。他不僅在經濟上資助抗戰⁵，而且將大批青幫徒子徒孫送給國軍做炮灰⁶。軍統的恐怖活動和四大銀行維持法幣的金融戰爭，都

要依靠、或者不如說犧牲他在上海的關係網⁷。蔣介石對他和上海「自由市」的傷害，較之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政策對荷蘭人的傷害，只能說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引起的反應卻不一樣，充分說明了意識形態比利益還要強大。抗戰結束，杜月笙的實力已經損失慘重，但蔣介石仍然嫌棄他識字不多、江湖嫌疑太重，不肯給他渴望的名分。杜月笙為了配合蔣介石表現道德楷模的需要，公開承認自己原來是壞人⁸，經過總統的感化才改過

4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蘇聯遠東局安排下，周恩來、趙世炎等組成軍事委員會，在上海發動武裝暴動，占領租界外的上海市區，並建立一支工人糾察隊。在暴動發生前，遠東局和工部局談判，杜月笙是中間人。三方達成協議：租界保護紅色革命家，革命家同意不侵犯上海的白人。杜月笙得到的保證是，他的鴉片貿易不會受到侵犯。

5 抗戰開始後，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任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僅月餘時間，杜月笙主持的籌募會就籌集到救國捐款一百五十餘萬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戰。他籌集了大量毛巾、香菸、罐頭食品用以勞軍。「八一三」抗戰後期，他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缺乏食品時，僅用了一天時間即向謝團送去了二十萬個餅。他主動將杜美路的私宅借給財政部「勸募委員會」作辦公地點，發動與組織上海各界力量認購了救國公債七千五百萬元，幾乎占全部發行量的六分之一。

6 「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不久，戴笠奉蔣介石之命與杜月笙合謀，利用幫會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在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的五個支隊中第一、第二、第三支隊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門生，支隊成員中有不少是因幫會關係而被拉去參加的。

7 杜月笙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遷居香港。在港期間，他在上海的門徒協助軍統特務殺死了偽上海市長傅筱庵。他主持的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採取各種辦法迫使虞洽卿等人離滬赴渝，制止黃金榮公開出任偽職，並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聖脫離了汪精衛集團。

8 蔣經國在上海「打虎」時，杜月笙三子杜維屏被抓。杜月笙在蔣經國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頭會議上說：「我

自新。他後來不肯去臺灣，也是因為看清了國民黨一定會進行整肅⁹。

陳毅來到上海，楊虎¹⁰帶槍投靠。黃金榮自投羅網，杜月笙卻遠走香港。陳毅通電請求逃亡香港的五大名流共建新中國，包括杜月笙和金融界的陳光甫¹¹、李馥蓀¹²、宋漢章和錢新之¹³。杜月笙置之不理，陳毅就派上海地方協會秘書長徐采臣赴港遊說，結果徐采臣反而被杜月笙說服，留在香港不走了。杜月笙的拒絕提高了他的統戰價值，正如黃金榮的投靠降低了自己的統戰價值。香港的統戰活動升級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層面，派章士釗親自出馬，赴港遊說杜月笙。於是發生了下面這段著名的對話。

杜：「章先生是決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嗎？」

章：「是的。」

杜：「章先生是否照舊掛牌做律師？」

章：「這個——誠然，共產黨統治下是用不著律師的，我不能再掛牌，不過……」

杜：「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師，那麼，你有什麼計劃？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章：「做生意嘛，只怕制度也不容許，不過，毛主席當面告訴過我，我在大陸，一切有他負責。有了毛主席的這一句話，個人的生活種種，那還用得著擔心麼？」

杜：「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擔心，只是生活不用擔心。」

統戰雙方再次顛倒了位置，杜月笙建議：如果章士釗願意去臺灣或海外，行程安全可以由他的弟子包辦。香港地下黨害怕章士釗動搖，趕緊中斷了談判，送章士釗回大陸。他們在香港收穫頗豐，國民黨反蔣的大老幾乎被一網打盡，構成了民革¹⁴成立的基礎。

本是個壞人，但總統執政以來，把我當好人，我就沒做過壞事。我兒子的事，料想當局會調查核實，秉公辦案，我完全服從政府。不過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員一視同仁，查實公辦，這樣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該公司倉庫，在下可以派人擔任嚮導。」

9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失敗，是因為紀律渙散、派系林立，也就是說列寧黨的性質不如共產黨堅強。他在臺灣重新登記，把大多數老黨員和舊派系排斥在外。這樣可以保證新的國民黨更加忠於他個人，因此李宗仁之類非蔣系的老國民黨都無法歸隊。杜月笙肯定屬於不會被接納的類型，他只有在上海灘的江湖社會才有利用價值。陳立夫家族都被排除了，他更沒有指望。

10 楊虎（1889-1966），曾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在重慶期間與周恩來搭上线。一九四九年投共。

11 陳光甫（1881-1973），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曾任上海銀行公會會長等職。

12 李馥蓀（李銘，字馥蓀，1887-1966），曾任浙江實業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等職。

13 錢新之（1885-1958），曾任交通銀行董事長、金城銀行董事長、復興航業公司董事長等職。

14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主要由國共內戰時的中國國民黨左派成員及其支持者和一大批投共分子組成，創建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原來是李濟深、宋慶齡、何香凝、譚平山等人創建的；後來許多國民黨籍的倒戈將領和被俘釋放的軍政人員加入。

其中許多人反共清黨的紀錄比蔣介石更為極端，因此杜月笙的舊怨其實不是無法克服的障礙。他明顯獲益於缺乏書面理論知識，更加信任豐富的經驗。黃金榮掃馬路的消息傳來以後，他更不懷疑自己的決定了。杜月笙在香港病故時，妻兒門徒故舊環繞侍奉，可謂善終。他臨終以前銷毀了所有人欠他的借據，為自詡仁俠的一生畫上了比較圓滿的終局。死得其所死得其分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很少有人能夠比他做得更好。

八、「老實人」

——李宗仁



李宗仁（1891-1969，廣西桂林人）的出身跟陳炯明、閻錫山幾乎相同，也就是崇尚教育的小康之家。宋明以來，中國社會的基礎就是這些人。曾國藩、林則徐和近代的鄉紳都是從這個階級中產生的。新學堂代替了舊科舉，李宗仁的廣西陸軍小學堂就相當於陳炯明的法政學校。他畢業的時間太晚，錯過了辛亥年的大好機會。少壯軍人在一九一二年飛黃騰達的速度之快，只有法國大革命以後的幾年才能相比。李宗仁在一九一二年考入廣西陸軍速成學校讀書，一九一三年畢業，或許是個錯誤，失去了最佳的機會窗口，所以才會等到北伐以後才成名。

他從陸軍速成學校畢業後，先當了幾年教官，對自己的前途似乎沒有確定的想法。護國軍興，他才下定決心投入行伍。他後來對唐德剛承認：「炒排骨」（當排長）是個

無利可圖的職位，待遇還不如教官。他升到團長，年已三十。如果在比較穩定的時代，這個升遷紀錄就算相當出色。在蒼黃反覆的民初，這就證明他當時是個不搞投機的老實人。

護國戰爭後，滇、桂軍長期進駐廣東。在富裕的廣東紳商眼中，他們越來越像寄生者和掠奪者。最後，他們支持孫文和陳炯明打回廣東。粵軍乘勝進軍廣西，瓦解了長期統治廣西的陸榮廷勢力。孫文和陳炯明隨即決裂，粵軍從廣西撤退。廣西陷入群雄逐鹿的混亂當中，提供了李宗仁崛起的機會。他和白崇禧、黃紹竑¹結成了著名的聯盟，擊潰了主要競爭者沈鴻英²。這時，孫文去世。滇軍唐繼堯覬覦兩廣，利用新政府威信未立的視窗期東征。李宗仁以寡擊眾，打敗了滇軍，威望陡然增加。

李宗仁加入新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希望分享財政資源，結果未能如願。國民革命軍終歸沒有統一，種下了日後分裂的伏脈。桂軍無法就食廣東，只有指望北伐打開餉源。因此，他變成了蔣介石的盟友。後者不大喜歡蘇聯和廣東人的包圍，特別注意從江浙招收子弟兵，希望盡快進軍長江流域。李宗仁選擇了依附蔣介石，這儘管純屬功利目的，但還是得罪了蘇聯。蘇聯害怕國軍北伐成功，就會不再需要他們，然而這種恐懼很快就

變成了現實。李宗仁積極輔佐蔣介石清黨，勢力迅速膨脹。

南京政府幾次企圖統一軍令，都沒有成功。抗戰爆發大大加強了蔣介石的地位，剝奪了李宗仁公開分裂國民黨的機會。蔣介石在一九四八年的失敗給他提供了最後一次機會，他無法抗拒誘惑。代總統的權力非常短暫，卻使他既不能去北京，也不能去臺北。他在美國社會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感到寂寞，最後返回大陸養老³。長期的反動資歷給他積累了統戰價值，這是張國燾和其他紅色叛逃者不可能具備的。

李宗仁回國前留下的回憶錄和回國後提供的資料大相逕庭，而且兩者都無法跟同時代的其他資料對證，因此史料價值不高，卻很不幸地被大量流傳和引用。在現代史的所有材料中，事後回憶是最不可靠的一種。當事人有最大的動機，根據事後諸葛亮的小聰

1 黃紹竑（1895-1966），新桂系三巨頭之一，以謀略見長。一九四九年在北京議和時試圖保全桂系家庭，一九五七年遭到揭批，一九五八年被人大開除，一九六六年自殺。

2 沈鴻英（1870-1938），綠林出身，陸榮廷部將，一九一四年自稱建國軍總司令。

3 一九六五年，李宗仁回到北京，受到隆重接待；一九六六年三月，他的妻子郭德潔病逝；七月，在「組織關懷」下，與二十七歲的護士胡友松結婚。

明，修飾自己在盲目決策時的動機。任何人只要對照日本人方面的紀錄，就會發現李宗仁在臺兒莊戰役的回憶中故意毀謗湯恩伯⁴。日本人對湯恩伯的勇敢和靈活相當忌憚，對西北軍的評價卻不高。他們還覺得徐州會戰的指揮相當拙劣，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也有同樣的看法⁵。

李宗仁的軍事教育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類型，而蘇聯教給黃埔軍官的知識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類型。兩者在火力配置方面的訓練要求相差甚大，李宗仁在這方面缺乏起碼的概念。他的能力主要在人事協調方面，能將將不能將兵。二戰的火力升級淘汰了許多黃埔老將，李宗仁的兵法其實比他們更過時。在戴安瀾⁶和孫立人的那種戰役中，他是連後勤軍官都不能勝任的。作為政治家，他雖然是名義上的國民黨人，卻更多地屬於北伐以前的類型，在列寧主義的擠壓下，逐步喪失了自己的政治感覺，淪為投機者和裝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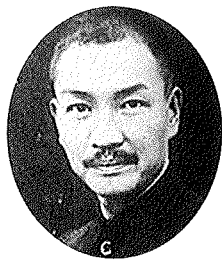
4 李宗仁晚年在口述回憶錄中稱：臺兒莊戰役，在孫連仲部損失慘重，急需救援時，他「嚴令湯恩伯軍團迅速南下，夾擊敵軍，三令五申之後，湯軍團仍在姑婆山區逡巡不進」。以致李宗仁「訓誡湯軍團長說，如再不聽軍令，致誤戎機，當照韓復榘的前例嚴辦。湯軍團才全師南下。然此時臺兒莊的守軍已傷亡殆盡」。其實，他對湯恩伯的指責並不符合事實。白崇禧晚年在臺灣接受中研院訪談時曾說：「湯恩伯司令用兵適宜，當敵攻擊臺兒莊之際，迅速抽調進攻嶧縣而呈膠著狀態之兵力，反包圍臺兒莊之敵人，與孫連仲部相呼應，同時，並調關麟徵、周燾一部擊破敵人由臨沂派來解圍臺兒莊之沂州支隊，於任務完成後，仍回師臺兒莊，此為其用兵靈活、合適之處。」而從日本軍部原始檔案中可以看出，湯恩伯在臺兒莊一役並非對抗李宗仁的指揮、為保存實力而遲遲不肯出擊，而是運用靈活的戰術，以「圍魏救趙」的戰法，分流進攻臺兒莊的日軍，從而緩解臺兒莊正面的壓力。日軍在後背受到湯恩伯軍威脅的情況下匆忙撤退，遺棄了大量輜重、大砲、坦克。正是中央軍湯恩伯軍團在臺兒莊地區的出現，使得日軍做出蔣介石要在徐州與日軍大舉決戰的錯誤判斷，遂調集大軍到徐州作戰，從而使該役真正上升為大規模的「徐州會戰」。此舉打破了東京大本營原定華北方面軍「不過黃河」的「有限作戰」禁令，徹底改變了「不擴大政策」。

5 法肯豪森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878-1966)，德國將軍，曾為蔣介石的軍事顧問。臺兒莊大捷後，各國駐華武官紛紛前往戰地參觀，當時史迪威與法肯豪森討論戰果，法肯豪森說國軍沒有按照自己原來的計劃乘勝追擊，日軍定會捲土重來。不久，徐州被日軍攻克。

6 戴安瀾 (1904-1942)，黃埔三期，參加過臺兒莊戰役、武漢會戰、徐州會戰、崑崙關戰役，在緬甸戰死。

九、列寧主義世界化的典型標本

——戴季陶



戴季陶（1891-1949，原籍浙江湖州，生於四川廣漢）是國民黨元老，在東京法政大學讀書期間轉向國族主義。這是清末革命黨人的標準模式，實際上是日本明治維新後國族創造運動的餘波和回音。只是「中國」這個詞的邊界和內涵比「日本」複雜得多，他們在當時和以後都沒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戴季陶自負其才，自稱「六歲學吟詩，十歲五經畢，十二至十三，廢經讀翻譯，十四任助教，十五事遊歷」。清國留學生在日本的生活相當便利，結果很多人從來沒有走出本省僑民的小圈子。但戴季陶不然，他不僅日語嫻熟，而且真能接觸日本社會，在當時殊為少見。一九零九年，戴季陶回國。一九一一年，他追隨陳其美和鈕永建參加上

海的起義。關外大都督藍天蔚¹遭到張作霖的壓迫，赴上海向本黨同志求援。年輕的戴季陶負責接待他，雙方似乎氣味相投。藍天蔚委派他擔任關東都督府（由革命黨人所建立，非日本人的關東都督府）的交通部長，前往大連就職。張作霖節節勝利，關東都督府的轄區很快就只剩下日本租借地了。戴季陶跟東北民軍諸將商議，決定放棄關外，配合南方的海軍，攻取煙臺。南北談判後，關東都督府解散，他才返回上海。一九一二年十月，陳其美和張靜江推薦他擔任孫文的秘書。孫文下野後遊歷日本，接觸包括首相桂太郎在內的各方名流和政要，都由戴季陶擔任翻譯。孫文的老朋友宮崎寅藏後來對胡漢民說，戴季陶的日語比他還好。他主持《上海民權報》的工作。這家報紙的傾向是激烈攻擊袁世凱，在二次革命中發揮了陳其美滬軍吹鼓手的作用。鄭汝成的北軍很快打敗了陳其美，迫使後者和鈕永建退往租界。這時，陳其美的兩位死黨蔣介石和戴季陶都流亡日本。兩人的友誼從此開始，經數十年不改。

1 藍天蔚（1878-1922），湖北黃陂人。曾留學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一九零七年藍天蔚赴奉天，與吳祿貞、張紹曾在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手下任職。一九一零年任第二混成協協統，駐紮奉天北大營。辛亥革命後，藍天蔚被革命派推舉為關外革命軍大都督，策劃驅逐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失敗後逃往上海。此後，藍天蔚繼續接受關外軍政府大都督一職，建立關東都督府（此關東都督府和一九零五年日俄戰爭勝利後日本建立的關東都督府同名），從事反清活動。

一九一三年，孫文的嫡系組成了中華革命黨。舊同盟會的大多數派系拒絕支持孫文，但陳其美一系始終站在領袖一邊，戴季陶也在其中。如果袁世凱和日本關係良好，他們大概不會有捲土重來的機會。然而隨著《二十一條》交涉的展開，中、日關係趨於惡化。日本人為了牽制袁世凱，開始扶植中華革命黨，一面資助居正²進攻山東，一面允許戴季陶在大連建立總部。一九一三年，戴季陶在大連組織了一支東北義勇軍。一九一四年初，化名木村滕吉的戴季陶再度來到大連主持黨務。孫文和陳其美當時對東北寄託了莫大的希望，因為這裡是日本人的勢力範圍，中華革命黨的前途主要寄託在日本身上。然而好景不長，洪憲帝制的失敗消除了中、日對抗的主要理由。外務省的職業官僚力主忠於協約國，尊重條約體系和中國對滿洲的領土主權，結果錯過了攫取滿洲的最佳時機。如果日本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之間下手，幾乎不會遭遇值得一提的阻力。協約國抽空了駐紮遠東的兵力，只能指望日本的善意。失去袁世凱的北洋勢力分崩離析，沒有重建大清版圖的決心和能力。革命黨迫不及待地追求中、日聯盟，覺得日本的友誼是阻止國內舊勢力反撲的唯一可靠保障，願意為此付出任何代價，包括早在辛亥年間就已經決定放棄的東北。袁世凱和美國人在《二十一條》交涉中覺得無法接受的條件，在孫文和革命黨看來都是理所當然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的外交環境就迅速惡化了。協約國和中國國內各黨派都撕毀了戰爭期間的承諾，使遠東戰場的主要功臣（日本）陷入比保持中立更糟的處境。從日本人的角度看，外務省和國際協調主義者（其中包括後藤新平的滿鐵和大連的領事館）犯下了誤國之罪。如果政府當初聽取軍部和黑龍會的意見，斷然武裝革命黨分割滿洲，完全可以造成既成事實。革命黨既然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日本代理人身分，自然不會像喪家之犬一樣四處求食，最後淪為蘇聯的代理人。以幣原喜重郎為代表的國際協調派（主張協調日本與英美關係，反對對華使用武力）在一九三零年代的沒落，跟這次記憶猶新的失敗很有關係。千百萬賢妻良母忍痛鼓勵丈夫和兒子去旅順口犧牲，從微薄的撫恤金當中省下錢，捐獻給黑龍會，養大了襁褓中的革命黨。這些純潔和崇高的心靈心甘情願地忍受生活的殘酷，只要看到天皇和國家幸福，就能含笑九泉。如果朝中大老為了只有學究才在乎的「國際秩序」、「條約義務」之類名詞，辜負了他們的一片真心，還能算是人嗎？國際協調主義屬於缺乏信仰和犧牲精神的鄉愿，大亞洲主義者則是日本最

2 屈正（1876-1951），湖北廣濟縣（今武穴市）人。生於塾師家庭。一九零五年赴日本留學，並在日加入同盟會。

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加入孫文組織的中華革命黨，任黨務部長。一九一六年五月，在日軍的支持下，屈正到青島組織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任總司令，出兵占領淄博，建立革命軍政府。在這段時期，蔣介石曾任其手下的參謀長。

接近救世主義情懷的理想主義者。黑龍會是同盟會的母親，只有他們不肯拋棄水深火熱的親邦，安心享受榮譽白人和遠東英格蘭的天賜洪福。他們培養國民黨的動機，酷似耶穌會在巴拉圭印第安人當中培養傳教士的動機，要將文明開化的福音傳到天涯海角。他們後來對國民黨背叛的感覺，也非常類似蔣介石對蔣經國在蘇聯公開譴責他的感受。

無論如何，孫文的命運在洪憲帝制結束後降至最低點。內閣和外務省的國際協調主義者戰勝了軍部和民間的大亞洲主義者（指黑龍會），後者卻是他的主要保護人。日本決定配合協約國，維護遠東秩序的穩定。這條路線自動落實為支持黎元洪一段祺瑞舉國一致政府依據「法統重光」的宗旨，結束中國的內戰和政潮。舉國一致政府由北洋、國民黨和進步黨三大勢力組成，得到了舊國會和公使團的支持。孫文的中華革命黨作為國民黨的少數派、分裂派和極端派，在護國運動中的功績又不如進步黨，在遭到唯一的盟友日本人拋棄以後，落到了滿盤皆輸的下場。作為武裝團體的中華革命黨和作為國會政黨的國民黨這二者之間的關係，酷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論觀念最為接近，論組織有同源性質，但由於現實政治策略的分歧和同生並存競爭的格局，鬥爭反而最為激烈。雙方等於對未來下了不同的賭注。

國會黨把前途押在國際協調——國內憲政復活的前景上，如果贏了就是執政黨或最大在野黨，如果輸了就會淪為空談俱樂部而註定萎縮。革命黨把前途押在國際協調——國內憲政不能復活的前景上，如果贏了就能兼併國會黨的基本選民，不是革命勝利者就是革命失敗後的主要地下黨，如果輸了就會淪為大多數庸俗老百姓眼中的恐怖分子。舊國會復活，是協約國和日本維護一戰前舊秩序的勝利。宋教仁的國民黨贏了，孫文的國民黨就輸了。然而舊秩序只是迴光返照，終於在一九二零年代全線崩潰。中華民國像一位時乖命促的學徒，還沒有出師就發現自己的老闆和師傅都已經破產。

這時，孫文又時來運轉。不過對於年輕的戴季陶而言，孫文的低潮期恰好是他最好的機會。成功的孫文有必要顧全大局，任用大批擁有社會資源的黨外名流和賢達，因此蔣介石和戴季陶這樣有才幹和野心，卻沒有資歷和聲望的本黨黨員反倒會得不到歷練的機會。何況，逆境為孫文提供了考驗黨員忠誠的機會。忠誠的戴季陶經得住考驗，孫文沒有忘記報答他。護法運動開始後，孫文終於有機會為忠貞幹部創造資歷和名望。流亡大元帥府委派戴季陶為公府秘書長，主要因為大元帥的政令出不了大元帥府。護法軍政府委派戴季陶擔任外交次長，主要因為公使團根本不承認廣州政府。

在此期間，戴季陶繼續扮演激進派報人的角色。他是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第一批成員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黨員，甚至起草了一份《中國共產黨綱領》。孫文親信當中產生社會主義理論家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如果僅僅從思想傾向看，朱執信和戴季陶比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列寧還要左。他們為了論證土地國有制在經濟上的可行性，寫出了幾萬字的文章。相比之下，共產黨雖然用暴力實施土地改革，理論基礎反倒不如這些國民黨頑固分子，而且論證的品質有每況愈下的傾向。

張聞天以後，共產黨在這方面的論證和自辯雖然數量驚人，然而論水準卻幼稚到可笑的程度。幾乎所有內容都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中國農民能不能、或者怎樣對應俄羅斯的富農——自耕農、地主——貴族、小市民——商人和無產階級，無論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他們的論據都荒謬絕倫和自欺欺人。其二是論證民國基層官員的腐敗和無能，因此必須通過土改來打倒他們。然而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土改打倒的對象恰好是農村社會唯一能夠對抗或緩衝官吏暴政的勢力，土改的結果是徹底斬除了傳統的地緣和血緣自治組織，恰好建立一個汲取能力相當於史達林的新組織。如果國民黨頑固派（指朱執信和戴季陶）沒有發展成亞洲的恰亞諾夫³，主要是因為政治橫向涉入的緣故。朱執信早死，可以不論。戴季陶在真正的土改展開時，也忘記了他自己才是開天闢地的專業左派，一

味論證共產黨不講道義，甘做顛覆祖國的外國第五縱隊。他那時開始強調具有強烈儒家倫理色彩的所謂道義，卻一點不提年輕時相當熟悉的經濟學理論。

孫文對戴季陶左傾的態度耐人尋味。他自己就是理論上的社會主義者和土地國有派。因此從嚴格的理論意義上講，一個真正的國民黨人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且肯定不是屬於社會黨人當中最右的一派。二十年代初葉正是孫文本本人忙於跟蘇聯調情的時候，又是他懷著近乎父愛的感情提攜戴季陶這批年輕人的時候。他一面責備那些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老同志不識大體，一面不准戴季陶參加共產黨的活動。國民黨剛剛完成列寧主義化的改組，戴季陶就當上了中央執行委員和宣傳部部長。這樣的地位就是留給汪兆銘，也不會委屈他。從孫文這一系列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做法看，他實際上懷有根深蒂固的「內圈」和「外圈」情結。他認為外圈適用於馬基維利的原則，內圈適用於信任同盟的原則。信任同盟的試金石不在抽象理論上的左與右，而在基於道德直覺、鄉

3 亞歷山大·恰亞諾夫（1888-1937），蘇聯經濟學家。「組織—生產」學派主要理論家。十月革命後支持蘇維埃政權，一九二零年因「勞動人民黨」案件被捕，後被槍決。他提出小農生產與資本主義農場企業有不同的生產曲線，小農的勞動力供給是既定的，沒有彈性，往往只能在勞動的邊際產出接近於零的時候才停止勞動。起決定作用的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工資和利潤的需要。

士感情和性格默契的兄弟會傳承。他要外圍黨員爭取異己勢力的好感，因為這些人是他預先就準備犧牲的對象，彷彿丫鬢可以隨便跟少爺偷情；同時要內圈的自己人保存最高度的純潔，將來才有資格接受自己的衣鉢，彷彿親生的女兒打死都要守身如玉，不能對不起自己精心挑選的女婿。戴季陶和蔣介石都明白自己是領袖特別看中的護法人才，不能跟外圍黨員一般見識。

家法的意義其實是這樣的：問題不在於你是左是右，而在於你的左右是不是為了本門的光大。朱熹說宋高宗時代的主戰派是君子，宋孝宗以後的主戰派就是小人，同樣是這個意思。黨國在不同的特殊環境下，有時需要向左，有時需要向右。這是個策略問題，不是主義問題。如果你為了愛黨而左傾或右傾，都是忠貞黨員。如果你為了投機或破壞而左傾或右傾，都不是忠貞黨員。從法律形式主義或歷史實證主義的角度講，這兩者是沒有任何區別的。朱熹和戴季陶都是那種自以為有這種能力、且自以為負有這種使命的角色。

戴季陶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以後，開始系統地發明孫文主義理論。孫文在第二年（一九二五年）去世，解放了他的手腳。他在這一年改名「戴傳賢」，也就是決心以

光大孫文主義為終生使命的意思。孫文本人沒有、也不想建構太系統的理論，因為他主要是一位現實政治家，需要與時俱進地改變宣傳內容。他在自己同時代人的眼中，是大可能保持邏輯一致的。他們很清楚孫文長期以民國內部的日本代理人自居，極力反對北京政府的任何統一或反帝主張。無論「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本身對不對，出自孫文之口就很像一場滑稽戲。所以真正的孫文主義只能在孫文死後，根據孫文消費者、而非孫文本人的需要建構，然後以《教義問答》的方式植入不瞭解前代掌故的年輕人腦中。孫文的老朋友、老近衛軍熟悉孫文本人，隨時都會漏出線索，破壞邏輯連貫、前後一致的新發明，因此無論歷史貢獻多大，都會構成孫文主義的障礙。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馬克思、列寧和其他意識形態領袖。在國民黨內，廖仲愷遇刺事件造成的清洗發揮了消除障礙的作用。此後，教育青年變成了一項政治任務。廣東大學改名為中山大學，校長由戴傳賢擔任，預示孫文必須由中國的平尼克變成中國的列寧。平尼克是華盛頓擔任主席的制憲會議成員，代表南方各州的觀點，提出的制憲主張大部分遭到否定，但仍然跟其他制憲會議議員一樣，是當之無愧的美國「諸國父」之一。國民革命的宗旨就是修正辛亥革命，將「諸國父」之一修改為獨一無二的領袖，將華盛頓和林肯的仰慕者變成列寧的同儕。戴傳賢的畢生使命就是發明這樣一位孫文、一位孫文本人都不認識的孫文，這種使命使他註定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敵人，而且理論越是接近反而越有同生競位的競爭的

能，因為「中國的列寧」只能有一個，不像「美國的諸國父」同時容得下一群彼此敵對的政治家。

戴傳賢的發明表面上是宋儒道統理論和晚清國族主義的奇特混合物，實際上是列寧主義的競爭性抑制劑。他對列寧主義的模仿是一種基於心術的逆向模仿，酷似列寧主義團體對基督教團體的逆向模仿。「戴記」孫文主義是一種反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列寧主義，正如列寧主義是鼓吹無神論和彼此相恨的基督教會。他關於孫文繼承堯舜文武周公的理論⁴，主要是統戰式的，因為三民主義先鋒隊必須深入到儒家影響很大的亞洲內地，在可以預計的很長時期內只能是極少數派。泛儒家文化影響的居民是三民主義國家的原材料，三民主義國家是國民黨先鋒隊的奮鬥目標。主義從屬於目標，政策從屬於材料。這種祕傳心法是純粹列寧主義的，但材料沒有絲毫列寧主義的成分⁵。全世界無產者是列寧主義國家的原材料，共產主義是列寧主義先鋒隊的奮鬥目標。主義同樣從屬於目標，政策同樣從屬於材料。國民黨為什麼是一個反共的列寧主義團體，由此可以一目了然。

先鋒隊政黨負有雙重使命：在缺乏合適土壤的條件下保存種子，為種子創造合適的土壤。這兩種使命經常相互矛盾、相互破壞，我們現在就生活在這些衝突造成的後果當

中。經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無須承擔這兩種責任，只相當於在熟地上照料莊稼的農業技術員。這種技術員如果莫名其妙地空投到沙漠上，多半會落到宋教仁的下場。西方政治學和人文主義學術通常不包括關於種子和土壤的內容，因為他們是坐享其成的文明繼承人。基督教信仰和日爾曼封建憲制為他們創造了文明的基礎，他們已經習慣於將現成的種子和土壤視為像空氣一樣理所當然存在的先在條件。

從孫文主義的角度看，列寧主義政黨可以變成一件有力的工具，服務於反對共產主義的目標。在這方面，他們沒有看錯。後來的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做出了非常相似的判斷，在伊斯蘭世界發揮了酷似孫文和三民主義在東亞的歷史作用。戴季陶支持和

4 在《民生哲學系統表說明》中，戴季陶說：「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實在是孔子以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中又說：「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接近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

5 戴季陶發明的是一種「反共的列寧主義」。他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中說：「要圖中華民國的生存，先要圖中國國民黨的生存，要圖中國國民黨的生存，一定要充分發揮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之生存欲望所必須具備的獨占性、排他性，統一性、支配性。……我們中國國民黨是三民主義的政黨，無論是何種派別的思想者，一定要有信心三民主義的覺性和決心，才可以來做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才是真正忠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一個政黨，除了主義，便沒有結合的基礎，主義是黨的神經系，同時是黨的血管。」

策劃四一二清黨，從他的理論格局上講是自然而然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除了沒有在形式上統一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以外，遵循了非常相似的政治時間表，首先利用蘇聯的支持發動列寧主義革命，然後通過清黨消滅共產黨同盟者和黨內的共產黨同情者。蘇聯通常對這種清洗無可奈何，出於反對西方的目的，還是非得援助這種政府不可。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者同樣遵循從容共到剿共的模式，最後放棄了反帝統一戰線，遲至一九三九年才決心投入英、法的懷抱，這種自我定位的意義可想而知，必須以放棄鄂圖曼帝國的遺產為代價。而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在繼承大清帝國遺產方面的成功，恰好是它後來失敗的原因，為了滿洲而向日本開戰，相當於凱末爾為了收復敘利亞和賽普勒斯向英、法開戰，為此不得不再次依靠蘇聯危險的援助，將清黨的效果付諸東流。在這種未曾發生的歷史中，凱末爾的繼承人只能逃往帝國主義歸還的賽普勒斯，依靠帝國主義的憐憫，詛咒伊斯坦堡鴿巢鳩占的蘇維埃政權。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戴季陶長期擔任考試院長和國史館長。他對功名利祿沒有興趣，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意識形態工作，因此贏得各派系的尊重。這種工作跟西方的學術沒有什麼共同之處，更接近於蘇斯洛夫和蘇聯的其他意識形態專家。西方的學術像手藝人一樣價值中立，因為泥瓦匠不用對建築物的流派風格負責，而且可以假定建築物肯

定是存在的。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則必須設計出一套不符合萬有引力定律的建築藍圖，證明這種建築物不僅可以存在，而且比其他流派和風格更加優越，在建築物最終倒塌的時候，還要證明這事全怪磚瓦品質不好，藍圖本身沒有問題。

這種類型的意識形態本質上屬於摩洛崇拜⁶，做摩洛的信徒比做它的敵人更危險。信徒必須為根本不是自己造成的錯誤承擔責任，敵人卻只需要嫻熟地運用馬基維利主義的技術就能從中取利。戴季陶是這種崇拜的大祭司，最終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信仰的誠實。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他在廣州自殺身亡。他的崇拜者堅持說他是因為憂國而導致心臟病發作，但這種說法跟他因憂國而自殺殉國區別不大。蔣介石率領全體中央執行委員出席他的葬禮，蔣緯國每年忌日為他戴孝。從國民黨的角度講，他是三民主義意識形態和國民黨現實政治地位不能相容局面的難成肉身。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他是列寧主義世界化過程中的典型標本。凡是羨慕列寧主義力量而反對列寧主義宗旨的第三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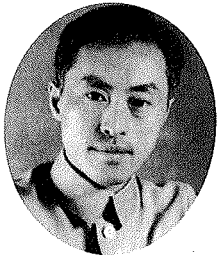
⁶ 摩洛 (Moloch)，是一位上古近東神明的名號，此神與火祭兒童有關；摩洛盛行於上古的地中海東南岸地區，包括迦南人、亞捫人、希伯來人、腓尼基人乃至黎凡特和北非的很多其他民族都知道這位神明。在當代歐美語言，Moloch 這個詞指代需要極大犧牲的人物或者事業。

反帝知識分子，多多少少都是戴季陶的精神兄弟。伊斯蘭世界尤其是戴季陶現象的苗圃，《金字塔報》的名作家海卡爾⁷就是納賽爾主義的戴季陶。

7 穆罕默德·哈桑寧·海卡爾(1923-2016)，是埃及及阿拉伯世界著名的新聞記者及時事評論員。他在一九五七至七四年間擔任開羅《金字塔報》主編。他曾是埃及總統納賽爾的知己和顧問，參與了納賽爾時代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決策。七十年代時他的著作《蘇聯人同阿拉伯人關係史話》就被介紹到中國，被官方用以「揭露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利用中東的複雜局勢，極力破壞阿拉伯人民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正義鬥爭，妄圖控制阿拉伯國家的醜惡嘴臉」。

一〇、蔣家天下陳家黨

——陳果夫、陳立夫



陳果夫（1892-1951，名祖燾，字果夫）、陳立夫（1900-2001，名祖燕，字立夫）是陳其美¹的侄子，而陳其美則是蔣介石的恩主。私人關係在他們最敏感的視窗期發揮作用，改變了他們一生的路徑。陳立夫最初在北洋大學和匹茲堡大學讀書，計劃當礦業工程師。一九二四年，蔣介石要求他到廣州幫忙。他本以為是暫時的，結果一去就是一輩子。廣州國民政府剛剛成立，人手缺乏，蔣介石需要可以信任的助手，任命陳立夫為

¹ 陳其美（1876-1916），浙江吳興人，辛亥革命初期與黃興同為孫文的股肱，曾先後組織暗殺陶成章、鄭汝成、陶駿保等孫文及革命黨的重要敵人，並任滬軍都督、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部长等要職，被孫文稱為「革命首功之臣」。陳其美還是青幫代表人物，也是蔣介石的結義兄弟，是蔣介石加入同盟會、謁見孫文的引薦人。後多次提攜蔣介石並委以重任，是民國初期對蔣介石幫助最大的關鍵人物。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陳其美在寄宿的上海法租界寓所被殺手槍殺而亡。

機要秘書和中央黨部秘書長。一九三二年，陳立夫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從此以後，CC系（Central Club，中央俱樂部）變成黨務系的代名詞。中統和軍統最初的主管部門都是中央組織部，徐恩曾²、戴雨農³和丁默邨⁴都從中央組織部調查科起家。如果國民黨是一個純粹的列寧式政黨，這些職務足以將他變成國民黨的史達林。然而國民黨雖然比民國早期的人事派系嚴密得多，卻從來沒有、也不願意變成第二個布爾什維克。陳立夫尤其是美國生活習慣極重的人，甚至不能或不願充分利用他的人事關係。中統受他影響較深，喜歡模仿聯邦調查局，追求技術和學歷，結果實際用途反倒不如江湖人物主導的軍統。

陳立夫在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內，歷任行政和經濟建設方面的各種要職，包括建設委員會委員、導淮委員會委員、考選委員會委員、經濟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他的工程師思維和同時代的專家治國論傾向非常合拍，對日益增強的計劃經濟模式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民國歷史有一種奇特的現象：西方產生的最新左派理論往往在本國沒有實施的機會，卻首先在中國實施，因為西方社會的保守勢力，尤其是宗教勢力始終強大，激進派通常只限於紙上談兵，而中國社會已經自行崩潰，缺乏強有力的保守核心，少數官吏和知識精英享有的權力比他們的西方同儕大得不成比例。一九六零年代以後，

這種現象也出現在獨立後的非洲國家。這些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三十年代的蘇聯）扮演了西方左派社會試驗場的角色，他們的失敗就是西方左派的失敗，因此後者負有為前者遮掩和辯護的責任。以美國為例，新政左派在不同時期將國民政府和史達林美化為民主的典範，都跟這種隱祕的聯繫有關。陳立夫在這些實驗者當中，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三十年代美國媒體對他的溺愛和回護，並不亞於十年後謝偉思⁵等人對延安的貢獻；或者更準確地說，不亞於羅斯福對史達林的保護作用。

一九三六年，國民黨處在一種自信滿滿的心理狀態。計劃官僚和進步主義者的聯盟

2 徐恩曾（1896-1985），浙江湖州吳興人，曾在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黨務調查科科長，亦是中央俱樂部的重要成員，一九三八年起，長期主政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歷任副局長、局長。

3 戴雨農（戴笠，1897-1946），原名春風，字雨農，浙江省江山縣人，長期主持國民黨特工與間諜工作，早期曾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工作，後為中華復興社、軍統、中美特種技術所等特務機構的主要創辦者及負責人。

4 丁默邨（1901-1947），湖南常德人，一九二六年加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後任中統第三處處長，一九三九年起任職汪精衛政權社會部、交通部、社會福利部等部長及浙江省主席等要職，後被國民政府逮捕處決。

5 謝偉思（John S. Service, 1909-1999），謝偉思乃自取的漢名，出生於成都美國傳教士家庭，後回美國讀書。返華後，一九三三年起在美國駐昆明、上海等地領事館任職，一九四四年七月作為美軍迪克西使團成員前往延安，會見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曾多次呼籲認識共產黨的重要作用，並提議美國與之合作，在延安設立領事館等。

似乎無所不能，廣大的亞洲內地就是他們無盡的原材料。列寧和凱末爾⁶是他們心中的英雄，因為他們逃離了帝國主義汙染的沿海經濟中心，在列強鞭長莫及的亞洲內陸建立了新生的吏治國家。民國初年的憲政和民權理想褪色了，因此連歐洲人似乎都不再尊重它們。新型威權主義的天命似乎已經降臨在國民黨頭上，打倒帝國主義的戰爭就是他們的試煉。陳立夫和宋子文都是這種輿論氣候的主要推動者，地質學家丁文江、李四光和大批理工科知識分子隨聲附和。一時間，胡適和殘餘的自由主義者彷彿僅僅是十九世紀殖民主義時代的遺老遺少。沒有這種普遍的輿論氣候，抗戰建國的理論幾乎不可能付諸實施，至少不可能在資源委員會和交通委員會的內地開發方案完成以前付諸實施。

戰爭爆發後，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他系統地推行了三大方針。其一是百年樹人，戰時當作平時看。其二是理工技術人員為主，壓制人文學科。其三是統一學制，藉抗戰遷徙的機會兼併殘餘的私立學校，因為私立學校的主力是教會學校，已經在北伐革命之後遭到搶劫，統一考試制度就是在陳立夫的這次改革中產生的。他在教育方面的歷史地位，酷似國民黨政權的整體歷史地位，也就是說扮演了從西方模式走向蘇聯模式的中間過渡環節，因此同時具有兩者的特徵，引起了後人爭論不休的定位定性問題，但蘇聯的因素毋庸置疑地日益濃厚。他預期抗戰結束以後就是建設新中國、實現凱末爾—孫文夢

想的大好時機，出版了這方面的許多小冊子，事先為此不惜成本地培養了大批工程技術人員，與大後方貧弱的經濟狀況極不相稱，結果為中共的「兩彈一星」和幾個五年計劃所用，製造了五十年代蘇聯模式經濟建設的神話，直到這批人在文革中被工農兵大學生取代。逃亡臺灣的國民黨人完全知道「兩彈一星」⁷是他們的野心和遺產，不僅是「抗戰建國」、甚至「新中國」的口號都是他們的盜版，他們不顧自己身為美國盟友的義務，為敵人實現的大國夢叫好，彷彿被逆子逐出家門的老父仍然為自己溺愛和養大的兒子驕傲。這種既可憐又可笑的表現充分證明了國民黨的政治德性，令人不得不佩服上帝裁決的無限公正。

從抗戰後期到行憲初期，陳立夫的角色越來越集中於文化建設方面。他改不了美國留學生的性格，受不了亂七八糟的江湖人物和土贗政客，確實也只有文化界才能感到

6 凱末爾（1881-1938），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總理及國民議會議長，曾在一戰後領導「凱末爾革命」，與希臘交戰，並在其後領導了土耳其的現代化改革。

7 「兩彈一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核彈、飛彈和人造衛星的簡稱，它們被視為毛的新中國成立後最初幾十年科技實力發展的標誌性事件。而「兩彈一星」的元勳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鐸、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都是民國時期培養的科技和工程技術學人。

舒適。在此期間，他歷任國立編譯館館長、正中書局董事長、《中央日報》社長，「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熟悉美國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偏見和生活方式，喜歡留在他們的交際圈內。結果雙方都高估了對方在本國的地位，把一小撮知識精英當成整個社會。《時代》雜誌將他評為一九四七年的世界風雲人物，期待他將戰後的中國引向美國進步主義的道路，結果完全落空。他遊說美國各界支持杜威競選總統，結果只是得罪了勝利者杜魯門和馬歇爾，給緊急關頭的國民黨造成了無法彌補的致命傷。他繼承了美國政治家的習慣，覺得自己應該首先站出來，為國民黨的失敗承擔責任，於是退隱到美國新澤西州小鎮養雞為生。

這種歸宿在失敗的美國政治家當中，實在是司空見慣；在中國人看來，簡直駭人聽聞；因此引起了無窮無盡的流言，包括陳、蔣兩家失和的流言。這些流言的實際作用，主要是把日本人製造、蘇聯人和陳伯達（中共文膽）抄襲的「四大家族」謠言變成了笑柄。從冷戰後披露的材料看，蔣介石其實一直在寫信勸他回臺灣做官，提出的位置非常符合他的嗜好和特長，包括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使、希臘和西班牙大使、巡迴大使、考試院院長，但他都婉言謝絕。他退隱的真實理由很可能是不足為外人道的生活習慣，因為他像宋美齡一樣，其實是半個美國人，不可能不覺得亞洲社會混亂腐敗，只有回到

文化上的家園才會感到舒適，即使生活清寒一些也無所謂。何況這本來就是他一九二四年到廣州「臨時幫忙」時的夙願，沒想到一「臨時」就是三十年。最後，他終於再次遷就蔣介石的願望，但除了文化方面的職務外，不肯插手政治和行政事務。他名義上是總統府資政，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了他擔任副會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李約瑟的研究，主要就是他支持的。臺灣老一輩學者當中，受這項工程影響的人為數甚多，潛勢力不遜於他在抗戰時期派到美國的留學生。他晚年的眾多業餘愛好包括中醫和《易經》，他個人的長壽給這兩者的粉絲增加了不少論據，雖然蘇格蘭燕麥的粉絲同樣有理由把他算成自己人。

8 一九三九年十月，日軍特務機關「登集團參謀部」對國民政府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所做的秘密報告顯示，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陳立夫等各自擁有上千萬資產。又宣傳宋子文是一九四零年代的世界首富。當時陳伯達根據這些謠言，著有《中國大家族》一書。後美國聯邦調查局因此秘密調查了宋在美國花旗銀行與大通銀行的存款，一九八三年這份調查局文件及相關文件解密，證明這一消息是來自日本的戰時謠言。

9 李約瑟（1900-1995），生於英國倫敦，生物化學家、漢學家和科學史專家。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對現代中西文化交流影響深遠。「李約瑟難題」即他提出的關於中國科技停滯的觀點。

陳果夫比陳立夫更像陳其美，一開始就報考浙江陸軍小學，加入了同盟會。陳其美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討袁之役）和三次革命（所謂的護法運動）當中主持同盟會——國民黨在上海的大本營。他追隨叔父，直至後者遇刺身亡。此後，蔣介石在他生活中取代了陳其美的地位。二十年代末，蔣介石在上海灘「為革命炒股」，先贏後賠，最後還是只能靠蘇聯經費，模仿不了史達林和汪壽華¹⁰的搶劫籌款法，暴露了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局限性。在此期間，陳果夫也追隨帶頭大哥，混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一九二四年，蔣介石在廣州主持黃埔軍校的工作。他留在上海，為蔣介石採購必要的軍用物資。一九二六年，蔣介石在廣州政府內部的地位迅速上升。陳果夫一到廣州，就出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中央組織部代部長的要職。國民黨的代部長或副部長往往比部長重要，後者的公關職能經常超過實際管理職能。陳果夫始終生活在老同盟會員的圈子裡面，對自己人和外人的區別非常敏感，不可能像陳立夫那樣安於客卿地位。鮑羅廷在此期間玩弄了一些很拙劣的手段，引起了陳果夫的警覺。

北伐決策是蔣介石個人的勝利和陳獨秀的重大失敗，蘇聯人從來不會原諒這種事情。鮑羅廷想拿汪兆銘做幌子，從蔣介石背後架空蔣介石。這項計劃有多方面的好處，在鮑羅廷看來簡直是天作之合。國民黨內幾乎人人皆知，汪、蔣有心結。汪兆銘覺得蔣

介石不過是偏裨小將，應該恭恭敬敬聽他這位元老的教誨才對。大多數擅長社交的人物都能討好汪兆銘，因為後者更在乎自己的美好形象，卻不大明白自己的利益在哪裡。問題在於，蔣介石恰好不是擅長社交的人。他嘴比較笨，人卻相當固執，越是口舌不聽使喚，越是心裡不服氣，屬於高華德參議員¹¹所謂「從內心知道什麼是正確」的角色，不懂得怎樣掩飾實幹家對清談家固有的蔑視。兩人相互的指控頗能折射他們的性格，或者不如說反映了他們心目中最重要的事物。蔣介石指責汪兆銘和蘇聯人合謀，企圖扣押或驅逐他。汪兆銘指責蔣介石企圖抹殺他的歷史地位，絕對不自量力。汪兆銘和許多國民黨左派人士一樣，喜歡把法國當作出走的目的地，喜歡跟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和藝術家交往，喜歡在所有來訪者面前表現自己的偉大情操。這些特點使他的圈子非常容易遭到滲透，而法國正好就是蘇聯在歐洲的間諜總部。蘇聯人對汪兆銘的瞭解，比這位自戀者在鏡中看到的自我形象準確得多。他們準確地預見到：只要他們在法國發展的人員勸誘汪兆銘回國，上海安插的人員發動浪漫而熱情的接待活動，慷慨地獻上無數個救國救黨

10 汪壽華（1901-1927），原名何紀元，中共早期工運領導人之一，青幫成員，曾多次採用綁架方式進行籌款，後被杜月笙活埋。

11 高華德（Bary Morris Goldwater，1909-1998），美國政治家，共和黨人，被視為是一九六零年代開始的美國保守主義運動復甦茁壯的主要精神人物，常被譽為美國的「保守派先生」。

高帽子，巧妙地利用文人討厭繁瑣管理工作的天性，就能輕而易舉地將他變成共產國際的掩體。

只要蔣介石無法拒絕這位大人物的歸來，陳果夫十之八九不會有能力驅逐他名義上的隨從。然後共產國際只要振臂高呼「黨權高於一切」、「打倒新軍閥」，就能孤立蔣介石在南昌的司令部。如果這個頑固分子仍然不懂得懺悔，就用張發奎（國民政府陸軍上將，曾與汪兆銘在廣州組反蔣聯盟，中共南昌暴動的軍隊為其部下）和唐生智¹²把他踢出去。如果汪兆銘像廖仲愷一樣恰到好處地遇刺，蔣介石大概逃不了許崇智¹³的類似下場。然後汪兆銘理論上的追隨者就會修改孫文形象一樣，將這位左派新領袖——烈士的形象修改到符合蘇聯需要的地步，然後以他的名義舉起更加革命的大旗。

事實上，這項美妙的設想全部變成了歷史。對鮑羅廷非常不幸的是，實現的過程陰差陽錯。陰差陽錯的主要原因在於歷史的動盪性超出了蘇聯人的即時控制能力，次要原因三位關鍵人物做出了異常的反應。汪兆銘自己就是第一位，首先任性地破壞了蘇聯人、蔣介石、真實的朋友和偽裝的朋友的一系列安排¹⁴。蔡元培是第二位，他不能滿足於自己親自跟丘九（暴力學生）決鬥，還想利用蔣介石的軍隊清理門戶¹⁵。第三位就是

陳果夫，他真正相信既能清除黨內的匪諜，又能維持黨務系統的運作（如果軍方的意見得以完全貫徹，國民黨黨部大概會被整個解散的）。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陳果夫與吳敬恆、張靜江等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要求對各地共產黨「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四月八日，陳果夫與吳稚暉、白崇禧等組織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取代共產黨

12 唐生智（1889-1970），湘系軍閥，一九二六年發動兵變，後投靠國民革命軍，北伐軍到武漢後，鮑羅廷試圖以「迎汪」來「倒蔣」，並利用唐生智等地方派系逼蔣交權。一九二七年底在寧漢戰爭中他敗給了李宗仁，前往日本。一九二九年四月倒向蔣介石，參加蔣介石與桂系軍閥的戰爭。十二月再次易幟聯合石友三反蔣。一九三一年後再次投靠蔣，一九三七年南京保衛戰中任最高指揮官，並下令扣船封路阻止難民撤離。一九四九年投共。唐生智身為軍人又信奉佛教，有「佛教將軍」之稱。

13 許崇智（1887-1965），廣東番禺人，一九一六年與蔣介石結拜為兄弟，力排眾議推薦蔣任黃埔軍校校長。一九二五年孫文逝世後，許被任命為軍事部長兼廣東省政府主席，成為僅次於汪精衛、廖仲愷和胡漢民的國民黨領袖。後廖仲愷被暗殺，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以控制局勢和處理廖案。在審理廖案過程中，蔣介石以國民黨右派涉嫌最大為名排擠許崇智。許本人被迫到上海避居公共租界，自此逐漸退出權力核心。14 汪兆銘一度主張調和兩黨關係，並得到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羅易的信任。但他在獲知共產國際發給中共的緊急指示電內容（要求立即實行土地革命，改造國民黨現有機構和高層，動員革命軍隊，組織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等）後，開始改變立場，進行分共部署。

15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蔡元培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上提交了「中國共產黨陰謀破壞國民黨之證據」、「浙江共產黨破壞本黨之事實」等報告，主持通過了吳稚暉草擬的「請查辦共產黨呈文」，並審定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各省黨員應進行處置的共產黨人的名單。四月九日，蔡元培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發出「護黨救國」聯名通電，痛斥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嚴詞指責工農運動。

操縱的上海市臨時政府，掌握上海軍事、政治、財政之權。一九二八年十月，陳果夫任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副院長，負責國民黨內組織、整理黨務及進行清黨，試圖打造純粹的黨組織。但國民黨黨權不振，黨費匱乏，黨務人員較之軍官和文官毫無前途，加之要害部門一開始即被共黨把持，陳果夫的目的始終沒有實現。國民黨清黨的不徹底性使其不能像歐洲社會民主黨一樣獨占左派的生態位，將殘酷清洗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從大多數人的記憶中抹去，然後輕輕鬆鬆地塑造民主形象。陳果夫身為國民黨主要的組織者，不能說沒有責任，儘管他個人對國民黨已經達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境界。

陳果夫長期定居中國，因此付出了身體上的代價，染上了這種環境很難避免的結核病。他參加北伐時，已經種下了病根，只是仗著年輕能頂過去。黨務工作是那種既得罪人、又繁瑣勞累的任務，也就是像汪兆銘這種人殺了他都不肯幹的事情，何況國民黨的黨棍還不能指望蘇聯共產黨書記的權勢。只有清教徒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才能使他堅持到底，將自己透支殆盡。抗戰爆發，內地的生活和醫療條件更加惡劣。他的病情急遽惡化，以後基本上就是拖日子了。他五十年代初在臺灣去世時，甚至沒有留下子女。在北洋時代，這種嚴苛的私生活紀律實在難以想像。然而在國民黨核心官員當中，以節制和熱忱自負的人非常之多。他們對北洋老人貪圖生活享受的蔑視，多多少少有點像清教徒看待

查理二世的廷臣。他們雖然高估了自己轉移風氣的作用，至少能夠大大增強了核心組織抵抗極端情況的能力。他的疾病對國民黨務的致命影響，幾乎相當於戴雨農去世對特務工作的影響。在他以後，國民黨再也沒有這樣任勞任怨的組織人才。像抗戰時期的國民黨這樣從上到下遭到全面滲透的組織，在世界歷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

一一、紅色國母

——宋慶齡



宋慶齡（1893-1981）在衛斯理安學院讀書時¹，生活方式無異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女孩。她們開茶會，演話劇。她畢業時，同學們都以為她將來會做醫生。她的家庭浸淫基督教文化，但同樣的傳統在不同的社會中發揮了大相逕庭的刺激作用。衛斯理安學院在美國是保守派的中堅，宋氏家族的基督教少數派背景則構成了他們資助革命黨的主要原因²。宋慶齡沒有做醫生，卻當了孫文的英文秘書，實為兩家數十年的革命友誼所致，但宋慶齡表示有意嫁給孫文時，長輩仍然表示不能接受。他們對孫文混亂的私生活並非一無所知，有理由相信孫文此刻還是有婦之夫³。宋慶齡選擇了私奔⁴，在日本和孫文舉行婚禮，但她始終對婚禮的合法性耿耿於懷，直到文革時期還寫信給韓素音⁵和索爾茲伯里⁶，強調孫文當時已經是自由之身。她對離婚——結婚的短暫時間差和牧師的意見如此敏感，幾十年如一日地展開反對流言蜚語的消耗戰，從反面證明了她小時候非常相信

1 喬治亞州梅肯市的衛斯理安學院 (Wesleyan College) 於一八三六年成立，是世界上第一所專為女性設立的學院，屬於衛理公會教派。一九零八年，十五歲的宋慶齡考入該學院，後成為校刊的編輯、舞蹈戲劇社社員、文學社通訊幹事，經常在校刊上發表文章，如〈留學生在中國之影響〉、〈二十世紀中世界最大事件〉、〈近代的中國婦女〉等。一九一三年畢業回國。

2 一八八五年，宋嘉樹從田納西州文德比特大學神學院畢業，被美國監理會派往中國宣教。一八九二年，因為教會紛爭以及薪酬問題離開了監理會。他開創美華書局，專門印刷出版聖經，同時還兼任上海福豐麵粉廠經理。他結識孫文後，成為孫文的重要資助者。

3 孫中山比宋慶齡年長二十七歲，與原配妻子盧慕貞育有一兒兩女，長子孫科比宋慶齡還年長一歲。當時只有還在美國讀書的宋美齡對二姐表示了支持。宋慶齡被軟禁在上海家中，逃出後奔赴日本。

4 關於宋慶齡當年是如何離開家、赴日本與孫中山結婚的問題，比較常見的說法是她跳窗私奔。這種說法出自愛德加·斯諾 (Edgar Snow) 的《復始之旅》。但據鄧廣殷說，宋慶齡曾反駁這一說法：「這又是他自己虛構的想像！……可憐的斯諾，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製造這樣的謊言，就為了給他的書製造轟動效應。」鄧廣殷是宋慶齡早年在香港創辦的保衛中國同盟（中國福利會前身）的領導人之一鄧文釗的長子，後來出任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理事。他與宋慶齡的友誼持續了幾十年，宋慶齡晚年給他及其夫人孫君蓮、長女鄧勤寫了近二百封英文書信，在英文遺囑中將全部藏書贈給他。

5 韓素音是英籍華裔女作家，曾在中印邦交中發揮作用，擔任過周恩來與戴高樂之間的特使，為毛澤東和周恩來寫過傳，被「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中國人民友好使者」稱號。宋慶齡致信她，是表示「在利昂·沙爾曼寫的那本傳記中，我發現她在描述我的婚姻這部分也像其他一些作者那樣犯了相同的錯誤」，請韓素音「採取任何認為合適的辦法把我這個聲明公諸於世人，以正視聽」。

6 索爾茲伯里是美國記者、作家，曾任《紐約時報》副主編，宋慶齡曾在北京寓所設宴招待他和他夫人。宋慶齡致信，是敦促他改正書中的錯誤：「你也許可以向你曾諮詢過的那些所謂可靠的參考資料來源發出警告，告訴他們這是一則極為惡劣的不實之辭，他們到處散佈是有罪責的。」她收到已作改正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的第二版時，立即給索爾茲伯里去信表示「對你的情誼深為感激」。

牧師教導的合法婚姻標準。

孫文由日本律師主持的簡易離婚手續從一九一五年六月開始，至多花了幾個月時間。當時的新教國家辦理離婚手續非常昂貴和複雜，窮人根本支付不起。貴族都很少願意忍受可能長達數十年的訴訟折磨，外加社交關係斷絕的沉重代價。如果供養情婦，成本反而較低。天主教徒離婚的難度，比殺妻還要大得多。教皇特許撤銷神聖的婚姻，對國王而言都是幾十年一遇的小機率事件。殺人犯獲得國王或總統的特赦，反倒是年年都有的事情。相形之下，東方社會至少可以稱為男人的天堂。傳教士對這種亞洲式的簡易離婚程序有什麼看法，無須過多解釋。這不是宋慶齡面臨的唯一消耗戰，她的婚姻在儒家價值體系和基督教價值體系當中的位置都頗為尷尬。國民黨元老和宋家長輩一樣堅決反對他們的婚姻，胡漢民甚至說出了懸崖勒馬這樣不給面子的話。婚禮草草舉行，大部分來賓都是日本人。雙重的隔閡直到孫文臨終時都沒有消解，體現於孫文給宋慶齡的財產安排⁷。女性對社會孤立的敏感性通常甚高，面對排斥，自然會驅使她們親近相反的價值觀。婚姻觀本身就是進步和反動的試金石，共產主義則是進步的最高峰。只有在進步的價值體系內，宋慶齡的婚姻才不會成為問題。孫文去世後，鮑羅廷夫人⁸一度變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習慣一直更接近西方，跟蘇聯人的共同語言多

於中國土著。她在漢口的豪宅需要共產國際的世界性供給網絡，地方軍閥是無法勝任的。鮑羅廷夫人是一位老練的特工人員，並不依賴鮑羅廷，在華北的地下活動當中獨當一面，直到張作霖將她驅逐出境。宋慶齡懂得怎樣運用這個保護傘。鮑羅廷對汪兆銘和左派文人的軟弱與虛榮痛心疾首，在宋慶齡身上發現了某種西方教育留下的堅定。她和鮑羅廷一起撤退到廬山，參加了南昌暴動的策劃。重建廣州革命統一戰線的希望破滅後，共產國際將他們全體撤回蘇聯。

張伊麗在《黨史博覽》（二零一五年第九期）說：「一九二七年武漢政府的叛變，促使宋慶齡選擇祕密前往蘇聯，以鮮明地反抗那些藉國民黨之名、行背離孫中山三大政

7 孫文有三份遺囑，包括政治遺囑、私人遺囑及《致蘇聯遺書》，私人遺囑是寫給宋慶齡的：「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8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據史達林的建議通過決議，任命鮑羅廷為孫文的政治顧問。十月，鮑羅廷夫人法因娜·謝苗諾夫娜·鮑羅廷攜兩個兒子來華，成為鮑羅廷的主要助手，並認識了孫宋夫婦，很快成為好朋友。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她在列寧紀念號上被張宗昌部下逮捕。七月被法庭裁定無罪，獲釋。（蘇聯人向法官行賄二十萬美元，法官收了錢並判她無罪，隨後逃走。）她在蘇聯情報人員（公開身分是學者）的幫助下在北京躲藏起來，後經新疆回到蘇聯。

策之實的人。據記載，當時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撥給宋慶齡和葉甫根尼·陳（陳友仁）⁹，一萬盧布用作赴蘇聯的旅費。這是宋慶齡一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動，不僅實現了孫中山的訪蘇遺願，而且開啟了宋慶齡投身共產國際、進行祕密工作的職業革命家生涯。「一九二七年八月，宋慶齡由美國密友雷娜·普羅梅等人陪同，先後輾轉海參崴、赤塔，於九月七日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政府的代表及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九月八日，宋慶齡發表聲明，重申訪蘇的目的和背景，並提出實行土地革命的主張。蘇方對宋慶齡的到來極為重視，為她安排了豐富且極具蘇聯特色的活動。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還專門召開會議，決定「從中國委員會的經費中撥出四千元作派遣費用」，「葉甫根尼·陳、宋慶齡和鄧演達¹⁰在蘇聯逗留期間的全部接待工作由時任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和主席團委員葉努基澤同志負責」。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專門開會並制定了文件，爭取宋慶齡參加「反帝大同盟」等有著共產國際背景的社會活動，以培養她對共產國際更多的認識，使之回國後在國民黨上層做他人替代不了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春，宋慶齡在陳友仁的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宮會見了史達林。史達林最後對宋慶齡說：「你得先回國去，共產國際討論後，會派信使去中國聯繫。」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李玉貞在《世紀》（二零一四年第七期）中說，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二十一日，宋慶齡給時在德國的鄧演達寫了兩封信。鄧演達回信說，就組建第三黨一事，可以繼續使用孫中山「從前在日本的主張，就以中華革命黨為新黨的名號」。為此他建議宋慶齡或到日本、或到德國面謀建黨之事。三月二十二日，史達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會議，就鄧演達信中提到的事情逐一做出具體指示。根據史達林的指示，次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米夫¹¹就宋慶齡的事向加拉罕¹²和伏羅希洛夫¹³提出九條建議，直言不諱地要「改造」宋慶齡¹⁴。在國共

9 葉甫根尼·陳（陳友仁，1875-1944），生於特立尼達，早年為媒體人，後追隨孫文，一九二七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以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為最大政績，有人稱武漢國民政府為「陳友仁時代」。後長期從事反蔣活動。一九四九年以後被中共葬入八寶山。

10 鄧演達（1895-1931），粵軍將領，曾參加討伐陳炯明。一九二六年七月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隨軍北伐。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後與宋慶齡等展開反蔣活動。一九三二年被蔣介石祕密處決。

11 米夫（1901-1938），一九三零年十月來到中國任遠東局書記，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蘇聯。後因被人揭發為政治反革命、托派分子而被逮捕，一九三八年被處決。

12 加拉罕（1889-1937），亞美尼亞人，十月革命後先後擔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副外交人民委員，參加布列斯特和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零年任蘇俄外交事務全權代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九二零年九月、一九二三年九月三次代表蘇俄政府發表對華宣言，宣佈廢除帝俄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北洋政府時代，出任蘇聯首任駐華大使。李大釗作為他的下線，在馮玉祥等人與蘇聯之間牽線搭橋。一九二六年，因中東路問題，張作霖表示不再承認他的大使身分，他撤離中國。一九三七年在大清洗中被逮捕處死。

13 伏羅希洛夫（1881-1969），蘇聯元帥，在國內戰爭時期成為史達林的嫡系，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四年任蘇聯陸海軍人民委員和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關係方面，米夫認為，「可以利用宋慶齡來分化國民黨的軍閥上層，保證把國民黨左派挖出來，參加與中共聯絡的工作。」

宋慶齡於一九二八年五月初到達德國，繼續致力於「中華革命黨」的建立。擁有德、俄共產黨雙重黨籍的羅比列，「受駐柏林蘇聯使館之命」與宋慶齡「往返」，所以共產國際對宋慶齡的活動瞭若指掌。宋慶齡加入蘇聯共產黨組織的具體時間不能確定，但多半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因為她瞭解牛蘭的身分，而逮捕牛蘭夫婦的國民黨當局始終沒有弄清楚¹⁵。她是蘇聯的特工，不在遠東局和中國支部節制之下，因為潘漢年當時在上海活動，很疑惑：「不知怎麼搞的，他們會把第三國際的關係交給孫夫人？」宋慶齡營救陳賡和廖承志時，自稱共產國際代表，讓廖承志匯報在上海的祕密工作情況並寫出叛徒名單，由宋慶齡轉交共產國際（據廖承志回憶，此事發生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她對中國支部的態度猶如欽差大臣，瞭解後者的隱祕。後者對她的瞭解，卻只限於她願意說明的部分。

宋慶齡通過安插在教會當中的特工董健吾¹⁶及其女兒董惠芳，建立了可靠的情報轉運管道，多次用共產國際的情報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周恩來表示：「在中國有百萬共產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米夫致函加拉罕，轉告遠東書記處關於宋慶齡問題的建議。該函全文如下：

「根據中國委員會的決定，茲將遠東書記處關於宋慶齡問題的建議轉去供你們討論。

第一，有必要讓宋慶齡同我們的一些負責同志進行一次談話，以便弄清她對共產國際最近一些決議、特別是她對第九次全會決議（該決議案指出，現時中共的工作中心是爭取工農群眾，準備實行武裝暴動）的態度。弄清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制定利用宋慶齡和她的一些志同道合者の方針。

第二，作為宋慶齡未來政治活動的前景，制定以下方針是合適的：（1）關於吸收她參加社會活動方面的工作。制訂在中國成立反帝同盟的計劃，由她主動參加該同盟的工作，並保證可以利用這個廣泛的組織作為共產黨人進行工作的某種合法掩護。（2）關於國民黨方面。認為可以利用宋慶齡來瓦解國民黨軍閥上層分子，並團結所有真正的左派在與共產黨保持聯繫的情況下進行工作。（3）關於國務活動方面。利用宋慶齡在恢復與蘇聯的外交關係問題上對南京、武漢和馮的中央施加壓力。例如，提出在中國成立「蘇聯之友協會」的主張。（4）利用宋慶齡來正確地報導蘇聯的情況，揭露無論來自國民黨首腦（在土耳其的孫科、胡漢民、西西伍）方面，還是來自帝國主義報刊方面對蘇聯的造謠和誹謗。（西西伍，即伍朝樞，伍廷芳之子，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

第三，除宋慶齡同我們的負責同志談話外，還有必要對她做更有力的系統的工作，並讓她瞭解我們的建設和政策，如（1）組織她到蘇聯各地參觀；（2）吸收她參加工會國際代表大會（即紅色工會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三日在莫斯科召開）；（3）指定一二名講解員對她做思想工作，等等；（4）於上述我所指出的幾個方面對宋慶齡做工作取得成效時，認為有必要召邵演達來蘇聯，使他採取與共產黨更緊密合作的方針，以便利用他和宋慶齡一起來達到上述目的。」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牛蘭夫婦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抓獲。警方從牛蘭夫婦的住所搜得共產國際遠東局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一年的賬冊、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處中國辦事處的帳冊、上海各銀行的存摺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產國際給遠東局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共產黨的指示，也有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這使中國的輿論界一時間議論紛紛，不僅有關中共的一些重要文件被逐件披露報章，而且還盛傳這個牛蘭是「第三國際在滬最高機關領袖」。

其實，牛蘭真實姓名是亞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尼克，一八九四年出生於烏克蘭的一個工人家庭。一九一七年加入布爾什維克，一九一八年加入「契卡」；一九二四年調入共產國際聯絡部擔任與奧地利、義大利、德國等國共產黨聯絡的祕密信使，一九二七年以後又被共產國際派往中國，以商業公司作掩護，建立祕密交通站，負責轉送各種文件和經費等。他的被捕對中共中央的正常工作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黨員，但只有一個宋慶齡。」宋慶齡將佐爾格獲得的蔣介石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計劃的情報¹⁷，轉送給蘇區，使得紅軍能夠從容應對，取得反「圍剿」勝利。一九三四年夏，面對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中共上海局書記盛忠亮秘密會晤宋慶齡，請求宋慶齡在國民黨統治區發起運動，以減輕國民黨對蘇區的壓力。遵義會議後，中共派陳雲和潘漢年到上海報信。宋慶齡為他們提供了掩護，成功地將他們送往莫斯科。共產國際中國組的地下秘密電臺，就是通過宋慶齡的關係，設在她紐西蘭朋友路易·艾黎¹⁸位於上海市愚園路寓所樓房的頂層。在長征中以及在紅軍抵達陝北根據地後，宋慶齡一直能夠通過無線電臺同中共中央聯繫。

西安事變後，宋慶齡繼續利用她的地位保護中國共產黨。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合法地位。宋慶齡可以名正言順地為延安籌款籌物。一九三八年六月，身在香港的宋慶齡為了幫助中國人民的抗日，專門籌建了「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抗戰結束後，一九四五年，宋慶齡的「保盟」用五百二十二萬元法幣買了大批物資運往中共的華北根據地。一九四六年，「保盟」改名後的「中國福利基金會」（此時的「中國福利基金會」是一個有巨大經濟實力又有良好聲譽的慈善組織）用四點三萬美元買了美軍一間有著二百五十張床的海軍醫院，運送到中共占領的蘇北，又用一點八萬元買了

美軍在上海的剩餘物資。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時，「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的幾座倉庫裡還存有三百噸準備給中共軍隊的物資。抗戰結束後，國民黨仍然對她投鼠忌器。蔣介石的婦人之仁和毛澤東的恩將仇報，完全符合世界應有的狀態。革命成功後，她的處境日益惡化。中、蘇決裂後，她甚至不得不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在為蘇聯的共產國際效力時，根本不把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放在眼裡——中國共產黨甚至不肯痛痛快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宋慶齡參與成立了設在歐洲的「國際營救牛蘭委員會」，並以個人名義發表聲明，要求南京國民政府釋放牛蘭夫婦。她還親自同蔣介石本人談判，交換條件是：南京政府釋放牛蘭夫婦，蘇聯當局遣送蔣經國回國（當年前往蘇聯留學的蔣經國）。

因牛蘭夫婦被捕後始終堅不吐口，國民黨也未能得到任何口供，故關於牛蘭的確切身分，一直未能搞清楚。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九日，國民政府江蘇最高法院判決二人無期徒刑，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蘇在抗日上進行合作，國民政府很快以「驅逐出境」為名，釋放了牛蘭夫婦。

16 董健吾（1891-1970），一九二八年祕密入黨，在上海從事中央特科的祕密情報工作，公開身分是聖公會聖彼得教堂牧師。

17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蘇聯間諜佐爾格到上海，以《德意志糧食報》駐中國通訊員和德中協會「中國銀行法的起源和發展」研究課題執行人的身分展開活動。一九三二年夏季，德國軍事顧問魏策爾同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們，在廣西桂林的一次祕密會議上擬定了第四次「圍剿」的戰略計劃，佐爾格立即將他所瞭解到的有關這次「圍剿」的進攻方向、兵力、部隊的集結、日期以及魏策爾想用來消滅中共紅軍的「掩體戰略」的中心內容，向莫斯科中央總部做了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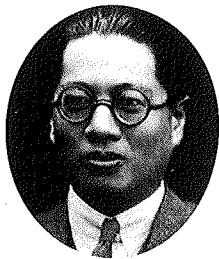
18 路易·艾黎（1897-1987），紐西蘭人，一九二七年到上海租界工部局消防處工作，後與中共建立聯繫，曾為紅軍兌換繳獲的地方鈔票，又與斯諾等發起工人合作社運動，還協助新四軍辦軍工企業。一九八七年病逝於北京。

快地批准，終於報了長期寄人籬下的一箭之仇。在她去世前，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慶齡，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宋聽後微笑說：「不勉強吧！三十一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

她的後半生每況愈下，她自幼習慣的生活方式終於走到盡頭，只能無可奈何地抱怨：「我的所有外國衣裳都給我表弟的五個女兒了。在那個無恥到極點的婊子江青所炮製的『文化革命』期間，她們都被『紅衛兵』趕出家門，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致楊孟冬信〉）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晚，宋慶齡在北京去世。她的遺願要求將骨灰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其父母墓地的東側，不要跟國共兩黨共同的國父孫文合葬。宋美齡晚年在美國仍然自責，為什麼沒有在一九四九年勸姐姐一起走，宋慶齡自己卻非常清楚，一生的骰子已經在她投奔孫文的時刻落地。她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終於可以安心摘下面具了。

一二、誤入東方的西方工程師

——宋子文



宋子文(1894-1971)來自一個以印刷《聖經》和資助國民黨著稱的家庭，這個家庭多多少少懷有自己成為某種未來楷模的期許。因此，他的經歷頗能代表另一種可能的歷史。宋子文最初在上海的聖約翰大學讀書，後來赴美國留學，在哈佛大學讀碩士，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他所屬的社會距美國比距長沙近，距加爾各答比距西安近。他

1 宋子文的父親宋嘉樹(1854-1918)，字耀如，海南文昌人。原姓韓，十二歲時過繼給宋姓舅父，遂改姓宋。一八七五年赴古巴，三年後赴波士頓，在絲茶店當學徒。十六歲時在北卡羅萊納州接受洗禮，被命名為查理·瓊斯·宋。一八八一年進入杜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一年後轉學到萬德畢爾特大學神學院。一八八二年入田納西州範德堡大學神學院，一八八五年畢業。次年回國，在蘇州、上海等地傳教，並執教於教會學校，胡適即其學生之一。兩年後在上海創辦美華印書館，印行中文本《聖經》，並參與創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還兼任上海福豐麵粉廠經理。一八九四年夏，宋嘉樹與途經上海的孫文相識，從此成為孫文的重要資助者。民國成立後，宋嘉樹曾隨孫文訪問日本，二次革命時，宋家避居日本。宋育有子女六人，依次為靄齡、慶齡、子文、美齡、子良、子安。

們的起點既高於北京，更不用說也高於內陸四分之三人口的終點。這種人對抽象的中國產生興趣，與其說出於利益和前途的考慮，毋寧說更接近於前輩傳教士精神的世俗化，將美國新教社會常見的救世情結轉化為拯救弱者——落後社會的情結。他們假定的拯救對象，對這些送貨上門的自封使徒懷有自相矛盾的感情，一方面佩服他們的勇氣、熱忱和操守，一方面難以忍受他們的自以為是、指手畫腳和急不可耐。請注意：從行為模式上看，他就是亨利·盧斯²的同胞。所謂中國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他們這種人出於善意而發明出來的，同時代的徐州人和潮州人估計認不出來。

國民黨發明的正史宣稱，宋家是孫文和蔣介石的忠誠支持者。然而從宋家的角度看，倒不如說孫文和蔣介石都是他們的塑造對象。宋美齡嫁給蔣介石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以斯帖³和海倫娜⁴，只能付諸懸測。宋子文飛揚跋扈的時候，渾身上下都散發出麥克阿瑟在菲律賓的氣場，倒是一目了然。國民黨的敵人（指共產黨）由於懶惰和倉促，用剪貼的方式收錄了國民黨在這方面的發明，在後面又複製黏貼了日本人在抗戰時期關於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發明。國民黨的敵人的敵人（指自封的啟蒙知識分子）和國民黨的敵人的敵人的敵人（指反啟蒙的各種宗教和各種族群）不大理解這種俄羅斯套娃式的楚門世界，他們依次出現，每一個新來者都以攻擊最近的先來者為主要賣點，而各取所

需地進行誇張、掩蓋和剪接。最後造成的結果很像火山爆發後的地層，原本層累造成的各層次扭曲、錯亂和翻轉，讓三葉蟲和腫骨鹿親如一家。宋子文在美國的工作是紐約花旗銀行見習，回國後以直升飛機的速度出任廣州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行長。法國作家安德列·莫洛亞聲稱，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士兵升為將軍的速度，比女人從懷孕到生產的速度還快。這種速度對辛亥年間的軍官和民國時期的留學生而言，都算不上陌生。宋子文從中央銀行行長升到財政部長的時間，雖然沒有趕上女人生孩子的時間，但無疑已經領先於大多數留日學生、更不用說留美學生上預科的速度，也就是說只用了兩年。他在一九二七年選擇了蔣介石，改變了蔣本人、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命運，雖然後三者一向不肯承認。

蔣、宋結合以前，蔣是一位徹底的革命家。也就是說，他依靠直接或委婉的搶劫為

2 亨利·盧斯（1898-1967），美國傳媒巨頭，創辦了《時代週刊》（一九三三年）、《財富》（一九三零年）與《生活》（一九三六年）三大雜誌。他出生於中國山東省蓬萊市，父親為美國傳教士。他將蔣介石塑造為虔誠的基督徒、不屈的抗戰英雄、堅定的反匪鬥士。

3 以斯帖是《聖經·以斯帖記》中嫁給波斯國王的猶太女子，憑借自己的智慧挫敗了壞人的陰謀，拯救了本族人。

4 君士坦丁一世的母親海倫娜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對教會多有捐助。

生。在這方面，他很像拿破崙在義大利，將缺乏餉源的痛苦轉化為進攻富裕城市的動力，然後將這種動力解釋成旺盛的革命精神。蔣介石的不幸在於，他還有一個拿破崙沒有的敵手——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理人比他富裕得多，不僅在資金上擁有穩定的供應線，而且在恐怖主義和敲詐勒索方面也比他專業得多。汪壽華同志⁵沒有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狂熱性、軟弱性和表演性，像一九零五年的布爾什維克一樣冷靜而精確⁶，表現出稅收機構般的特有的自信心，只是他用炸彈代替傳票。而生活在敖德薩和上海的資本家早在沙皇和北洋軍閥倒臺以前，就已經產生了適應紅色政權的幻覺。省港大罷工的工人和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享受季諾維也夫同志⁷和史達林同志慈父般的關愛，開銷全世界無產者的共同財富。白崇禧和何應欽的軍隊連廣東賭場的收入都沒有保障，更多地指望下一個城市的房租比較貴，因為商會籌集犒軍的銀兩，一般要靠倒楣的房東預支幾個月租金。房東之所以特別適合充當剪羊毛的對象，是因為有產的牽掛使他們不方便逃之夭夭。至於北方的馮玉祥，領取盧布的資格僅次於蒙古的活佛，並不瞧得起廣州和武漢的晚輩，更不用說瞧得起蔣介石麾下饑餓的士兵了⁸。

在一九二七年詭異的春天，鮑羅廷很有把握地宣稱，就算用唐生智來取代蔣介石，後者也完全無可奈何。史達林則表示，橘子皮可以扔了。這些話如果出自克倫斯基或汪

兆銘之口，很可能只是小資產階級文人的表演欲望發作；但史達林同志涉及人事問題的時侯，一向是不會為虛榮心綁架的。問題在於：蔣介石正如他自己所說，習慣於不按牌理出牌。如果他是理性的人，大概就不會參加革命了。他理解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方式，跟他那些發動珍珠港事變的日本同好一模一樣。這種人遇見走投無路的情況，不會像理

5 汪壽華（1901-1927），一九二三年加入共產黨，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的主要負責人。他靠青幫勢力發動運動，最後被杜月笙殺掉。

6 一九零五年，俄國發生了一系列恐怖襲擊、罷工、騷亂、暴動，布爾什維克大展身手。列寧後來說：「沒有一九零五年的總演習，就不可能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勝利。」

7 季諾維也夫（1883-1936），蘇共早期領導人之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首任主席，最後被史達林殺掉。

8 依靠蘇聯提供的資金，向工人發放罷工費用，是發動工人運動的主要手段。一位參加過五卅罷工的老工人回憶說：「在四個月罷工中，我們得了不少罷工補貼。我們想：『不上班也能拿錢，真是大好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檔案》）省港大罷工期間，「一個工會一成立，立即派檢查小組或者宣傳小組進行爭取會員的工作。搞宣傳的人所帶的不是宣傳品，而是各拿一根又粗又長的木棍，如有工人不願意加入工會，他必將受到木棍的棒打，因為工人們加入工會之後，他們一方面可以獲得工人的進會費和每月的公費，另一方面又可得到工廠主所給的公共福利費。」（《廣州工會運動的報告》，見《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9 據北京警察廳公佈的從蘇聯使館搜獲的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蘇俄在華軍政費半年度之預算，計（甲）對於中國全國之普通經費共美金九萬三千八百五十三元，其中中國共產黨中央黨部軍事指導人員經費五萬元；（乙）馮玉祥軍隊經費共美金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元；（丙）國民二、三軍（即胡景翼、孫岳所部）經費共美金十四萬零二百四十元；（丁）廣東經費，因缺乏相當報告，未擬定預算。總計除廣東外，半年即需耗美金三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三元，約合中國大洋一百萬元。

性人一樣投降，卻會像賭徒一樣知行合一，也是一不做二不休，指望掀翻桌子以後突然出現轉機，如果運氣不好就不成功便成仁。北伐以後的幾年，他的運氣好到駭人聽聞的地步。根據他的籌款方式，他進駐上海以後，本來只能支持半年時間，然後只有共產國際才能養得起他。不過他首先掀翻共產國際的桌子，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一點。這時他並不知道宋子文能為他做什麼，因為宋子文自己都不知道。然而宋子文居然從海關總稅務司那裡弄到了真正的歲入，使他可以多支持幾個月。這筆錢還有另一項作用，促使武漢方面的東征變成北伐。

鮑羅廷剛剛從上海租界的總部得到全世界無產者的新款，就發現蔣介石已經不是橘子當中比較軟的那一個，更軟的橘子是吳佩孚。四一二以後，寧漢分道北伐，蘇聯援助的馮玉祥和武漢國民政府會師於吳佩孚的河南。而此時，張作霖派張學良南下，名義上是支持吳佩孚，實際上是對他趁火打劫。等到張發奎打進河南，無產者的金錢和漢陽兵工廠的軍火都用光了。共產國際主要出於陰差陽錯，在下一批資金到位以前洩漏了紅軍國際化的預案，嚇壞了汪兆銘和反覆無常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結果連武漢的革命政府都弄丟了¹⁰。宋子文的錢也花完了，但他緊接著就創造了更大的奇蹟，在相當於女人孩子的時間內，趕走了長期把持海關的洋人，讓蔣介石能夠組織南京政府，又在相當於

留日學生念預科的時間內，廢除了條約體系的財政約束，讓蔣介石富裕到足以收買馮玉祥 and 張學良的地步。他這兩年的工作，奠定了黃金十年神話的真正基礎，也用完了他和蔣介石一輩子的運氣。

蔣介石開始真正相信，革命精神和道德榜樣戰無不勝，就像拉封丹寓言的蒼蠅相信自己已在拖馬車，而變本加厲地玩弄孤注一擲，結果招致了抗戰和冷戰的大敗。我們用廉價的後見之明分析，原因其實只有兩項。大英帝國出於國內福利政治和歐洲條約體系的需要，決定從遠東撤退。國民黨迫不及待地搶占真空，收到了趙括搶占上黨¹¹的同樣效果，再次證明免費午餐和美麗陷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宋子文善於利用美國精神同

10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後，武漢政府的汪精衛仍然認為「反共就是反革命」。五月三十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向鮑羅廷、羅易等發出了「緊急指示」，要求實行土地革命，動員農民自動沒收土地，組建一支八個師或十個師的可靠軍隊，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等。羅易給汪精衛看了指示，要求他執行指令，否則共產國際將與國民黨一刀兩斷。汪精衛意識到事態嚴重，將電報副本傳示孫科、陳友仁、譚延闓等人，眾人大驚，開始部署分共。事後，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第一書記布哈林說：「羅易竟將共產國際的祕密指示真誠地送給汪精衛看，這完全是一種糊塗、愚蠢的做法。」

11 西元前二百六十年，秦軍猛攻上黨，廉頗率趙軍來救，趕到時，上黨已被攻陷，兩軍對峙。隨後，中了秦人離間計的趙王用趙括替換了廉頗。趙括輕敵冒進，全軍覆沒。

胞的情懷和弱點，把自己的行徑美化為扶助弱者的俠義舉動，暫時借用了美國的力量。這種模式經過宋美齡之手，在抗戰中挽救了蔣介石，也使美國人最終不可避免地幻滅以後，迫不及待地離開亞洲，讓蔣介石的最後一個泡沫迅速破裂。

宋子文的財政改革包括以下步驟：編列統一的全國預算，建立統一的中央鑄幣廠，最終以紙幣代替銀元，依託中央銀行發行內債，數額經常超過當年的歲入，強制四大銀行和私人銀行接受中央銀行的統一規劃。這些舉措徹底破壞了民初限制公共開支和維護貨幣穩定的基本條件，將預支未來的權力賦予南京國民政府，造就了黃金十年的建設成就和國家門面。事實證明，國民政府經受不起這樣的誘惑。一九三三年，財政部發行的正式內債已達十四億元。大部分負擔落在上海資本家頭上，後者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進步的觀察家（往往是善意的美國人）看到美麗堅固的公路網飛速延伸，南京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樣年年換衣，自以為摸到了一個偉大民族崛起前夜的躁動，感動得熱淚盈眶。蔣介石在宋美齡的影響下改信基督教，他們的信心就更加堅固了。亨利·盧斯用《舊約》先知的口吻叫道：東方的人民在黑暗和痛苦中掙扎了多少個世紀，期待他們的救星，現在救星終於出現了，他的名字就叫蔣介石。即使林肯·斯蒂芬斯¹²和艾德蒙·威爾遜¹³到蘇聯朝聖，都不可能比亨利·盧斯更加虔誠了。

國民黨在政治上是一種弱化版的列寧主義，在經濟上也是一種溫和版的計劃經濟。它的中央銀行和資源委員會發揮了中共的準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功能，開始將工部局（即租界的市政委員會）的遺產投入內亞的無底洞，最終投入建構「新中國」所必須的戰爭。沒有宋子文和他的改革，國民政府根本沒有產生這種期望的機會。孫文的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象，只能是日本和蘇聯的代理人。在袁大頭和鷹洋的時代，金圓券永遠不會出現。在沒有中央銀行的時代，上海的金融家為了維護自己的信用，在帝國主義的安全保護下，能夠斷然拒絕袁世凱、段祺瑞政府的類似企圖，保護市場和貨幣的穩定性。在沒有宋子文的世界里，國民政府不可能抵抗蘇聯超過幾個月。

然而在有宋子文的世界里，國民政府真的有必要抵抗蘇聯嗎？國民政府通過紙幣、債券、國有化和通貨膨脹，已經將蘇聯的歷史使命完成了四分之三，將大部分國民變成了無產者。國民政府在這時候突然優柔寡斷起來，結果在自己掀起的洪水中滅頂，難道

12 林肯·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1866-1936)，美國記者，早年投身「黑幕揭發運動」，一九一九年訪蘇期間採訪了列寧，回國後聲稱：「我看到了未來，它行得通。」

13 艾德蒙·威爾遜 (Edmund Wilson, 1895-1972)，美國文學批評家，一度對社會主義抱有極大好感，一九三五年訪蘇。

不是求仁得仁的應有歸宿嗎？從劉和珍（五四激進主義）到林昭（文革激進主義）的道路是非常短暫的，從宋子文（國民黨）到劉少奇（共產黨）同樣如此。蔣介石的「新中國」必然破壞條約體系的約束條件，內亞建設必然破壞上海資本主義經濟的約束條件。在這段歷史中，宋子文扮演的角色酷似托克維爾的寓言。東方專制帝王如果得到臣民不可能掌握的西方技術，就能夠將國家變成一個工廠，行使祖先從來想像不出的武斷權力。宋子文就是這樣一位優秀的西方工程師，在西方會成為公民社會的優秀僕人，在東方則會成為順民社會的危險管家。宋子文對南京國民政府的重要性，無疑不會遜於科爾柏（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為國王貫徹重商主義政策）對路易十四的重要性，從革命外交到抗戰和冷戰，從法幣改革到租借協定，幾乎沒有任何重要政策能夠在沒有他的支持和參與的情況下成功。

然而，他的同事對他的評價非常奇特。幾乎沒有人能正確地估計，哪怕是反對他的政治作用。所有的指責和辯護（前者占壓倒優勢）都指向他的個人作風，他傲慢、自大、專橫、不夠世故、不給人留面子，總之就是「帝國主義者」的標準漫畫。善良正直的第三世界人民奮起反抗帝國主義者的嗟來之食，主要就是為了彌補受到傷害的感情。朱自清、聞一多等人的回憶錄尤其生動地說明了知識分子的感情是萬萬傷害不得的，反帝愛

國意識形態直接源於他們永遠無法癒合的虛榮心。不過故事當然可以從相反角度說，變成天真正直的揚基佬在奸詐、怯懦、腐敗的東方社會中不斷碰壁的紀錄，很像《醜陋的美國人》當中的麥克懷特大使¹⁴。這兩種解讀都是完全正確的，全看讀者更樂於認同哪一方。如果你仔細查看攻擊者的翹楚傅斯年那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發表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南京《世紀評論》），就會發現：士大夫最受不了的地方，就是宋子文用人行事的作風既惡劣又傲慢，卻說不出他的政策到底錯在哪裡。辯護者以胡適最為忠厚，也認為宋子文實在太不會做人，雖然覺得他稱得上任勞任怨，卻說不清他的財政工作好在哪裡，或是認為這事根本不重要。為傅斯年喝采的知識分子只是根據宋明士大夫的傳統，覺得只要敢罵大人物就了了不起，罵的內容是什麼則無關緊要。同情胡適的知識分子多半認為反蘇反共就是政治正確，怎麼做都有理，即使所作所為都是在為蘇聯做準備。

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共產黨，都完全不懂得美國上層中產階級的人格結構和行為

14 原作為小說，後拍成電影，講述麥克懷特大使被派往中印交界的小國Santana，在這裡不受信任，遭到敵視，處處受挫。

模式，故頭腦簡單地想像財政家肯定有錢，有錢肯定貪汙腐化。但他們想像的腐化方式非常低級，比較適合衙門的胥吏，一點不像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同行會幹得出來的事情，這說明他們的智力水準和階級地位沒有達到能夠理解金融操縱的層次。宋子文主持了一九四五年的接收活動，這個名詞掩蓋了二十世紀遠東最重要的一次國有化，實際上是針對沿海和大城市資產階級的總清算。後者不僅出於可以想像的原因，大多數住在日本占領區，而且也因為王克敏¹⁵和汪兆銘的政權較多地保存了民國初年的法統和政策，給資本主義留下餘地，而大後方微不足道的工商業幾乎都在重慶政府的卵翼之下。如果有人以為沒收或搶劫僅僅針對日本人的財產，那就太天真了。畢竟從原則上講，不肯追隨國民黨一起逃到後方的人都可以算漢奸的。這次革命行動不僅產生了大量的貪汙，而且製造了此後貪汙的溫床，但迄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宋子文本人曾經撈過什麼油水。他當然有能力做到這一點，但這不像他的習慣。他和宋美齡一樣，終生沒有擺脫美國中產階級人士的生活水準，一點不像外逃貪官。他們兄妹都不肯跟蔣介石去臺灣，寧願回美國，本身就表明了某種文化的親和力。他死後只留下一百萬美元和一處房子，跟宋美齡差不多，跟美國中產階級差不多。這種現象不能解釋為他把大部分財產留在南京或上海，要知道，沒有人能比金融家更善於轉移資本，如果他有這種欲望的話。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內的親美派和自由派心慈手軟，對他的失敗負有重大的誤導責任。他對宋子文也是這種看法，在日記裡後悔地表示不該重用此人，甚至在一九六三年對宋子文說出這樣的話，「我這一輩子跟你做的生意，都是賠本生意！」¹⁶ 這話必須從兩方面理解。一方面，沒有比政治家的公正更靠不住的東西了。沒有宋子文，蔣介石不可能比李宗仁和張發奎強大多少，也肯定比不上馮玉祥和張學良。從另一方面講，這話又是非常正確。沒有宋子文，蔣介石肯定只是群雄之一¹⁷。在這種情況下，他也根本不

¹⁵ 王克敏（1879-1945），一九三七年日本扶植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京）的首腦之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京）與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併入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之後，王克敏改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名義上歸汪精衛管轄，事實上自成體系。

¹⁶ 蔣、宋二人矛盾不斷。如一九三三年，蔣介石在宋子文出國訪問期間挪用預算，花在最新一次剿匪軍事行動上。宋回國後，與蔣發生嚴重衝突，請辭財政部長及行政院副院長之職。蔣介石沒有挽留他。據胡漢民說，宋子文私下說：「當財政部長無異做蔣介石的走狗，從現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條狗！」而蔣也一連十幾天都在日記中大罵宋子文「禍國殃民」、「頑劣」、「作梗不化」。一九四三年，圍繞史迪威的去留問題，蔣、宋又發生了嚴重衝突，宋一度被軟禁，直到低頭認錯才得以回到公務活動中。

¹⁷ 沒有宋子文在財政上的支持，蔣介石無法在與桂系、馮玉祥等的競爭中獲勝。國民黨在廣州初期財政極為困難，直到宋子文任財政部長，局面才逐漸打開。宋子文整頓財政機構，提高效率、調整稅率、開闢新稅源，財政收入立刻顯著增加，一九二五年政府收入是二千五百一十八萬元，一年後就上升到一點零零一三億元。宋擔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七年，在江蘇、浙江、安徽等地整理財源，獲得稅收；又直接向上海一帶的金融界借款，成功取得借貸，並發行了一點五億元的內債；他還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簽訂關稅協議，提高進口稅；他推行鹽務改革，同時在上海設立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家銀行——中央銀行。蔣介石的競爭對手都沒有得到這種程度的財政支持。

可能發動抗戰。蘇聯和日本肯定會在滿洲、內蒙龍爭虎鬥，用沙皇和日本對待大清的方
式對待十八省的任何政府。蔣介石雖然永遠不會跟羅斯福平起平坐，但也永遠不會喪失
自己的小小勢力範圍。歷史將會把他跟龍雲、陳炯明放在一起，這本來是他最適合的位
置。

一三、技術官僚

——傅作義



傅作義（1895-1974，山西省榮河縣人）是閻錫山和陳炯明的同儕和晚輩。辛亥軍興時，他在太原陸軍小學讀書。學生軍集體參加革命，然後又回去讀書。當時學生軍參加革命乃司空見慣，但再回去讀書就比較少見，這說明山西的社會秩序沒有遭到多大的擾亂。一九一二年，傅作義升入清河第一陸軍中學。一九一五年入保定軍校。畢業後返回山西，此後在山西軍界服務，由旅長升為師長。這樣的生平酷似正常國家的職業軍人，不像業餘愛好者當家的民國軍界。閻錫山參加北伐，給他帶來了獨當一面的機會。他在著名的涿州戰役（一九二七年九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抵抗張學良的優勢兵力，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蹟。三個月的圍城戰役是民國史上少見的歐洲式戰爭，充分發揮了晉軍的科班水準。在此前和此後的大多數戰役中，政治都比軍事重要得多。也就是說，統帥的外交和策動能力決定戰爭勝負。前線部隊很少需要將作戰能力發揮到極致，北伐的大

多數戰役都是這樣。傅作義證明他是少數真能作戰的將領之一，地位急遽上升。

北伐軍出於外交的考慮，選擇閻錫山的部隊入駐平津¹。在各國公使的眼中，黨軍和馮玉祥部隊的蘇聯氣味都太濃厚了。閻錫山是辛亥舊人，也就是革命陣營中合法性最強的一方。閻錫山主持北平政治分會，傅作義鎮守天津。中原大戰時期，閻錫山、馮玉祥支持汪兆銘在北平開府。張學良入關支持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兵敗下野，但他們的實力仍然存在，只能交給緩衝人物代理。於是傅作義出鎮綏遠，宋哲元出鎮華北。他們分別代表閻錫山和馮玉祥的舊勢力，同時又是蔣介石和張學良能夠接受的溫和派人物。傅作義從此變成了相對獨立的勢力，不因閻錫山的再起而改變。

綏遠是山西移民的北美洲和南非洲，自然會引起移民和蒙古原住民的衝突。傅作義在河套地區的建設頗有成績，也就意味著蒙古人的空間岌岌可危。危機緊迫，蒙古上層人物開始分化。親華、親蘇、親日三派漸漸形同水火。德王²代表親日的少壯派，一度希望蔣介石抑制傅作義和山西移民的擴張，就像印第安人和黑人指望英國抑制北美和非移民社會的墾殖活動，失望後投向關東軍一方。一九三五年以後，晉綏軍和蒙古人不斷發生衝突。傅作義打贏了大多數戰役，包括著名的百靈廟戰役³，給蔣介石和大後方

的輿論留下了錯誤的印象，覺得日本人資助的蒙古人不過耳耳，日本人自己的戰鬥力也不會太強。

蔣介石覺得應該在內蒙這樣有利的戰場乘勝追擊，也可能懷有將戰爭引向蘇聯和外國的隱秘動機，他在一九三六年將全國各軍將領召集到西安，準備發動全面抗戰。他派傅作義打前鋒，讓張學良當預備隊，嚴重地傷害了張學良的感情。在張學良看來，傅作義只是晉軍的偏裨小將，他自己跟閻錫山是平起平坐的人物，沒想到蔣介石覺得他連傅作義都不如。這次部署對他發動西安事變起到了極大的刺激作用，但時機對張學良非常糟糕，因為全國都知道抗戰迫在眉睫，很難相信扣押總司令的將領不是為日本人出力。

1 一九二七年六月，閻錫山通電擁護三民主義，除五色旗，改懸青天白日紅旗，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司令，一九二八年六月，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兼任北平臨時政治分會（轄京兆、直隸、熱河）委員和代理主席。

2 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人，主張內蒙古獨立，並與日本在察哈爾、綏遠聯合建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任副主席、蒙古軍政府總司令等職。

3 百靈廟位於綏遠北部，是烏蘭察布盟草原上著名的召廟，為喇嘛、蒙民聚集中心，也是漢蒙交易最繁盛的地區。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百靈廟戰鬥發生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至二十四日，交戰雙方分別為傅作義領導的綏遠軍及德王領導的蒙古軍。最後綏遠軍獲勝。

西安事變解除，蔣介石一回南京，原有的戰略部署就恢復了。傅作義仍然是前鋒，抗戰僅僅推遲了幾個月。山西高地原本是國軍計劃堅守的重點，結果太原沒有守住，日軍和蒙軍直取黃河。傅作義從日本側背發動進攻，挽救了敗局，保全了晉西北高地和陝北，使國軍的計劃沒有完全落空。在隨後的包頭和綏西戰役中，他的戰績優於全國大多數部隊。儘管如此，或者正因為如此，他的部隊和蒙古王公、八路軍都不和。八路軍在戰爭期間不斷兼併華北國軍和地方團隊，卻很難滲透傅作義的防區，因為他的軍隊和河套移民社會基本同構，軍不離民、民不離軍，團結能力很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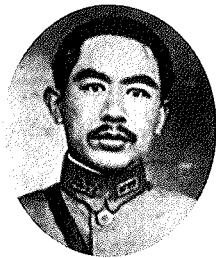
抗戰結束時，他的部隊正好卡住了八路軍進軍滿洲的要道，首先爆發衝突。傅作義連戰皆捷，解除了晉北、綏東的危局，證明沒有滿洲工業區支持的八路軍根本不足為懼，但他無法阻止八路軍通過山東海路、蘇聯和察哈爾進入滿洲，他只能不斷打擊缺乏重武器的華北解放軍，成功地控制了華北大多數要地。只要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滿洲的戰爭仍然懸而未決，他在華北就能穩操勝券。然而一旦滿洲塵埃落定，林彪部隊就在重武器、運輸和人數方面優於關內的一切部隊，這反映了日本的滿洲占領區對國統區的巨大工業優勢，中原大戰時張學良入關的一幕勢必重演。這時，傅作義必須選擇南下或是易幟。他太信任河套的農業——軍事基地了，覺得歷次易幟都沒有妨礙他東山再起，於是向毛澤

東提出回綏遠搞水利，實際上等於割據一方。毛澤東卻順水推舟，說綏遠地方太小，把全國水利都交給他。於是他當上了水利部長，名義上地位更高，實際上卻被架空了。舊部拆散以後，他在政治上已經死亡。

傅作義的性格屬於技術人員一類，能力很強，循規蹈矩，沒有遠見，不敢冒險。在正常國家，他多半會憑藉傑出的能力升到高位，享受平靜和榮耀的生活，但永遠不會捲入政治。他生逢亂世，不得不客串政治家，但性格改不了，非但不肯在沒有機會的地方創造機會，連已經存在的機會都不想充分利用。他像優秀工程師一樣，總是服從最近或最強的主人，為主人做好分內的工作，如果不滿也只是消極抵抗。蔣介石認為他是叛徒，拒絕接受他暗中輸誠的表示，這並不公正。只要蔣介石有能力統治中國，傅作義是不會拋棄他的。技術官僚都不會喜歡搞運動的手段，但都沒有辦法公開反對，所以傅作義企圖向臺灣的舊主表態，並不是虛偽或反覆。毛澤東肯定從來沒有信任他，但也非常清楚他這種人不是搞顛覆的材料，因此沒有直接打擊他。傅作義居然得以善終，似乎是技術官員的德性所應得的結局。

一四、無原則的「新疆王」

——盛世才



盛世才（1895-1970，遼寧開原人，漢軍旗人）是辛亥後培養的第一代軍官，也是精明的投機者。他在雲南講武堂接受了一戰前日本的軍事教育，結識了郭松齡¹。他們都是野心勃勃的南滿青年，鄙視老一輩的粗鄙無文和忠義觀念，把無原則的功利主義當成了科學和進步本身。他們圍繞在少帥身邊，漸次擠壓吳俊升、張作相一輩老將，本身就預示關東社會的黃金時代行將結束，洪水即將淹沒「人生感意氣」的江湖道義。只有在舊社會結束以後，東北父老才開始懷念老師弟兄袍澤的審慎和明智。雖甘棠遺愛，無以過之。

盛世才像郭松齡一樣缺乏社會性感情，卻比郭松齡精明得多。郭松齡倚仗自己的才幹和張學良的友誼，輕侮老將，沒有德川家康賴以成事的耐性。盛世才的自知之明比

他強得多，知道自己在將星雲集的東北沒有競爭優勢，因此主動報名前往孤懸塞外的新疆²。他正確地預計到，他的才幹、殘酷和敏銳在那裡沒有人可以匹敵，正如歐洲的野狗在澳大利亞沒有天敵。他的行動非常及時，九一八事變在他身後爆發。大批東北軍假道蘇聯，逃往新疆³。這些人的能力不比他差，只是晚了一步。

1 一九一七年，盛世才進入東京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一九一九年，他投筆從戎，進入雲南講武堂韶關分校受訓，並得到擔任戰術教官的郭松齡賞識。一九二二年春，從講武堂畢業後，他追隨郭回到東北，成為奉軍的一名排長。由於郭松齡與張學良的親密關係，盛世才也受到重用，曾擔任奉軍代表與孫傳芳、劉湘等周旋。在此期間，盛世才停妻再娶，與時任張作霖衛隊團團長邱宗浚的次女、被郭松齡認作義女的邱毓芳結婚。一九二三年，經郭推薦，盛世才到日本陸軍大學深造。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郭松齡起兵反奉，盛世才回國參加。郭松齡兵敗被殺，盛世才逃回日本。畢業後，盛世才到南京的總參謀部充當上校參謀。

2 一九三零年，雲南省主席龍雲正在物色講武堂教育長人選。國民政府秘書彭昭賢向龍雲舉薦了盛世才，得到雙方認可，入滇成行在即。恰在此時，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派秘書長魯效祖到滬，寧延攬軍事人才，同樣經彭昭賢介紹，魯效祖與盛世才搭上線，雙方一拍即合。在前往新疆之前，盛世才對他的朋友趙鐵鳴說：「此行乃破釜沉舟之舉，有進無退，吾必遠到邊區另創造一局面，將來或作一總司令亦未可知。不然，我就找一老朽長官，假意殷勤，待其死後繼承其權位，代統其眾，天下事大有可為。」

3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東北民眾救國軍總司令蘇炳文率部退出蘇聯。據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統計，共有二千八百九十名軍人和一千二百名非軍人（包括婦女兒童）進入蘇聯境內。蘇方原計劃將他們送回東北，但鑑於此時新疆發生大規模叛亂，金樹仁政權搖搖欲墜，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改變原來通過的決議……准許將被拘留者疏散到新疆。」

新疆當時能否算作中華民國的領土，非常值得懷疑。全世界除了外交官團體和地圖繪製員以外，都覺得這塊土地更像俄羅斯的編外殖民地。陝甘古道已經淪為不亞於印度西北邊界的危險蠻荒之地，迪化大員返回北京必須取道西伯利亞大鐵路和海參崴。老將楊增新⁴葬身西域以後，屍體都需要得到蘇聯的善意才得以還鄉，正如他在世之日，必須依靠俄文法政學校培養幹部。他能夠勉強維持統治，全靠當地穆斯林「順服當權者」的保守主義和刻意降低軍隊戰鬥力的狡猾措施。老將軍根本不相信他的部隊有能力抵抗俄國人或鎮壓本地叛亂，這兩件事一旦發生，他無論如何都會完蛋的，因此只能依靠外交手腕防範。降低戰鬥力，至少可以減少軍事政變的風險。他清除了同盟會和哥老會的潛伏勢力後⁵，就把軍隊改造成福利院，允許失業者吃糧，有工作就自行離去。盛世才面對的，就是這樣一支軍隊。

楊增新如果活得更久，肯定會變成盛世才的敵人。他號稱包容一切，奉行閉關自守、減稅裁軍的「無為而治」，但其實除了那些喜歡混日子的人，他並不願意包容任何人，即使自己的老朋友和把兄弟馬福興⁶也沒有放過。盛世才不是甘於就範的角色。然而，楊增新及時地遇刺。盛世才的交涉對象變成了金樹仁⁷。金樹仁對陝、甘的長期衝突印象深刻，對楊增新的保守政策非常不滿，準備大規模擴充和強化軍隊，進一步推動停滯

多年的改土歸流政策，盛世才正是他需要的人才。哈密削藩，迅速引起了席捲數千里的大亂。馬仲英在固原甘軍系統內部不能得志，乘機西進。新疆軍隊不堪一擊，毫不令人意外。迪化主要依靠白俄老兵和東北流亡者的軍事素質，才沒有陷落。在此期間，盛世才的地位迅速上升；而金樹仁沒有很好地利用客軍的勝利，因為他自己的地位並不穩

4 楊增新（1864-1928），雲南蒙自人。一八八九年中進士，歷任甘肅河州知州及新疆阿克蘇、迪化、巴里坤道臺等職。辛亥革命後任新疆都督。一九二八年通電擁護南京國民政府，宣佈易幟歸附，七月一日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七月七日，楊增新在俄文法政學校第一期學生畢業慶典宴席上，被軍務廳長兼外交署長樊耀南等人刺殺。樊耀南宣佈接管政權，但隨即被政務廳長金樹仁調兵捕殺。楊增新靈柩於次年假道西伯利亞運送回國，蘇聯政府為楊開祭致哀，並派專車和軍警武裝護送。

5 據楊增新《補過齋文牘》統計，民國初年，新疆哥老會成員在伊犁起義前後刺殺地方官吏共十五人之多，地方官談「哥」色變。楊增新對哥老會大打出手，利用「回隊」捕殺哥老會成員達一百七十多人，到一九一八年左右，新疆哥老會基本銷聲匿跡。

6 馬福興（1864-1924），經名穆罕默德·尤努斯，雲南省建水縣人。曾統領「回隊」，後為喀什提臺，作威作福且野心膨脹。楊增新利用教派矛盾，授意與馬福興有宿怨的烏什縣長馬紹武發起突襲，殺死馬福興。

7 金樹仁（1879-1941），甘肅河州人，一九一四年起歷任新疆阿克蘇縣長等職，一九二六年任新疆省政務廳廳長，一九二八年楊增新遇害後任新疆省主席。一九三一年四月，哈密發生暴動，甘肅的馬仲英部亦進軍新疆，金樹仁越來越無力控制局勢。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新疆省參謀處長陳中（黃埔三期，中共黨員）、迪化城防指揮官白受之、航空學校校長李笑天、迪化縣長陶明樾等人發動政變，歸化軍（入疆的俄國白衛軍，後加入中國國籍）、迪化駐軍、來新的東北救國軍都參與了兵變。金樹仁逃出迪化，圖謀反攻未成，經塔城取道西伯利亞返回內地。

固。在蘇聯領事館的策劃下，他的政府迅速垮臺。盛世才肯定早就跟蘇聯有約⁸，因為他一進省城，就得到了蘇聯紅軍的直接援助。顯然，在分崩離析的新疆，客軍的團結能力和戰鬥力遠遠超過本地社會，足以構成新政府真正的競爭者。在接下來的戰爭中，紅軍和白俄結成了荒謬的聯盟，保衛脆弱的迪化傀儡政府，打敗了馬仲英和伊犁鎮守使張培元的聯軍。相應地，新疆的軍政機構膨脹了數十倍。蘇聯不得不提供數百萬盧布的援助，支付盛世才政權的大部分開支，同時駐軍哈密，保護迪化的安全。盛世才為了回報史達林，把新疆變成了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交通樞紐⁹。

楊增新繼承了大清的新疆，也就是滿蒙的新疆。他接管了蒙古貴族統治的阿山道（承化寺），時刻恐懼外蒙的「狼貪」，也就是收回漠西蒙古故地的企圖。他承襲了清吏輕視「纏回」（六城穆斯林¹⁰）的成見，認為後者是缺乏戰鬥力的順民，可以安插在蒙古王公的封地之間，牽制蒙古統一運動。他竭力封閉新疆，壓制任何難以控制的新因素。然而就在他的治下，新疆社會發生了最深刻和不可逆的變化。蒙古部落人口衰竭，逐漸喪失了漠西主宰者的資格。六城穆斯林效法土耳其人和俄羅斯韃靼人，完成了創造民族共同體的工作。盛世才面臨一個迥然不同於前清，卻非常接近於現在的新疆。除了阿爾泰（承化寺）的領土糾紛以外，蒙古問題幾乎銷聲匿跡。楊增新視為馴服工具的新民族，

給迪化政權及其客軍製造了越來越多的麻煩。

抗戰時期的新疆構成了蘇聯通向重慶的重要補給線，將重慶國民政府變成了蘇聯的國防外線和第二個廣州國民政府。然而好景不長，蘇、德戰爭結束了遠東的蜜月。蔣介石和盛世才得不到蘇聯的軍械（因為蘇聯自己還需要英美的軍事物資援助），相繼另起

8 盛世才上臺後，給史達林寫了一封親筆信，表示自己將共產主義作為終身信仰，願意接受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領導。根據雙方簽訂的祕密協定，蘇方出動紅軍，化裝成中國軍隊，幫助盛世才消滅了他在新疆的死對頭張培元的部隊，打敗了馬仲英部，並且出動飛機、坦克，幫助盛世才平定了南疆維吾爾族的叛亂。盛世才亦投桃報李，於一九三四年公開宣佈在新疆實行以「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建設」為內容的「六大政策」，蘇聯不僅長期駐軍新疆，而且在新疆各地派有專家、顧問、教官、醫生等，提供貸款，幫助新疆制定「三年計劃」，同時獲取了探礦、採油、修路、經商、辦廠等種種獨占的特殊權益。一九三八年八月，盛世才以就醫為名，祕密前往莫斯科，三次見到史達林。盛世才向史達林表示，希望自己能加入蘇聯共產黨。史達林當時沒有答應，但當盛世才啟程回國時，史達林卻派人遞給他一張黨員證，並讓他宣誓效忠。盛世才一一照辦。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盛世才與蘇聯祕密簽訂了為期五十年的《新蘇租借條約》。一九四一年一月盛世才向蘇聯提議：新疆脫離中國，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並加入蘇聯。蘇聯鑑於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需維持蘇、中同盟關係，未接受盛世才的提議。9 在中共受到封鎖最嚴重時，新疆是唯一一條可以接受外援的通道。盛世才同意中共在「迪化」設立「八路軍辦事處」，鄧發、周小舟、騰代遠、陳潭秋曾分別擔任過辦事處主任，「八辦」是當時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幹部交流往來的交通「中樞」。

10 乾隆時期的《西域圖見錄》中紀錄的「六大回城」是：莎車、喀什、阿克蘇、庫車、英吉沙、和闐。後世對「六大回城」的記載又有差異，如有烏什而無英吉沙等，但指塔里木盆地周圍則是一致的。

爐灶。盛世才倒向國民政府¹¹，造成的後果非常類似張學良的易幟。三區革命¹²和九一八事件處在相同的政治生態位，只是蘇聯取代了日本。不過，盛世才的冷酷和精明絕不是張學良所能比擬的。他掌握了導師史達林慣用的手段，改變政策就要殺掉原先政策的執行者，以便斷絕後患。他清洗完畢，帶著積蓄到重慶做農林部長。控告他恣睢橫暴的狀況紙先於他抵達重慶¹³，一直追隨他到臺灣，當然沒有產生效果。蔣介石自負聖賢，不會撕毀保全降王的承諾，甚至專門給盛世才派了一隊警衛，防範為數甚多的仇家找他麻煩。他在臺灣撰寫了一批回憶錄，試圖把自己描繪成維護國族主義的英雄。其實，他的一生如果能夠證明什麼，就是證明了他根本沒有固定的原則，但非常善於選擇投機對象和倒戈時機。

11 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自身難保，盛世才親蘇態度發生轉變。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他上書蔣介石：「現已徹底覺悟，蘇聯國家確實離開馬克思主義，走上帝國主義侵略道路，尤有甚者，即掛著馬克思主義假招牌，以援助落後國家與民族為名，暗中進行其侵略伎倆，其用心較之其他帝國主義者尤為毒辣！……是以戰今後絕對不能再與此類假的馬克斯主義者相合作，誓以致誠，擁護鈞座與國民黨之領導，效忠黨國。」八月，宋美齡代表蔣介石赴新疆安撫盛世才。隨後，盛世才要求駐新蘇軍及專家、顧問在三個月內撤回蘇聯，並製造了「陰謀暴動案」，將中共在新人員一百二十八人軟禁，後將陳潭秋、毛澤民等殺掉。一九四三年，國民黨在新疆設立黨部，迪化亦設立美英領事館，中央軍也進入新疆。盛世才見狀不好，於一九四四年再度製造「陰謀暴動案」，把重慶派來的大批幹部投入監獄，試圖重新向蘇聯示好，但蘇聯已徹底拋棄他。一九四四年九月，盛世才被免去省主席和警備司令等職務，調離新疆。

12 一九四三年五月四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採取措施推翻盛世才的辦法，決定以「民族復興小組」的名義，在新疆各少數民族中培養革命力量。為此，蘇聯成立了一個以內務人民委員部伊格納托夫將軍為首的特別行動小組，訓練反叛武裝，輸送武器入新。一九四四年十月，蘇聯正式吞併唐努烏梁海地區，使其成為「圖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十月七日，蘇聯僑民於阿山組織了一羣哈暴動。十一月七日，蘇聯駐伊寧領事指揮伊寧當地的維吾爾族「解放組織」與蘇軍小股武裝配合發動更大規模的暴動。隨後派出內務部顧問團和多支部隊進入新疆參戰。十一月十二日，「伊寧解放組織」正式宣告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臨時政府宣佈「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脫離中國獨立。到一九四五年七月，伊犁、塔城、阿爾泰三區全部被占領。

13 盛世才離疆後，各界對他的控訴「罄竹難書」。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麥斯武德為代表的新疆代表專門提出議案要求政府懲辦盛世才，蔣介石表態說：「某同志昨天在會上提及盛晉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時慘殺民眾一事。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國西北邊陲，其面積十五倍於浙省，自民國成立以來，中央與該省之聯繫似斷似續，無權過問，盛同志卒能運用其力，將新省奉獻於中央，功在黨國。諸位同志，要明瞭此旨，顧念大體，勿再責難往事……」

一五、左派知識分子

——張國燾



張國燾（1897-1979）出身於江西萍鄉的新派士紳家庭，父親張嘉銘是清末第一批政法學校培養的法官。張國燾十二歲就轉入新式學堂讀書，在當時仍然是不尋常的。一九一二年，他的中學邀請黃興來演講。雖然湘語和贛語的接近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語種，張國燾還是一句都沒有聽懂黃興的湖南腔。他從小就擅長運用階級地位，索取特殊地位。他因為賭博的緣故，被中學開除。熟人都勸他以認錯換取留校，但他斷然拒絕。革命家性格所必需的各種元素當中，驕傲名列前茅。他知道家庭和學校的相對地位，更清楚自己在家庭當中的地位。縣學校對他只是平流進取，不值得為此遷就。他離開萍鄉中學，就進了首府的心遠中學。這實際上等於獎勵，讓他明白沒有鬥爭就沒有收穫。

心遠中學在當時江右的地位，大體相當於伯明罕大學在今天的英國。校長熊育錫醉心於歐式教育，畢業生以擅長理工路線著稱。一九一六年，張國燾果然考入北京大學理工預科。他在北京期間結識了李大釗，一生的命運由此改變。李大釗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北京建立第一個黨支部，以張國燾為助手，負責組織工作。維經斯基和馬林在東方工作時，他是李大釗以外唯一參與機密的亞洲人。李大釗和陳獨秀的聯絡工作，主要由他負責。李大釗主持社會主義青年團，將招募的聖戰者送往莫斯科訓練。圖書管理員毛澤東在此期間求見李大釗，見張國燾只顧侍候李大釗，對自己連話都懶得多說，斷定他瞧不起自己這個「鄉下土包子」。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共產國際公開的代表馬林和祕密間諜負責人尼克爾斯基潛入上海。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和北京代表張國燾負責接待，馬林不久就公開表示更欣賞後者的才能。於是，《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起草任務就此交到張國燾手中。尼克爾斯基派李達和李漢俊處理庶務，用共產國際的錢給各地代表發路費。資產階級政黨照例是由黨員捐款維持，因此充滿了嫉妒之情，稱無產階級政黨為「盧布黨」。

張國燾起草的文件又經過張太雷翻譯成英語，經馬林審批後通過。此後，「一大」

就由張國燾主持。俄文紀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稱：「主席張同志（係指張國燾）在第一次會議上說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意義，大會必須制定綱領和實際工作計畫。」《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稱：「我們開會推了張國燾為會議主席，這也是事前得到馬林同意的。」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則說：「大會組織非常簡單，只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紀錄。」

這一次，毛澤東給張國燾留下了「土鼈式狡猾」的印象：「（毛澤東）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閒談的時候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毛澤東顯然還沒有資格跟國際代表直接聯繫，因此只能做張國燾的下屬。張國燾根據共產國際提供的經驗，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便「中國工人們和外國工人們的密切關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分置各地支部：北方分部（濟南分部併入）由羅章龍、王盡美負責，武漢分部由包惠僧、林育南負責，湖南分部由毛澤東負責，廣東分部由譚平山負責。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張國燾率領中國支部代表團參加，向大會匯報了輸出革命的階段性成就。列寧雖然病入膏肓，還是同時接見了張國燾和國民黨代表張秋白，親自監督國民革命的進程。張國燾摸清了偉大導師的期望，順著他的心思表示：「國共兩黨應當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兩黨合作的進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困難，不過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列寧對張國燾的回答「似乎很滿意」，命他回國擴大組織。

張國燾從莫斯科回國後，就在廣州成立了全國工運總通訊機關。鐵路總工會成立後，張國燾出任總幹事。一九二四年五月，漢口祕密機關敗露，供出了全國鐵路總工會的祕密機關和張國燾等人的住址。京師警察廳逮捕了張國燾和他的妻子楊子烈。張國燾夫婦不到一個星期，就決定犧牲自己的同黨。張國燾交出了北京的潛伏者名單，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是國民黨中的共產派，但因為沒有擔任官職，純屬掛名，希望政府網開一面。楊子烈的親筆供詞說：「張國燾是研究共產主義學說的……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這種邪學說，而得像現在這種結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脫不了干係的，我也不願意脫離干係。政府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錯事，是應該求老大人的寬恕，使其有改過自新之餘地……至於我的丈夫張國燾，此次做錯了事是應該受懲罰的。但是青年閱歷尚淺，諸

大人素來德量寬宏，許人改過遷善，故敢請諸大人念張國燾初犯，特別加於寬恕。那不但張國燾和我銘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覺的人，也當感德無涯矣。」衛戍司令王懷慶建議槍斃張國燾，經濟變元勸說才保住了性命。

馮玉祥發動政變以後，釋放了張國燾和他的同黨。共產國際為了緩解張作霖和吳佩孚的南北夾擊，命令張國燾、羅章龍、項英發動京漢鐵路大罷工，給吳佩孚的「討賊聯軍」以沉重打擊。吳佩孚自以為思想開明，允許工會活動，現在覺得上當受騙，憤怒地報復。張國燾、羅章龍和項英及時逃走了，犧牲了人肉盾牌林祥謙。半個月後，張國燾回莫斯科述職。馬林為他辯護，希望將他調到上海的遠東局。張國燾在上海繼續做工人運動，配合五卅事件以後的鬥爭，直到蔣介石的北伐軍入城。蔣介石清黨以後，張國燾參加了組織南昌兵變的工作。他後來在回憶錄當中寫道，賀龍的搶劫經驗比其他軍官豐富得多，所以大家想打牙祭，都去找賀龍。軍潰粵東，張國燾經香港逃回上海。莫斯科再次將他召回培訓，然後（一九三零年）派他主持鄂豫皖蘇區的工作。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寫道，由於自己待在密封的轎子裡，身邊的紅軍還以為他是剛剛捉來的「白肥豬」（勒索贖金的肉票）。

張國燾聲稱蘇區軍政官員極其腐化，不能不整肅。軍官習慣於廣置外室，把解放婦女的人群大會變成了掠奪美女的機會。安徽省委書記方英的報告證明他的說法有部分的真實成分¹，但各地蘇區競爭性整肅的主要動力無疑仍在蘇聯。張國燾的清洗比毛澤東殘酷得多²，主要是因為他和莫斯科的資訊距離更近。蘇聯的清洗波及共產國際的海外系統，遠東局沒有幾個人倖免。知識分子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能力，通常在梁山好漢之上。江湖梟雄和流寇渠魁在儒家社會當中代表殘暴的極端，在列寧主義體系當中卻淪為軟弱的典範。毛澤東因「富農（也就是小資產階級）路線」而垮臺。顯然，同儕嫌棄他不夠心狠手辣。蘇區如果多維持幾年，毛澤東的下場就會非常可悲。不過，贛南和鄂豫皖蘇區的橘子很快就擠乾了。博古和張聞天決定前往蘇聯邊境吸乳，張國燾決定入川尋找下一批「白肥豬」。《中共川陝省委宣傳部對新發展赤區的宣傳大綱》不僅提出了「赤

1 「紅軍與蘇維埃尚未有建立親密的聯繫，以為蘇維埃是紅軍招待所，尤其對於婦女的關係惡化非常……紅軍南下時，到各處都有強姦事發生，還有少數女子認為擁護紅軍是解決性的問題，是唯一要務。自動把慰勞紅軍的婦女分配給團長、參謀長睡覺。如以上事件是非常普遍現象，我認為非常嚴重的。」（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解放軍出版社）

2 鄂豫皖蘇區範圍很大，肅反先後幾次，延續時間很長，完全搞清被殺人數相當困難。比較清楚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至十一月紅四軍白雀園肅反被殺人數，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說：「白雀園大肅反，是鄂豫皖根據地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頁。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

化全川」的響亮口號，而且還將這四個血紅的大字刻在通江縣的石頭上。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商務日報》題為「破壞屠殺遠勝闖獻，慘傷心目罄竹難書」的報導說，「三縣（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經濟器用，均已破碎靡遺，人民生機，喪失盡淨，此其現象，近與東省之倭寇，遠比明季之獻賊，無或殊異。」「查通江縣城……約計城鄉內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於不滿歲之孩子，其被慘殺者，二千餘人，加入各鄉間及由鄉拉入城內慘殺者，綜在一萬六千以上，城內諾江公園，屍堆櫛比，行政機關及富紳住宅，均窖有屍，東南西北各城門外橫屍遍野，壘壘然河山變色……尤慘者是每女屍下體皆被刀傷。」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川月報》報導，全川在這次兵災中共死亡人口為一百一十一萬之巨。半個世紀以後，四川大學歷史系的師生們到川北革命根據地搜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記得一些血腥的事件，與當時的報導大致相符。「紅色恐怖」是人們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們至今記得，這個逃亡叫做「跑紅」。張國燾自己在回憶錄中提及，「川北是擠掉了汁的檸檬」，已不宜長期駐守。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後來承認：紅軍撤出川北，除了面對敵人的優勢兵力，根據地「民窮財盡」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紅四方面軍撤出這個地區時，還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糧食，在樊功會師時，兵強馬壯，糧食充足，與紅一方面軍形成鮮明對比。（見趙曉鈴《一九三三年四川

兵災》)

張國燾以此為資本，覺得自己應該享有更大的發言權，甚至在聯席會議上嘲笑博古領導無方，損失了大部分紅軍。這話雖然是事實，在政治上卻並不明智。張國燾本來可以利用蘇聯系幹部和梁山系幹部天然的相互猜忌，分化和拉攏其中一方。結果卻是毛澤東分化拉攏了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使張國燾限於被動。張毛鬥爭的背景是共產國際的暫時缺席，否則他們兩人都不敢起覬覦之心。共產國際的缺席，從根本上講是第二次史達林—蔣介石反帝聯盟的需要。張國燾提出西北聯邦³，實際上是認為蘇聯不能再指望了，所以他本來比毛澤東左得多，這時卻急於退回遠東共和國的模式。毛澤東決定支援垂頭喪氣的蘇聯系，根據原計劃去蘇聯邊界要資助。兩者孰勝孰敗，都不取決於策劃者

3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張國燾成立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該聯邦包括格勒得沙共和國與博巴人民共和國兩個少數民族政權。史稱「第二中央」。一九三五年六月，由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等領導的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當時紅四軍有近八萬人的強大實力，而紅一軍只剩近一萬人。故會師後，張國燾取代周恩來出任紅軍總政委。張國燾堅決南下，而紅一軍堅持「北上路線」，二者分裂。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張國燾在卓木桐的喇嘛廟召開會議，決定另立中共中央，張國燾任中央主席，並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的黨籍。一九三六年，紅一軍在延安鞏固了根據地之後，而執行南下政策的張國燾則損兵折將。在共產國際命令下，張國燾取消了「第二中央」。

的英明與否。如果史達林決心犧牲遠東支部，或是蔣介石堅持以此為條件，毛澤東無論在黨內怎樣勝利，到了蘇聯邊境都是死路一條。史達林和希特勒妥協以後，逃到蘇聯的歐洲共產黨人普遍不得好死。如果史達林不放棄遠東支部，或是蔣介石高抬貴手，割據川邊的前途，就明顯不如北上吸乳。

蔣介石的大戰略保護了毛澤東，斷送了張國燾。委員長不想將紅軍斬盡殺絕，而是想利用紅軍打入川滇，壓制地方勢力，準備抗戰大後方。張國燾想留在川邊，因此非打不可。毛澤東想去蘇聯邊境，正好符合蔣介石拉蘇聯下水抗日的希望。張聞天看出了委員長的用心，為自己真正的祖國著想，反對紅軍靠近蒙古邊境，以免引起胡適樂見的蘇聯—日本衝突。然而，走投無路的紅軍已經顧不上那麼多了。最後，穆斯林軍隊替紅軍做出了決定。無論他們不想打通國際交通線，穆斯林都不准他們打通。張國燾的部隊為了留在川邊，損失慘重；為了打通國際路線，損失更加慘重。從此之後，他就淪為政治殭屍了。毛澤東和王明的鬥爭尚未塵埃落定時，他還有幾天喘息時間，但他作為黨內鬥爭的老手，心裡不可能不明白，無論誰獲得勝利，下一步都會拿他開刀。這時，統一戰線已經再次啟動。蔣介石以寬大和虛榮著稱，現在變成了他唯一的救星。

張國燾的出逃投奔蔣介石⁴，實際上非常符合毛澤東的心意。毛澤東知道自己不是蘇聯的親生兒子，深恐史達林對他下手。他向蘇聯控訴王明諸多不是，遭到季米特洛夫的拒絕。他從慘痛的經驗當中學到了政治精算的藝術，知道怎樣評估這次火力試探的結果。他在此期間的基本策略是爭取史達林和蔣介石這兩位「神仙」支持自己，至少爭取他們不要正式支援黨內的敵人。史達林和蔣介石都希望讓毛澤東做西班牙共產黨，在蔣介石的前線英勇犧牲，正如蔣介石在史達林的前線英勇犧牲。王明執行這條路線最為忠誠和積極。所謂王明路線，其實就是積極抗戰路線或史達林—蔣介石路線。中國共產黨如果像西班牙共產黨一樣，在馬德里或武漢拼光老本，多半也會逃回莫斯科，在世界和平大會或諸如此類的統戰組織當中度過餘生。王明自己就是大半個俄國人，既不能領略《金瓶梅》和《水滸傳》的妙處，又不需要梁山好漢做粉絲，在這樣的環境裡可以如魚得水，實際上他的後半生也就是這樣度過的，充分體現了上帝的仁慈和公正。

4 國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後，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張國燾借祭拜黃帝之名逃離延安，來到武漢，投奔中國國民黨。四月十一日周恩來到漢口，與張多次協商未果之下，四月十八日，中共開除張的黨籍。張國燾投奔國民黨後，蔣中正視其為「對延安的致命打擊」交給軍統領導人戴笠「妥善運用」，但此後張國燾對中共（特別是主要以紅四方面軍為班底組成的八路軍一二九師）進行的策反工作收效甚微。

毛澤東一點都不喜歡這個路線，但更沒有膽量公開反對，否則兩位「神仙」很可能換掉陽奉陰違的部下，重新啟用無條件服從的部下。張國燾已經輸光了他的所有部隊，變成一條拔掉毒牙的眼鏡蛇。蘇聯名義上提高張國燾的地位，實際上卻不給任何資源，可見其動機只是不太信任毛澤東，並非有意重用張國燾。毛澤東如果放開王明不管，不惜代價地打擊張國燾，肯定能把張國燾徹底打垮，然而鬥爭總會暴露自己的破綻，為了對付次要敵人，反倒會給主要敵人製造可乘之機。所以，毛澤東對張國燾的手段就是陰柔的小動作。例如讓張國燾的兒子在話劇裡演反面人物，自己在下面鼓掌之類。這種「一地雞毛」的做法，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大媽非常熟悉。如果敵人不夠聰明，就會勃然大怒而自己暴露自己的破綻。如果敵人足夠聰明，就會理解小動作隱含的暗示：「小寨養不起大俠，聽說柴大官人正在招人……」當然如果敵人恰好是懶、賴、滑、賤四德俱全的聰明人，毛澤東就可能不得不供養這個活寶終身了。即使紅衛兵，拿這種人也是沒辦法的。這種人很容易比毛澤東和紅衛兵活得長，然後煞有介事教育天真的青少年如何反思歷史。如果他出身前北洋或國民黨陣營，就會變成愛國者；如果出身紅色陣營，就會變成兩頭真老幹部。張國燾的問題是殘暴有餘而無賴不足，做不了這種人。他如果也有毛澤東那種長期受人歧視的江湖浪人經驗，就不會這樣沉不住氣。

張國燾逃到武漢後，周恩來和李克農的特務很快就發現了他的蹤跡。他們完全有機會在戴雨農的特務趕到之前，把張國燾的武漢變成托洛茨基的墨西哥（一九四零年史達林派人刺殺托洛茨基於墨西哥）。周恩來做這種事情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張國燾企圖將邱南章⁵推進長江淹死，結果沒有成功。邱南章和吳克堅沒有趁此機會除掉他，只是因為周恩來有明確指示的緣故。顯然，是因為延安各派系都覺得張國燾還是滾蛋最好。張國燾畢竟見過列寧，又給蔣介石寫了求援信，如果死在周恩來手裡，延安就要負責向史達林和蔣介石解釋理由。他們完全有能力證明張國燾罪該萬死，但舉證的過程必然會向兩位「神仙」暴露自己的大量黑材料。這種得不償失的勝利，做了還不如不做。張國燾一旦投靠了蔣介石，他在莫斯科的朋友和延安的殘部就無話可說了。他走，史達林很可能認為毛澤東和王明虧待了他。他一走，等於證明了毛澤東和王明以前的做法非常正確。蔣介石安排張國燾全家團聚，延安交出了張國燾的妻兒。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臨走前還做了精湛的表演，聲稱為黨勸說張國燾迷途知返。林伯渠指出，她如果真有這種想法，怎麼會把孩子和家財全都帶走。這種事情只能發生在武漢陷落

⁵ 邱南章（1911-2011），一九三六年起一直擔任周恩來的侍衛。西安事變時曾護衛周恩來赴西安同蔣介石談判。著有《張國燾叛逃的前前後後》。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攻陷武漢）以前，史達林堅持的西班牙模式仍然能夠約束國共兩黨。如果發生在皖南事變（一九四一年一月）以後，楊子烈大概不能平安脫離。張國燾的母親到武漢倒沒有什麼困難，但她帶來的消息讓兒子非常難堪。紅軍把他們家當土豪打了，當然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角度看倒也並不冤枉。

張國燾在戴雨農的保護下轉移到重慶，給別動隊的見習軍官上思想政治課。一九四零年，蔣介石安排他做了國民參政會的議員。周恩來為此提出強烈抗議，然而沒有效果。日本投降後，善後救濟總署的署長蔣廷黻派張國燾去江西的分署。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是川軍舊部，沒有忘記張國燾所部對蜀人的荼毒，一再給張國燾難堪。張國燾心灰意冷，棄官隱居上海。冷戰爆發以後，他組織了《創造》雜誌。內容主要是反思共產主義和獨裁的內在聯繫，跟陳獨秀晚年的文章大同小異。後來的反思家棄張取陳，其實主要還是為了保全自戀者的幻覺。陳獨秀和張國燾走的是同一條路，反的也是同一種思。如果思想真有知識分子幻想的力量，他們的下場也就不會是這樣了。豬在風口上飛起來，就以為自己有呼風喚雨的力量；一旦離開風口，就會摔死在地上。盧布和組織支援的思想貌似強大，其實力量還是在於盧布和組織。馬基維利早就說過：武裝的先知勝利了，沒有武裝的先知失敗了。張國燾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已經只剩下思想了。除了像五四

青年一樣辦雜誌，他還能做什麼？如果他沒有加入李大釗的組織，人生的道路還是會引向同一個終點。

張國燾隨著蔣介石逃到臺灣，受到國民黨的冷遇。蔣介石發現包容三教九流，效果還不如培養死忠分子。國民黨各派系凋零殆盡，只有粵系還能在香港掙扎片刻。美國人永遠天真，到處尋找既反共又反蔣的民族民主勢力或第三勢力。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在冷戰格局凝固以前，暫時還能扮演美國人的幻想。張國燾到香港投奔他們，編輯既反共又反蔣的《中國之聲》。朝鮮戰爭爆發後，他們的生存空間日益狹窄。美國人發現無論蔣介石在其他方面多麼不合格，暫時還是唯一能夠堅守反共前線的角色。第三勢力像泡沫一樣破滅，張國燾就連雜誌都辦不下去了。當然，五四青年的雜誌一般也就是這種下場。他人窮志短，向毛澤東和劉少奇請求生活補助。如果亞洲研究中心和堪薩斯大學沒有向他有償搜集歷史資料（一九六六年開始，美國堪薩斯大學邀請他撰寫《我的回憶》連載文章，並於香港明報月刊刊登中文版），他很可能會走上李宗仁的道路。他的剩餘價值在於熟悉黨內鬥爭，能夠做出比局外人更準確的判斷。文革開始以後，香港地下黨一度撕下了白手套。張國燾根據經驗判斷，這是上海一九二七年暴動前的局勢。他決定走為上策，逃往加拿大，生活不能自理以後，在養老院裡去世。無論如何，這已經是他能夠

指望的最好結局。

一六、被扼殺的史達林

——劉少奇



劉少奇（1898—1969）出身於湖南寧鄉的小地主家庭。這種家庭除了振興家業的強烈願望以外，跟周圍的小農沒有明顯的區別，從文化水準和社會責任的角度看，都不足以稱為士大夫階級。小地主重視自己的積累，對同儕沒有扶助的義務，對社區的公共事務漠不關心。他們如果出租土地，租金通常比士大夫、大地主或宗族長老高得多。後者作為社區領袖或社區凝結核，必須把社會公益放在私人經濟利益之上，從共同體紐帶的角度看待土地關係，否則就會喪失作為統治者的德性標誌、文化和體面。小地主都是沒有文化或體面負擔的下等人，辛苦經營只為求財，不在乎別人說三道四。這樣的家庭如果生在和平時期的儒家傳統社會，通常會經過幾代人的積累，將經濟資本轉化為教育資本，上升為士大夫階級，最後由聚斂者和暴發戶轉型為統治者和慈善家，但他們的上升欲望在其最強烈的時候，正好趕上了社會階梯的倒塌，因此以變形、甚至錯亂的方式表

現出來。

資本主義進入農村的時候，通常會遭到社區領袖基於鄉土共同體或宗族共同體利益的抵制。小地主通常是最容易接受自由競爭和社區解構的少數活躍分子，統治者和窮人組成的大多數反倒是心存疑慮的。斯托雷平時代的貴族、知識分子和窮人一心維護村社，只有少數富農或村社分離者熱衷於小家庭本位的發家致富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者推行減租減息時，驚訝地發現：大地主向佃戶索取的租金早就低於經濟學認為的正常標準了，實際上構成福利領取者對秩序輸出者的長期逆向經濟剝削。宗族的公共財產尤其是赤裸裸的社會主義機構，服務於本族DNA的傳播最大化。鄉村共同體雖然沒有《紅樓夢》的賈府資源豐富，但血緣大鍋飯的邏輯仍然是一脈相承的。外族人無論多麼善於創造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價值，都永遠不會比血緣共同體內部的寄生蟲地位高。週期性大洪水通常會消滅整個地區的人口，讓墾荒的外來人重新開始這場遊戲。社會主義者很難找到比他們更加社會主義的社會了，減租減息的打擊實際上落在了少數急於致富的社區分離者和厭惡大鍋飯的人之頭上。只有這些人才會索取市場標準的租金，只顧自己掙錢。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父親都屬於這種人，也同時遭到統治者和窮人的厭惡。統治者（王

先謙和葉德輝之流）討厭他們的貪婪和精明，覺得他們依靠少盡社區義務而縮小了原有的階級落差；無產階級討厭他們的貪婪和精明，覺得他們依靠少盡社區義務而擴大了原有的階級落差。這些小地主如果能夠碰上一個朴正熙式的威權型獨裁者，就會變成未來資產階級的代表。而無產階級的子弟會變成他們的工人，士大夫的子弟會變成滿腔嫉妒的左派知識分子。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父親生不逢時，還沒有來得及把子孫後代培養成士大夫或資產階級，就親眼看到他們變成滿腔嫉妒的左派知識分子。

小農如何產生階級地位接近、行為模式不同的新暴發戶，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以下因素肯定存在，但不一定是故事的全部：蛋白質供應、激素水平和意識形態訓練。下等人的典型特徵是遲鈍、麻木、軟弱，難以長期集中注意力，缺乏制定長期計劃和集結短期力量的能力，生活在散漫和片段的世界中，傾向於今朝有酒今朝醉。這些特徵非常不適合生存在原始部落或大洪水時期，只能是文明社會建構的產物。其中許多特徵從醫學角度分析，其實屬於慢性營養不良或蛋白質攝取不足的症狀。只不過病人數量如果足夠大，社會就會把不正常當作正常。原始部落通常人口不多而自然資源豐富，人均攝取蛋白質和平均身高超過農業社會。健康的獵人或採集者通常不缺蛋白質，缺乏蛋白質的病人會因為行動遲緩迅速落入捕食者口中。原始部落沒有大量簡單機械，不需要智力、

毅力、體力和勇氣的半福利性工作。這些工作的出現和下層階級的出現，似乎是文明社會的特徵。蛋白質供應的突變通常有兩種原因：其一是培養種子選手的家庭策略，但能夠使用這種策略的家庭通常不是最底層。最底層人口通常意志和道德非常渙散，基本上無力維持穩定的家庭，更不用說採取任何家庭投資策略了。女性在懷孕和養育當中能夠得到男性的扶助，本身就是明確的階級標誌。真正底層的特點是男性滅絕，女性外流。蛋白質供應突變的第二種因素更加重要，就是外部世界的資源和機會輸入。湘軍開啟的軍事化傳統，對近代湖南社會非常重要。毛澤東、劉少奇和楊度脫離原有的階級，都由家族內部的軍事冒險家開始。蛋白質是高激素水平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兒童的蛋白質供應如果已經得到保證，未來的階級門檻首先就要取決於性激素水平。婚姻策略和社交策略大部分是當事人性激素水平的無意識反應，與其天然水平不適應的策略很快就會使當事人感到尷尬和混亂。激素水平的下降會導致當事人對身體信號和階級信號的敏感性下降，產生乖謬錯亂的應對策略。意識形態訓練只有在其他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強化資源整合的效力，但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不同的意識形態體系會直接影響路徑和命運。

劉少奇家族的意識形態原本屬於致力於興家的小地主類型，已經發展到了可以培養

幾個脫產秀才的程度，但辛亥革命打斷了他原先接受的私塾教育，將他送進了新型師範學校。在新式教育大擴張的背景下，師範生如果願意回鄉教書，原本並不困難，但他已經不再是原先的鄉下孩子，他的父母已經富裕到足以不讓下一代的幾個孩子留在農村的地步。他開始追求超越自身階級的目標。他一離開鄉下，就拋棄了糟糠之妻，把大部分時間用於社會活動，以至於無法正常畢業。在此期間，他結識了毛澤東和楊開慧。不久，他就跟楊開慧的室友何葆真同居。他的家庭在農村是小地主，但在城裡連小資產階級都不如，家人不能也無意支持他到北京闖蕩。他自己的新學知識同樣不足以支持他在大城市活動。湖南的師範學校雖然號稱新式，其實因為師資力量的限制，真正過硬的科目也只有《資治通鑑》一類。他從脫離原有階級和路徑的時刻開始，就再也無法回頭了。他進不了北大，也不能赴法勤工儉學。「俄羅斯研究會」價格便宜，他就像飛蛾撲火一樣扎了進去。

「留俄預備班」給他準備了川資，將他接到上海。他這時肯定已經知道未來的命運了，因為預備班的課程全是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他和任弼時、羅亦農、柯慶施都是預備班的同學。共產國際在租界發動工人運動時，經常調動這批年輕的學員充當打手。自由市的資產階級看到這些排成整齊隊列、呼喊外國口號的糾察隊員揮舞短槍和大棒，毆

打其他幫會的好漢，感覺就像維也納市民第一次看到共產黨和納粹黨的準軍事組織在大街上角鬥。缺乏重武器的警察很少有膽量干涉這樣的戰鬥，海軍陸戰隊又不是隨時隨地都能登陸。英國人當時堅持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標準給警察配備武器，結果導致了遠東局的坐大。美國人後來又犯了同樣的錯誤，按照本國警察的標準給南越警察發裝備，結果將大部分國土送給了南方局的槍手。

劉少奇一開始的培養目標就是城市地下黨代理人，符合共產國際初期的工作路線。莫斯科根據爪哇革命經驗，準備以上海、廣州工人運動為主要戰場，以英、日帝國主義為主要敵人，把國民黨對土地和省分的貪婪攫取視為落後性的表現。一九二一年，劉少奇的幕後資助者露出真面目。「赤色職工國際」的工會「中國勞動組合」這個共產國際侵略遠東的早期白手套，欣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畢業生。劉少奇在莫斯科僅僅停留了一年，就奉命返回上海，隨即前往內地，組織了粵漢鐵路和安源煤礦的兩次大罷工。國民黨打回廣州以後，他順理成章地當上了全國總工會（前身即「中國勞動組合」）的代理委員長。國民政府為了回報蘇聯的支持，發動了針對英國人的省港大罷工。劉少奇和蘇兆徵主持封鎖香港的行動，將國民黨和蘇聯的蜜月推向最高潮，但最初的裂痕也由此而生。罷工工人由廣州革命政府養活，負擔極為沉重。國軍將領覺

得不如把他們編入北伐軍，至少還能派點用處。蘇聯代表和陳獨秀都熱衷於反帝運動，不願進攻內地各省。他們嘲笑蔣介石的波拿巴主義思想，說國軍的戰鬥力源於人人都想做省主席的欲望，但蔣介石贏了這一回合，史達林比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更願意遷就國民黨。

北伐軍一到武漢，劉少奇就把總工會的辦公室搬到漢口。武漢的工糾隊迅速發展，在幾個月內嚇跑了大部分資本人家。李宗仁惱怒地說：為什麼共產黨總是在北伐軍的後方搞破壞，偏偏不到敵人的後方去搞破壞？這個指責並不公正，至少劉少奇早在北伐軍來到以前就發動過兩湖的工人運動。他領導的群眾運動發揮了人肉盾牌的作用，使得保衛租界的英國水兵不好意思開槍。陳友仁的政府¹能夠成功地接管漢口租界，多虧了劉少奇親自部署的反英活動²。

1 陳友仁 (1898-1944)，原籍廣東順德，父母是客家人，生於加勒比海的英國殖民地千里達的一個華僑家庭。曾創辦英文報紙《京報》(Peking Gazette)，擔任總編輯，鼓吹革命，一度被袁世凱通緝。蘇俄與孫中山接觸時，陳友仁是孫的外交顧問。一九二七年，陳友仁代表武漢國民政府，與英國分別簽訂收回漢口英租界之協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協定。由於其成功的鐵腕外交，以及精通西方法典，陳友仁獲得巨大聲譽。當時中國最大報紙——上海《申報》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革命外交家陳友仁的名字，有人甚至稱武漢政府為「陳友仁時代」。

2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北伐軍攻占武漢，九月十四日，武漢總工會成立。從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

清黨以後，他和汪兆銘達成協議。他同意將工糾隊的主力調往江西，留在武漢的機構放下武器。朱培德為他的部下提供了避難所，安排他在白鹿洞書院和廬山公館休養。他和汪兆銘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直到汪兆銘下野。根據他在廬山時期的同伴丁覺群的說法，劉少奇在代表工人和資本家談判時，曾受資本家賄賂，而得到汪兆銘和陳公博的信任（「汪說，你還是留在共產黨內好，不要暴露。」）。劉遇事向陳公博請示匯報，唯命是從。解散工人糾察隊，瓦解工人的罷工和武裝暴力活動。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劉少奇獲悉寧漢合作、汪精衛垮臺消息後，就到了上海。（〈對劉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漢口、廬山所犯罪行的交代〉，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文革結束後，劉少奇的平反報告證明了丁覺群報告的真實性。

無論如何，劉少奇沒有參加周恩來策劃的南昌暴動。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兩湖、江西和華北各省的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左派仍然藕斷絲連。汪兆銘和朱培德的禮送政策不是孤立的，劉少奇也不是唯一希望繼續打著國民黨左派旗號活動的共產黨人。周恩來、葉挺、賀龍在南昌同樣高舉國民黨的旗幟，汪兆銘和張發奎對此並不反感。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徹底決裂，在南方還要等到廣州蘇維埃的公開決裂。至於北方，甚至這樣姍姍來遲的決裂都沒有發生。劉少奇在上海休息了幾個月，又來到天津整黨。他

發現當地的共產黨人普遍認為：只要北伐軍（馮玉祥和閻錫山）占領平津，革命就勝利了。劉少奇斷定這些人都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必須無情地肅清。周恩來卻在他背後刺了一刀，向中央指控他犯了取消主義的錯誤，另派張慕陶主持華北黨務。劉少奇不得不檢討自己的「命令主義」，黯然返回上海，接受了滬東區委書記的職務，直到幾個月後接到滿洲的任命。

李大釗被捕後，滿洲的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劉少奇和孟堅奉命恢復當地的黨組織，但也迅速重蹈覆轍³。如果不是因為張學良正好在這段時間接管了政權，他的前途

武漢地區工人罷工三百多次，「常對僱主提過度之要求，甚至以武裝之糾察，封閉廠店，強迫僱主行不可能之條件。」（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大公報》）甚至「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搜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都是極平常與普遍的」。（《劉少奇自述》）商人不堪忍受，紛紛逃跑。大量企業倒閉，失業人數激增，貨物奇缺，物價飛漲。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英租界水兵與示威者發生衝突，擊斃一人，擊傷多人。劉少奇等藉此機會，在漢口舉行了號稱二十萬人參加的「追悼一三死難同胞暨反英示威大會」，工人糾察隊帶領遊行隊伍衝進英租界，扯下英國旗，驅逐英國人。隨後，國民革命軍接管英租界。

3 《滿洲日報》（奉天專電八月二十四日電）報導說：「支那（中國）時局困難以來，似有許多共產黨員趁中央、奉天間的諸問題正在談判而陷於忙亂之機，潛入奉天紡紗廠，故當局預先已有警惕。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五點左右，該廠職工王繩一等幾人下工後，來該廠裡院與南方職工打扮的支那人（劉少奇）秘密接頭，正在遞交共產黨傳單及其他材料費用等時，被警戒者發現，當即押送支那方面公安局審訊。王係三年前招收的該廠職工，至今逢機便

凶多吉少。張學良授意下的高等法院故意避重就輕，把他的案件當成普通的煽動工潮事件，區區半個月就放人。以便保存劉少奇和滿洲省委，為易幟後的政策轉向留餘地。這場交易實現了托洛茨基和加拉罕未竟的夢想——把滿洲變成了戰爭策源地，但後來構成了劉少奇叛變革命的主要罪證。劉少奇寫給張學良的感谢信非常肉麻，發誓要在有生之年報答再生父母的恩情。但從政治上講，毫無疑問，張學良才是上當受騙的一方。毛澤東後來寫給蔣介石的感谢信同樣肉麻，卻從來沒有人懷疑他的撒謊誠意。張學良的部分動機大概類似韓復榘和宋哲元，利用共產黨增加他們對蔣介石的獨立性。饒漱石在滿洲被捕時，張學良拒絕了蔣介石的引渡要求，因為「東北的事情我們自己辦」。另一個可能的動機則類似蔣介石和徐恩曾，即想利用共產黨著名的地下活動能力為自己服務。徐恩曾依靠錢壯飛，打入了原先的禁區滿洲。張學良則想利用劉少奇，打入原先的禁區中東路。⁴

劉少奇離開滿洲後，前往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他接下來在上海、贛南和西行途中（指長征）繼續擔任名義上的工會職務，實際上卻無事可做。工會無疑屬於白區工作，在當時的情況下屬於特務活動的外圍，在紅區則純屬擺設。他不得不將農村的短工、沿街叫賣的小販和雜貨鋪的店員統統解釋成工人階級，才能保證他的

工會不至於變成官多兵少的衙門（劉少奇〈蘇區階級工會會員成分〉，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此期間，馬克思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大多落入國民黨控制的工會。早期工

進行共產黨的宣傳，是一直受當局監視的人物。」滿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報告說：「紗廠鬥爭問題，奉天紗廠兩月來即以五成開支，而且是奉票，我們經過支部的討論在群眾中提出要八成現洋的鼓動，並要求立刻開支，群眾情緒異常興奮，我們更繼續不斷一再進行鼓動工作，一面準備召集各工人工會，八月十八九的時候，群眾情緒已確實到了可以行動的時候，而且八月廿七日又是開支的關頭，據當時情形沒能在組織上積極準備，八月廿七日不按照工人要求開八成現洋，群眾行動確已不成問題。不料在召集第一次群眾會時，支部書記即遭拘押，其他同志一人被開除（前數日）致會不能開成，叛徒崔某（過去是同志）與廠中陰謀勾結，即以陷害常張同志，又向省委報告謂群眾會仍可召集，省委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趙、孟二人去，上次是全總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隨被捕。」趙即劉少奇，化名趙之啟，孟即孟用潛，當時名孟堅，叛徒崔某即崔鳳翥，全總代表是張崑第。丁是丁君羊。

4 張學良的衛隊長劉多荃在〈我所知道的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紡紗廠破獲一起共產黨案件情況〉中說：「一九二九年我是張學良衛隊上校團長，時常跟隨張學良。一九二九年八月底，警察廳在奉天紡紗廠破獲一個大共產黨案。關係到東北三省的事。當時警察廳長白銘鎮和憲兵司令部副官長程廣道，告訴我捕了三個人。經審訊，其中一個人供認是中共滿洲省委書記。供出了滿洲省委員會和瀋陽、哈爾濱、本溪湖、撫順及鐵路沿線黨組織與活動計劃。張學良責成參謀長榮臻和白銘鎮與這個黨的負責人達成了政治交易條件：要他徹底交出東北活動計劃、地點、參加人員名單等。今後不再在東北搞政治破壞和顛覆活動；對中東鐵路有關工人運動雙方事先取得聯繫，相機配合……這個負責人要求簽字畫押後，不登報，雙方聯繫各派妥靠人員，到指定地點會晤。張學良親口對我說：這個共產黨負責人給他寫信表示感激，張長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將來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這個案子連捉帶放共廿天左右，釋放時我們和他有祕密計：對外宣佈確非共產黨人，找不出確實證據，由警察廳批准無罪取保釋放。」

人運動的幹將大多脫（共）黨叛（共）黨，甚至構成所謂「反動工會」的骨幹，最終變成中共在五十年代鎮反運動⁵的主要對象。蘇區的工會在它的領導下，實現了托洛茨基的夢想，變成了政權機器的一部分。他在一九三三年「二七」全總召集的各省青工部長會議上說：「個人的利益要服從團體的利益，團體的利益要服從國家的利益。工人在自己的政權下不能罷工，罷工是對國民黨、對帝國主義、對資本家的鬥爭方式。」蘇區的工會要「教育工人要用新的態度來對待新的勞動，號召國營企業與合作社企業的職工，要愛護自己的工廠，愛護公共財產，貢獻自己的技能與天才，為了革命戰爭而努力生產，把勞動的英雄們列到紅榜上去。同時號召大家必須與破壞勞動紀律、違反廠規、偷竊公共財物、浪費材料及怠工偷懶的現象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劉少奇〈用新的態度對待新的勞動〉）即使如此，他的「勞動組合」仍然是蘇區事務最不重要的部分。他的工會只給紅軍輸送了一萬九千人馬，在「正規部隊有三十五萬人；非正規部隊有六十萬人」（王明在一九三三年共產國際執委會上的報告）的紅軍當中微不足道。

這段低潮期直到一九三六年才結束。劉少奇接管北平的北方局工作以後，恢復了武漢時期如魚得水的感覺。北方諸將的曖昧性格比武漢的國民黨左派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他雖然是北方局的領導，北方局的成就卻不能首先歸功於他。

一二·九運動和盧溝橋事變無疑是北方局為黨立下的不世奇功，但真正的功臣比劉少奇的資格老得多。除了莫斯科以外，很難想像還有人能夠協調他們之間的關係和工作。劉少奇的特長不是純粹的情報工作，而是半公開的社會活動。他的系統和周恩來的系統一直談不上友好，優勢明顯在後者一方。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抗戰前期之所以會相互提攜，蘇聯系人馬給他們造成的共同挫敗感發揮了很大作用。劉少奇在延安的活動，壓制了王明的蘇聯系人馬；在華中、華東的活動，壓制了饒漱石的蘇聯系人馬。他上升為黨內第二號人物，則是毛澤東用以遏制周恩來的最可靠保證。在抗日根據地，劉少奇培訓幹部，教育他們運用社會組織關係，在舊政府和社會精英的關係網外，建立自己的影子政府，逐步削弱和切斷舊勢力的網絡，最後取而代之。他的作風比毛澤東更接近史達林，一切從幹部黨的角度出發。他的組織能力對土改和三反、五反作用最大，但對鎮反的作用就不如毛澤東。這些運動的暴行不

5 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是一九五零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發動的第一場肅清反對勢力的運動，鎮壓對象以國民黨殘餘、特工、土匪勢力為主。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做決定」。據一九九六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鎮反」運動中，有八十七萬餘人被判死刑。

是由他開始的，他在蘇區時代實際上很少參加這些活動。任何共產黨領導人都比他責任更大、罪惡更深，因為共產黨政權不依靠搶劫是無法生存的。

在聶力在《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上海文藝出版社）一書中，及魏巍等人編寫的《聶榮臻傳》中都提及，劉少奇反對林彪把不肯出錢的土豪拉倒大街上拷打的辦法，認為「這種搞法不光不會得到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農民的同情，其結果只會使鋪子關門，人也逃走了，款也籌不到，政治影響反而會很壞」。而林彪的暴力籌款方式，則是紅軍的普遍做法。陳毅則在〈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說：「朱、毛領導的部隊每月至少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巨大的款項主要是靠勒索地方豪紳得到的。一開始，他們是通過綁票來實現這一目的，但由於紅軍聲勢浩大，豪紳們往往聞風而逃，所以要想綁票比較困難。……紅軍捉不到人，便在房子上打主意……許多人為了保住房子，只好乖乖地把錢送來。……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然而，這些介於恐怖主義和流寇搶劫的活動，其組織度不夠高。如果紅軍生活在擠不完橘子當中，自然可以滿足於這種非常浪費的掠奪方式。只有滴水不漏的社會監控，才能實現顆粒歸公的汲取，這就對幹部組織的要求更高，需要劉少奇這樣心思細密的組織人才。組織才是他真正的天才，浪人性格濃厚的梁山系人馬難以勝任。

劉少奇在抗戰時期就開始大規模地培養幹部，準備統戰到革命的轉型，沒有前一個階段的籌備，四、五十年代的鬥爭就會像二、三十年代一樣混亂，不僅會造成戰利品的大量浪費，而且會妨礙史達林式的社會監控體系有效運作。他向鹽城訓練班的幹部學員解釋統治的奧秘：「建立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一定要肅清暗藏的反革命，但要慎重不亂殺人。……對真正的漢奸反革命，今天應採取鎮壓政策，毫不留情的對付他。……不過我們要慎重顧到群眾中的影響等。例如對那些鼎鼎大名的，有地位的，過去在群眾中有些威望的紳土地主，因為他的地位太重要的，雖然他是頑固的反對我們的，但因為捉了他或殺了他影響很大，就不能不在事前慎重考慮和決定處理辦法。」顯而易見，統戰對象和革命對象是同一批人。統戰時期應該慎重對待，意思就是在（以前和以後的）革命時期應該殺掉。一九四五年以後的革命比一九三七年以前的革命容易了許多，關鍵就在於統戰時期剪除了舊精英的社會聯繫。土豪的財產和官職可能沒有變化，但他們已經失去了曾國藩、別廷芳動員宗族、鄉鄰的組織資源。社會重組完成後，幹部取代了鄉紳在社會網絡當中的位置。土豪從凝結核變成局外人，自然就會變得不堪一擊。如果革命者像三十年代一樣直接進攻土豪，很可能同樣會陷入眾多小別廷芳的汪洋大海。統戰工作之所以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原因一目了然。

劉少奇填補了毛澤東文人性格留下的空缺部分，否則後者寸步難行，但毛澤東擔心自己遭到組織的裹挾，也是早晚會發生的事情。土改、三反、反蔣戰爭和朝鮮戰爭構成同一個連續體的不同側面，幹部和組織都是成敗的關鍵。毛澤東把這些自己不太擅長的組織工作託付給劉少奇，不能說沒有知人之明。劉少奇向東北幹部傳授土改的技術：「群眾鬥爭起來了，要打人、使用肉刑、殺人，現在總是控制不了……殺的方法上，有活埋的、槍斃的、活剮的，還有勒死的，剮了以後還要掛在樹上和門上……給他們殺人權……總比沒有法庭好……問題不是殺不殺，而是軍事力量達得到不？」向全國幹部傳授社會重組的技術：「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得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很多事情不好辦。」工人團體自從省港大罷工以來，一直是國民黨的重要陣地，在清黨運動中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而且具備一定的戰鬥力，自然構成主要的鎮壓對象。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前後，上海公私各廠逮捕了六千零七十七人，其中包括三百二十五個基層工會主席或委員，七十三個上海總工會和產業工會幹部（上海工人參加鎮反運動總結報告），一九五一年七月）。工人組織瓦解後，企業已成釜底游魚。鎮反運動自然延伸為三反、五反，將孤立無援的企業家各個擊破。共產國際一九二二年在上海開創的事業，

至此功德圓滿。五十年代初期，蘇聯接受遠東方面的報告，軍事方面的材料署名入通常是毛澤東本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的材料署名入通常是劉少奇。這種組合充分說明了兩人當時的關係，以及他們和蘇聯的關係。鄧小平當時還是小角色，工作風格亦步亦趨地模仿劉少奇，而且一直表現得比劉少奇更左、更誇張，在反右運動和人民公社的指標問題上尤其如此，大大加重了滿洲和四川的饑荒。

史達林能夠戰勝黨內的敵人，因為他最能勝任乏味的組織工作。長此以往，幹部隊伍的主力就變成了史達林的人。其他人即使名義地位更高或更出風頭，總是鬥不過組織力量的控制者。毛澤東完全清楚劉少奇不是中共的赫魯雪夫，而是中共的史達林。如果劉少奇真是赫魯雪夫，毛澤東反倒不會覺得他足以構成威脅了，因為從毛澤東後來對赫魯雪夫的態度看，他明顯認為赫魯雪夫是個愚蠢軟弱之徒。赫魯雪夫即使從蘇聯黨的角度看，也是太衝動任性了，缺乏史達林式冷酷的堅韌。中共黨內最像史達林的人，也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周恩來和康生雖然同樣冷酷而且更加陰毒，卻像許多特務頭子一樣韌而不堅，摻雜了許多女性化的脆弱，組織工作的專業能力不如劉、鄧。如果中共完全走蘇聯路線，毛澤東很容易遭到淘汰。毛是一位精明的觀察者，不可能看不出這一點。高、饒事件已經暴露了毛的猜忌心，因為饒漱石和劉少奇的矛盾在黨內是眾所周知的。

饒漱石不愛聲色娛樂，一心致力權術，不是粗枝大葉的人，如果不是自以為得到了毛澤東的鼓勵，是不敢公開進攻劉少奇的。毛到底是一開始就打算利用和犧牲饒漱石，還是本來真想打倒劉少奇、周恩來，但一看史達林的臉色不對就轉彎，就像他在大鳴大放——引蛇出洞事件當中的表現一樣，不可能有準確的答案。無論如何，即使他在高、饒事件當時還沒有把劉少奇當作主要敵人，在五十年代後期已經沒有選擇餘地了。

政治家要懂得選擇有利於自己的戰場，大搞蘇聯式計劃經濟顯然不是毛澤東的有利戰場。時間越久，劉少奇培訓的幹部隊伍就越壯大。領袖一旦被架空，多半會死得很慘。劉少奇和蘇聯系人馬的殘忍，比毛澤東和梁山好漢可怕得多，正如奧斯威辛的平庸官吏群體比海盜船長愛德華·蒂奇可怕得多。中、蘇決裂和文化大革命恰好是毛澤東的有利戰場，劉少奇集團在這裡有勁使不上。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看，決裂既無必要又無利益。從蘇聯的角度看，決裂是毛澤東單方面的挑釁。蘇聯根本沒有打算對毛澤東下手，也看不出毛澤東到底有什麼要求沒有得到滿足。然而，毛澤東是一位深謀遠慮的人。他能在道路的起點就看到道路的終點，然而這種能力沒有辦法給大多數人解釋清楚。大多數人只有在接近終點時才能看清道路的方向，然而這時候已經無法回頭了。毛澤東如果不能成功地挑起中、蘇鬥爭，就沒有多少機會破壞幹部黨的成長。亂中取勝是毛澤東和

梁山系的特長，卻不是幹部黨的特長。脫軌會造成更嚴重的脫軌，最終形成綁架效應。沒有中、蘇決裂，文革很難發生。沒有文革，一九七二年外交革命很難發生。如果幹部黨順著五十年代中葉的發展方向走下去，一九七六年的政變（指逮捕四人幫）大概提前十年就會發生了。毛澤東的下場，最好也不過是印尼的蘇卡諾，最壞就會變成阿富汗的阿明⁶，而後者比前者的可能性大得多，因為共產黨體制是容不得傀儡領袖自然死亡的。毛澤東的折騰雖然禍害了黨國，但至少把幹部黨難以避免的勝利推遲了十多年，保障了自己的自然死亡和歷史評價，顯然證明了他的格局理解力和權術高人一籌。至於東亞居民遭受的池魚之殃，那本來就是他和他的敵人誰都不當回事的因素。何況大清滅亡以後，這些人無論如何都是要倒楣的。知識分子進剝皮亭還是夾邊溝⁷，差別不是很大。順民反正總是要餓死和吃人肉的，有沒有共產主義的牌子關係同樣不大。歐洲人、甚至俄國人，確實因為共產主義而損失慘重；東亞人的損失卻不是因為共產主義。後者至多只能

6 哈菲佐拉·阿明（1929-1979），阿富汗前領導人。一九七八年，人民民主黨發動軍事政變（四月革命），推翻政府，塔拉基執政，而阿明任政府總理。二人明顯政見不一，積怨日深，阿明發動政變殺害了塔拉基，但是阿明的上台直接觸犯了蘇聯在阿利益，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出兵處決了阿明。

7 夾邊溝，位於中國甘肅酒泉境內的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底，近三千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裡勞動改造。恰逢中國大饑荒，糧食產量急遽減少，造成約一千五百人因饑餓而死亡。

抱怨自己為什麼沒有像洪承疇時代的士大夫和順民一樣誠實，像維護八旗將士一樣維護大日本皇軍，把毛澤東和劉少奇統統擠回張獻忠的生態位，但這件事主要應該怪蔣介石。

劉少奇不敢或不能在五十年代末阻止中、蘇決裂，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的知人之明或把握機會窗口的敏銳特長。他既然承認了毛澤東的反修（實際上就是打倒幹部黨的意志）路徑，就把自己放在了不利戰場上。他暗用幹部黨約束反修革命的努力，並不能阻止毛澤東的勝利，卻足以引起毛澤東的厭惡，雖然他這時已經死定了，但死法如此悲慘卻是他的失敗權術造成的。在毛澤東這樣狡詐、孤立、敏感、殘酷的內心中，劉少奇式的牽拉約束無異於一條纏住下身的大蟒蛇，好不容易把蟒蛇扯下來，自然要往死裡面打。一個女人如果被惡心的渣男死纏爛打，就能體會到毛澤東的感受。列寧主義者的性格特徵和行為模式確實酷似冷血動物和爬行動物，把智力、道德和能力的缺陷變成了有利條件。他們對別人的痛苦和自己的痛苦都非常遲鈍，因此才能在自己創造的世界上有滋有味地生活和滅亡。

一七、紅太陽身後的暗星

——康生



康生（1898-1975，原名張宗可，山東膠南縣人）出身於山東的大地主家庭，在德國殖民地青島接受了新式教育，畢業於德國傳教士創辦的青島禮賢中學。這種教育不是造成他家庭不和的原因，沒有充分的證據。無論如何，他自作主張去了上海。他在上海期間的費用，不是由原來的家庭承擔的。有傳言說他欠了賭債，也有傳言說他與父親的妾有染，總之，家裡不給他錢了。

勞動者容易投入改良派的工會，因為他們有勞動技能而且希望依靠勞動養活自己。統治階級的叛逆者容易投入革命，因為他們渴望政治權力而且除此之外沒有能力養活自己。康生迅速加入了劉少奇和李立三的學習班，這裡的顛覆或鬥爭課程由共產國際買單。山東的地主不同於南方的士紳，習慣於暴力橫行的環境。康生自幼熟悉槍棒和水滸文化，

因此在鬥爭課程上天生就比其他學員占優勢——他在顧案中親手用斧頭砍死一名顧順章家屬。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暴動給他提供了吸引上級注意的機會，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進攻第五區警察局。蔣介石清黨以後，他的許多同夥死於非命，他卻化名趙容，以上海中華商會會長虞洽卿秘書的身分招搖過市，在地下黨的網絡中占據了更高的位置。他在一九三零年曾經被捕，始終未能洗刷叛變的嫌疑。政治局委員盧福坦¹後來投靠國民黨，提供了康生變節的紀錄。陳賡瞭解此事，卻長期保持沉默。饒漱石在國民黨留下的檔案中看到了盧福坦的報告，向毛澤東匯報，但毛澤東沒有反應。康生在文革初期通過謝富治（時任公安部長），將盧福坦處決。

這些材料可以做出多種解釋。康生可能確實變節，事後殺人滅口，但他掌握情報部門的要害，以致馬基維利主義者都覺得他的利用價值比忠誠不忠誠重要。康生的變節材料也可能是真正的變節者、黨內敵人或國民黨捏造的，目的在於破壞康生的前途或擾亂共產黨內部秩序。康生甚至可能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以貌似變節的方式開闢橫跨國共兩黨的祕密網絡，中國支部的大多數領導人沒有資格瞭解深層祕密，故才會產生對他

變節的懷疑。無論如何，他肯定表現出適合從事情報工作的性格和天賦。他和周恩來在此期間的合作非常密切，包括著名的顧順章案件。柔石捲入的借刀殺人案²，是不是他的傑作，或者是不是其他領導人借助他完成的傑作，其實並不重要，因為諸如此類的活動本來就是他的日常工作。

一九三三年，康生調往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他進入中央政治局。如此迅速的升遷，本身就證明了情報工作在共產國際體系內的地位多麼重要。康生這個名字就是他在此期間取的俄語化名，原先常用的化名趙容從此為人遺忘。他追隨史達林，在中國支部的幹部當中展開肅反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和以後幾十年的政治資本。一九三七年以前，他大體上支援王明。遵義會議以後，他還在列寧學院和東方勞動大學組織擁護王明為總書記的效忠表演。他什麼時候發現史達林的決定雖然難以判斷，但不會晚於奉命回國的時刻。

1 盧福坦（1890-1969），一九三二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三年被捕後叛變，一九五一年後被長期關押。

2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安排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王明進入政治局。此後，林育南、何孟雄等人私下聯絡，試圖反對王明。十七日，林育南及左聯作家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等在漢口路東方旅社開會時被捕。有人認為這是康生告密所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和康生從蘇聯飛抵延安。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等待這位「崑崙山欽差大臣」³的心情多麼忐忑，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帶來的聖旨，既可以追認毛澤東賴以上位的小動作，也可以結束毛澤東的政治生命和肉體生命。這是毛澤東與康生的第一次見面，毛澤東對史達林身邊的使者誠惶誠恐。康生這時已經知道史達林讓毛澤東替代王明的決定，但毛澤東還不知道⁴。他這時改換門庭，毛澤東沒有拒絕的資本。如果他等到毛澤東拿穩蘇聯的態度以後，後者未必不會清算他和王明曾經勾結的舊賬。後來的情況證明，這次交易對雙方都非常有利。康生選擇了勝利者，毛澤東彌補了自己的短板。史達林對黨—軍幹部的威懾力，主要源於他對克格勃（KGB）的絕對控制，而毛澤東從來就沒有這樣的控制力。問題不僅在於周恩來、李克農、陳賡都不是毛澤東的自己人，而在於毛澤東根本沒有可能在情報系統內部安插進自己的班底。即使他以後有機會培養自己的班底，時間上也是緩不濟急，因此招降納叛就是他的次優選擇，也是他上位太快必須付出的代價。康生既是情報界的內行，又熟悉蘇聯的內幕，正是毛澤東所需要的人。何況毛澤東在蘇聯的限制下，不敢直接消滅王明，通過爭取王明的親信倒戈，乃是孤立和架空王明的適當手段。

王明根據蘇聯的旨意，準備在武漢複製馬德里戰役⁵。毛澤東和任弼時企圖將他凍

結在延安，結果失敗了⁶。大多數領導人支援蘇聯和王明，康生卻屬於支持毛澤東的少數派。王明主持長江局，康生利用情報部門不斷找碴。王明發現他反戈一擊，憤怒地痛罵「康生無恥」。一九三八年九月的六屆六中全會將王明定為右傾投降主義，標誌著史達林最終放棄了強迫中國支部為國民黨充當人肉盾牌的初衷。王明灰溜溜地返回祖國蘇聯，康生隨即擔任了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情報部部長、中央機要局局長、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要職。他在情報部門發揮的作用，跟劉少奇在黨務部門的作用非常相似。整風運動依靠康生，毛澤東思想的發明依靠劉少奇。這樣的運動對毛澤東非常必要，因為他無法以史達林的方式殺光舊人——但零星的消滅是可能的，劉志丹的神祕死亡很可能能涉及這方面的問題。小說《劉志丹》之所以引起文字獄，恰好說明毛澤東不能承認他

3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延安，毛親自到機場迎接，發表講話說他是「崑崙山上下來的神仙」。

4 一九三八年八月初，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

5 馬德里戰役發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一月，此役粉碎了佛朗哥將軍的速勝迷夢。而國際縱隊在此役中的重要性廣為人知。國際縱隊是由各國共產黨招募志願兵加入西班牙內戰的組織，在蘇聯國防部的協助下成功。

6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在漢口租界裡設長江局，王明任書記，周恩來任副書記。但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淪陷後，中共中央長江局被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撤銷，遷往重慶的辦公機構改名南方局。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共產國際派」被整肅。

有殺光老幹部的權利⁷。如果換成史達林，就會直截了當地宣稱死者都是帝國主義間諜了。

康生和毛澤東的聯盟，犧牲了周恩來和李克農在情報部門的優勢。但種種跡象表明，周、李和蘇聯的關係並沒有就此中斷。康生在五十年代的失寵，就是源於這個聯盟的反攻。蘇聯情報部門為了應對朝鮮戰爭以後的新形勢，對遠東各國的情報部門進行了全面改組和技術升級。此事本身完全正常，不是冷戰初期的任何亞洲共產黨領導人能夠反對或阻止的。中央社會部改為中央調查部，領導權轉入周恩來和楊尚昆之手。康生在一九五六年以後復出，然而還是沒有實質性的權力。康生一再嘗試染指中央調查部，但李克農及其繼承人孔原都不配合。康生常發牢騷說：「現在我同中央調查部的關係就是《書報簡訊》的關係。」

直到毛澤東向赫魯雪夫宣戰，康生的機會才重新降臨。他向毛澤東表示：「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心領神會，回答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⁸康生從這次的《劉志丹》專案組開始，重新找回來毛澤東左膀右臂的良好感覺。

毛澤東投桃報李，送給他「光榮的反修衛士」稱號。副總理習仲勳、經委副主任賈拓夫、小說作者李建彤的丈夫、劉志丹的弟弟劉景範、小說人物的原型都遭到專案組的審查，康生則是專案組的主任。一九六三年五月，專案委員會提出了〈對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結論是小說「偽造黨史」、「把毛澤東思想說成劉志丹思想」、「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勳」等一系列罪狀，是為「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製造黨篡國的輿論，後來又上升和擴大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這次事件從技術上講，可以視為文革的預演，特殊之處不在於殘忍，而在於把老幹部列為主要打擊目標，而陝、甘、寧老區的上萬人也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黑爪牙」。

這次事件從政治上講，可以視為整風運動的補課。毛澤東在史達林活著的時候，只敢摸摸史達林的靴子，現在終於鼓起勇氣，把靴子拿在手裡玩，然而直到生命的最後一

7 該小說由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著，一九六二年被誣指為反黨小說。大量中共幹部因而牽涉在內，該事件前後共株連迫害萬人。一九七九年該案平反，被稱為「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亦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聲。

8 此事發生於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第一天。他們所指的就是《劉志丹》。

刻，都沒敢把腳伸進去。紅太陽的謹慎或怯懦大概是明智的，因為康生雖然沒有周恩來那樣可怕，但終究不是雅果達或葉若夫⁹的遠東版。尤其重要的是，由於路徑依賴的緣故，毛澤東永遠不會變成史達林的遠東版本。蘇聯的幹部黨是史達林一手締造的，毛澤東則是幹部集團形成後從外圍竄起的。毛澤東及其繼承人能夠修改紙上的歷史，但是仍然不得不生活在真實歷史造成的後果當中。

毛澤東只要拿起靴子，對康生就已經足夠了。文革一開始，中央調查部的戰火立刻就燃燒起來。較之老特務和老特務之間的火併，紅衛兵的模仿秀簡直像扮家家酒一樣純潔無害。中央調查部部长孔原、副部长鄒大鵬相繼倒臺，蔣介石有理由痛恨的大批匪諜紛紛前往他們該去的地方¹⁰。如果康生真是國民黨特務，那他確實沒有辜負黨國的不殺之恩。即使戰國俠客和日本浪人的臥薪嘗膽，都不可能比他的清洗更加經典了。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如果能有一「康老二·四指示」¹¹十分之一的惡毒，文革就永遠不會有產生的機會。文革後的平反昭雪，在偽造歷史方面實在比毛澤東和康生更為惡劣。康生的妻子曹軼歐¹²後來說：「這次中央全面地否定文革，把許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和檔案全部毀掉，他們是利用給一些人平反之機毀掉材料和檔案的。這太可惜了。我為什麼要給你談這些東西呢？因為我不談，今後就沒有人會如此全面地瞭解這起史無前例的革命的

整個過程和來龍去脈了。僅僅憑文獻和文件及會議上的講話是遠遠地不夠的。」（師東兵〈「應當恢復康生的本來面貌」——訪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遺孀曹軼歐〉）

文革對毛澤東而言，已經太晚了。他太老了，沒有精力像二十年代的史達林一樣培

9 雅果達（1901-1938），蘇聯政治人物，曾擔任內務人民委員，在史達林的授意下，雅果達發動了大清洗運動，一九三八年被槍決。葉若夫（1905-1960），蘇聯的祕密警察首腦，也是史達林大清洗計劃的主要執行者之一，後在政治運動中失勢被處決。

10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因為孔原三十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最瞭解康生在共產國際工作時期緊跟王明、帶頭呼喊「王明同志萬歲」那段歷史。在孔原靠邊站後，康生攻擊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長鄒大鵬是東北反革命叛黨集團「高老莊」的重要成員。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康生在深夜給鄒大鵬打電話追問他的歷史問題和反革命叛黨集團的關係，達一個多鐘頭。隨後，鄒大鵬夫婦自殺身亡。從一九六八年開始，康生取代周恩來，實際上主管中央調查部的工作。

11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向中央調查部發出了一個被造反派稱之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這個指示全面否定了建國以來中央調查部的工作。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月兩個月內，康生授意和安排了幾個黑名單，將百分之六十五的中共八屆中委定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和「有政治歷史問題」者，將百分之六十二的中共八屆監委委員定為「叛徒」、「特務」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將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三屆人大常委委員和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定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國特」、「裡通外國分子」等。

12 曹軼歐（1906-1989），原名曹蕙芬、曹淑英，曾用名林康、林娜，康生的第二任妻子。一九二七年同康生結婚。一九四九年曾任中共山東分局組織部副部長。「文革」中為康生辦公室主任。文革中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是在她的奔走授意之下出爐的。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被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後被開除黨籍。

養班底。江青則永遠改不掉文藝界的泡沫習慣，永遠分不清權力的表象和權力的實質。在康生這樣的老特務眼中，他們就是一群孩子。曹軼歐說：「姚文元的文章寫得很好，很有論戰性，也有一定的水準。缺點是他的知識太雜而不精。……康生曾經跟我說：『姚文元除了能寫寫文章，其他的政治經驗並沒有多少。這樣的人抬得太高對他對黨並沒有多少好處。』後來的事實果然證實了這一點。後來江青就是在文化界和文藝界找一些秀才、演員充任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這不行呀！他們怎麼能有治理國家和從事政治鬥爭的經驗呢？……毛澤東……儘管對江青一再培養和鍛鍊，但是在用人問題上恰恰沒有把他自己的精髓傳授給江青。那就是必須在軍隊裡有自己可靠的力量和隨時應變的措施。」

（同上）

這些孩子們的背後，幾位風燭殘年的馬基維利主義者焦急地期待對方的死亡。毛澤東盯著周恩來，周恩來盯著康生。康生唯恐落到李士群¹³的下場，連醫生開的藥都不肯吃。他臨終前最後一件事，就是把江青和張春橋叛變的黑材料交給毛澤東和周恩來¹⁴。其他人以前提出類似指控的時候，他曾以特務專家的權威保證兩人沒有問題。顯然，他現在確定文人左派必敗無疑。他或許正確地預見到，毛、周二人，就像相愛相仇的夫婦，直到生命的終點都無法鼓起撕破面具的勇氣。他或許沒有把握判斷誰勝誰負，只想兩頭

下注以保證自己死後的歷史地位。他當時即使注意到鄧小平或胡耀邦，也只會把這些人當成周恩來陰影中的無名小卒；正如他計算江青和張春橋，只能假定他們將會服從毛澤東的遺囑。

康生雖然機關算盡，但他對身後的希望還是落空了。他知道太多的黑材料，幹了太多的髒活。如果他被定義成好人，就有太多的人只能定義成壞人。毛澤東早就預見到這一天，曾經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有人對康生同志不滿，那是他們怕康生同志。康生同志是我們黨的活檔案。他所經歷的各個階段，都對我們黨的建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建國前的審幹，我們沒有多少文字的記載，主要靠像康生同志這樣的人來提供資料和證

13 李士群（1905-1943），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接受特務訓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後叛投國民黨，

抗戰期間以中統中尉情報員身分投奔日方，主持籌建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的工作，最後被特高課毒死。

14 一九七五年八月，病入膏肓的康生對毛澤東身邊的王海容、唐聞生說：我恐怕不久於人世了。有件事總放不下，請你們轉告主席。江青、張春橋兩人歷史上都是叛徒。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是江青讓我看的。你們可以找兩個人去瞭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他們可以證實江青、張春橋是叛徒。他還說，這事他在延安的時候就已經清楚，但一直沒有向中央和毛澤東反映。王、唐把此事告訴了章士釗的女兒章含之。同年十二月，康生突然提出要到醫院去看望同樣久病不起的周恩來。救護車開進院子，躺在擔架車上的康生吸著氧、輸著液，掙扎著與周恩來單獨在房間密談了一個小時。偶爾進去的醫護人員聽到，他們在談論江青、張春橋的叛徒歷史。康生要周和他一起寫報告給毛澤東，周認為康生作為中央副主席，完全可以單獨給毛寫報告。

據。於是，有人千方百計地要打倒康生同志，我們不要上這些人的當。」根據紅太陽的語言習慣，這些句子可以翻譯成：「康生你聽好，沒有我，你是活不長的。你看看，大家都想吃了你。你要努力維護我，那是為了你自己呀……」

「四人幫」被抓起來將近一年，但康生的問題還是沒有揭露出來。葉匡政主編《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裡面提及，一九七七年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工作時說：「現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幫』，黨校也不能例外。」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康生的問題才逐漸被以小字報的形式被「揭發」¹⁵。一九七八年底，中央黨校和中央組織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點名誣陷的幹部名冊。這個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點名誣陷的共六百零三人。而最終，康生終於被判決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

《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裡面的內容，即使對最缺乏歷史理解力的讀者，也不需要太多的翻譯。《汙點證人誘供指南》如果需要案例，可以全文照錄。當你的證人知道應該揭發，又不知道揭發的正確內容時，你就應該這樣教他們說話，同時解除他們不必要的顧慮。有些真正的罪行是不該說的，有些不存在的罪行是應該說的。有些罪行

分散在許多非典型人物身上，不如集中在少數典型人物身上，才能更好地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有些罪行應該由受害者或犧牲者負責，因為兇手太多了，不應該讓人民對社會的光明面失去信心。有些犯罪應該交換情節，以便提升或降低反面人物在劇本中的階級地位。如果家裡的魚沒有了，而你又沒有養貓，你就可以說是狗狗吃的，因為許多人發誓說狗狗喜歡跟貓打架，而你養的鳥又沒有事，如果貓狗聯盟不是已經潛伏下來，怎麼可能把假象做得如此完美呢？你學會做以上所有的工作以後，就有資格做人民、正義、良心和真相的最忠實朋友了。

15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哲學教研室幾個同志經過商量，派一個同志去見馮文彬（時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請他徵求胡耀邦同志意見，不同意他們貼揭康生蓋字的小字報。……當天中午，馮文彬經過徵求耀邦同志意見，回答這位同志：『耀邦同志講了，貼康生的小字報這件事，我們既不提倡，也不反對。』這位同志高興地說：『這個態度就是對我們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極大支持。我們決定貼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來，責任完全由我們來負。』下午，由韓樹英、吳義生、盧俊忠、毛衛平等五人署名的第一張揭發康生的小字報貼出來了。標題是：（××××（指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執行的是一條什麼路線？），主要揭發所謂『康老路線』與江青（『四人幫』）路線完全是一丘之貉。這張小字報有意貼在十六樓一層走廊西頭南牆上。幾小時後，接二連三又有人寫小字報，挨著第一張小字報往東貼，第二天、第三天……陸續又貼了幾十張小字報，小字報從十六樓的一層南牆轉到北牆，轉上二層的樓梯，再轉到二層走廊南牆、北牆，再轉上三層的樓梯，到三層以後轉入會議室。觀者絡繹不絕。胡耀邦抑制不住內心的高興，對身邊的秘書梁金泉說：『聽說十六樓貼了揭發康生的小字報，好得很呀！咱們去看看。』梁秘書勸他不必去，說小字報底稿都會收集上來的，可以看到全部內容。」

忠實的朋友最終總會記住，如何體貼大家的感情，節省大家的腦力：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野戰軍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各人民團體黨組：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和關於謝富治問題的審查報告，已經中央政治局討論批准，現轉發給你們。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康生、謝富治進行審查以後，一年多來，中央紀委做了大量工作，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謝富治兩人，政治品質表現惡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現在中央決定把康生、謝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黨公佈，同時撤銷對這兩人的〈悼詞〉，並決定開除他們的黨籍。全黨同志都應當從康生、謝富治的問題上汲取教訓，以康生、謝富治為戒，認真地執行《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增強黨性鍛鍊，注意品質修養，做真正合格的共產黨員，共同努力嚴肅黨紀，搞好黨風，把我們的黨建設好。

此件和關於康生、謝富治的兩個審查報告，可先傳達到全體黨員，經過適當時間再向黨外宣佈。

兩個審查報告各有七個罪證附件，因為很多內容涉及黨和國家機密，這些附件只發給省軍級參閱，不再往下傳達。

中共中央

一九八零年十月十六日

一八、黨的化身

——周恩來



周恩來（1898-1976）出身於移民淮安府的紹興師爺家庭。師爺文化代表士大夫文化的陰暗面。士大夫教育強調正色立朝，匡正朝廷的濫權和腐敗。士大夫教育的失敗者很容易相信、而且說服社會相信：他之所以失敗，原因在於社會太黑暗。師爺教育強調辦實事不擇手段，主要職能就是為士大夫辦理那些違背儒家倫理、然而對於帝國秩序和主官前程必不可少的灰色事務，自始至終不能指望分享儒家的道德操守和自我陶醉。師爺教育的失敗者除了承認自己無能以外別無選擇，社會對待不夠精明能幹的壞人是毫無憐憫的。周恩來後來回憶說：「我的家庭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都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我們沒有土地，為什麼說是封建家庭呢？過去紹興人靠什麼為生？一靠土地，二靠當紹興師爺。師爺很厲害的，給縣官出主意的，現在叫『秘書』。縣官都用兩個師爺，一個管收稅，

多數是滄州師爺（滄州師爺也是由紹興遷到滄州定居的），一個管判案子，多數是紹興師爺，都可以剝削人。」他父親周邵綱（1874-1942，原名周貽能，後改名邵綱）在師爺的學業方面完全失敗，只得滿足於零零散散的差使，常年為族人所輕。周恩來剛剛出生，就過繼給早逝的叔父周貽淦為嗣，由守寡的嗣母陳氏撫養。他年齡不到十歲，生母和嗣母就都去世了。他在族中無依無靠，自然養成陰柔、敏感、隱忍的性格。

一九一零年，周恩來的伯父周貽賡（1872-1933，周恩來的大伯父）北上謀職。東三省總督衙門當時正在試辦新政，空缺較多。周家通過未來的國務總理錢能訓，覬覦稅吏的差事¹。這個無人需要的孩子跟著長輩，第一次走出了家門和私塾，在奉天和天津領略了剛剛起步的新式教育。模範學校模仿日本學制，吸引了大批滿洲富人的子弟。稅吏的社會地位雖然不高，但灰色收入相當豐厚。周恩來從此穿上了明治風格的校服，戴

¹ 錢能訓（1869-1924），浙江嘉興人，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進士，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任國務總理。他是周恩來三伯父周濟渠的第二任妻子錢馥蘭的哥哥。周恩來六歲時，錢能訓曾多次去周家做客，幾次輔導周恩來的書法。一九零九年，淮河發大水，衙門裁員，周濟渠去東北投奔時任奉天右參贊的錢能訓。錢能訓安排他到鐵嶺任稅捐局主事，兼管鐵嶺的礦務。同年秋，周濟渠奉命去湖北賑災，時在東北奉天的周貽賡委託他順道回淮安老家，把十二歲的周恩來和時在武漢的周恩來父親周貽能一起帶到東北。周貽賡也是利用周濟渠與錢能訓的姻親關係在東北謀到差事，當時已在奉天度支司任司書（相當於今天的財政科會計）。

上了大簷帽。師爺的基本功包括代上級草擬公文，這對少年周恩來的學業頗有幫助。他的作文〈東關模範學校第二週年紀念日感言〉堪稱民國秘書公文體的經典²，因為這些公文的作者都是周恩來的同類。新式教育未能產生西方式的社會，卻降低了畢業生的階級地位。大清的優等生直接做官，民國的優等生只能給並非考試產生的官員做秘書。

一九一三年七月，周恩來畢業。同年八月，他考入南開中學。一九一七年畢業後，他留學日本。由於日語成績太差，報考的幾家學校都不肯錄取他。他寫信給國內的同學說：「弟現預備日文，無大困難。所難者懶病時發，不肯向書堆裡求快樂，是為病耳。官費考試在明夏，屆時背城一戰，十有九必敗。緣來此日文程度一年，用功者可保考入。若弟優游性成，誠難有把握矣。」他在這方面酷似李大釗，精力主要用在留日同學會和基督教青年會的合縱連橫上面。顯然，他真正的興趣在於政治活動。預備性質的政治活動即使在沒有直接利益的情況下，對他仍然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這種人是不適合讀書的，因為誰在違背自己內心渴望的情況下都不可能發揮最佳水準。他明白這種生活方式的下場，在日記中寫道：「這叫做自暴自棄，還救什麼國呢？愛什麼家呢？不考取官文學校，此羞終不可洗。」幸而南開在此時決定開辦大學部，准許南開中學的畢業生免試入學，才挽救了他的面子，然而老虎即使從小像兔子一樣養大，一旦嘗到鮮血的滋味以

後，就不可能回去吃草了。他在南開大學同樣荒廢課程，集中精力搞學生運動，結果被學校開除。

國民黨作為學生運動的主要唆使者和受益者，不會虧待在鬥爭中湧現出來的先進分子，一九二零年代的勤工儉學運動源於國民黨文化左派和共產國際歐洲代理機構的合作，共產國際的目的則是為下一階段的遠東滲透培養職業革命家。一九二一年，周恩來毫不意外地在巴黎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二年，他出任歐洲支部書記。周恩來的主要任務就是借用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³推動勤工儉學的合法外殼，在國民黨的培養基地內部建立共產國際的培訓網絡。他在此後的四年內，頻繁奔走於柏林和巴黎之間，一面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一面將黨團骨幹分子送往莫斯科學習深造。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他護送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熊雄等十二人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同年十一月，他又選送劉伯堅、李合林等十餘人赴蘇聯培訓。葉劍英、朱德、聶榮臻、蔡暢、

2 這篇文章當時就獲得了模範作文獎，收入著名教輔書《學校國文成績》（上海進步書局）和《中學生國文成績精華》（上海大東書局）。

3 李石曾（1881-1973），清末重臣李鴻藻之子，國民黨元老，最早留學法國。

陳毅、郭隆真、李立三、李維漢、鄧小平、李卓然都是他發展的黨員，莫斯科對他的工作非常滿意。一九二四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季米特洛夫命令他回廣州參加革命。鄧小平和李富春接替了他在歐洲的任務。北伐以後，他在歐洲培養的舊部陸續滲入遠東。這些人和他在廣州革命政府培養的幹部合流，構成了遠東各支部未來數十年的核心和骨幹，沒有任何人能夠取而代之。

廣州國民政府的實際首腦鮑羅廷接到季米特洛夫的信函，立刻委派周恩來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前任戴季陶和邵元沖都把自己的角色理解為思想教育和理論指導，對組織工作無所作為。蔣介石校長對他們的消極態度很不滿意，希望周恩來迅速扭轉局面。事實證明，周恩來沒有讓他失望。周恩來根據蘇聯紅軍的經驗，建立了校軍教導團，將每週政治學習規範化，將連坐、監視、告密體系深入到基層。蔣介石東征陳炯明途中，周恩來的政工部門又發揮了協助徵發民伏和物資的任務。黃埔學生為骨幹的第一軍成立後，周恩來以少將軍銜出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蔣介石作為國民黨左派的新銳，多次公開宣稱周恩來和鄧演達是他最得力的左膀右臂。黃埔學生軍是黨軍的實驗，隨後就向各軍推廣經驗。《政治週報》宣稱：「革命軍與別的軍隊的最大不同點，就是他軍隊內的政治宣傳，這是革命軍打勝仗的根本原因。這種政治宣傳工作，在平時要緊，在

戰時更發要緊。在戰時要使人民與軍隊合作以協力對付敵人，全靠這種工作做得好。」
（毛澤東主編的《政治週報》第三期刊登的〈東征紀略〉）

總體戰從此降臨東亞，習慣軍民分離的老派人無所適從。政工部門的權力凌駕於軍官和地方官之上，通過黨組織和群眾組織將他們完全架空了。蔣介石出力，周恩來摘桃。學生軍趕走了陳炯明，預演了塔利班對馬蘇德⁴的勝利。周恩來跟在蔣介石的背後，成立了中共潮梅特委（後來的汕頭地委），籌備革命新區的黨建工作。黨建工作一旦完成，社會重組就要次第展開。舊式的地方精英和民眾習慣於統治者來來去去，誰都不會變更地方秩序，現在才發現大禍臨頭，然而為時已晚。周恩來解散了「劣紳」（也就是革命者無法統戰的工會領袖）把持的各工會，將地方報紙《平報》改組為《嶺東民國日報》，強迫各商會預徵房租資助革命軍，將黨員派進各地司法機構，配合黨部領導的群眾組織揭發人，

4 馬蘇德是阿富汗的塔吉克名門望族，一九七九年蘇聯發動阿富汗戰爭。馬蘇德率領游擊隊展開抵抗運動，一九九二年阿富汗戰爭結束，內戰爆發。在南部塔利班勢力的步步緊逼下，馬蘇德游擊隊在一九九六年被趕出首都喀布爾。二零零一年，死於蓋達組織的自殺性爆炸。

上演人民檢舉和人民審判的滑稽戲，不出半年就從土豪手中榨取了袁世凱和陳炯明在民初十年都沒有得到的鉅款，為下一階段的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和卓越的示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一九三六）

革命政府在粵東的舉措，促使大批難民逃入英國保護的香港，也刺激香港本土的華人士紳組織民團，協助大英帝國維持地方秩序或反革命秩序。香港華人社會政治意識的覺醒，周恩來和蔣介石功不可沒，而且不是最後一次。沒有及時逃走的人，不久就要在革命的下一階段，通過分吃人肉，證明自己對革命的忠誠。陳炯明苦心經營的粵東自治模範區，一度同時得到西方傳教士和蘇聯黨代表的讚美，就此毀於一旦。

革命陣營決定重演五卅事件⁵的佈局，考驗大英帝國維護遠東秩序的決心。周恩來率領的東征軍兩個營、學生軍一個營共兩千餘人脫下軍服，以「革命群眾」的名義入侵沙面英租界。如果英國人抵抗，就算是帝國主義屠殺無辜平民。如果英國人不敢抵抗，便衣兵就會占領租界。革命政府無須承擔撕毀國際條約的罪名，就能在事後驚訝地發現英國人「自願放棄」了條約權利。英國人堅定地還擊，當場擊斃了五十多名便衣兵，包括一團三營營長曹石泉（共產黨員）也中彈犧牲。周恩來僅以身免，身邊的衛士都被打

死⁶。所謂的「沙基慘案」拯救了香港殖民地，正如所謂的「五卅慘案」拯救了上海自由市。鮑羅廷知難而退，聲稱直接對抗只會讓革命軍吃虧。蔣介石在獲得了蘇聯追加武器援助的保證以後，勉強接受了蘇聯的要求，暫時滿足於在日記裡天天痛罵帝國主義。

（《鄧穎超談話錄》，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月版，第四十二頁）

蔣介石很高興周恩來為他清掃道路，直到他發現戴季陶的黨羽和周恩來的黨羽開始在黃埔軍校內部出現了對立衝突。蔣介石是個缺乏思辨能力的軍人，一開始只能像傻瓜

5 一位參加過五卅罷工的老工人回憶說：「在四個月的罷工中，我們得了不少罷工補貼。我們想：『不上班也能拿錢，真是大好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檔案）省港大罷工期間，「一個工會一成立，立即派檢查小組或者宣傳小組進行爭取會員的工作。搞宣傳的人所帶的不是宣傳品，而是各拿一根又粗又長的木棍，如有工人不願意加入工會，他必將受到木棍的棒打，因為工人們加入工會之後，他們一方面可以獲得工人的進會費和每月的公費，另一方面又可得到工廠主所給的公共福利費。」（〈廣州工會運動的報告〉，見《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6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示威隊伍按照香港罷工工人、廣州市工人、市郊農民、青年學生、黃埔軍校學生、粵軍警衛軍、黨軍第一旅教導團的順序從東校場出發。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八百多人、黨軍第一團第三營、第二團第二連、第四連、第七連共約兩千人參加。第一排槍響的時候，周恩來走在黃埔軍校學生軍的最前面，與他並肩的一左一右兩人當場被打死。周恩來則迅速匍匐在地，並快速轉入小巷，到後街隱蔽。

一樣不斷呼籲：任何人破壞團結，都是對不起那些在東征中死難的弟兄。這種弱智的處理方式自然壓制不了任何一方，衝突終於發展到影響軍事紀律的地步。蔣介石雖然不會講理論，卻受不了部下不服從命令。他還沒有當上國民黨領袖的時候，很高興周恩來用群眾路線架空和趕走了前輩。他自己當上領袖以後，就開始覺得周恩來的祕密組織分割了他本來可以得到的權威。他最初不想趕走周恩來，只想讓周恩來的黨組織服從軍事長官的命令。任何軍官都有理由認為，雙重指揮系統其實是在幫助敵人。蔣介石首先召集革命軍政人員聯席會議，要求周恩來公佈加入國民黨和革命軍的共產黨員名單。總司令第一次，但不是最後一次信誓旦旦地宣稱：他一貫論功行賞，人人都能看見，絕對不會歧視任何部下。同性戀者如果索取加入美軍的權利，一定會對蔣介石這樣的左派領袖感到滿意，而列寧主義者會怎樣利用粉紅色開明人士的平等原則，那就不用過多解釋了。總之，兩人是註定要反目成仇的。

「中山艦事件」爆發後，蔣介石和汪兆銘公開反目。兩人都指望蘇聯支持自己，而蘇聯代表布勃諾夫決定支持蔣介石⁷。蔣介石自己都承認自己是在賭博，但他賭贏了。他做什麼或不做什麼，對賭局幾乎沒有影響。關鍵因素在蘇聯的內部鬥爭，蔣介石只是在二十年代後期一直運氣特別好而已。布勃諾夫是史達林的人，史達林正在忙於打擊托

洛茨基。二十年代中葉來華的蘇聯特派員往往是托洛茨基的人，包括加拉罕。史達林如果沒有及時捆住他們的手腳，他們早就把蘇聯拖進反對張作霖和日本的戰爭當中了。郭松齡兵變只差一點點就要變成遠東軍和關東軍的東北亞華沙戰役。就當時的力量對比而言，這場戰役很可能把張作霖和滿洲變成遠東的畢蘇斯基和波蘭。因此史達林希望國民黨充當蘇聯的避雷針，托洛茨基希望蘇聯赤膊上陣為世界革命犧牲。史達林的人馬如果反對蔣介石，就會將蘇聯推向托洛茨基希望的路線。（《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三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蘇聯代表一發言，故事的結局就確定了。汪兆銘憤而出走，蔣介石一時接管了廣州革命政府的黨政軍大權。周恩來再也無法拖延，公佈了打入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內的二百五十多名共產黨員身分。其中三十九人得到消息，立刻宣佈退出共產黨。事件的禍

7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四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派中央委員、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來華時化名伊萬諾夫斯基）為首的使團來華，讓他們弄清中國的局勢並報告政治局；同加拉罕一起就地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這些措施不需要政治局批准；整頓派往中國的軍事工作人員的工作。三月，布勃諾夫使團一行抵達廣州。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布勃諾夫為了維護史達林的中國政策，對蔣介石採取讓步措施，撤掉了不受蔣介石歡迎的蘇聯駐廣州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副團長羅加喬夫和拉茲貢的職務。本來指望布勃諾夫會打擊蔣介石的汪精衛大為失望，賭氣稱病。而蔣介石拜訪了布勃諾夫，表示革命更應時時進取，不宜採取保守態度，非速定北伐大計不可。

首李之龍表現最為積極，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的《廣州民國日報》上刊登啟事：「鄭重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有關係的社會團體，以單純的中國國民黨黨員資格，受吾師蔣介石先生指導，以謀三民主義之實現。耿耿此心，尤盼共產黨同志予以原諒。」共產黨從來不以擅長原諒著稱，周恩來直到五十年代還沒有忘記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寫材料證明李之龍確實是叛徒。

蔣介石的運氣還沒有用完。他越來越習慣把自己的任性當作高人一籌的英明和道德，將蘇聯的援助投入了蘇聯並不希望的北伐戰爭。陳獨秀用理論來反對，但拗不過史達林遷就蔣介石的決心。鮑羅廷系統在史達林的支援下，把持了北伐軍的主要工作。然而，上海遠東局集中了維金斯基的班底，更多地保留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執政時期的風格，因為在資源爭奪方面已經落了下風，他們決定在上海複製十月革命，畢竟地下活動和城市暴動才是真正的蘇聯風格。蔣介石和鮑羅廷的軍事行動看上去就很像波拿巴主義，非常符合托洛茨基喋喋不休的熱月路線（即熱月政變）。遠東局將周恩來調到上海，不僅是為了發揮他搞地下活動的特長，尤其是為了暗中維護老近衛軍和世界革命的路線，延緩熱月黨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庸人官僚主義不可避免的和平演變。周恩來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同時也製造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波拿巴主義迎面相撞的危險格局。

如果你用純粹的列寧理論來解釋歷史，四一二事變就是這兩種主義的對決。這就是為什麼史達林需要絞盡腦汁，牽強附會地解釋為什麼蔣介石的勝利應該怪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政策。這些理論即使以蘇聯標準判斷，都沒有絲毫說服力，結果一切責任都推到陳獨秀頭上，儘管或者不如說正因為他沒有決定任何政策。陳獨秀對清黨的責任和江青對文革的責任是差不多的，主要說明了兩件事。第一是弱者永遠沒理，因為有理沒理本身就是由實力和成敗決定的。第二是文人最適合當替罪羊，因為他們最喜歡裝出比實際更重要的樣子。

8 李之龍（1897-1928），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加入中共。一九二四年四月考入黃埔一期，十一月畢業，留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一九二五年十月被廣州國民政府任命為海軍局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代攝局務，並兼中山艦艦長，軍銜晉升為海軍中將。中山艦事件後失去職務，宣佈脫離共黨。一九二八年被殺。一九五一年，李之龍遺孀陳正明、兒子李光慈向武漢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請，要求追認李之龍為烈士。一九五二年九月四日，中南民政務復函武漢市民政局，內稱：關於李之龍是否可稱烈士一案，經周總理、董必武副總理函電證明，及吳德峰同志口頭證明：李之龍於被捕後曾登報申明悔過脫離我黨，出獄後復參加反動集團，在廣州槍斃，為其內部矛盾所致。故不能予以烈士稱號，其家屬亦不能予以烈屬待遇。

9 維金斯基（1893-1953），化名吳庭康，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一九二零年秋被共產國際遠東局派往中國，會見了孫文、陳獨秀等人，組織建黨。他先後六次來華。四一二政變之後，被認定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錯誤，調回蘇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維金斯基和周恩來領導的特務委員會決定恢復紅色恐怖。他們通電討蔣，宣佈錯誤的妥協才是失敗的原因。特務委員會以租界為根據地，重啟黨軍進駐以後暫停的勒索活動，卻未能換回失去的革命高潮。共產國際的內部糾紛和鮑羅廷的嫉妒嚴重妨礙了他們的工作，直到史達林最終戰勝他的所有對手。周恩來趕到武漢，企圖在兩湖地區組織紅軍，但共產國際的撥款出了問題，以致功敗垂成（《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版，第一百一十七至一百一十八頁）。消息洩漏後，汪兆銘開除了武漢國民政府內部的共產黨員。七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加倫、張國燾、周恩來在武漢舉行會議。會議決定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占領南昌，然後立即重返廣東，從海路接受蘇聯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子彈及機關槍缺乏，請電知國際能於外埠裝好貨物，一俟汕頭攻下，在十日內即能運至汕頭方好。」李濟深的廣州四一五清黨比汪兆銘徹底得多，迅速派出陳濟棠的部隊強占汕頭。蘇聯援助還沒有到達，汕頭港口已經陷落。葉挺聞訊，充滿絕望地說：「到了今天，只好當流寇，還有什麼好說！」賀龍聞訊，充滿希望地說：「我心不甘，我要幹到底。就讓我回到湘西，我要捲土重來。」（郭沫若：《革命春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版，第二百二十七、二百二十八頁）

周恩來從海路逃往香港，再從九龍乘船返回上海。他除了組織部和中央特科的工作外，還負責文化滲透，例如替名義領袖郭沫若照料創造社及其刊物。周恩來根據史達林的幹部黨原則處理組織工作和情報工作，蘇聯培訓的幹部、軍官和情報人員都由他分配調遣。他在蘇區周圍各縣建立一批文具店、百貨店、藥店、布店和電器、機械等店鋪，用來向蘇區輸送物資，並作為交通聯絡點，還在上海和武漢建立了軍事培訓、兵運培訓、匪運培訓速成學校。陳賡、康生、李克農、顧順章、錢壯飛都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同時參加了協助徐恩曾和戴雨農組建中統與軍統的工作。共產國際的地下組織比國民黨的地下組織資格老、資金多、技術強，一直是後者的教師和模範對象。雙方在反對帝國主義和上海資本家、滲透和統戰滿洲軍政機構兩方面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產生了既長期合作、又殘酷鬥爭的微妙關係。雙方在上海黑社會的羊腸小道上，經常共用和交換金錢、資訊、線民和情婦（共產國際的賬單包括專門的情婦開支項目）。周恩來作為他們的領袖，首先跟施存統和張太雷分享情婦王一知¹⁰，然後又跟理查·佐爾格分享情婦張

10 王一知（1901-1961），原是中共成立時東京小組施存統的夫人，後來與張太雷同居。張死於廣州暴動，王一知長期受周恩來的特別照顧。張國燾夫人楊子烈親眼見到鄧穎超打過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到侮辱。

米夫¹²接管遠東局的工作以後，將他的學生王明推上了中國支部的領導位置。新中央準備進駐贛南，首先派周恩來和李克農去蘇區清道，揪出混入革命內部的小資產階級（富農）路線支持者（例如毛澤東）和軍閥主義者（例如朱德）。他們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將毛澤東打入一生的最低谷。周恩來以蘇區中央局書記名義攝政，直到博古和張聞天進駐贛南。毛澤東見勢不妙，立刻知趣地病倒，躲進了傳教士留下的長汀醫院，在此後的兩年內寫了無數檢討。周恩來接管了他交出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決定饒他一命。其他共產黨員對這種違背列寧主義原則的寬容極不滿意，紛紛要求置毛澤東於死地。項英表現尤為激烈，指出毛澤東的富農路線和他的思想意識不可分割：他不懂馬克思和列寧，只懂《三國演義》和《金瓶梅》。毛澤東後來悻悻然地回憶說：「那時候不但沒有一個人上門，一個鬼都沒有。」其實他心裡明白，應該感謝周恩來，因為處在他那種處境的大多數人，本來應該是沒有一個人上墳才對。項英並沒有看錯毛澤東，他確實是農民小知識分子：擅長以妾婦之道事人，效忠／認罪／喊冤／叫屈都是表演。他後來抱怨史達林愛蔣介石超過愛他，也是同樣的口吻，意思相當於女人說男人不關心我，只代表索取更多照顧的希望，不能從字面上理解。

蔣介石和史達林的談判、遠東局的解散、紅軍的西竄發生在同一時間段，都是史達林推行「人民民主」新戰略的一部分。史達林本人後來得意地教導毛澤東，人民民主乃是最新的欺騙手段，對付那些渴望上當的資產階級¹³。新政策最終解散了共產國際這樣

11 周恩來在上海時，還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張文秋，又名張一萍，她是專職性「住家主婦」的女同志。周恩來這樣重要的領導人，當年在上海的住家不止一處，張文秋就是其中一個住家主婦。後來張文秋被共產國際情報組在上海的代表佐爾格看中，周恩來就把張文秋派給了佐爾格，佐爾格又把張文秋讓給另一個德籍助手（中文名吳照高）。她的名字出現在共產國際的專職情婦薪水冊上。專職情婦在遠東局的地位類似孫二娘在梁山中的地位，只是除了開店賣包子和發送情報以外，還要負責給她招待的情報人員提供臨時女管家服務和臨時情婦服務。

12 米夫（1901-1936），一九二八年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參加中共六大。一九三零年至上海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次年將王明等人安排進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年回國。一九三九年死於大清洗。

13 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七大期間，史達林開始預見到納粹是蘇聯面臨的現實威脅，試圖在民主國家中尋找盟友。據南斯拉夫駐共產國際代表米洛凡·吉拉斯的回憶，史達林解散共產國際的想法首先是在「巴爾幹國家正在與蘇聯聯合起來」的時候；我們不應當「害怕」英國，為了不讓他們覺察到南斯拉夫正在發生一場革命或者正在被共產黨人努力控制，我們應當避免任何打草驚蛇的舉動。史達林後來教導毛澤東學習「人民民主」。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給史達林的電報中說：「在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階段，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例子，除了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當離開政治舞臺，這將極大地加強中國革命。」史達林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的電報中說：「我們認為，代表中國人民的中間階層，並反對國民黨集團的各種反對黨將要繼續存在很長一段時間。為了反對中國的反動力量和帝國主義力量，中共將不得不加入到他們中間以尋求合作，但要對他們進行控制。……」（這）意味著現在不實行對所有土地進行公有化、廢除土地私有權、沒收所有從小到大的工商資本家的財產、沒收不僅屬於大土地所有者而且也屬於雇工的中小所有者的土地。這些改革只能留待以後。」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毛在給史達林的電報中坦承了「左傾傾向」的錯誤，並告訴史達林，這些傾向「已經被徹底地改正了」。

赤裸裸的顛覆機構，遠東局自然落到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下場。新政策要求歐洲各國共產黨加入社民黨、激進黨等進步勢力主導的人民陣線，共同對付更加可怕的希特勒同志，為蘇聯充當人肉盾牌。國民黨顯然就是這一政策遠東部分的社民黨，抗日統一戰線顯然就是遠東的人民陣線。上海中央和贛南蘇區作為遠東局的下屬機構，理所當然要隨著遠東局一起犧牲。蔣介石如果真正理解史達林的行為模式，就會明白史達林已經把遠東支部作為見面禮送給他，賄賂共產黨接受蘇聯和國民黨的抗日聯盟，在日本人面前扮演「向我開砲」的自殺英雄，即使中國共產黨人在此期間全被殺光，史達林也不會覺得比犧牲希臘和波蘭共產黨人更心疼。然而，蔣介石總是以己度人。他以為史達林會關心自己的人質部下，猶如他自己關心蔣經國，放共產黨一條生路，能夠在中蘇關係方面發揮不亞於蔣經國回國的正面影響。他把這種動機體現在軍事部署，連陳誠這樣的嫡系都看出其中奧妙，自然不能責怪李宗仁、白崇禧之流沿途防水。史達林由此看清了蔣介石的小資產階級軟弱本性，以後就不斷用恨鐵不成鋼的教育口氣對他說話。

周恩來和大部分共產黨人已經認命，準備服從史達林的安排，把自己當成死人。毛澤東突然拿出三國、水滸的流氓手段篡奪權，本來不會有什麼成功機會的，但沒有人會為自己剛剛扔進垃圾箱裡的廢品跟拾荒者打架，死人更不會反對強盜剝掉自己的衣

服。張聞天和周恩來在整個西竄期間，地位一直高於毛澤東，但他們已經沒有什麼辦法了，只有像行屍走肉一樣跟著走，直到在瓦窯堡恢復了蘇聯和上海的聯繫。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特殊關係從此確定。毛澤東知道周恩來是蘇聯的人，而且始終敬畏蘇聯的秩序。毛澤東自己不太喜歡蘇聯的秩序，但他根本離不開蘇聯的資源。他對周恩來採取了一面控制、一面分化的政策，用劉少奇分化周恩來在組織系統的力量，用康生分化周恩來在情報系統的力量。只要史達林承認他製造的既成事實，他就無須擔心周恩來反撲。周恩來很快理解了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安排，及時拋棄了王明。

這時，張學良給周恩來送上了一份大禮。他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接替馮玉祥在西北的地位。滿洲的財政體系高度依賴以正金銀行為核心的日本——朝鮮金融體系，習慣豐衣足食。流亡關內的東北軍依靠蔣介石零零碎碎的補給，痛感今不如昔。只有蘇聯才能填補日本留下的空缺，張學良天真地以為自己不會比馮玉祥差。他居然沒有想到：在史達林的心目中，他永遠是張作霖的兒子。史達林僅僅出於謹慎，就不可能信任他。周恩來明知史達林的懷疑態度，還是故意讓張學良覺得西北聯合政府大有希望。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周恩來和李克農帶著電臺向延安進發。四月九日，他們和張學良在延安城內一座教堂內會談。會談的結果就是著名的西安事變。張學良起兵以後才發現：史達林非

但沒有同意接納他，而且還懷疑他在日本唆使下破壞蔣蘇聯盟。張學良發現上當，但已經為時太晚了。周恩來不再理睬這個喪失統戰價值的對象，趕到杭州跟蔣介石談判。蔣介石已經跟史達林達成默契，因此態度異常爽快。他希望兩黨永久合作，即使在他死後也不分家，以免給英、日帝國主義以可乘之機。共產黨可以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行政區可以是整個的，但須由中共推薦一個南京方面的人來做正的，「以應付各方」，副的以下均歸中共，並由中共自己幹，他不來干涉；軍隊人數不同中共爭，總的司令部可以設，他絕不來破壞紅軍部隊，只是聯絡而已；糧食接濟定額設法解決。蔣介石設想的永久合作方案，比廣州革命政府更有利於蘇聯及其下屬，實在沒有理由抱怨史達林暗算他。「一、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量之幹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二、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後執行。關於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三、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四、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可與第三國際發生代替共黨關係，並由此堅定聯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間之聯合。」（〈中共中央關於與蔣介石第二次談判情況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

無論如何，周恩來得到了他需要的一切。統一戰線翻譯成正常人的語言，就是：我

的東西都是我的，你的東西都是我們大家的。後來越南共產黨用同樣的手段對付美國人，季辛吉總結如下：共產黨的意思是首先要成立聯合政府，然後才能談判；談判一方是共產黨自己為一方，另一方則是自己領導的聯合政府，談判的內容只限於聯合政府怎樣將權力移交給共產黨。顯然，革命在統一戰線成立那一天就已經勝利了。後面發生的一切，只是技術問題而已。蔣介石極其遲鈍，沒有意識到自已已經是死人了。皖南事件發生後，蔣介石聲稱自己在執法。毛澤東卻理所當然地說他在造反，因為他破壞了統一戰線直通車的節奏，正如彭定康的直接選舉計劃破壞了香港和平解放的節奏。

史達林最初指定王明負責統戰工作，參照西班牙人民陣線保衛馬德里的模式，啟動以共產黨為人肉盾牌的「保衛大武漢」活動¹⁴。毛澤東發揚鴻門宴精神，通過瘋狂而肉麻地同時討好史達林和蔣介石，說服兩位上級調走了王明，把權力分給周恩來和劉少奇。王明一走，他就可以拿出「能做不能說」的三國誌祕訣了。毛澤東正確地估計形勢，周恩來不能清除。一方面因為他掌握國際共產主義的寶貴管道，共產黨能勝過國民黨就是

14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聯名在《新華日報》發表〈我們對於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問題的意見〉，號召發揚西班牙人民保衛馬德里的精神保衛大武漢。

依靠這些管道。另一方面因為黨內的幹部大多數都是他培養的，毛澤東沒有足夠的班底將他們全部替代。抗戰奠定了毛、周關係的基本格局：既限制，又利用。其實，這也是周恩來主持統戰工作的基本原則。

一九四零年，周恩來藉養病的機會赴蘇聯。他向季米特洛夫、哥德瓦爾特、庫西寧、曼努伊爾斯基、拉科西、野坂參三主持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匯報了中國共產黨的近期工作，實際上是說明了王明已經一敗塗地的事實，建議大家接受毛澤東的野路子。季米特洛夫表示高度懷疑毛澤東的馬列主義成色，但信任周恩來同志在現場做出的判斷。周恩來是自己人，習慣用蘇聯的語言說話。毛澤東不是自己人，隨口引證東方歷史人物的說話方式就會刺激排異反應。最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做出了〈關於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季米特洛夫親手將文件交給周恩來，告訴他決議是史達林本人審定的。撇開黨八股，決議的政治意義就是共產國際承認了毛澤東的地位。毛澤東如果沒有留用周恩來，能不能過關是很成問題的。一九四零年二月，蘇聯派專機送周恩來、任弼時、岡野進（日本）和阿里阿罕（印尼）回東亞。飛機途經新疆和陝甘，沿路的國民黨人像接待欽差大臣一樣畢恭畢敬。頭腦清醒的內亞首領一直都懂得蘇聯才是他們真正的保護人，不亞於張景惠（1871-1959，奉軍老將，曾任滿洲國內閣總理）和滿洲土豪對待日本人。只有重

慶的蔣介石生活在自己的夢想世界中，不斷犧牲自己為數不多的忠僕和朋友，以便維護東亞最高領袖的假象。委員長像許多缺乏實力的政治家一樣，越來越沉溺於道德感召力的自我陶醉。他甚至含情脈脈地告訴周恩來：「抗戰四年，現在是有利時機，勝利已有希望，我難道願意內戰嗎？願意弄坍臺嗎？現在八路、新四還不都是我的部下？我為什麼要自相殘殺？就是民國十六年，我們何嘗不覺得痛心？內戰時，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難過。」周恩來當場表示非常感動（他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第二天就召集部下，籌備秘密活動委員會。

英、美加入對日統一戰線，蔣介石一度非常得意。周恩來的快樂不亞於他，而且依據更加充分。共產黨如果遭到國民黨的屠殺，一向很難指望史達林的同情。蘇聯的邏輯是：如果你失敗了，那就說明你錯了；如果你犯了錯誤，那就說明你有罪。主觀惡意作為犯罪要件的必不可少性，在馬列主義者看來純屬資產階級庸俗性和淺薄性的體現。他們作為唯一合格的社會科學家，只承認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必然性，也就是說你的不幸就是你的罪惡。同樣是資產階級專政，赤裸裸鎮壓的威權統治者明顯就比假惺惺民主的軟弱統治者更懂得科學。史達林尊重佛朗哥和張作霖，遠遠超過達拉第¹⁵和蔣介石。蔣介石放走了紅軍，未能贏得他任何感激；殺了新四軍（指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

件），反而讓史達林想起了目無政治紀律的游擊隊個人英雄主義者如何該死。史達林在難忘的一九一九年當政委，槍斃了不知道多少自以為是的紅軍將領，一輩子都引以為榮，現在又拿這話出來敲打興致勃勃的毛澤東。

毛澤東明顯不瞭解蘇聯，天真地以為蔣介石這次造反一定會得罪史達林，興高采烈地制定了聯合日本人進攻重慶的偉大計劃，結果碰了一鼻子灰。這件事說明他對周恩來的信任和利用都非常有限，因為周恩來絕對不會向莫斯科提出這樣愚蠢的三國誌風格的方案。史達林刻薄地宣稱：槍斃游擊英雄是件好事¹⁶。這個頭銜在共產國際的宣傳體系中僅僅適用於毛澤東和朱德，從來沒有用在周恩來和劉少奇這種合格的列寧主義幹部頭上。史達林對蔣介石的評價明顯提高了，甚至體貼地提醒委員長殺人還不夠多¹⁷，為了消除層出不窮的背叛，應該學學他自己的榜樣。不過蔣介石明顯地暴露了自己沒有能力領會大元帥的深刻智慧，史達林的心血來潮很快就過去。

美國人反倒及時跳出來折磨蔣介石，要求他保護哪怕是反賊的人權，當然其中也少不了周恩來無所不在的煽風點火。周恩來依靠美國地下黨員的情報網，掌握的資訊比羅斯福和蔣介石都更多更快，因此能夠搶在國民黨人的前面，向英國大使卡爾和美國總統

代表居里提供國民黨的黑材料，聲稱蔣介石的政策將會導致統一戰線的分裂，客觀上有利於日軍南進（周恩來致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英國政府接到卡爾的報告，就要求蔣介石不可讓日本人漁翁得利。居里隨後也開始威脅蔣介石：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各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新中華報》，一九四一年三月九日）。他臨走時還念念不忘推廣普世價值：「中國應有自下而上的徹底的民主」（《新中華報》，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教會了周恩來和《新華日報》以後應該怎樣做宣傳。宋子文「甚以此為慮」，加大了保

15 達拉第（1884-1970），激進社會黨人，一九三三至一九四零年間三度出任法國總理。一九三八年他代表法國簽署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給希特勒的《慕尼黑協定》，毀棄了法、蘇互助條約。一九三九年初承認佛朗哥政權。

16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計劃「在政治上軍事上迅疾準備全面大舉反攻」，要周恩來告訴駐重慶的蘇聯大使和蘇聯軍事總顧問，停止接濟蔣介石，「公開援助我們。」甚至發出電報，特別要求「呈交史達林同志，使他能夠估量中國形勢，考慮能否給我們具體的軍事援助」。一月二十一日，史達林在列寧忌辰紀念儀式上的談話中提到新四軍軍長葉挺，稱葉是「一個不守紀律的打游擊的」，「查查看事變是不是他挑起的。我們也有些打游擊的，人是好人，但我們不得不把他們槍斃掉，就是因為他們不守紀律。」二月六日，季米特洛夫秉承旨意給毛發出措辭嚴厲的電報：「我們認為同蔣介石分裂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應當堅持分裂的分針。請您清楚地考慮局勢，重新研究您現在的立場，並通知我們您的意見和建議。」

17 據古屋奎二《蔣總統祕錄》，史達林曾對中國駐蘇大使楊傑說，希望他轉告蔣委員長，如要消除人民對中國政府的不忠行為，應槍殺四百五十萬人。所謂四百五十萬，似為當時估計的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二。

護進步人士的力度。王世傑驚恐之餘，嚴令國軍不得妄發一彈。於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此期間，有條不紊地消滅了國民黨山東、河北、江蘇省政府，收編了國民黨在敵後的大部分軍隊和游擊隊，結束了韓德勤¹⁸和沈鴻烈¹⁹對津浦鐵路的長期騷擾。

滿鐵在華北的戰時經濟建設碩果纍纍，周恩來和潘漢年功不可沒。日本人在此期間，公開採取了偏袒共產黨的政策。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陸相東條英機發表講演：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戰，但日本決不能依賴國共糾紛，而是要依賴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中國事件。此外，蔣介石想把八路軍、新四軍壓往黃河以北，這也不符合日本政府的願望。東條說：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共產黨去華北，是想損害日本利益。日本人說到做到，在二月初發動了針對華北華中國民黨軍隊的攻勢。國民黨在長江以北的殘餘勢力全線崩潰，八路軍及時收編了大部分潰兵和散槍。

統戰工作首先是技術問題，要盡可能提高資產階級的反顛覆成本，用合法機構掩蓋地下工作。資產階級法律出於虛偽的形式主義，即使掌握了非法活動的確鑿證據，也只能針對個別情報人員提出起訴，很難拔除保護地下活動的培養基和白手套，因此在勞民傷財以後，總還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周恩來三令五申，要講究公開和祕密、地上

和地下活動既配合、又分離的原則。紅岩辦事處是合法機關，南方局則是祕密的。高級領導一般有合法的身分，普通地下黨員則並非如此。兩者如果沒有緊急情況和特殊許可，一般不得相互接觸。工作範圍同樣謹守階級原則：領導統戰要人，地下黨統戰群眾。例如郭沫若和章乃器²⁰的真實身分，就只有周恩來知道。不同層次的工作人員不得橫向和逆向交流，只有縱向和單向的指令管道。地下黨同南方局的聯繫，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是由省委或特委的負責人親自到紅岩去匯報工作並接受指示，少則一年一次，多則一年三、四次；二是由南方局派交通員送去指示或接受報告，一些簡單的事情就由交通員轉達。工作人員和群眾之間，構成圓心和多層同心圓外圍的結構。內層群眾政治覺悟成熟以後，就可以加入組織，一面接受上級的單線指令，一面以自己為中心發展新的外圍群眾同心圓。

18 韓德勤（1893-1988），魯蘇戰區副總司令，一九四三年一月與掃蕩的日軍周旋月餘，三月十八日在與新四軍三師副師長張愛萍聯繫後，獲准進入新四軍四師根據地暫避日軍，卻為新四軍攻擊俘獲，後被釋放。

19 沈鴻烈（1882-1969），山東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指責八路軍「破壞行政系統」、「游而不擊」，遭到持續打擊，一九四一年被調往重慶。

20 章乃器（1887-1977），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經常幫地下黨轉移活動經費，祕密聯絡人員。

這種活動模式非常接近細菌在培養基上的擴散：感染核心是明確和穩定的，感染邊緣是模糊和擴展的。例如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周恩來電告中共中央青委：南方局青年組現有非常關係一百五十人（其中包括大中學生和文化、教育、軍事、政府、經濟等機關的青年），已經建立了四個「據點」。每個「據點」由幾個定期聚會的同情者組成，一面學習馬列主義經典政治文獻和重要時事新聞，一面為組織承擔免費的調查與通訊工作。組織也會暗中幫助這些外圍群眾和發展對象，為他們解決工作、家庭、婚戀之類的實際問題。例如重慶著名交際花胡繡楓，她和丈夫重慶社會局局長李劍華都是公開的國民黨員和祕密的地下黨員，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和周恩來指示潘漢年操縱汪兆銘政權的情報首腦李士群。李士群也是周恩來和李克農的舊部，在上海情報界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廣泛的人脈。李士群要求組織把胡繡楓分配給他，這事本身並不過分。贛南蘇區為李德尋找配得上日爾曼人身高和生殖器長度的女人，周恩來為理查·佐爾格安排專職情婦，都是例行公事，很可能以著名的「一杯水主義」收場。鄧小平的妻子卓琳最初也是同樣的身分，最後弄假成真頗有偶然性。投奔延安的文藝女青年經常遭到這樣的待遇，黃克功案件只是說明出身反動家庭的女人不太好改造而已。胡繡楓的問題在於：她和周恩來本人有染，而且分享了周恩來日常暴露的某些祕密。周恩來少不了她，也不敢把她交給雙重間諜李士群。胡繡楓為了不讓周恩來為難，建議姐妹易嫁。這就是關露事件的

真正起因，關露的真實身分就是胡繡楓的妹妹胡楣。關露的生平跟江青非常相似，也是一九三零年代進步文藝界的積極分子，為黨組織當過外圍情報員。胡繡楓心機縝密，做事不留痕跡。她似乎偶然而正常地致信李士群，為關露謀職業。李士群約見關露，立刻不能自己。關露從此打進了李士群的臥室，為周恩來做祕密工作，最後跟潘漢年和李之龍一樣，被周恩來出賣²¹。

周恩來特別強調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但他所謂的「我們要尊師重道」體現的是老共產黨員和老特務（如果這兩者還能有什麼區別的話）的寶貴經驗：「在教育界自中學教員以致大學教職員必須（有）特殊的組織。」「根據經驗，即使是中學教員（也）能起

21 關露（1907-1982），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同時加入「左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以《女聲》月刊編輯身分作掩護，收集日、汪機密情報，並積極組織策反，被國民黨列入漢奸名單；一九四九年後又因漢奸罪名兩度入獄，直到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獲得平反。不久自殺。她的第三個戀人是中共建國後的外交高幹王炳南。兩人相識於抗戰前夕，一九四六年兩人再度相逢後，很快就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當時王炳南為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成員（周恩來為團長），可常乘軍調處飛機來往南京與蘇北中共根據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飛機去看關露之前，按中共的黨組織原則向周恩來夫婦匯報了與關露的戀情。鄧穎超趕到機場將王炳南留了下來。鄧說：「恩來和我反覆研究，認為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於是王炳南向關露寫了絕交信。

很大的作用，因為他可以影響很多學生。儘管是啟蒙工作，但將來的作用非常之大。」（周恩來致劉曉並告康生的電報，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日）組織控制的知識分子有這麼重大的作用，組織沒有控制的知識分子當然也會有同樣巨大的危害。後者顯然必須消滅，不過這事需要由未來的解放軍和軍管會來執行。

隨著日本的投降，戰後安排的矛盾日益尖銳。原則問題可以含混，具體問題就無法妥協。周恩來向蔣介石提出的條件，包括了以下幾項致命的內容：山西、山東、河北、熱河、察哈爾五省主席及委員由中共推薦；綏遠、河南、安徽、江蘇、湖北、廣東六省由中共推薦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直轄市由中共推薦副市長；中共參加東北行政組織；國民政府設北平行營及北平政治委員會，由中共推薦人員分任；中共參加軍事委員會及其所屬各部工作。蔣介石以政令統一為和平談判的基本目的，讓談判代表張治中回答說：「中共軍隊悉數撤退至黃河以北，而據有黃河以北之地區，豈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共方面如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廳長、委員，儘量開列名單，請中央量才任用，切不可指定何省應劃歸中共，推薦何人任主席、廳長、委員。兄等所提華北四省主席應由中共推薦，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異乎割據地盤？」（《張治中回憶錄》）周恩來自己的解釋是：「我們把談判作為教育人民的工作。……因為對

方不願解決問題，我們就告訴人民是他不願解決，用以教育人民。」（《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談判破裂後，周恩來繼續主持情報工作。國民黨要害部門的幾大鼯鼠熊向暉、謝和賡、閻又文，都是周恩來的舊部。蘇聯專家指導社會部的改組和公安部的建立，離不開周恩來的巧妙安排。他知道毛澤東猜忌心重，表面上放棄了繼續把情報機構的企圖，甚至以無情犧牲舊部的方式，配合毛澤東過河拆橋的清算活動，但蘇聯、香港和海外統戰管道的經營，畢竟非他莫屬。即使在毛澤東和赫魯雪夫交惡以後，香港地下黨仍然是周恩來的禁臠。紅色中國的貿易生命線和東南亞的革命輸出，都在周恩來等掌控之中。周恩來操縱反共老手李濟深私奔大連、北平，成立反蔣親共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將統戰工作推向歷史最高峰，但白區黨（共產國際傳統繼承者）和紅區黨（梁山傳統繼承人）的衝突越演越烈，以一九六七年的暴動為高潮，有效地破壞了周恩來的許多部署，實際上是毛澤東——蘇聯鬥爭在黨內和東亞的投影，從背後破壞了蘇聯挑戰最後和最好的機會。

周恩來和他的朋友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毛澤東對美國的貢獻遠遠超過蔣介石，只有蔣介石對蘇聯的貢獻才能相比，但他既然不敢在北京向莫斯科挑戰的當時採取行動，以

後就更無法擺脫毛澤東的綁架了。黨是周恩來的母親和家園，卻只是毛澤東的坐騎和工具。毛澤東可以利用黨來綁架周恩來，反過來卻不行，正如真正的母親不敢要求所羅門將嬰兒一分为二，冒牌的母親卻可以。毛澤東之所以容忍周恩來，就是因為他看透了周恩來。他只要將黨綁架到無法回頭的地步，黨就不可能否定他。一九五八年的挑戰是為了在他生前斷絕周恩來和蘇聯系人馬的退路，一九七二年的外交革命是為了在他死後斷絕周恩來繼承人和蘇聯系人馬的退路。周恩來之所以隱忍毛澤東，也是因為他看透了毛澤東。毛澤東沒有別的坐騎和工具，也不是那種能夠自己培養班底的人。只要黨的組織機器始終存在，毛澤東任用的三教九流浪人終歸只是過眼雲煙。

這種既控制又利用的微妙關係，一直持續到兩人生命的盡頭，既考驗了毛澤東觀察性格和玩弄權術的水準，又暴露了他權力基礎和組織力量的薄弱。他只能耐心地等待周恩來去世，儘管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他的耐心越來越小。周恩來知道自己的繼承人必然會在自己身後戰勝毛澤東的繼承人，但陰柔的性格使他極其恐懼直接攤牌的時刻。最後，兩人都如願以償。毛澤東通過他的路徑鎖定，綁架了黨；然而黨雖然在背叛蘇聯的路徑上無法回頭，卻不再屬於他的繼承人。周恩來通過他的繼承人復辟，奪回了黨；然而黨雖然落到了共產國際的繼承人手中，卻再也無法返回共產國際的路徑。

一九、「老兒子」

——張學良



張學良屬於那種事蹟眾所周知的人物，因此無須重複敘述。他的性格屬於「老兒子」的類型，任性而脆弱。「老兒子」的意思是：一個家庭多年期望得子，卻生了太多的女孩。在大家都已經絕望的時候，兒子突然降生了。他處在這樣的環境內，不變成花花公子是非常困難的。他少年時代習慣了奉系勢力節節上升的趨勢，自己又在軍事革新當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此視事太易，沒有堅持長期計劃的耐心，不能區分枝節的困難和方向的謬誤。

東北易幟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此後的一切錯誤都派生於此。張作霖在東北的地位主要依靠他的外交平衡術，因此奉軍可以輕易入關，關內的勢力卻不能輕易出關。東北的特殊地位如果動搖，奉系的優勢就不復存在了。東北軍接受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自殺

性質極為明顯。張作霖和孫文結盟，就堅持擱置三民主義和反帝外交，表現了高度的審慎。蘇聯取代沙俄以後，東北亞的勢力均衡體系已經搖搖欲墜。國民政府的勢力一旦伸入東北，東北的緩衝區地位就全完了。在新的平衡實現以前，東北必定會淪為動盪的焦點。張學良指望將外交責任交給南京，無異於抱薪救火。

從勢力均衡的角度看，九一八事變恢復了東北易幟前的平衡。張學良過度地倒向南京，結果使自己喪失了統治東北的資格，從此只能依靠蔣介石的善意了。這種格局非常類似亞努科維奇¹倒向俄羅斯，結果失去了統治烏克蘭的資格。對於奉系自身，九一八將張學良繼位造成的裂痕變成了鴻溝。張景惠一流舊派人士憎惡國民黨超過憎惡日本，早在楊宇霆²遇害後就離心離德，現在乘機投向日本一方，在「新京」新政權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張學良本人領導的新派遊士氣質多於土豪，厭惡鄉民的土鼈式忠誠，酷愛北平的花花世界，習慣了蔣介石撥給的統戰津貼，早已不願返回關外。他們相信蔣介石欠他們的，因為流亡是易幟的代價，他們理應永遠占據國民政府的第二位。

然而在蔣介石嫡系和南方各派系的眼中，東北軍根本就是北洋最保守的一派。他們支持領袖的統戰收買政策，僅僅因為外交和地緣政治的需要。他們覺得現在東北軍已經

淪為仰人鼻息的客軍，理應效法皈依三民主義的北洋殘軍，接受黨國的革命史觀，放棄特殊化的幻想。認知圖景的衝突比單純的利益衝突更難調和，蔣介石和張學良兩人最初仍然很講義氣，但他們的部屬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摩擦。從馬基維利主義的角度，蔣介石實際上可以而且應該迅速背信棄義，吞併張學良在關內的部隊，但他自負英雄，不肯乘人之危。從馬基維利主義的角度，張學良在九一八以前完全可以背叛蔣介石，在九一八以後就絕對不能再起貳心，但他也不是馬基維利主義者。

「老兒子」始終好高騖遠，覺得身邊的土氈不如遠來的和尚，是因為熟悉和管束令人厭煩，陌生和新奇引人入勝。他一旦得到遠來的和尚，又會像對待原先的土氈夥伴一

1 亞努科維奇 (1950)，前任烏克蘭總統，曾經三度出任總理。二零一四年二月，烏克蘭國會將其革職，他逃亡到俄羅斯，宣稱自己是被暴力非法奪權，是合法的烏克蘭總統，並為俄羅斯所承認。二零一五年，國際刑警組織宣佈將亞努科維奇列入「紅色通緝令」名單，對其全球通緝。

2 楊宇霆 (1885-1929)，奉天法庫 (今遼寧省法庫縣) 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八期步科畢業。歷任奉軍參謀長、東北陸軍訓練總監、東三省兵工廠總辦，奉軍第三和第四軍團司令，江蘇軍務督辦，安國軍參謀總長。東北易幟典禮當天拒不參加集體留影。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楊向張學良提出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的要求，張學良推說晚餐再說，後召警務處長高紀毅進府，晚上楊宇霆與黑龍江省省長蔭槐被高紀毅、譚海率領六名衛士殺害於大帥府「老虎廳」。

樣，迅速由厭倦而背叛。他的政治操守和對待女人的忠誠差不多，原因也非常相似。他最容易犧牲忠誠的朋友，購買敵人的歡心，部分原因就是土鼈過於忠誠，無論他怎樣反覆無常都會忠誠到底。他對真正冷酷無情的敵人，反倒流露出無計可施的執褲子弟本色。他在老帥張作霖麾下，對國民黨作戰，卻覺得「三民主義」比土鼈鄉親的「三國式」忠義更時髦，最後為了時髦而誅殺父親的老將，不惜犧牲自己的根基而為原先的敵人效力。他一到蔣介石麾下，孫文思想就失去了原有的魔力。他像拋棄委身相許的女人一樣，迅速轉向更加神祕的獵物，開始跟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調情。墨索里尼坦白地告訴他，義大利人和所有歐洲人都對中國不感興趣。於是，這個厭倦新玩具的孩子又轉向史達林。

蔣介石以寬大慷慨自負，不殺降將、不毀承諾，在中國歷代政治人物中也是罕見的。張作霖留下的顧命老臣大抵是民間粗俗儒學薰陶產生的江湖人物，集粗魯、殘酷和小團體的忠義於一身。這些人都把張學良當成任性的寶貝，一再容忍他的輕率，一再替他收拾殘局。他身邊的女人就更不用說了。他在這樣的生活環境內，自然培養不出審慎和遠見。史達林則是完全不同的類型，極端謹慎和堅忍，從不忘記過去的冒犯。他的殘酷不是為殘酷而殘酷，而是極端謹慎和缺乏安全感的產物，因為他冒不起寬恕舊仇人而遭到反噬的風險。他一向不會為了虛榮而採取實質行動，非常鄙視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這種愛

慕虛榮的文人氣質。虛榮損害鋼鐵般的堅強，而史達林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鋼鐵。朱加什維利（史達林原姓朱加什維利）之所以給自己取這個名字，就是想要模仿這種性格。

張學良背叛蔣介石的動機主要是虛榮，覺得遭到蔣介石集團的怠慢，卻提不出具體的、馬基維利性質的政治要求。事實上，他去西北是他自己選的。蔣介石和他的盟約是安排他做國民政府的副主席、行憲後的副總統，蔣介石並沒有因東北淪陷而背盟。張學良因為某些後勤軍官負責的雞毛蒜皮小事而不滿，而這些事情並不由蔣介石本人負責。這種行徑就像驕縱的小孩哭鬧，沒有具體的要求，只是覺得大人對他不夠注意。史達林理解不了這種動機，只是簡單地把張學良當成張作霖和東北軍的政治繼承者。他沒有忘記，張作霖是蘇聯和共產主義不共戴天的死敵，張學良本人又是中東路事件³的主要製造者。這樣的人居然突然提出加入共產黨（透過中共向史達林提出申請），未必沒有叵測的居心。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不能冒這種險。

3 一九二九年七月，在南京國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圍中，張學良以武力強行收回蘇聯掌握的中東鐵路（沙俄修築的從赤塔經滿洲里、哈爾濱、綏芬河到海參崴的鐵路，在滿洲境內的一段鐵路簡稱「東清路」，民國以後改稱「中國東省鐵路」，簡稱中東路），在蘇聯軍力進攻下，當年十二月，張學良不得不接受蘇方提出的恢復中東鐵路中蘇共管的原狀、雙方釋放被俘人員而宣告結束，並簽訂《伯力會議議定書》，但未被國民政府承認。

史達林生性多疑，不可能沒有注意到張學良同時跟國民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調情。從他的角度看，即使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花花公子的反覆無常、百分之二的可能性是陰謀家拖蘇聯下水的妙計，他也要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來防範這百分之二的危險。資產階級政治家可以多次失敗和再起，但蘇聯政治家一次失敗就是萬劫不復。雙方對風險的看法當然截然不同。史達林知道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內都有一批人渴望引誘蘇聯和日本開戰（至少李立三和蔣廷黼已經把這種意圖公開化了），以減輕國內壓力；而他的外交佈局恰好是想誘使中、日開戰，給自己減輕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懷疑張學良的主動投靠乃是誘使他反日的陰謀。主謀是張學良自己、日本人、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對他並不重要。他為了比對張學良小得多的懷疑，已經殺掉了許多忠實部下，怎麼可能對張學良網開一面。

這時，張學良犯了另一個判斷錯誤。他以為中國共產黨就是蘇聯的忠實代理人，不會假傳聖旨。然而，他缺乏知人論世的智慧。中國共產黨當時正處在最絕望的時刻，張學良幾乎就是他們最後的救命稻草。如果戰爭重啟，他們可能不得不退往蘇聯。史達林對失敗的共產國際支部人員非常殘酷，他們很可能像波蘭共產黨中央一樣被斬盡殺絕。如果張學良倒戈，他們立刻就能打開局面，獲得蘇聯和國民黨的重視。如果他們將史達

林拒絕他入黨一事告訴張學良，這個任性的孩子可能再次覺得感情受到傷害，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情，因此只能瞞著他，雙方慢慢聯絡感情，至少可以拖延時間，從張學良手中得到一些軍火和資金。拖延到最後的結局會怎樣，他們自己也心中無數。他們沒有料到，張學良這個孩子沒有耐心，居然把共產黨假傳的史達林意見當真，以為蘇聯會支持他們的西北聯盟抗日，魯莽地發動了西安事變。蘇聯、日本、國共兩黨都驚詫莫名，相互懷疑是不是對方的陰謀。今天我們發現這些資深的陰謀家偏偏在這件最重要的事情上完全無辜，充分證明歷史沒有什麼必然性。

中國共產黨最初希望蔣介石去死，國民黨徹底瓦解，最大限度地減輕他們的壓力。但史達林完全不是這麼看問題的，他覺得蔣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顯然是日本人，非常懷疑張學良是日本人的間諜。當然他高估了花花公子的馬基維利能力，但人之常情都是以己度人。史達林如果處在張學良的位置上，不會覺得玩弄馬基維利主義外交有什麼不對。何況，他始終認為張學良是張作霖的兒子。他對張作霖非常忌憚，直到高崗事件的時代（一九五四年）仍然耿耿於懷。在他的理論中，張作霖的繼承人肯定比孫文的繼承人更反動，正如佛朗哥將軍肯定比西班牙共和派更反動，儘管他們都是敵對勢力。共產國際的紀律比國民黨嚴格得多，中國共產黨不得不為蘇聯的大局犧牲自己的小局。他們

完全清楚，這樣做就是害死了張學良。他們直到時過境遷幾十年後，仍然對張學良心懷愧疚，一再送去最優厚的條件，但張學良從來沒有寬恕他們，不給片言隻句的回覆，堅決將他們從記憶中抹去。

張學良聽到蘇聯宣佈他是日本間諜，還以為可能是外交辭令，等到周恩來前來表態，就完全絕望了。他知道自己已經是一具政治殭屍，就完全不想活了，最後一次任性起來。照他一貫的作風，又是犧牲現在的盟友，投向現在的敵人，親自將蔣介石送回南京。蔣介石寬恕他，因為兩人其實是相互理解的，也因為蔣介石知道：張學良名義上是他的下屬，事實上是他的盟友。如果黃埔軍人私通敵國，肯定不會放過；但諸侯實際上就是一個準國家，翻雲覆雨並不是異常現象，廣州國民政府也是這樣做的。

一個人無論年輕時多麼荒唐，晚年總會喪失驅使他荒唐的各種欲望。張學良只是任性，不是弱智。退隱是一面鏡子，照出了自己的形象：誰對他好，他就對誰壞；誰對他壞，他就對誰好。這樣的人如果成功，世界上還有天理嗎？老師和他忠肝義膽的江湖好漢辛辛苦苦打下江山，讓他坐享其成，得到了什麼結果？他一再自己害自己，這並不要緊，但他也一再害死對他最好的人，還有什麼臉面在這些人犧牲以後苟活下去？中國人

不容易接受基督教，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儒家的罪惡是一個具體的世俗概念，但他沒有這方面的障礙，因為根據儒家的世俗標準，他已經是不忠不孝的罪人了。蔣介石皈依基督教，最初可能是向強大的西方示好，體貼虔誠的妻子；最後就變成修身養性的法寶，逆境中最可靠的依託。張學良最後皈依基督教，則無異於解脫，否則他無法面對自己。

二〇、紅色文宣教父

——陳伯達



陳伯達（1904-1989，福建泉州惠安人）出身於沒落的士大夫家庭。高祖父陳金城，在道光朝中舉人，曾經大膽地彈劾琦善。陳伯達的父輩時運大不如前，剛剛達到秀才的層級，科舉就廢除了。他們不能或不願適應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家道迅速中落，到陳伯達的少年時代，已經連擅長經營的富裕農民都不如了。階級地位的顛倒，比單純的物質匱乏更富有刺激性。士大夫文化促使他們相信自己沒有錯，一切都是世界的錯，尤其是洋人和商人的錯。洋人和商人的勝利不是因為聰明能幹，而是因為遊戲規則的破壞。只要稍微加一點理論上的胡椒粉，邪惡的洋人和商人就可以升級包裝為邪惡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陳伯達的一生，彷彿就是為了完成沒落士大夫由於知識淺薄和視野狹窄而未竟的精神勝利法，通過理論巫術將是非顛倒的世界重新顛倒回來。左派一般出身講究面子而缺乏金錢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吏治國家的小公務員和下層白領家庭，企圖通過

抽象理論知識改變階級地位的人，一般會走上左派或進步主義的道路，而統治者和底層人都有輕視條條框框、依靠經驗知識的傾向。

陳伯達畢業於廈門集美師範學院，畢業後做了小學教師。這樣的學校和這樣的職業，特別適合他這樣既沒有錢、又擅長書面學習模式的人。抗戰以前的小學教師日子其實相當滋潤，不難在前清習俗未改的土氈父老面前扮演士大夫，收入相對於極為低廉和穩定的物價水準堪稱豐厚，至少養家糊口不成問題。真正從淳樸勞動者階層逐漸積累而向上流動的學生，對這種祖輩未曾享受過的美好前景相當滿足和感激。但陳伯達這種人處在同樣的境地，就會認為這一切都是社會理應償還他們的欠債，而且遠遠配不上家鄉父老崇拜的他那顆聰明腦袋。他在文藝愛好者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小說，還成功地自學了英文，像孔雀開屏一樣得意，覺得前後左右的土氈誰都配不上自己，應該去大城市揚名立萬了。一九二四年，二十歲的陳伯達進入了上海灘。

他在上海的前途相當於現在的小報記者，但他確實有一般小報記者所不具備的才幹

1 陳金城（1802-1852），一八四三年為陳慶鏞代擬〈申明刑賞疏〉，指控賣國權貴、敗將逃官，奏文「直聲震海內」。

和志向。他加入了國共兩黨合辦的學習班，變成了國民革命的候補政治輔導員。北伐開始後，他擔任國軍獨立第四師師長張貞²的秘書和福建陸軍幹部學校的政治教官。他本著吃飯砸鍋的精神，加入了國民黨，利用國軍的保護傘，為共產黨代表王荷波³組織民間武裝，在思想保守的福建社會激起了極大的反感。蔣介石清黨以後，命令福州衛戍司令張貞就地處置這個搗亂分子。張貞是形式上加入國民黨的舊派軍人，不適應列寧主義時代的黨派鬥爭倫理，覺得小團體的私人關係比意識形態的路線鬥爭重要得多，不僅放了陳伯達一條生路，還送了陳伯達一千塊錢的路費。陳伯達拿著舊軍閥的錢逃到上海，在這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倒臺以後，這筆錢變成了他的罪證。

陳伯達入黨後，首先在武漢從事宣傳工作。隨後，他和王明一起去莫斯科孫文大學受訓。校長米夫在史達林控制國際共運機構以後，長期負責上海遠東局的工作，將王明和其他弟子安插到中國支部的領導職位上。陳伯達回國後，根據王明的指示，在天津編輯《北方紅旗》。國民黨地下組織襲擊共產黨地下組織，抓獲了陳伯達，但由於雙方都是地下組織的緣故，不得不將他釋放。統治華北的西北軍舊部依靠共產國際的程度，超過依靠南京國民政府的程度。國民黨在這些地方甚至連黨部都遭到監視和限制，依賴地下組織的程度比他們在上海自由市更為嚴重。這樣的環境為蘇聯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直

接造就了吉鴻昌的兵變⁴和北平的學潮⁵。陳伯達在這兩項工作當中成就卓著，贏得了劉少奇的嘉獎。

一九三六年，北方局改組。劉少奇任書記，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長，林楓任秘書長。他們在冀察政務委員會的保護下，從半地上活動轉為公開活動，發動北平各界盡快抗戰，有力配合了周恩來和康生領導的地下活動和兵運工作。日軍主要將領的病假和休假造成了「我強敵弱」的寶貴機會，盧溝橋抗戰就在這屆新班子的有力領導

2 張貞（1884-1963），保定軍校畢業，原為福建靖國軍將領，後加入國民革命軍，官至陸軍上將。他救過陳伯達兩次。一九三一年，陳伯達在天津被捕，後被關在北平草廠子監獄，還是張貞出手相救，陳伯達在獄中只待了十個月就出來了。毛澤東曾在一次會議上說：「我看，國民黨也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張貞就救過陳伯達一命。」
3 王荷波（1882-1927），福州人，中共早期工運領導人之一。一九二七年春，陳伯達應邀擔任王荷波組織的工人糾察隊的顧問。

4 據師哲回憶，柯慶施曾告訴他，陳伯達從蘇聯回國以後，到了天津，但找不到黨的關係，遇到在蘇聯留學時相識的柯慶施才接上了關係。柯派陳伯達到吉鴻昌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編輯《民眾日報》。吉的公開身分是抗日將領，實際是共黨的祕密黨員。京、津地區黨的地下工作，在經濟上靠吉鴻昌支援，柯慶施則幫助吉做統戰工作。

5 一九三五年，在北平、華北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和不被今人甚知的新啟蒙運動。陳伯達是這兩次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清華大學救國會發表的《告全國人民書》中，著名的「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就是出自陳伯達之手。

下提前爆發了。國民黨地下組織借助通州大屠殺，履行了他們對統一戰線的義務。上級對陳伯達的工作表示滿意，將他調到延安。

陳伯達在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任教。毛澤東發現陳伯達運用辯證法的方式符合自己的偏好，決定重用此人。毛澤東對陳伯達的《老子的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和《墨子的哲學思想》提供了修改意見，陳伯達對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同樣不遺餘力。陳伯達調到毛澤東辦公室，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此後三十年，陳伯達一直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的生活方式接近舊式士大夫，好處和壞處都不例外。師哲回憶說：他的房間永遠髒亂差，到處都是亂七八糟的書堆。他知道毛澤東恨王明，就投其所好地宣傳自己也是王明打擊的對象，從他以往跟王明的關係看，實在毫無根據。他好名成癖，喜歡將整個寫作團體的成績放在自己一個人的名下。毛澤東的衛兵李家驥回憶說：陳伯達衣著樸素，不修邊幅。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毛澤東授意陳伯達寫文章反駁。劉少奇起草七大文件，通過任弼時恭請陳伯達動筆。如果共產黨是一個朝廷，他的地位已經接近漢代的中書和明初的大學士。中宣部下令將《評中國之命運》印成小冊子，保證黨政軍幹部人手一冊。陝、甘、寧邊區就發行了一萬七千冊，所有學校都列為必修課。南方局在重慶和桂林，華東

局在上海大量發行。董必武和統戰部負責出版英譯本，向全世界廣泛發行。蔣介石和陶希聖面對國際性的強大動員力量，表現得完全像一群沒有見過世面的土鼈。《竊國大盜袁世凱》、《中國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敵蔣介石》出版以後，陳伯達實際上已經是紅色政權所有文史哲研究的教父。這些作品只是滿洲國和汪兆銘政權戰爭宣傳材料的草率堆積，加上一層薄薄的史達林主義油彩而已，但並沒有妨礙大批英美留學生和國學長老誠惶誠恐地學習研究，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在他倒臺以後，學術界所謂黨性的原則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原則也是根據他這些小冊子設計的標準確定的。

隨著毛澤東地位的穩固，陳伯達的權力越來越大。一九四五年，他擔任中央候補委員和宣傳部副部長。一九四八年，他擔任馬列學院副院長。一九四九年，他擔任中央委員和中科院副院長。他和《論聯合政府》、《共同綱領》的關係，不會低於張君勱和《中華民國憲法》的關係。五十年代初，他參加了編輯《毛澤東選集》的工作。《選集》

6 陳伯達經常向毛澤東訴說，他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受王明的「排擠打擊」。但據和他同期在中山大學的同學回憶，陳伯達在中山大學和誰都不來往。他個性孤僻，自視清高，除了讀書，別無所好。他在蘇聯幾年，仍聽不懂俄語，實際上是「孤家寡人」。

本來是為了彌補北京在莫斯科和東歐各支部面前的理論自卑感，但還是需要蘇聯顧問尤金⁷的主持。蘇聯顧問在軍事、情報、經濟、交通各方面的主導地位，是陳伯達無法挑戰的，但他覺得自己在文化方面至少還有一手，不是隨時都心服口服。他追隨毛澤東去莫斯科，看到蘇聯人用《紅罌粟花》歌頌遠東的革命，居然敢於提出抗議，迫使蘇聯人從此停止上演這部歌劇。這部偉大作品不僅極不知趣地將鴉片原材料作為紅色革命的象徵，刺激了南泥灣主人敏感的神經，而且將共產主義思想塑造成像梅毒一樣，由蘇聯水手通過口岸娼妓傳播給廣大內地群眾，從而變成燎原之火。陳伯達做了這樣冒險的事情，仍然能夠鎮靜自若，一天到晚睡懶覺，在被窩裡堆滿了書，使得蘇聯服務員都感到驚訝，不能說沒有蘭相如之風。一九五五年，陳伯達出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一九五八年，他促成了《紅旗》雜誌的創辦。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陳伯達寫給我一封信，他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現在轉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陳伯達順理成章地出任雜誌第一位總編輯，毛澤東為他題寫了二十多次刊頭。兩人的關係如膠似漆，毛澤東的政策和陳伯達的思想難分彼此。由於陳伯達寫給毛澤東的東西從來不留底稿，他究竟為毛出了多少力，一直是歷史祕密。《史達林與中國革命》、《毛澤東與中國革命》、《論毛澤東思想》將現實的政策建立在歷史的選擇之上，既劃定了後世黨國領導人不可逾越的界限，又奠定了自己作為當今首要毛澤東思想解釋

者的地位。「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構成主要矛盾」的理論是由他在一九五六年、而不是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發明的，雖然他在毛澤東改變態度以後，機敏地亦步亦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農業二十三條》都少不了他的大筆，劉少奇的《共產黨員修養》也經過他的潤色。如果共產黨算一個朝廷，那麼他已經實現歷代士大夫參知政事的最高欲望，然而由於共產黨畢竟不是一個朝廷，他必須付出應有的代價。

一九六六年八月，陳伯達進入政治局。文革初期，他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和中宣部顧問。他的權力在形式上達到頂峰，實際上卻每況愈下。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依靠張春橋的襄贊，壟斷了釣魚臺的工作。名義組長陳伯達經過毛澤東的幾次警告和訓斥，只能知趣地躲在米糧胡同的家裡不去上班。他以老臣和內行自居，瞧不起江青周圍嘴上無毛的激進派文人，但是作為毛澤東欽定的內廷首腦，又必須至少在形式上主持文革。結果，他兩頭不是人。勝利者覺得他是文革的絆腳石，失敗者覺得他是文革的罪魁禍首。

7 尤金（1899-1968），一九五零年被派往中國充當《毛澤東選集》的編輯顧問，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九年任駐華大使。

九大報告起草期間，雙方的關係急遽惡化。陳伯達和林彪出於老人和內行的惺惺相惜，企圖重新強調經濟建設和富國強兵，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路線，為了避免反對毛澤東文革決斷的嫌疑，同時也沒有忘記批判「劉、鄧路線」。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毛澤東的支援下，抨擊陳、林版本的「唯生產力論」和「調和主義」。結果，雙方各自起草自己的版本。毛澤東接受了張春橋和姚文元的版本，將陳伯達的稿件退給本人。陳伯達看到毛澤東連裝他稿件的牛皮紙袋都沒有拆開，知道大勢已去，只有閉門痛苦。九大通過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走投無路的陳伯達只有懇求林彪保護他。

他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毛澤東對假定繼承人的猜忌眾所周知，怎能允許自己的秘書帶著自己的祕密投奔最危險的人物。陳伯達如果在九大以後就此認輸，毛澤東會不會放過他還不好說。一旦投靠林彪，就只有兩種選擇了。要麼輔佐林彪搶班奪權，希望新主人善待自己。否則毛澤東無論能不能容忍林彪，都一定不能容忍他的背叛。然而他畢竟不是林彪的自己人，林彪無意保護他。「天才論」是不是符合唯物主義，完全是個藉口。江青和林彪同樣用非常類似的話語吹捧毛澤東，現在反過來煞有介事地譴責陳伯達不懂馬克思主義。陳伯達也許不懂馬克思，但黨內其他人只可能比他更不懂。他即使沒

有說過這些東西，眾多的著作也不難挑出其他的骨頭。毛澤東發動了「批陳整風」運動，將陳伯達打成了國民黨特務、叛徒和托派。林彪死後，他的罪名又增加了修正主義分子這一條。因為「唯生產力論」畢竟是他和林彪的共同創造，在林彪垮臺以前還不能徹底批倒批臭。

陳伯達在秦城監獄度過了文革的最後幾年。毛澤東死後，江青的大多數敵人看到了希望。只有他和林彪集團例外，反倒被包裝成江青的同盟，又被打倒和審判了一次。

鄧小平在黨內以心胸狹窄和心狠手辣著稱，所以才會贏得毛澤東「鋼鐵公司」的讚美之詞⁸。他不能原諒林彪和陳伯達企圖以犧牲他和劉少奇為代價，換取毛澤東同意結束階級鬥爭和轉向經濟建設，堅定地主張這些人的逆案一定不能翻。他在文革以前一直堅定地支持階級鬥爭，反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毛澤東和反右運動所做的貢獻，比劉少奇和周恩來以外的任何人都要多，在人民公社和大饑荒的時代，他用恐嚇手段強迫東北的

8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鄧小平與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得知以後，對鄧小平說，她強加於人吶，我也是不高興的，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好。鄧小平說，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後我到她那裡去講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毛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綿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

地方幹部提高徵糧配額，為了欺騙京、津地區的外國友人，力主大量調走鄉邦巴蜀的口糧。鄧小平自己如果沒有遭到江青和激進文人的攻擊，幾乎不可能公開反對文革，但他既然已經非做文革反對者不可，自然能夠看出在列寧主義的基本框架內，除了採取林彪和陳伯達的「唯生產力論」以外，實際上已經無路可走。他一面將林彪、陳伯達的修正主義政策算在自己頭上，一面將自己的極左路線栽到林彪、陳伯達頭上，對無法開口反駁的私敵施加二度傷害⁹，不會體會不到隱祕的快感。毛澤東在利用蔣介石抗日而損失慘重的同時，利用三國演義壯大了自己的勢力，然後宣佈蔣介石是因為消極抗戰才喪失戰鬥力的，就充分享受了同樣的快感。只有真正學懂了中國革命史和毛澤東思想的極少數人，才能真正理解和運用這種充滿SM色彩的祕傳心法。大多數學生要麼把這些內容當作瑣碎材料的堆積和考驗記憶力的訓練，要麼就會覺得這些東西無非是下級對領導歌功頌德的產物，根本理解不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下一代的苦心。即使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革命導師，畢竟也是半個歐洲人，把階級鬥爭看成以最高效率消滅敵人的科學手段，沒法領會東方妾婦的猥瑣陰暗，不大會操作挑動和享受敵人心理痛苦的精緻藝術，在同樣的迫害中都顯得更加機械和率真。

改革開放並沒有改變共產黨的行為模式，只是調整了打擊和統戰的具體區域，陳伯

達的處理方式就是絕好的證明。他們一面堅持陳伯達絕對不能釋放，即使臨死前保外就醫都要嚴格監視，一面聰明地相信即使從敵人的身上，也能最大限度地榨出剩餘價值（胡耀邦指出：陳伯達學問好，研究能力強，應當發揮他的專長，安排他為中央做一點研究工作。我們現在的改革和建設，遇到許多問題需要研究。讓陳伯達搞一點研究，研究出來的成果，我們可以參考）。他們的聰明不是從陳伯達開始的，滿洲國高級知識分子在昌平勞改農場出版的西方名著叢書就是同類的手段。日本的醫生護士和技術軍官、國民黨的軍官和知識分子、蘇區和長征期間綁架的傳教士醫生遭到的待遇，其實都出於同樣的手段。我們所能知道的一鱗半爪，肯定只是他們所作所為的極小一部分。金家父子對韓國演員和日語教師的綁架和利用，顯然不是朝鮮的獨特發明。如果運用警察對綁匪的犯罪學分析，其實不難形成高度準確的行為預測。如果運用蛋頭學者的政治學和歷史學模型，準確率反而差得多。

9 陳伯達於一九七零年十月十八日被拘押（後來，他的刑期就從這一天算起），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才被正式逮捕。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講話（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提到「林彪」、「四人幫」，特別是所謂理論家陳伯達、張春橋，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日，陳伯達與「四人幫」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公開審判。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一九八九年九月，陳伯達的骨灰送往八寶山墓地。他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他將無數隱祕帶進了黨的墳墓，即使作為灰燼也絕不能逃離黨的範圍。他當然是有罪的，但學術界和媒體試圖讓順民相信的罪名，明顯來自更大罪犯的栽贓。他付出了代價，但列寧主義者爬蟲一樣冰冷和猥瑣的心靈肯定會為他減輕許多痛苦。除了極其虛偽或極其天真的人，誰都不會對他的所作所為感到驚訝。後文革的知識界如此深刻而廣泛地繼承了他扭曲的心智和愚蠢的詭詐，反倒會更加長久地引起後人的驚詫。

二一、紅色孤將

——林彪



林彪（1907-1971，湖北黃岡人）是五四運動想要解放的那種內地新青年的典範，從參加學生運動開始¹，最終通過黃埔軍校投身革命²。黃埔軍校是速成班性質，以政治教育為主，其他以後自學。林彪還沒有畢業，北伐就開始了。他在葉挺麾下作戰，這支部隊的政治保護人是張發奎。蔣介石清黨後，粵軍陷入了一種石達開式的情緒，懷念廣州根據地的好日子。共產國際決定順水推舟，利用他們收復廣州，重建蘇聯軍援路線，於是產生了著名的南昌起義。林彪以中級軍官身分隨軍南下，在高級指揮官逃亡殆盡後

1 一九二二年，小學未畢業的林彪考入董必武等創辦的武昌共進中學；一九二四年，他成為共進中學學生運動的領袖、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被中共青團武昌地委指定為共進中學團支部書記；一九二五年秋，五卅運動中帶頭參加遊行示威。

2 一九二四年底，中共要求各地組織迅速在內部選派優秀青年投考廣州黃埔軍校，林彪在上海考試通過被錄取。

投入朱德所部，跟隨朱德來到井岡山。

紅軍的組成非常複雜，葉挺、林彪這種前國軍軍官的素質比毛澤東和賀龍召集的江湖好漢強得多，但在混亂環境內籌款求生的能力反而更差，所謂龍游淺底遭蝦戲。朱德後來說有些事只有毛幹得出來（指沒有底線的打土豪以籌款），就反映了長征期間共產國際撥款時斷時續的後果。毛在這個時候絕地反擊，大概不是偶然。江湖好漢——業餘軍人和正規列寧主義者——黨務官僚的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的主要特殊之處，也是毛得以上臺的主要原因。國軍前軍官在這種環境中因處境尷尬而被孤立，最容易遭到懷疑和清洗。政治保衛局並沒有冤枉他們，畢竟從事實上說，他們叛變的可能性確實是最大的。其他人都已經沒有退路了，他們卻可以合理地指望蔣介石著名的寬厚。等不到長征開始，這種軍官或被殺或逃走，已經所剩無幾，百色起義的主將李明瑞³就是典型。僥倖活命的極少數，往往是託了國軍進攻根據地的福，才逃出了政治保衛局的虎口。林彪不屬於這兩類，因為他和毛澤東結成了各取所需的聯盟。毛在軍事方面還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需要一個林彪這樣的人。毛、林聯盟控制了總前委，永遠結束了朱德的政治和軍事生命⁴。毛獲得了一方諸侯的地位，林彪第一次獲得政治決定權。

張聞天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的身分，趕走了毛澤東及其富農路線。林彪迅速拋棄了老朋友，倒向更加缺乏軍事經驗的新領導，護送他們一起踏上逃亡之路，指揮了沿途的幾次戰役。他在長征路上企圖阻止毛捲土重來，卻沒有成功⁵。曖昧的狀態只有史達林才能解決，他最終決定支持毛。林彪有趣地交出了兵權，改任紅軍大學校長⁶。在此期間，毛對他非常猜忌，甚至公開指責說，王明背著他跟林彪聯繫。毛自己說林彪很有戰術天分，但別人也這麼說，他反倒不高興。如果抗戰沒有及時爆發，林彪的前途將會極其危險。

抗戰導致八路軍人數急遽擴張，速度比國軍和日軍快得多，對原有軍官和抗日青年

3 李明瑞（1896-1931），原為桂系將領，因未能得到軍長職位而勾結共產黨反蔣反桂，由鄧小平等介紹入黨，曾任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和紅七軍軍長，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中共肅反運動中，被共產黨以「企圖率隊逃跑」罪名殺害於江西于都。一九四五年中共為其平反。

4 一九二九年古田會議全盤接受了毛澤東「黨管一切」的建軍主張。毛獲得紅四軍領導權，重新當選前委總書記，林彪當選總前委委員，進入紅軍決策層。反對毛主席的朱德從此失去實權。

5 據聶榮臻、伍修權、李富春等描述，林彪在遵義會議前和會議上「都沒有講什麼話，他的態度是曖昧的」。四渡赤水後，林彪給中央「三人小組」寫信建議撤換毛澤東，但未被採納。

6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紅軍大學即後來的「抗大」成立，林彪調任校長開始教學，不再任紅一軍團長。

都形成了巨大的正向激勵。林在抗戰期間指揮了幾次偷襲，最多時能夠擊斃數百名日軍。這些事件對日本的軍事行動影響甚微，卻暴露了共產黨和八路軍內部的奇妙關係。毛討厭林彪的平型關戰役，不遜於討厭彭德懷的百團大戰，說明他的眼光和識見確實高人一籌，也說明他確實沒有任何原則可言。他正確地指出，這種戰鬥除了使自己感覺更正確以外，沒有什麼軍事意義。八路軍沒有跟日本人作戰的能力，應該滲入被國民黨遺棄、日本人又沒有占領的大片真空地帶，在那裡建立組織和擴充軍隊，改善共產黨在未來的決策地位⁷。他對自己的判斷異常自信，甚至敢於對抗史達林的決策。在共產黨的政治生態場內，這事幾乎等於玩命。林彪經過幾次試驗，對日本人的戰爭素質有了一定的認識，開始轉向軍隊的擴充和軍官的培訓（一九三八年五月，毛將林彪調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默然放棄了原先的衝動。毛對他在抗日軍政大學的工作非常滿意，曾說：「我們的抗大，要培養出幾百個，幾千個，幾萬個像林彪同志那樣的幹部來。」給予了特別的禮遇（林彪被送回延安治傷時，毛騎馬十五公里迎接）。

一九三八年，林彪經過國軍防線時遭到哨兵誤傷，一度前往蘇聯治病，回國後繼續擴軍練兵，等待戰爭結束。中共的軍隊在抗戰期間的壯大，他的貢獻甚大。毛在延安的整風運動，他幾乎沒有參加。這種做法在黨內非常出格，但毛絕不是不能隱忍的人。

然而毛也不是那種記性不好的人。幹部整訓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突然傳來蘇聯出兵滿洲的消息。毛向閃電一樣迅速地做出反應，立刻停止運動，解放正在改造的幹部，把他們派到最危險的地方去，同時向美國人、蘇聯人和國民黨表示友善和忠誠，希望借用他們的交通工具，盡快運送幹部和軍隊。美國人同意用飛機給他們運兵，接收華北各地。蘇聯開放了他們占領的滿洲和朝鮮，通過大連港接應從山東渡海而來的八路军。國民黨的態度取決於各地的要人。衛立煌的戰區對他們一向友好，掩護了晉、察、冀邊區的建立。閻錫山的戰區戒心很重，引起了最初的衝突。傅作義的戰區以前非常友好，人送外號「八路半」，現在卻捨不得平綏鐵路的戰利品，以致反目成仇。林彪奉命協同高崗，進駐蘇聯占領的滿洲。滿洲經過日本人的多年建設，號稱東方魯爾區，年產飛機上千架，軍事工業超過了關內各省總和的兩倍以上，品質更不是大後方山溝裡的小廠所能比擬。

7 平型關一戰前後，毛在電報中反覆強調，「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暴露紅軍目標，引起敵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而林彪則表示「目前須打勝仗，捉俘虜，提高軍民抗戰信心，提高共產黨與紅軍威信」。

8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林彪赴蘇聯就醫。一九四零年三月，林彪接替任弼時任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負責人。

9 高崗（1905-1954），陝西米脂人，高崗是陝北紅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集東北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號稱「東北王」。在高饒事件中被批判，自殺身亡。

的。滿洲的兵員吃大豆成長，人高馬大，面對喝稀飯吃小米的關內士兵，猶如俄羅斯人。手出現在南印度港口，看待後者的警察如同看待小孩。

國共雙方都看到了滿洲的重要性，但形勢顯然不利於國民黨。蘇聯為共產黨開放了海陸空三路，國民黨登陸滿洲而依靠的營口港和葫蘆島港遠不能跟大連相比。他們姍姍來遲，主要的資源已經掌握在對方手中。僅僅蘇軍第一、第二方面軍移交的武器就包括：三千七百門火炮、迫擊砲和擲彈筒，六百輛坦克、八百六十一架飛機、一千二百挺機槍、六百八十座各種軍用倉庫、松花江艦隊的船隻。曾克林（原八路軍第十六軍分區司令員）後來回憶說，他們在蘇家屯倉庫（位於瀋陽郊外，日本關東軍最大的武器倉庫，裡面的武器可以裝備幾十萬人）「先後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槍兩萬多支、輕重機槍一千挺，還有一百五十門各種口徑的迫擊砲、野砲和山砲」。不僅裝備了自己和到達滿洲的其他部隊，而且還向山東運送了一批武器彈藥，僅子彈和砲彈就有五百多萬發。大連兵工廠日夜開工，將重型砲彈送往華中，否則徐州戰役是根本不可能展開的。除此之外，林彪還獲得了一份厚禮：關東軍宿將老兵和日本技術人員。由於日本在「滿洲國」推行的建設是全面的、而且層級很高，這批寶貴的人力資源比閩錫山在太原招募的數千退伍日軍重要得多。山西的日軍只是戰時軍人，但林彪獲得的日本人不僅數量多得多，而且包括

了軍人和各類技術員，能夠提供一個工業社會的完整支援¹⁰。新的戰爭一旦爆發，這些資源就會給林彪一方投下決定性的砝碼。

儘管日本人給林彪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但他最可靠的支持者仍然是蘇聯老大哥。高崗用老幹部習慣的直率語氣說：「『勾子（屁股）』靠著蘇聯，只要把臉面前海上陸上幾個口子一堵，東北就是我們的了！」國共和談很快破裂，新的戰爭應驗了高崗的預見。毛澤東和林彪只需要討論次要的細節問題，諸如四平該不該堅守，錦州和長春哪一個更

¹⁰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的《紐約時報》報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外務省調查局局長加藤松平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向外界公佈，日本前關東軍官兵及其家屬，一共有十四萬人或被迫留在東北共軍中服役，或滯留在共產黨的控制區內生活；有教授士兵開砲打槍的，有教授飛行技術的，有跟隨部隊做戰術指導的，也有駕駛坦克和國軍直接交戰的。例如滿鐵技術員家庭的孩子砂原惠參加了土改、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中村義光留在第四野戰軍第二野戰病院。一九四九年，東北軍工部留用的技術人員一百八十六人中，日本人就有一百零三人，超過百分之五十。中華人民共和國空軍起源於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的林彌一郎部，這支關東軍的王牌集體加入東北民主聯軍時，計有飛行員二十名、機械師二十四名、機械員七十二名以及其他各類地面保障人員近二百人。林彌一郎在回憶錄《我與中國》當中說：他籌辦了東北航空學院，新中國第一代飛行員大抵是他的門生。這段因緣構成了日中友好協會的傳奇，林彌一郎後來擔任該會會長。林彪對這些日本人關愛有加，甚至為了照顧他們的飲食習慣，把珍貴的大米留給他們吃，讓自己的戰士吃高粱米。四野百萬大軍當中，只有幾萬人是關內和蘇聯派去的外來幹部。

重要之類，重要問題有史達林同志和蘇聯軍官負責，基本上穩操勝券¹¹。一九四七年年初，史達林派遣裝甲兵、航空兵、砲兵顧問和坦克、裝甲、運輸車支援退守松花江北岸的林彪，一舉扭轉了戰局。一九四八年，蘇聯專家顧問團進駐滿洲。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和弗拉基沃斯托克（海參崴）的軍事專家為林彪制定戰役計劃，阿穆爾河的太平洋艦隊的軍艦配合林彪的攻勢（《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蘇聯與滿洲革命根據地》O·波利索夫著），有不少專家死在滿洲。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在中共軍隊中的蘇聯軍事顧問（包括軍官和士兵），就有一百零二人陣亡，七百人受傷（不包括受傷後死亡的）。共軍內戰中所需要的一切幾乎全部來源於蘇聯，幾乎每支中共部隊都配備十名左右的蘇聯顧問，協調各個部門的行動、並保證戰鬥分隊的效率（B·傑里岑《燃燒的中國》）。毛澤東深恐林彪在關鍵時刻坐失良機，一再要求面見史達林。史達林不願公開接觸他，只派米高揚到西柏坡視察，幸好米高揚的判斷對毛有利：「一九四八年終，中共的戰鬥行動展開迅速，進展良好，在中國北部進行了決戰。在得到了我們全部給予中國的七十萬日本關東軍武器的中國革命軍，向北京方向的中國中心挺近（A·列托夫斯基文集）。」

一九四九年二月，毛澤東向蘇聯借債三億美元，希望蘇共提供日常必需品、石化

產品和汽車（他提出的具體數字是三千輛）。這些物資大部分都要交給林彪。他表示：「三億美元是我們的請求，我們不知道你們是否會給我們這個數額，或多或少，假如你們不給，我們也不會生氣（B·傑里岑《燃燒的中國》）。」周恩來希望蘇聯提供反坦克武器和重型坦克。不久，周又要求提供「鋼軌、液化石油氣、大約五千輛汽車和其他產品」。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史達林決定提供三億美元的貸款，年息為百分之二，每年六千萬，分五年提供，部分貸款以軍用物資和交通工具的形式支付。史達林說：「我們還……可以向滿洲政府出售幾艘掃雷艇，並且在大連、旅順和弗拉基沃斯托克培養中國水兵掃雷……提供四十架殲擊機……建立海軍，打撈中國近海的沉船，並協助修

11 據列多夫斯基說：「蘇聯政府在蘇軍解放了滿洲之後，便取將滿洲交與中共之手的方針。合約所訂蘇軍撤離滿洲的期限一到（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國民政府遂計向滿洲派遣其部隊，意在占領蘇聯紅軍撤離區域，但是莫斯科不允許國民政府向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原中東鐵路）派遣兵力；不允許國民政府從地方居民中進行部隊改編和警力擴充，使得國民政府失去了組建和使用國民政府行政管理機構的可能性。蘇聯政府還宣佈，原服務於日本關東軍的工礦企業以及其他設施，皆作為戰利品屬於蘇聯。部分企業設備被運往蘇聯境內。」「蘇共授意中共向滿洲派遣自己的軍隊——東北人民自治軍，後來，即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中共在派遣到滿洲軍隊的基礎上成立了東北民主聯軍（另有一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其兵力來源是地方游擊武裝和被中共控制的八路軍，人數將近一百萬人（另有一說二十七萬人），使得中共得以開展武裝鬥爭攫取滿洲政權，並以此為主要根據地作為依託在全中國展開與國民政府的權力角逐。」見《一九三七—一九五二年事件參與者的文件與證據：在中國命運之中的蘇聯和史達林》（A·列托夫斯基著）

理……建一個飛機裝配廠，我們可以給你們最先進的戰鬥機，想要捷克的，想要蘇聯的都行，目的就是你們用這些飛機培養自己的空軍幹部（A·列托夫斯基文集）。」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林彪的混合部隊席捲華中、華南。次年夏天，戰爭基本結束。

林彪的身體太差，飛機要求解甲歸田。他對朝鮮戰爭態度消極，對毛澤東給他的眾多官爵也不感興趣。他名義上是政治局的第六號人物，實際上連出席會議的時間都不多。廬山會議以前，他主要的活動就是養病。廬山會議其實也是毛拉他參加的，後者需要一個能夠替代彭德懷的人選。林彪從此擔任國防部長和軍委副主席，但日常事務多半由他的親信邱會作、黃永勝等人操持。他私下對毛澤東的評價甚低¹²，但在公開場合始終高調擁毛。劉少奇企圖將大饑荒的責任歸諸毛一人，他卻聲稱一切錯誤都是因為大家沒有正確理解毛的話¹³。劉少奇垮臺後，毛澤東只能依靠周恩來和林彪主持文武事務。兩人的精神狀態都不太好，林彪尤其需要藥品維持。他在這種情況下急欲奪權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不能排除他的親信和親屬可能利用他的力量。蒙古上空的墜機事件¹⁴迄今仍然是謎，當局事後來編輯的反林彪材料似乎只能證明他早已看透了毛，卻不能證明他有具體的謀反活動。當然，如果真有這樣的祕密謀反活動，當局不肯公佈要害證據也並不令人意外。

12 林彪在筆記中寫道：「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捏造是老毛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招。」「你先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聽他先說才可一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

13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林彪說：「現在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沒有照著毛的指示、毛的警告、毛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

14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半夜，林彪和家人駕駛飛機從北戴河飛往蘇聯，因不明原因墜毀於蒙古溫都爾汗，機上人員全部喪生。林彪以突然出走的方式結束了政治生涯，中共對此採取了保密措施，但隨著國外媒體的披露和林彪長期不出面，國內民眾逐漸得知了這一消息。從一九七三年開始，毛澤東發起了批判林彪的鬥爭，在中共十大上，林彪被定為「叛徒」、「叛黨叛國」，文革之後也沒有給林彪平反。

二二、遠東的幽暗之心

——蔣經國



蔣經國（1910-1988）的少年時代充滿了不安全感，一部分源於他父母的尷尬關係¹，另一部分源於口岸和鄉村兩種生活方式的衝突。兒童大抵有原始動物式的本能，能夠領會各種微妙的氣氛卻不知其所以然。青年蔣介石不是稱職的父親，不明白兒童的需要在於安全和愛撫的體會。他自己就是任性而衝動的人，又將上海灘起伏不定的浪人生活帶進了兒童高度敏感的世界。蔣介石作為父親，像許多自以為是的男人一樣，以為物質和成功是最重要的，對微環境的穩定性和心理安全感非常遲鈍，經常盲目地踐踏兒童世界的玻璃房子。他在物質上慷慨大方，但兒童恰好在物質方面極不敏感。蔣經國的母親屬於那種既軟弱又執著的類型，將自己的焦慮和怨懟投射給兒子。

少年蔣經國的認同偏向母親，對父親為他安排的前程採取應付過關的態度。他的世

界很早就分為內層和外層，隱忍和窺測的本領遠在同齡人之上。他從蘇聯的嚴酷訓練中倖存，端賴這種早熟的素質²。蔣介石在同樣的年齡，比兒子任性得多。這種差異反映了父子兩代人所處的不同環境，蔣介石的社會至少對青少年的健全人格更友好一些。蔣家雖然掙扎於小康和困頓之間，但泛化的儒家價值觀仍然籠罩全社會。蔣氏母子都不會懷疑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周圍的人都有明確的角色。富貴和貧賤的變化都是緩慢積累的產物，都是各個社會角色原先軌跡的自然延伸。蔣介石的家境可能困難，但顯然充滿了誠實和信任的氣氛。蔣介石喜歡當面得罪人，尤其是得罪領導，動不動就拂袖而去，或衝動起來往往孤注一擲，對不可逆性的失敗估計不足，他厭惡對東方太監式的詭詐，

1 蔣經國的母親是蔣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1882-1930）。一九零一年，毛福梅與蔣介石結婚，一九一零年生下蔣經國。此後，蔣又有了側室姚冶誠和新的妻子陳潔如。一九二七年，蔣為了與宋美齡成婚，毛福梅被迫與蔣離婚。

2 蔣經國一九二五年十月赴蘇，與馮玉祥等人的子女一同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並加入共青團（團小組長是鄧小平）。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蔣經國在學校的聲討大會上用俄語高呼「打倒反革命蔣介石」。在校期間，他成為蘇共候補黨員。一九三三年，蔣經國與王明發生正面衝突，共產國際因此要求將他流放到西伯利亞。這是他在蘇聯生活時期最艱難的歲月。《真理報》曾經刊出蔣經國寫給母親毛福梅的信，說父親是「全體人民公敵，因此也是他兒子難以和解的敵人」。這封信出自王明之手，王寫好之後，讓他簽字。他再三拒絕，最後還是簽了。

一九三五年，他與女工芬娜結婚，芬娜後改名為蔣方良。一九三六西安事變後，蔣經國回國成為可能。十二月十六日，周恩來與蔣介石會面，擔保蔣經國可以回來。一九三七年二月，蔣經國在莫斯科的告別茶會上說：「中央派我到中國，以便把家父爭取到我們這一邊。」

並回敬以方向感很差的暴戾。戒懼的惡習大體是血氣之罪，中年以後，蔣介石用儒家和基督教的道理修身養性。女人、攀龍附鳳者和惡意陰謀家都有理由認為，這種男人很好對付。他的雷區暴露在明處，沒有長期掩飾的能力，順著他的脾氣就能牽著他走，即使讓他吃虧都不用擔心他反悔。

蔣經國從蘇聯回國時，性格就已經定型。跟他父親恰好相反，他的硬智力不如父親，卻有女人和特工比較常見的那種擅長體貼和操縱別人感情的能力。他父親用人恩多威少，卻因為性格多稜多角而不斷得罪人。他自己用人則外寬而內忌，物質方面遠不如父親慷慨，暗地的監視和牽制卻遠遠超出了父親的性格和智力允許的程度，取得了不遜於安德羅波夫³和周恩來的統戰成績。蔣介石待專家學者厚道，但為人剛愎固執，不會逢迎文化人的虛榮心，對自己的經驗抱有也許是過分的驕傲，結果經常被這些文化人抹黑成不學無術的文盲，其實他的知識水準在外行人當中已經算是優秀了。蔣經國比較注重方式方法，自己又非常缺乏虛榮心，擅長挪用周圍專家的意見，懂得把握在出乖露醜以前閉嘴的節奏，儘管知識背景比蔣介石還差，卻能給粗心的觀察者留下超出實際水準的印象。

蔣介石在私生活中是激情的奴隸，很容易做出好色自私的男人會做的事情，但如果面對比自己更加高貴和堅定的女人，根本就沒有佈局和控制的能力。蔣經國的私生活像優秀的克格勃人員一樣恐怖，幾乎無法區分老謀深算的佈局和個人感情的流溢，甚至很可能他從蘇聯返回後就已經習慣於不再區分公私領域了。蔣介石和陳潔如⁴的故事屬於情慾驅使的凡夫俗子，在經驗豐富的小說家、律師和牧師看來十足乏味。蔣經國和章亞若⁵的故事屬於周恩來和潘漢年的無間世界，瀰漫著為黨國自關的特殊材料加工廠氣息。情慾衰退後，人多半會慢慢流露本色。蔣介石的晚年越來越像專橫仁慈的儒家大家長，

3 安德羅波夫(1914-1982)，蘇聯政治家，曾任蘇聯 KGB 首腦，一九八二年接替勃列日涅夫成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安德羅波夫是蘇聯歷史上第一位從情報領域的領導人升任蘇共和蘇聯最高領導人，他在任 KGB 主席十五年中，強化了 KGB 組織，建立了一個較穩固的權力基礎。他傾向於反對個人崇拜，儘量避開禮儀性活動。

4 陳潔如(1906-1971)，出身商人家庭。一九一九年，已有一妻一妾、年過而立的蔣介石初次見到陳潔如，就對她軟磨硬泡展開追求。蔣向陳母表示有意明媒正娶陳潔如，並聲稱自己已與原配及侍妾脫離關係。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蔣陳結婚。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為與宋美齡結婚，安排陳潔如赴美留學，隨後在《申報》上刊登啟事，宣稱與其「本無婚約」。而蔣介石日記中涉及陳潔如的許多紀錄，均被墨筆抹去。

5 章亞若(1913-1992)，一九二六年結婚，並育有兩子，後丈夫去世。章亞若一九三九年擔任蔣經國秘書，隨後與蔣經國發生婚外情，並於一九四二年初在桂林生下兩子蔣孝嚴、蔣孝慈。同年八月十五日，她在桂林醫院突然死去。蔣孝嚴後來說：「經過長期縝密的查證，我很確定母親章亞若是被父親蔣經國的手下害死。」另外，蔣經國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蔣介石始終不知道蔣經國、章亞若的戀情，更不知道兩人育有孝嚴、孝慈二子。

宋美齡的晚年越來越像虔誠的中產階級基督徒。蔣經國的晚年可怕地酷似安德羅波夫的最高峰，把全部私生活都變成了統戰工作的一部分，甚至死後都得到了安德羅波夫一模一樣的勝利和失敗。蔣方良⁶的晚年酷似加里寧同志的妻子，只剩下擠乾了一切水分的橘子皮。

宋教仁和汪兆銘的性格仍然屬於前一個時代，以波蘭獨立戰爭和日本明治維新的中國版主角自居。蔣經國和劉少奇已經屬於後一個時代，將浪漫的犧牲和邪惡的密謀同時去魅，甘做革命不知疲倦的會計師。蔣經國的仕途始於贛南特區，代表國民黨內親蘇勢力的抬頭。國民黨的黨務部門和情報部門即使在清黨以後仍然是左派的大本營，把地方勢力和軍隊看成有待於繼續革命的腐敗勢力。蔣經國的權力之路恰好從這兩個缺乏榮耀的分支起步。張聞天政府涸澤而漁的政策瓦解了長期妨礙國民黨深入群眾的宗族和土豪，使贛南變成了一張易於畫圖的白紙⁷。蔣經國只用了微不足道的福利貸款，就將已經一貧如洗的殘民變成了依靠社會工程為生的雇傭人員。新贛南的社會組織由開明的技術官僚和馴服的窮人組成。蔣經國組織模仿蘇聯的群眾組織，負責將工程師應付不了的髒活排除在他們的視野之外。只要中央政府支援模範工程的資金流持續不斷，這場遊戲就可以永遠玩下去⁸。但抗戰後期的形勢並非如此，因此蔣經國最終拋棄了這條政策和

財政闖尾。

在抗戰後期，國民黨親蘇派遭到最尷尬的挫敗，他們的理想國家被地緣政治和分贓機會無情地打擊。黨內的腐敗分子對此是滿不在乎的，他們早就默認東北和西北至多算國府的藩屬國，預見到左派整頓地方勢力的企圖肯定會得罪蘇聯。他們又一次看準了。在這場遊戲的結尾，蘇聯將腐敗的地方派系和鴉片販子恭維成開明士紳和社會賢達。一心改造社會的積極黨員和熱愛進步的技術官員反而得到了蘇聯贈送的極右分子的帽子，

6 蔣方良（1916-2004）隨蔣經國來到中國後，再也沒有回過蘇聯，一直保持低調，很少露面。她晚景淒涼，蔣經國死後，三個兒子也相繼去世。臺北國史館邀約她口述歷史，也被拒絕。

7 南京國民政府收復「中央蘇區」時，這裡已經凋敝不堪。據統計，瑞金、寧都、興國、雩都、會昌、石城、廣昌七縣原有人口一百五十餘萬，被帶走充當紅軍者達十五萬六千餘人，在肅反運動中被害者四萬多人，因缺乏醫藥而患病者一萬餘人。故人口銳減，尤以壯丁缺乏為甚，計僅有人口八十餘萬，且多半老弱殘廢，壯丁不及百分之三十。

8 一九三九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六月，蔣經國擔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贛南）行政督察專員和保安司令，他提出「建設三民主義新贛南」的口號，在此展開的「新政」包括：查禁菸賭娼、整頓吏治、取消苛捐雜稅、設立貧民救濟機構、日用必需品統籌統購，等等。由於他身分特殊，贛南各縣所徵田糧賦稅基本上由他全權處理，而不用向上繳納，此外，中央所屬的大庾鎢礦的鎢砂由他徵收「地方附加稅」，財政部鹽務署也在贛州設立了湘閩皖贛四省督運處，由他兼任處長，由此得到了許多額外收入，使他的「贛南新政」基本上沒有資金上的負擔。

因為他們的折騰破壞了灰色緩衝地帶，將國民黨推到了必須跟蘇聯正面衝突的危險位置。

蔣經國在此期間屬於上述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派系，他在西北和東北的試探活動暴露了該派系眼高手低、虎頭蛇尾的性格⁹。如果蔣介石當真打算利用這些機會栽培他，那麼他的表現顯然已經證明自己還沒有成熟到值得栽培的地步。二戰與冷戰之間的幾年，他的命運就是打入冷宮。這不是他個人的厄運，統一戰線時代的粉紅色人物在冷戰前夜大都落到左右不是人的下場。蔣經國在政治上相當於國民黨的華萊士¹⁰，本來很可能就此結束政治生命。上海打虎失敗¹¹，證明資本主義政治框架妨礙了社會主義管制順利展開。進一步就是陳雲，退一步就是岸信介。蔣經國本人意氣消沉，沒有表現出決斷的勇氣，幸而國民黨及時崩潰，替他做出了選擇。

蔣經國赴臺初期，主要負責情治工作的整肅和重建。國民黨習慣將這些工作交給黨內左派，以及真實或偽裝的前共產黨人。蔣經國深厚的蘇聯背景使他特別適合駕馭這些人。他麾下的前共產黨人，對台灣五十年代的所謂「白色恐怖」負有最大的責任，老派軍人或體面的資產階級人士遠不如他們擅長斬草除根。他們一方面消滅了本土士紳，實

質上完成了對岸同黨的階級鬥爭工作；另一方面又消滅了自己在島內的同志和晚輩，實質上完成了對岸同黨的自相殘殺工作。他們在前一方面的徹底性不及對岸，結果導致臺灣新生代土豪提前以民主主義復辟；在後一方面的徹底性大於對岸，結果導致臺灣技術官僚提前以建設名義搶班奪權。

蔣經國本人從特務首腦轉型為內閣首腦，本身就反映了這兩種相反相成的發展趨

9 一九四二年，蔣經國曾赴西北考察。而二戰結束後，蔣經國被任命為外交部東北特派員。他冀望爭取合作，在蘇聯明目張膽地掠奪滿洲的工廠、機器設備時採取忍讓態度。一九四五年耶誕節，他前往莫斯科，兩度拜會史達林，尋求滿洲問題的解決。但蘇方並不信任他，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認為他「偽裝是蘇聯真心的朋友」。在交涉失敗後，蔣經國備受抨擊，政治地位下降。此後兩年，他的曝光率極低。

10 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1965），羅斯福時期任農業部長、副總統，杜魯門時期任商務部長。他象徵著新政民主黨人的平民哲學，設計了整個三十年代民主黨政府引起爭議的農業政策。杜魯門上臺後，他反對與蘇聯對抗，被人稱為「史達林主義的走狗」，最後遭到解職。

11 一九四八年八月，蔣介石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等法令和辦法，宣佈發行金圓券，實行限價。行政院特設經濟管制委員會，下設上海、天津、廣州三個督導區。上海區以俞鴻鈞為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為助理。蔣經國雖名為助理，實際上負全責。到上海後，蔣經國即「以伸張正義的做法，嚴懲囤積居奇的奸商、汙吏，穩定民生必需品的供應」，同時希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獲得廣大民眾的共鳴和支持」。先後扣押上海申新紡織公司總經理榮鴻元及杜月笙之子、鴻興證券號負責人杜維屏等「老虎」，轉交法庭審理。蔣經國用高壓手段「限價」，嚴禁物價上漲，從而形成更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十一月一日，行政院宣佈取消限價。當日，蔣經國發表《告上海人民書》，承認自己未能盡責完成任務，在若干地方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應向政府自請處分。

勢。他主持的保密局和國防安全會議在五十年代初期取代了鄭介民和毛人鳳的舊班底，在五十年代中晚期模仿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轉型為正規的技術官僚組織，中層幹部的培訓和技術裝備的補給完全依賴美國的對口機構。國防部情報局對應美國中央情報局，司法部調查局對應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會議模仿美國的類似做法，不設實際管理機構，協調所有情報治安機構，包括駐外武官處和島內憲兵司令部，論實權僅次於總統和行政院長¹²。後來的評論家有意無意忽略了剿匪對民主的規範性和刺激性作用，恰好跳過了最關鍵的一環。臺灣情報機構的現代化先於軍隊和政府，現代化的節奏恰好跟蔣經國從保密局到國防部和行政院的節奏同步。現代化的成功就是中原流亡領導人武斷權力的結束，或者說是美國世界秩序的內化。工作人員對無論民選還是任命的領導都沒有多少依賴性，但美國導師和同儕的交流共用只要中斷六個月就會讓他們混不下去。從此以後，周恩來和李克農的特工工作模式實際上已經過時了。從後來的江南案¹³來看，美國情報機構一般能夠先於臺灣政治領導人瞭解臺灣情報部門的真實做法。這種基於溝通習慣的柔性規訓和基於天花板約束的剛性規訓構成了臺灣不成文憲法的核心部分，成文憲法必須通過重新解釋符合世界憲制的基本框架。蔣經國如果完成不了第一階段的任務，就不會有多少機會坐穩行政院長的位置。只要他能夠坐穩行政院長的位置，經濟政策大體是一個搭順風車的問題（一九七二年三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大力推

行國民黨的本土化)。美國佈局於外，美國訓練的中層管理人員配合於內。冷戰格局的機會窗口配合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領導人只要識時務就行了。

蔣經國似乎沒有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不希望出現吸引眾望的明確繼承人。他不斷提拔技術專家和政治外行擔任副手，然後在他們積累到足夠的經驗和聲望以後，重新換上新一代沒有經驗和聲望的技術專家和政治外行。如果他像自己以為的那樣，還可以多活十幾年，李登輝是沒有多少機會在一九九零年代繼續擔任副總統的，很可能會在後來

12 一九五零年三月，蔣介石任命蔣經國為「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兼任特設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負責整合已有的情報部門。為了清除道路，蔣介石親自勸退了中統的陳立夫。蔣經國將軍統、中統兩大特工組織合為一家，將兩局人員混編，打破兩局長期以來的半敵對狀態，建立現代諜報體制，結束私人割據的局面。

一九五四年，在蔣經國的推動下，蔣介石設立以鄭介民為局長的國家安全局，而蔣經國則是國家安全局的實際領導者。此外，還分別設立仿照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模式的國防部情報局和仿照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模式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憲兵部隊、大陸工作會、海外工作會、駐外武官處等情報機構，均定期向總政治部及國家安全會議報告，接受督導。至此，蔣經國成為全島超過五萬多特工人員的共主，在國民黨內成為僅次於總統蔣介石、行政院院長陳誠的第三大人物。

蔣經國執掌情報部門時期，臺灣對內部的整肅達到高潮。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七年解嚴為止，被捕入獄的人數將近三萬人。經查證，錯殺的無辜民眾總計約五千人以上。

13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著有《蔣經國傳》的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被臺灣情報局雇用的臺灣竹聯幫人員刺殺身亡。劉宜良為大陸收集情報，同時也是FBI的線民。

的繼承人面前扮演類似林洋港的角色。不過，李登輝的仕途和本土化的政策是兩回事。後者是蔣經國在繼位以前就已經開始的佈局，非常不可能因為具體人選的更動而改變。蔣經國自己主持的本土化不一定導向民主化，但肯定包括了封鎖統派路徑的意圖。他是國民黨內最瞭解蘇聯政治語言的人，而廖承志的遊說¹⁴已經暴露了特洛伊木馬的未來安置方式。有限、可控的本土化恰好能讓對方吃啞巴虧，而自己仍然處在可進可退的有利地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啟動的遊戲在自己身後完全失控。

這主要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臺灣憲制必須適應世界憲制演化的問題。隨著羅馬世界（指美國主導和維繫的全球秩序）的來臨，外邦人重啟多極世界的成本日益超過購買羅馬保護的成本。羅馬憲制僅僅通過對外邦憲制行使世界憲制的仲裁權，就已經足以整合全世界絕大部分邦國的秩序資源和物質資源，對任何潛在的帝國覬覦者預先實施天花板鎖閉和路徑鎖閉。從系統演化的角度看，羅馬世界逆行為多級世界的可能性並不太陽系逆轉為星雲的可能性大多少。獨攬霸權的羅馬和沒有霸權欲望的小邦通過互利共生的演化，將分享競爭性霸權的地方性強國生態位瓜分殆盡，以至於後者已經不可能用文明與合法的方式重演前輩的成功了。

蔣經國死於冷戰結束的前夜，享受了天意能夠賜予政治人物的最大恩惠：死得其時。否則他只要多活十年，無論如何決斷都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從所有各方贏得超過其應得的讚美，倒是很有可能得罪所有各方。

14 廖承志（1908-1983），廣東惠陽人。廖仲愷與何香凝之子，一九四九年前多數時間在國統區工作，一九四九年後，歷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僑辦主任，港辦主任等職。長期是中國共產黨海外統戰工作負責人。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廖承志致蔣經國先生的公開信〉，信中聲稱「臺灣終必回歸祖國」、「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國共應該「再次合作」。

一三三、東方的馬基維利

——毛澤東



毛澤東（1893-1976）出身於湘軍老兵的家庭，習慣受寵，任性自私。他父親按照鄉下的標準，算是見過世面的老江湖。他不僅帶回了一些軍餉和戰利品（當時普遍認為欠餉可以用搶劫特許權沖抵），而且帶回了膨脹的野心和發財的野路子¹。曾國藩後來悲哀地承認，老兵油子的發財模式搞壞了老家的社會風氣。鄉鄰覺得毛家改善生活的方式，蘊涵了漠視小共同體道德義務的邪惡元素。毛澤東像大多數寵兒一樣聰明，看穿了這一點。毛澤東的父親一面用道德的名義和橫暴的方式，要求兒子絕對服從振興家業的偉大計畫；然而他振興家業的方式，偏偏又讓左鄰右舍覺得不道德。毛澤東抓住這裡面的矛盾，狠狠地折磨父親，甚至勾引幫會盜匪，搶劫自家的財產²。毛澤東的敵人經常指責他，自家就是鄉下的地主和商人，憑什麼以無產者的領袖自居，跟自己的階級兄弟作對。從利益結構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樣的指責完全正確；然而從心理結構和人類

的本性出發，適得真相之反。

虛偽橫暴的父親（老財）面對聰明軟弱的兒子（窮人），構成了地主資本家——工農無產者之間進行階級鬥爭的心理原型。毛澤東如果不是因為小時候痛恨父親，長大以後就不會痛恨父親的階級兄弟。童年的痛苦和屈辱對人格損害最大，因為只有這種傷害沒有辦法報復。階級替身連坐完全不符合理性，卻非常符合人性的黑暗核心。許多男人喜

- 1 「毛節儉的父親有條不紊地繼續著其致富生涯。他不再買地給自家人種，而是從其他農戶手中買下他們的地契，使這些農戶都成為他的佃戶。他用這種辦法積累了一筆可觀的、數額在二千至三千銀元之間的財富。……每逢秋天，為了還債，大多數農民都不得不將自家生產的、也為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糧食，以打了很大折扣的低價，賣給像毛澤東的父親這樣的投機商。到了春天，也就是青黃不接、糧價上漲的時候，他們又不得不以高價從其手中買來數量同他們賣出的差不多的糧食，以免挨餓，並因此而蒙受沉重的經濟損失。」（亞歷山大·潘佐夫《毛澤東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胡蓉在《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史海回眸）一文裡提到，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回憶說：「毛順生很會做生意。後來，光靠銀元、銅錢來周轉經濟不夠，就自己出了一種『義順堂』的票子，代替貨幣。票子是紅色的，別的票子人家不要，只要是『義順堂』的就要。」
- 2 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寫道：「一個農民秘密會黨哥老會的一些成員到毛家行竊。澤東在多年後回憶說：『我想這是件好事，因為他們偷到了他們沒有的東西。』這種大逆不道的觀點不僅遭父親反對，『我母親也不贊成。』澤東承認說。……在澤東十七歲那年，時值青黃不接，韶山發生了糧荒。……毛順生這個『大戶』……在饑饉襲擊韶山時，他居然還往長沙販賣糧食。憤怒的村民攔截了他的貨船，把糧食搶個精光。『我並不同情他。』澤東談及當時暴跳如雷的父親時說。」

歡折磨女人，因為他忘不了第一個女朋友對自己的傷害。五四青年小時候反抗不了包辦婚姻，長大以後報復不了塚中枯骨，所以特別痛恨吃人的禮教，實際上出於同樣的心理結構。只是這樣的報復猶如海水解渴，越喝越渴。如果一個人僅僅從抽象理論出發，憎惡資產階級，就很容易變成徵收遺產稅的工黨幹事長，卻不會像毛澤東那樣觸發出肉體搏鬥必需的嗜血衝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需要另一條路線的心理驅動。

非驕兒不足為逆子，毛澤東就是這種類型。他反叛家庭的資本，來自父親對他的額外教育投資。愛與恨具備奇妙的鏡像關係，容易促成愛恨雙方的相互模仿。毛澤東一面反叛父親，一面繼承或接受了父親精明現實的性格。他早在默默無聞的青春期，就以嘲笑同齡人天真的理想主義為樂。他似乎很享受由此產生的心理優越感和虐待狂快感，像上癮的酒鬼一樣越來越離不開這些刺激。袁世凱的總督湯薌銘以曹錕的侵略軍為後盾，暫時壓制了湖湘本土派的反抗，在長沙實現了「華沙的和平」。民族英雄蔡松坡動員西南聯軍，粉碎了袁世凱重建帝國的陰謀。湘人乘機揭竿而起，驅逐了可憐的湯薌銘。毛澤東的同學無不興高采烈，唯獨他急於炫耀馬基維利主義的冷靜。他宣稱「湯督決不可去」，因為征服者無論有多壞，畢竟用殘酷的手段建立了秩序，推翻暴政是容易的，重建秩序卻是困難的（潘佐夫：《毛澤東傳》）。事態的發展完全驗證了毛澤東的分析，

證明他的馬基維利天賦遠在同儕之上。

毛澤東如果是一位誠實的政治學研究者，順著這條路徑，就應該走向李大釗、白堅武³的國家主義——威權主義理論（當然李大釗其實也不過是投機威權主義而已）繼續反對本土派驅逐張敬堯的運動⁴，因為張敬堯無非就是第二個湯薌銘。但他內心深處仍然在父親的價值觀支配之下，他不是真心信奉威權主義，而是要通過論證威權主義的道理，證明自己的聰明和能力。如果其他投機對象比袁世凱和段祺瑞的威權主義更容易將他的才智和能力變現，他一秒鐘都不會猶豫。二十年代的本土運動似乎比袁世凱時代更有成

3 白堅武（1886-1937），河北交河人。十八歲中秀才。一九零七年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與李大釗同學並成為至交。民初，曾任記者和政府低級僚屬。期間與李大釗創辦法政雜誌《言治》。後入吳佩孚幕府，曾任吳佩孚軍總部政務處處長，號稱吳佩孚之「小內閣」。其後國民黨北伐，吳佩孚徹底失敗，而白堅武也喪失了政治發展的機會。他認為，國民黨標榜訓政卻無法可依，較之北洋時代實為歷史的倒退。故轉向與日本合作，後以漢奸賣國罪名被馮玉祥處死。

4 張敬堯（1881-1933），安徽霍丘人。一九一八年一月，奉段祺瑞之命，張敬堯進軍湖南省，討伐南方政府（護法軍政府），並實際控制了長沙及岳陽一帶。張敬堯的統治手法偏向榨取式，表現得拙劣、腐敗，遭到湖南省社會各界反對。一九二零年初，湖南驅逐張敬堯運動達到高潮，張敬堯雇傭鄂人漳組成旅京「湘事維持會」，為張敬堯進行辯護。為此，毛澤東與羅宗翰等四十五人聯名致信各報館各團體，揭露「湘事維持會」的內幕。毛澤東不反對湯薌銘卻反對張敬堯，證明他並非出於前後一致的信念而只是投機。

功機會，他就迅速擱置了優秀的馬基維利主義者對民主小清新的天然鄙視。

一九二零年六月，湘獨運動的大老給了毛澤東兩萬大洋，對師範生而言，無異於一筆橫財（馮勝平：〈毛澤東的良心債——兩萬大洋的來龍去脈〉）。他立刻投入本土派
的宣傳運動，以優異的成績證明了自己的投資價值。這些宣傳包括：〈湖南改造促成會
發起宣言〉、〈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湖南改造促成會覆曾毅書〉、〈湖南建設
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
做起〉、〈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全自治」與「半自治」〉、〈為
湖南自治敬告長沙三十萬市民〉、〈湖南自治運動請願書〉等。

毛澤東和彭璜依靠青年湘獨運動一夜成名，變成了湘人的梁天琦和陳浩天。毛澤東
說彭璜「志高有勇，體力堅強，朋輩中所少」（〈毛澤東致彭璜書〉，一九二一年一月
二十八日）。湖南《大公報》推出定期專欄「湖南建設問題」，由他們兩人主筆。彭璜
發表了〈對於湖南建國的解釋〉，指出「要立『國』，就是要獨立，要根本改造，要有
獨立憲法，要完全自治」。湘獨理論不是毛澤東和彭璜首創的。他們的前輩和同胞蔡松
坡將軍早就提出：中國類似羅馬帝國，湖南類似羅馬廢墟上產生的英格蘭和法蘭西。梁

啟超和晚清立憲黨人發明的「中華民族」，不過沒落大一統帝國的借屍還魂而已。「湖南者，亦猶羅馬之英法，可謂能有新機耳。特湖南省也，英法國也，同異之間，如是而已。」（斯蒂芬·普拉特：《湖南人與現代中國》）青年湘獨分子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否定了章太炎和晚清革命黨人發明的「漢族」，強調只有湖南民族才是歐洲意義上的「民族」⁵。

一九二零年十月十日本來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自然會引起湘獨勢力的一片嘲諷。湖南《大公報》副主筆李景僑發表社論：「我們不慶祝過去的中華民國，應慶祝將來的湖南『國』，不可嗎？……中華民國騙了我九年的『慶祝』，不又被湖南『國』連本帶利都騙去了。那麼國慶日的時評我還是不作！」毛澤東的第一批粉絲當中，還包括未來

5 彭瓊在〈怎麼要立湖南「國」〉一文中說：「深覺得這個籠統混雜的漢族名目，壓住了我們湖南人的向上，阻止了我們湖南人的進化，牽制了我們湖南人的發展本能！現在硬覺得我們湖南人不叫是漢族了！要不然，就是『非湖南人』不叫是漢族？湖南有湖南人的特性，湖南有湖南人的風俗，湖南有湖南人的感情與本能。移言之，湖南地方的人民，是有一種獨立的『民族性』。這個『民族性』很不與各省同胞相類，所以認定湖南人與各省同胞是同一民族，原來是個解釋民族的莫大錯誤！……中國的湖南，簡直是英國的愛爾蘭了？凡是主張正義人道的人，哪個不贊成愛爾蘭獨立……湖南人的精神果猶未滅絕！就應當趁此晨光萬丈的時代……大呼精神獨立！民族獨立！湖南獨立！」

的第一代共青團領袖張文亮。張文亮當時更傾向世界大同，但他也堅信湖南民族比漢族或中華民族更適合充當全人類自由聯合的基本單元。「我更希望把『中國』二字遠拋東海……欲談湖南國，絕不容再所謂『中國』存在！」（斯蒂芬·普拉特：《湖南人與現代中國》）

陳小雅後來提出，彭璜可能死於毛澤東的謀財害命。無論此說的依據是不是足夠充分，彭璜的失蹤確實給青年湘獨運動造成了重大的損害。運動失去了銳氣最盛的先鋒彭璜以後，又失去了最有力的金主譚延闓。趙恆惕取代譚延闓，完成了基本法的制定工作⁶，仍然將毛澤東視為湘獨運動的後起之秀，對他的「文化書社」⁷關照有加，但運動的衝鋒陷陣階段已經結束，毛澤東再也不能指望大筆的現洋。然而，共產國際和國民黨的盟約正在形成。他們無論盧布還是武器，都比湖南土豪強大得多。譚延闓身為國民黨的元老，可以理直氣壯地歸隊。毛澤東沒有體面的變節理由，但他也不像大地主那樣需要面子。維經斯基在上海賣掉了布爾什維克從俄羅斯搶來的珠寶，尼克爾斯基決定分出一部分招募亞洲苦力。毛澤東拿到兩百大洋的交通費，欣然前往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⁸。

毛澤東在會上幾乎無話可說，但主持會議的俄國間諜（尼克爾斯基）和荷蘭煽動家（斯內夫利特，中文馬林）都有理由認為：愚昧閉塞的亞洲內地只要出得了湊數的代表就不錯了，其他方面不能太苛求。毛澤東只要能解決經濟問題，同樣不會太在意金主的立場。共產國際同意每月給他六十大洋的津貼，後來又增加到一百七十塊大洋，比歧視他的北大教授還要多。於是，毛澤東暫時過上了幸福的無產階級革命生活。他用組織提供的經費，盤下了長沙清水塘的房子，畢生第一次有錢雇傭人，這是鄉下的剝削階級父

6 趙恆惕（1880-1971），湖南衡山人。一九二零至一九二六年湖南軍政首領，勢力後臺為直系軍閥吳佩孚。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他召開湖南省議會，積極倡議聯省自治，創制省憲。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趙恆惕正式公佈《湖南省憲法》。

五月一日，湖南第一屆省議會自行集會。九月十日，全省縣議員投票選舉，趙恆惕高票當選為省長，就任由《湖南省憲法》所產生的中國首位間接「民選省長」。一九二六年春，唐生智起兵進逼長沙。趙恆惕為了避免湖南重起內戰，主動提出辭呈，離開長沙，退居上海。

7 一九二零年八月，毛澤東、易禮容、彭璜等創辦於湖南長沙。主要銷售馬克思主義書刊。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文化書社緣起〉，指出：「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用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人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8 楊奎松在《讀史求實》裡指出：「維經斯基受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國開展工作，其相關的活動經費亦由東方民族部提供。而東方民族部為籌措經費，曾派遣特使帶上價值十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去賣，並不止一次地託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帶去的確切的經費數目即為二萬美元。」一九二二年中共一大召開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為旅費的一百元匯款。參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

母永遠不敢指望的（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如果彭瓚沒有失蹤，譚延闓仍然慷慨解囊，毛澤東會不會留在他的湖南祖國，頗能發人遐想。毛澤東缺乏語言天賦，在北京做每月八塊錢的圖書管理員期間，連滿大人語都沒有學會。北大的輿論領袖根本聽不懂他的湘語，使他備感屈辱。他的同儕忙於留法、留俄，但他寧願留在家鄉。其中的心理因素顯而易見，他只有在家鄉才能找回高人一等的感覺。他即使到了晚年，都非常不願意接觸層次高於自己的人，不僅受不了「言必稱希臘」的匪諜系，甚至連身邊的女人都要越換越土。山中無老虎，猴子才能稱大王。梁山泊有了林教頭，白衣秀士王倫就會渾身不舒服。毛澤東最後將東亞大陸改造成全世界最大的禁室，只有封閉環境才能保證粉絲越來越蠢，從而無限延長偶像的高峰體驗。

毛澤東出於這樣的心理，只要祖國湖南還有他上升的管道，大概是不願意背井離鄉的。彭瓚和譚延闓如果直到一九二八年仍然不負初心，毛澤東很可能會繼續攀登他們搭建的社會階梯。這樣一來，他就會淪為國民革命軍追剿的反動派。湖南土豪勢單力薄，因此他只能逃入湘西群山，但他的軍事才能用在本土，會比用在井岡山更為得心應手。黨軍在有機會統一東亞大陸以前，就要迎擊日本泛亞主義的老朋友。皇軍一來，毛澤東

仍然會得到下山的機會。歷史對他的評價，很可能類似翁山將軍和蘇卡諾。

馬林（斯內夫利特）最初根據他在爪哇的經驗，準備讓國民黨發揮類似「穆斯林聯盟」的白手套作用，開展反帝工人運動。毛澤東一如既往，除了實力以外，什麼都不相信。馬林回憶說：「毛澤東對我解釋：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毛澤東告訴我，湖南有三四萬現代工人，他對工會組織已拿不出任何辦法，所以十分悲觀，甚至認為拯救中國唯有靠俄國的干涉。我不像毛澤東那樣的悲觀，認為應該像現在這樣實幹。」（朱洪：〈毛澤東進入「三大」中央局和馬林的關係〉，《百年潮》，二零零四年第一期）毛澤東相信，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可能變成馬林向季諾維也夫承諾的群眾黨，既然俄國的援助給了廣州的國民政府廣州，那麼共產黨人當然應該加入國民黨。毛澤東永遠比其他更現實，不像張國燾那樣需要說服。馬林對他的配合感到滿意，派他去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大」。因此，青年國際代表達林（Sergei Dalin）把毛澤東算

9 翁山（1915-1947），帶領緬甸脫離英國獨立的軍事領袖。一九四二年，翁山接受日本的援助，協助日本攻打緬甸的英國殖民政府，以推行民主政治來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後改為與盟軍合作。但在緬甸正式獨立前，翁山被暗殺身亡。蘇卡諾（1901-1970），印度尼西亞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日本帝國占領印尼期間（1942-1945），蘇卡諾曾經與日軍合作對抗荷蘭殖民地軍隊。

成了「馬林的人」（袁南生：《毛澤東、蔣介石與史達林》）。

毛澤東在廣州獲得了汪兆銘的賞識，代理宣傳部工作。汪兆銘當時採取了「向左派開放」的策略，特別樂於提攜後進，從而凸顯自己的「少主」資格。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的身分，出席了國民黨二大。他出於機會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的本性，覺得國民黨比共產黨和湘獨運動更有出息，準備再次改換門庭。達林忍無可忍，告訴維辛斯基：「毛秘書（毫無疑問是馬林安插的人）說話，簡直讓你毛骨悚然。例如他說國民黨過去和現在都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達林致維辛斯基信》，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日）如果汪兆銘在蘇聯的支持下趕走了蔣介石，毛澤東很可能走上陳公博¹⁰的道路。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發動了一起類似古巴導彈危機的攤牌。蘇聯人退卻了，汪兆銘憤而出走。汪系人馬聯翩辭職，毛澤東也丟了代理宣傳部長的差使。

汪兆銘下臺，可以去法國休養。毛澤東下臺，就只剩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閑差了。國民黨的農民運動始於粵東，主要由蔣介石和周恩來負責。粵東士紳階級哺育了孫文和陳炯明，資助了辛亥革命和護法戰爭，最終被外省人的黨軍和貧下中農掃地除門，成群結隊地逃往香港，絕大部分都沒有回來。毛澤東在此期間，忠實履行了魯迅的建議，

只管在革命的飯鍋裡舀飯吃，其他什麼事情都不管。北伐軍占領湖南後，開始如法炮製地建立各地黨部和群眾協會。毛澤東隨軍前進，發揮的作用仍然僅限於黨校教員的日常事務：做報告、放幻燈、寫調研文件，諸如此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描繪的現象和歌頌的「痞子運動」不是毛澤東發動或設計的，而是國共兩黨幹部在毛澤東鄉邦複製粵東模式的結果。

毛澤東在調研途中看到，他少年時企圖反抗、青年時企圖投靠的士紳階級居然如此銀樣蠟槍頭。他們不僅垮臺，而且以極其可笑可憐的方式，在武力和才智都談不上出色的社會邊緣人面前，表現得不堪一擊。如果敵人十分強大，失敗可以歸咎於敵人的邪惡。如果敵人只是一群小丑，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失敗者早就是一具正在腐爛的屍體了，為了拒絕承認自己的滅亡，故意忘記了真正的兇手和斷氣的時間，一直撐到蛆蟲爬出皮膚的時刻，再宣稱自己死於這些蛆蟲。毛澤東看到自己曾經諂媚、羨慕、畏懼和仇恨的

10 陳公博（1892-1946），生於廣東南海。曾經為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中央執委。抗戰開始後隨汪精衛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長，是汪政府內第一號人物，曾被視為漢奸。抗戰結束後逃往日本，最後被押解回中國，審訊後被槍決。

對象居然如此不中用，興奮感、解放感、輕蔑感、恍然大悟感從〈報告〉的字裡行間溢出。他由衷地感到，貧下中農才是真正的老師。這個道理翻譯成毛式語言，就變成「群眾有無窮的智慧和力量」。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由此產生，包括以下的要點：「你要懂得怎樣蔑視人類，怎樣利用他們的弱點，怎樣開發他們的隱秘欲望，怎樣解除道德、傳統、習慣和一切符號的約束。無論外表多麼高貴體面，人都是犯賤的。人人都在跟隱秘的欲望作鬥爭，以免自己不顧一切地卸下文明的枷鎖和禮教的負擔。你如果尊重人，實際上就是阻止他們自我解放。他們的理性會感激你，黑暗之心卻會驅使他們仇恨你，甚至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你如果踐踏他們的枷鎖，實際上就是幫助他們自我解放。他們的理性會譴責你，黑暗之心卻會愛戴和感激你。誰沉溺形式，就會得到泡沫。誰順服黑暗之心，就會得到實質。」毛澤東思想的其他部分，都是他本人和門徒將上述精髓和具體情況結合的產物。

粵軍首先為孫文立下了汗馬功勞，然後又為家鄉父老的利益，抵制了孫文引狼入室的宏大計畫，反目的朋友當然比統戰的敵人更可恨。因此，國民黨永遠不會譴責蔣介石對南粵地主資產階級的暴行。湘軍作為國民黨的統戰對象，理應享有反革命勝過新革命、

新革命勝過老革命的待遇。因此，國民黨必須譴責「痞子運動」的罪魁禍首。黨軍和湘軍的合作，把蔣介石從「左派」（指在廣東對當地資產階級的暴行）變成了「右派」（指國民黨在湖南卻反對暴行）。

敵我認同是共同體的根基所在，左右分歧只有在共同體內部才有意義。右派的本質在於維護某個具體的既存共同體，左派的本質在於解構這樣的共同體。蔣介石扭曲的身分，實際上說明粵、滬、湘、贛根本不是同一個共同體，否則蔣介石不可能同時扮演保護者和破壞者的角色。偽共同體缺乏真正共同體的邊界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比真共同體更容易遭到滲透和征服。解構是征服者和革命者的共同特徵，最成功的革命者歷來都是征服者。征服者和保衛者的戰爭很容易跟左派和右派的鬥爭混淆，因為外人和無產者的政治本能都是破壞。唯一的區別在於：無產者在哪裡都是無產者；外人——征服者只有在外邦才貌似左派，在自己的政治基地總會表現出濃厚的右派色彩。

共產國際對蔣介石清黨的反應，就是命令中國共產黨建立自己的軍隊。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熱烈地支持「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真理。共產國際以前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毛澤東也是最積極的支持者。兩者在理念和政策上都南轅北轍，在技術

上都是現實主義（機會主義）對教條主義（堅持原則）的勝利。毛澤東永遠是最徹底的現實主義者，認為教條主義者都是傻瓜。他後來從譴責蘇聯不夠左（修正主義），跳到譴責美國不夠右（綏靖主義），同樣是理論意義的南轅北轍和現實意義的前後一貫，使投機色彩最重的蘇聯和美國政治家都顯得像老加圖¹¹一樣迂腐而純潔。

莫斯科把大部分金錢和顧問交給了周恩來和葉挺，命令他們從南昌打回汕頭，重演海路接受蘇聯武器的劇本。毛澤東只得到了一點點零頭，但他的收益其實最大。他第一次獲得獨當一面的機會，建立了自己的基本盤，變現自己在馬基維利領域的特長。秋收暴動在軍事上實屬敗筆，大部分軍官和士兵的逃亡暴露了他組織能力的薄弱，而上井冈山則證明他是優秀的馬基維利主義者。然而他卻不是優秀的列寧主義者，他擅長《水滸》、《通鑑》的權謀智慧，排擠和架空了所有可能的競爭者，但史達林擅長的組織工作並不是他的強項，贛南的蘇維埃化應該是經過博古和周恩來之手完成的。

上海中央進駐瑞金，暫時結束了毛澤東飛揚跋扈的幸福生活。紅軍在川黔邊界的流浪暫時切斷了共產國際的交通線，權謀技巧相對於硬資源的重要性隨之上升。毛澤東抓住了這個短暫的機會視窗，同時證明了自己擅長體察人的隱秘欲望和隱秘弱點。儘管如

此，他的倖存和成功仍然有賴於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史達林和蔣介石已經達成抗日協定，誰都不願意為區區一個毛澤東的搶班奪權而影響大局。毛澤東其實並不怎麼瞭解高層次博弈的內幕，只是為人比較知趣，懂得見風使舵。他在西安事變、統一戰線、皖南事變的時候，都是首先玩弄極端利己主義的小聰明，然後通過試探抵抗力之強弱，弄清蘇聯基本路線所能允許的自留地最大範圍，然後沿著剃刀邊緣前進，大局上儘量配合蘇聯的國際戰略，自留地趕緊多存私房錢。這樣的操作需要同時具備高超的智力、敏銳的感覺、冷靜的心態和死不要臉的決心，稍稍偏斜一點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毛澤東如果稍微多一點盲從，就會落到西班牙共產黨的下場。莫斯科一向對國民黨拷貝自己對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對共產黨拷貝自己對歐洲共產黨的政策。紅軍在一九三六年企圖打通國際交通線的時候，蘇聯在蒙古邊境準備的補給就嚴格地複製了西班牙內戰的規格。王明的統一戰線策略和周恩來的保衛大武漢計劃，都是西班牙人民陣

11 加圖 (Marcus Porcius Cato, 前 234-前 149) 通稱為老加圖，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家、國務活動家。老加圖通常被認為是羅馬共和國時期典型的保守派人物。他堅決維護羅馬的舊原則，認為羅馬社會風氣的變壞，幾乎全是來自希臘的不良影響導致的。他主張維持羅馬原有的簡樸生活，防止社會分化。

線和馬德里保衛戰的翻版。大多數共產黨領袖無論如何怨恨毛澤東，心裡都明白：如果沒有他，共產黨就要做國民黨的人肉盾牌；國民黨願意做蘇聯的人肉盾牌，正是以此為前提的。他如果沒有掌握史達林容忍自留地的底線，棗園的蘇聯情報站就足以讓他死得不明不白。史達林做掉他，不會比他做掉劉志丹更困難。周恩來和康生對他的支持，也是以蘇聯的同意為前提的。任何人只要對照一下王明中毒案和托洛茨基遇刺案，就會發現毛澤東只有一批外行可用。社會部的特工是蘇聯直接培訓的，在上海和香港戰績輝煌，並不是沒有做過暗殺的工作，但毛澤東顯然不敢信任他們，至少在暗算蘇聯的保護對象時，不敢運用蘇聯訓練的專業人員。

毛澤東應對滿洲接收、朝鮮戰爭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決斷模式仍然沒有多少變化。他的資訊仍然很不靈通，證明周恩來、李克農和情報部門仍然直屬蘇聯。這個情報機構可以成功地掌握了蔣介石的軍事機密，卻聽任毛澤東捕風捉影地猜測莫斯科的廟算。黨政領導無法控制同級和下級的情治單位，因為後者由最高層垂直領導，這是列寧主義體制的一大特徵，有助於確保下級對上級的依賴。對此，毛的策略仍然是阿米巴式的，首先在自留地的方向試探，如果沒有上級的阻力，就伸出更多的觸角，如果感到巨大的阻力，就轉到似乎沒有阻力的方向。掌握內情的觀察者很可能覺得史達林比他聰明得多，

石敬瑭根本沒有冒充多爾袞的資格，但這樣的判斷可能並不公正，因為史達林的決斷離不開全球情報網的支持。毛澤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決斷的難度要高得多。

史達林在世之日，毛澤東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的局限。史達林死後，他開始享受解放的感覺。赫魯雪夫得不到他的敬畏，一方面是因為他的自留地已經初具規模，另一方面也是出於誤解，因為赫魯雪夫推出了許多貌似小清新的政策。毛澤東從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時候開始，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教條主義理論家和馬基維利主義者的衝突，每一次都是後者勝利，所以非常相信自己的經驗。他覺得「和平共處」、「土豆加牛肉」¹²之類的蠢話，無非證明新一代領導人缺乏鍛鍊。弱者或蠢人露出破綻的時候，就是他應該再一次搶班奪權的時候。赫魯雪夫增加了援助，連核技術都給了。資產階級人士出於庸俗道德觀，大概會認為毛澤東應該感恩圖報，至少對待赫魯雪夫，應該比對待苛刻的史達林

12 一九六四年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訪問匈牙利時，曾在一次演說中說，「福利共產主義」就是經常可以吃到「古拉希」。「古拉希」是匈牙利一道頗具代表性的家常名菜，即把牛肉、土豆加上紅辣椒和其他調料用陶罐燉得爛爛的，然後澆在米飯上。中國官方將之翻譯為「一盤土豆燒牛肉的好菜」。毛澤東作政治寓言詞〈念奴嬌·鳥兒問答〉，把赫魯雪夫譏諷為修正主義。詞的下闕用了這個典故：「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更好一些。毛澤東的想法恰好相反，知道史達林從來不會忘記索取他的一磅肉，斷定赫魯雪夫之所以釋放善意，一定是因為他在黨內根基不穩。這個判斷並不全錯，因為赫魯雪夫確實有爭取兄弟各黨支持的意圖。

然而毛澤東高估了權謀相對於硬資源的重要性，可以說為自己的成功經驗所誤。毛澤東試圖動員全世界共產黨反對蘇聯，結果只有阿爾巴尼亞響應。東南亞近在咫尺，變成了莫斯科和北京纏鬥的主戰場。毛澤東一面重新發明歷史，抹去了共產國際領導遠東革命的痕跡；一面重新發明理論，將蘇聯的幹部黨模式劃為資產階級復辟。毛澤東深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道理，決心借此機會剷除黨內的列寧主義者。他在打天下的時候，離不開蘇聯的支持和蘇聯培養的幹部集團，但正因為如此，非免死狗烹不足以坐穩江山。史達林每一次改變政策，都要殺光原先政策的執行者。問題在於他不是史達林，沒有殺人如草不聞聲色的克格勃。情報、公安系統都是列寧主義者的禁嚮，毛澤東只能依賴梁山系軍人、流氓無產者和紅色文人的大雜燴。鄧小平的文革經歷就足以證明，列寧主義者作為集團，只是在形式上被打倒了。

毛澤東只能依靠群眾動員、梁山系軍人和外交路徑綁架、破壞、抵銷和封禁列寧黨

的組織力量。他在黨內的處境，像一個依靠移植器官的病人，一開始就沒有痊癒的希望，只能盡可能巧妙地運用免疫抑制劑，降低排異反應的激烈程度，拖長苟且偷生的時間，但永遠不可能消除排異反應。群眾的風暴轉瞬即逝，只有林彪和軍管會才能阻止權力重新落回老列寧主義者手中。然而，即使林彪也逃不過周恩來的陰險謀略。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及墜機思維事件）以後，只有尼克森才能拯救毛澤東。毛澤東畢竟是東方古老謀略的大師，尤其擅長運用弱者的邊緣策略。他知道，強弱的關係是辯證的。強者的弱點在於，他們的牽掛太多。弱者的強處在於，他們用不著牽掛什麼。蔣介石捨不得「全民領袖」，毛澤東就可以利用這一點欺負他。匪謀系捨不得「黨的領導」，毛澤東也可以利用這一點綁架他們。正所謂吳起抱屍，死有餘智。¹³

13 吳起（前400-前381），戰國初期軍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吳起仕楚時，主持改革，史稱吳起變法。但吳起的變法損害了楚國貴族的利益，楚悼王去世後，楚國貴族發動兵變，貴族們號令士卒用箭射傷吳起，吳起拔出箭逃到楚悼王停屍處，將箭插在楚悼王的屍體上，大喊：「群臣叛亂，謀害我王。」貴族們在射殺吳起的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屍體。楚國的法律規定，傷害君王的屍體屬重罪，將被誅滅三族。楚肅王繼位後，把射殺吳起同時射中楚悼王屍體的人全部處死，受牽連被滅族的有七十多家。吳起抱住楚王的屍體，想讓追殺他的敵人投鼠忌器。毛澤東的敵人本來可以徹底否定他的歷史地位，把他打成破壞莫斯科共產國際正確革命路線的敵對勢力，但是這樣一來，就會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美反蘇的基本路線，所以只能滿足於七三開（七分好三分壞）的歷史評價，這樣就不能毀掉毛主席紀念堂和天安門的毛主席像了。

一九七二年外交革命和「三個世界」理論的真實目的，就是要把周恩來和老列寧主義者綁在反蘇聯盟的戰車上。否則只要一閉眼，後者就會把黨國帶回原先的軌道。這樣一來，中國八十年代的中學歷史課本就會記載：「周恩來和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蘇聯的正確領導下，粉碎了混進革命隊伍的野心家和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毛澤東，將革命的旗幟傳給了以鄧小平和陳雲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鄧小平和陳雲在八十年代初的「治理整頓」或「再列寧化」失敗後，也得不到國際資本主義的輸血，就只能增加蘇聯老大哥的負擔，結果勢必加速柏林圍牆的倒塌，自己也會隨著柏林圍牆一起倒下。

毛澤東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猴氣」太重。史達林十年如一日，深耕幹部隊伍建設。毛澤東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更沒有這樣的耐心。何況他既懶惰又嫉妒，容不得身邊的人比自己層次高。他提拔陳永貴（農民總理）的邏輯，跟寵愛張玉鳳（毛的生活秘書）的邏輯完全相同。只有最蠢最土的粉絲才會真心崇拜他，使他感到安全。組織部門和情報部門一樣，一直掌握在蘇聯的學生手中。毛澤東甚至沒有利用自己的地位，認真培養一支嫡系部門。所謂的毛派分子只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胸無大志的底層投機者、過革命扮家家的紅色文人和學生，根本不具備老列寧主義者冷酷的組織紀律性、多年的政治經驗和殺人不眨眼的狠毒。他們追求權力的虛飾，卻讓權力的實質從自己的指間溜走了。

江青和姚文元的真實性格，跟「左聯」時代的小文人相去不遠。王洪文的真實性格，則是幾頓好飯好菜就能收買，稍加恐嚇就會屈服。張春橋雖有決斷，但經營人脈的能力很差。

毛澤東既然沒有足以填補真空的班底，任何勝利都不過是抽刀斷水而已。他能夠打倒劉少奇，卻不得不提拔鄧小平。鄧小平從政治意義講，就是劉少奇的分身。他打倒鄧小平以後，並非不能斬盡殺絕，然而即使斬盡殺絕，無非就是再換第三個劉少奇。他老了，折騰不動了。他明知周恩來才是匪諜系的真正魁首，比他更願意做莫斯科的兒皇帝；然而周恩來是如此狡猾、卑屈和陰險，使他既找不到藉口又冒不起風險。他只能懷著壓抑的仇恨，等待和盼望周恩來死去。他想在不消滅共產黨的前提下，消滅壓迫他多年的匪諜系。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等於皇帝想在不放棄儒家的前提下，成立排斥士大夫的內閣。他自己也知道，這種想法不可能實現。

毛澤東臨死前，曾經向毛派和列寧派詢問身後事。王洪文像白痴一樣，得意洋洋地回答：中國人民必將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鄧小平像眼鏡蛇一樣，陰刻惡毒地回答：中國必將陷入慘烈的內戰（特里爾，《毛澤東傳》）。至少從這天開始，他就明白

自己的粉絲根本鬥不過自己的敵人。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扶植華國鋒這樣的中間派，希望華國鋒感恩戴德，不負「你辦事我放心」的期許，加上鄧小平「永不翻案」的書面保證，至少能夠堵住匪諜系復辟的道路，保護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孤兒寡婦。明眼人一望即知，這種策略等於死馬當活馬醫。武則天垂老之際，也只能提拔廬陵王，安排李家子弟和武家子弟盟誓，絕不自相殘殺。他們都是資深的馬基維利主義者，依靠寒盟背誓起家，依靠斬盡殺絕固位，如今輪到自己托孤寄命，居然指望跟自己一樣心狠手辣的馬基維利主義者，信守他們一貫鄙視的空話和廢紙，天下寧有是理？

吳起的妙計雖然保護了毛澤東的屍體和頭像，卻保護不了毛澤東的孤兒寡婦。前者在眾目睽睽之下，路徑綁架可以發揮作用。後者在隱祕的角落，正是馬基維利主義者的保留地。毛澤東的聰明才智，僅僅推遲了淒慘的下場。他自己選擇的命運，最終還是追上了他。

他曾經有過機會，享受清白和平靜的生活，但他不願意浪費自己的才能和野心，為自己簽署了浮士德式的隱祕判決書。教授的女兒楊開慧對師範生毛澤東而言，本來應該は無緣覬覦的甘美果實。她如果不是懷有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情愫，本來不難得到世俗意義上好得多的郎君。毛澤東後來的妻妾，就沒有一個不是熱衷攀附的挖金女郎。毛

澤東拋棄她，可以解釋為男性常有的弱點；然而自己在山寨另覓新歡，卻沒有把孤苦伶仃的妻子送去上海、香港或其他安全地帶，不僅大多數男人做不出來，連同一時代的大多數黨員都做不出了。

湘軍將領長期遵循舊式戰爭的倫理，沒有騷擾和監視住在他們眼皮底下的楊開慧。

毛澤東如果想要派人接她走，沒有任何技術障礙。共產國際的許多中級幹部都能利用組織的網絡，送家屬去香港治病。毛澤東的地位比這些人高得多，但他居然連嘗試一下都不肯。彭德懷的紅軍襲擊長沙，屠殺交不出錢的商會領導人，湘軍都沒有遷怒到楊開慧身上。毛澤東自己卻為了兼併彭德懷的部隊，非要第二次進攻長沙，彷彿存心想要借刀殺人。他進攻和撤離長沙的時候，離楊開慧的住地只有幾小時路程。湘軍仍然沒有做出任何妨礙毛澤東接人的事情，然而毛澤東就是不接。長沙市民經過了兩次超限戰的折磨，開始高呼報復。何鍵¹⁴仍然允許楊開慧選擇要不要跟毛澤東離婚，只要離婚就可以免于

¹⁴ 何鍵（1887-1956），湖南醴陵人。民國時期湖南省政要，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以在南嶺極對付中國共產黨而聞名。在一九三零年十月逮捕毛澤東的夫人楊開慧。因為她拒絕退黨或聲明與毛澤東脫離關係，被何鍵執行槍決。

追究。楊開慧明知毛澤東在外面搞女人，仍然不肯背叛丈夫。共產黨後來對待真實或虛構的敵人，從來不曾如此寬容。毛澤東後來用榮華富貴酬勞的革命接班人，沒有一個像楊開慧這樣忠誠。

二四、老列寧主義者

——鄧小平



鄧小平（1904-1997）出身於巴蜀士紳家庭，家裡擁有四十多畝良田，收取佃農的租金。當時，佃農租種的份地多在兩到五畝之間。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是清末第一批法政學堂的畢業生，也是廣安當地的袍哥大老（掌旗大爺）。「文明」這個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意在彰顯他的新黨色彩。保路軍興，他在本縣積極回應。蜀軍政府宣佈獨立後，他為本縣編練民兵。他在袍哥和黨人的派系鬥爭當中失敗後，又辦起了絲廠，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出身、個人歷史任何一方面，他都屬於共產黨定義的階級敵人。

鄧文明好賭好色，以此敗家。他因為輸錢，不得不出賣產業，沒有像當時大多數新派士紳一樣，讓鄧小平接受高等教育。他因為好色，娶了比兒子大不了幾歲的小妾，促成了家庭內部的不倫之戀，弄得鄧小平不得不背井離鄉¹。鄧小平在法國並不安分守己，

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激進的政治活動上。勤工儉學的主辦單位說他不肯幹活，不宜雇傭。他加入了周恩來領導的支部，也不把這些萬惡的資本家放在眼裡。他們一度相信法國的十月革命很快就會爆發，在巴黎和里昂大搞顛覆活動，結果被法國警方驅逐出境。

共產國際讚賞鄧小平的革命精神，送他進莫斯科孫文大學進修，跟蔣經國同一個班。北伐期間，他為馮玉祥培養軍官。清黨以後，他奉命發動廣西的兵變²。兵變一敗塗地，鄧小平倉皇逃回上海。前委書記陳豪人指責他臨陣脫逃，他不得不寫檢討（〈七軍前委報告〉）。隨後，他在瑞金當了幾年縣委書記。此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到走」（隨波逐流）。國民黨收編紅軍以後，他做了劉伯承的政委。一九三九年，組織為他安排了主婦³。

卓琳是雲南宣威火腿廠老闆的大小姐，在紅軍過境時跟父親的火腿一起被繳獲。紅軍把多餘的火腿分給沿途的窮人，把多餘的女人帶到了瓦窯堡（陝西），經過適當的改造，在延安分給了長期饑渴的老幹部，開始了激情燃燒的歲月。卓琳的父親及時逃走，結果沒有得到先進思想的教育，繼續在白區「剝削勞動人民」，並最後在土改當中死於革命群眾的專政。卓琳已經脫胎換骨，自然不會理睬沒落階級的殘餘，此後一直陪伴鄧

小平，發揮了女主人不可替代的功能。布爾什維克解決個人問題的方式，確實是資產階級無法理解的（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第一章〈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1904—196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劉鄧大軍在抗戰期間避居太行山區，迅速成長到數十萬眾。日本人走後，他們投入打倒蔣介石的戰爭。鄧小平率軍打回自己的老家，將當地的士紳和知識分子屠殺殆盡。

1 「至於鄧小平，他的確是很能幹，但中南海的警衛戰士都知道，他從來都是講享受的。他的這一面毛主席是不瞭解的。鄧小平他家是一個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個小妾談戀愛，離家出走了。這事當時還鬧得很大，那個年代這是一種滅人倫的事，是孽子才幹的。所以他後來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國了，到法國後他也沒勞動過。共產黨講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鄧小平個人表現怎麼樣呢？右江起義開小差，置革命成敗與眾多起義戰士的生命於不顧，卻說是去找中央彙報工作。……鄧小平後來還發展到強姦女護士。這個是後話了。」（《威本禹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2 又叫百色起義，右江暴動。一九二九年底，中共利用蔣介石和桂系軍閥間作柏、李明瑞之間的矛盾，在廣西百色發動的軍事暴動。暴動的主要負責人是陳豪人，他是中共廣西前委書記、中共廣西軍委負責人、中共在廣西右江地區和紅七軍的首要領導人。但後來中國官方宣傳「百色起義」時，通常不提及他的名字，而提及鄧小平。

3 鄧小平第一任妻子是張錫媛（1906-1930），他們是在蘇聯時的同學，兩人一九二八年結婚。兩年後張因病而死，孩子夭折。第二任妻子是金維映（1904-1941），一九三二年結婚，一九三三年，鄧小平遭到批判和貶職，金維映離他而去，後嫁給李維漢。卓琳（1916-2009），原名浦瓊英，鄧小平的第三任妻子。兩人一九三九年結婚。卓琳的父親浦在廷是宣威人，創辦了宣威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德和罐頭廠。

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柔性規訓，他本來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裡享福的。大樹一倒，割草就容易了。一九五零年一月，鄧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萬徵糧工作隊。但隨即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匪叛亂」，徵糧隊遭到武力抵抗，許多縣城被圍困。關於這場「叛亂」，中共官方宣稱乃國民黨殘餘勢力所為，但實際上主要是農民及各種地方勢力的自發反抗。農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權的徵糧行動，是因為國民黨政府早已收過一九四九年的公糧，新政權其實是對農民重複徵收，而且徵收的數量大大高於國民黨政府⁴。毛澤東對他的組織紀律性感到滿意，因為即使以列寧主義者的標準，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範。秦基偉回憶說：「他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而是抓住了你就得從嚴處理，那是一點也不含糊的。」（〈秦基偉談鄧小平〉）

高崗事件給鄧小平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兩人都是剛剛入京的封疆大吏⁵，鄧小平這時正是高崗的下屬，頗得高崗信任，分享了高崗清君側的計劃（不讓劉少奇代理毛澤東主政）。高崗心粗氣浮，覺得自己和毛澤東都是蘇區黨，毛澤東既然已經授意他除掉劉少奇，而自己跟蘇聯的關係不錯，又得到了林彪、彭德懷、鄧小平幾大藩鎮的支持，一定可以完成清君側計劃⁶。誰想史達林帶頭反對，直接向毛澤東交代高崗不可信用。毛澤東見勢不妙，立刻倒打一耙，指責高崗破壞黨的團結，離間中蘇關係。而鄧小平則更

加過分，洩露了高崗和自己清除劉少奇的密談內容。⁷

4 當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報告，真實地記載了這一事實：一九五零年一月起才徵收一九四九年的公糧，比正常情況下晚了四個月，這時「農村糧食確已短少」。按上級下達的指標，川南區一九四九年度公糧負擔為四十二點五萬噸大米，以全區農村人口約一千萬，人均負擔四十二點五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糧」十公斤，實際達到五十公斤以上；當地農村大米人均產量只有百五十公斤左右，公糧徵收占到平均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這一徵收量比國民黨執政時期高百分之三十到五十……自然會引起反抗。

征糧開始後的一個月內，全川暴動的農民達到數百萬之眾，政府隨即動用武裝力量強力鎮壓。在重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堅決「剿匪」來保證徵糧任務的完成……在剿匪和徵糧高峰的一九五零年春夏之交，川南區全國饑民達二百萬之眾……「餓死人的事情到處發生」。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對剿匪和徵糧的態度十分堅決……

……重複徵收一九四九年公糧大獲全勝之後，四川省的公糧徵收量逐年遞增，一九五二年達到三百八十九點二萬噸，比一九五零年的徵糧數幾乎翻了一番，足以供二千萬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糧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調的格局從此形成。（東夫〔王東瑜〕：〈大躍進時期四川大饑饉的特殊成因〉，《當代中國研究》，二零零九年第一期）

5 一九五二年秋，為了即將施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央要削減地方權力，調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習仲勳等地方軍政第一要員進北京，史稱「五馬進京」。其中，高崗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6 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在回憶錄中說：毛澤東派高崗查潘陽舊文件，想找到劉少奇一九二九年被捕叛變的黑材料。（鍾延麟：〈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十二卷第四期）

7 「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

高崗再魯莽，畢竟不是三歲小孩，當初如果不是覺得鄧小平站在自己這邊，怎肯隨便分享殺頭的機密。他對「牛皮公司副總經理」（鄧小平綽號）的痛恨，不會低於光緒對袁世凱的痛恨，然而悔之晚矣，只好自尋短見。高崗事件本質上是一次火力偵察，毛澤東由此掌握了蘇聯的真實立場和梁山系（紅區黨）／匪諜系（白區黨）的相對實力。戚本禹說，毛澤東本來無意整死高崗，而是想等風頭過去再重新啟用他，但在劉少奇和蘇聯系的強大壓力下，不可能一點懲罰都不給。高崗發現上級（指毛）和部下（指鄧）都在欺騙自己，苟活下去確實也沒多大意思。鄧小平明知高崗死在自己手裡，而非毛澤東手裡，當然願意給毛澤東整死的人平反，絕對不讓自己害死的人翻身。這些現象都說明，匪諜系才是列寧黨真正的主人。毛澤東雖然精於權術，也僅僅是自保有餘而已。（以上二節參見《赫魯雪夫回憶錄》、《楊尚昆回憶錄》、《譚震林回憶錄》和《戚本禹回憶錄》）

梁山系灰頭土臉，匪諜系揚眉吐氣。周恩來組織高饒垮臺的善後工作，鄧小平起草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周恩來本來打算親自向全黨宣讀這份報告，卻因急性闌尾炎未能如願。鄧小平重溫法國和蘇聯時代的舊夢，替老搭檔伸張黃俄的主導地位，可謂得其所哉。饒漱石連坐下野，空出的肥缺（中央組織部）落到了鄧小平

手中。中央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前身），也由他兼任。他從辦事人員升級為決策人員，端賴高饒事件。毛澤東敬酒不吃吃罰酒，得到了面子，丟掉了裡子。這樣的勝利如果再多來幾次，梁山系就要完蛋了。匪諜系如果不再忌憚梁山系的平衡力量，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就要岌岌可危。劉少奇、周恩來雖然也是勝利者，但只不過保住了原來就有的地位。鄧小平才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如此不能鯉魚跳龍門。高崗饒漱石如果平反，等於宣判鄧小平篡黨竊國。所以高崗家屬的平反努力等於一張化學試紙，可以檢驗出共產黨的決策層是不是還在鄧系人馬的控制之下。

劉少奇對鄧小平格外滿意，「叫大家崇拜鄧小平，叫書記處多負一點責任。」（《王力反思錄》，北星出版社）但毛澤東並不是這麼想的，他希望鄧小平當好他這個「醫生」的「護士長」（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史達林就是

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8 黃皮膚的俄國人，指中國共產黨內的國際派或匪諜派。土鼈派或梁山派因為缺乏言必稱希臘（蘇聯）的能力，一直看他們不順眼。

在這個位置上起家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也曾把愚蠢的約瑟夫小弟當作打雜人員。毛澤東居然沒有利用如此重要的位置，好好培養自己的班底，可見他自己的性格就是難耐繁劇的類型，而梁山系確實也沒有可用之人。朱元璋麾下的明教徒和草莽英雄出於類似的理由，不得不把許多要職讓給科舉產生的文人，但毛澤東和梁山系在二十世紀的處境，遠不如朱元璋和他的小夥伴們。朱元璋打天下，主要依靠自己。他艱苦奮鬥時，劉福通、韓林兒自顧不暇，沒有給他什麼支援。他功成名就時，劉福通、韓林兒已經敗亡，不能對他構成威脅。毛澤東無論打天下還是坐天下，軍事資源、戰略佈局、黨政組織、情報特工都捏在蘇聯手中。他在建國第五年享有的獨立性雖然超過劉豫，仍然趕不上石敬瑭。關鍵原因是二十世紀的社會複雜性已經大大增加。草莽英雄能夠飛黃騰達，他很可能是最後一代。

鄧小平不是安於打雜的角色，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給他提供了干預決策的機會。赫魯雪夫猶豫反覆，甚至想到徵求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意見——史達林絕不會做這樣的事情。毛澤東圖謀不軌，正是因為赫魯雪夫表現軟弱。鄧小平沒有絲毫猶豫，主張蘇聯出兵鎮壓，因為政權最為重要，其他一切皆屬次要。他屬於雙手沾滿鮮血的第一代布爾什維克，對掛在布達佩斯路燈上的同志感同身受，非常害怕後生晚輩因為缺乏同樣的

恐懼，擔負不起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重任。

匈牙利事件決定了中國反右運動的基調，鄧小平負責引蛇出洞。他聰明地指出：「報紙把壞話刪掉，實際上是幫助他們，現在應讓他們放完，應在新的基礎上團結中派。一是黨改變作風，一是右派教育他們。現在報紙上為右派粉飾。對各種言論不要駁，到一定時機黨內也打打招呼。有三個東西不能登：對物價有影響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肅反的。現在不放不利，右派還沒有出頭。」（〈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的講話〉，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澤東只關注龍雲、費孝通等寥寥數人，大多數右派分子的名單都是鄧小平圈定的（鍾延麟：〈鄧小平在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派中之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五十卷第四期）。人民公社期間，鄧小平繼續追隨劉少奇。他勸毛澤東退居二線，把具體工作交給劉少奇。劉少奇宣佈：「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劉少奇：〈在石景山發電廠的講話〉）鄧小平積極配合，向扯後腿的各省施加壓力：「東北的某些領導人和廣大地區……繼續執行著寬壟淺耕、廣種薄收的老一套，不是用革命的辦法而是用改良的辦法領導農業，結果使農業生產大大落後了。這個事實，反映了農業生產戰線上兩條道路兩種方法的鬥爭還很尖銳，說明農業方面還有白旗未拔，思想還沒有解放。」（《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十

月一日)

一九六零年，「全國幾個主要城市糧食很緊張，北京、天津只有四天存糧，上海只有兩天存糧。」鄧小平告訴他的愛將：「糧食還得調，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目前，只有我們四川作出犧牲了。」五大軍區出動車輛，從巴蜀運走了一百四十七億斤糧食（羅曉紅：〈李井泉四川調糧真相〉，《黨史文苑》，二零一一年第十五期）。巴蜀由此淪為遠東的烏克蘭，餓死上千萬人。烏克蘭將集體農莊定義為蘇聯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巴蜀人民卻必須面對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凌辱。

赫魯雪夫根據蘇聯集體農莊的經驗，一開始就不看好中國的人民公社。彭德懷在蘇聯東歐各國到處告狀，希望老大哥出面教訓毛澤東：「中國問題的嚴重，困難繼續下去，也許只有靠蘇聯紅軍幫助我們才能解決了。」（林蘊暉：〈朱可夫事件與彭德懷廬山罷官之間的關係〉）毛澤東明白，中蘇兩黨的鬥爭和中共黨內的鬥爭是無法切割的。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宣佈蘇聯老大哥為修正主義者和主要敵人。周恩來和劉少奇都不敢公開拒絕他的綁架，彭德懷自然孤立無援。劉少奇倚鄧小平為左膀右臂，處理黨內日常事務，從「四清」到「五反」，不斷將「工作組」的恐怖撒向各地。

毛澤東越來越擔心，今後的幹部將會知道害怕劉少奇。他擅長窺測強者的弱點，劉少奇的弱點在於沒有軍隊和情報部門的支持。他利用周恩來和林彪，成功地打倒了劉少奇和鄧小平。革命群眾和青年學生再一次扮演了啦啦隊的作用，但他們的真實分量不會比以前歷次運動的貧農、工人和學生積極分子更大。鄧小平在江西度過了幾年天天喝茅臺的隱居生活，等待毛澤東的小朋友們把事情搞砸。他沒有等待多久，就回到北京副總理的辦公室（一九七二年），以治理整頓的名義，恢復了列寧黨的老傳統。毛澤東自從林彪事件以後，精神大不如前，不得不假裝相信，鄧寫給他的信中（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永不翻案」的承諾比一張廢紙更有價值（「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鄧小平兼任總參謀長以後，實際上已經繼承了劉少奇和林彪的政治遺產。周恩來和康生死後，鄧小平和葉劍英結盟。幹部、紅軍和特務三大柱石都在鄧小平掌控之下，毛派只剩下一些激進文人和周邊群眾。鄧小平最後一次下臺純屬形式，毫無政治頭腦的華國鋒根本填補不了空缺。老列寧主義者都在等待毛澤東死去，好讓他們回到習慣的軌跡。打倒四人幫，堪稱世界政變史上第二輕易的任務。第一名，根據邱吉爾的說法，無疑是

布爾什維克水兵打倒了依靠婦女（女兵營）兒童（士官生）保護的克倫斯基。鄧小平毫無懸念地復出，一腳踢開了不知所措的華國鋒。

老列寧主義者的黃金時代開始了。現在，他們的道路上似乎不會再有任何障礙。鄧小平和陳雲興致勃勃，放手規制完美的計劃經濟。他們覺得以前的事情之所以搞砸，全怪毛澤東這個搗亂分子。他們不太介意計劃以外的邊邊角角，願意睜一眼閉一眼，結果從農民私分的土地上，意外地「掘出一個大金娃娃」。所謂金娃娃其實就是非常脆弱的小農散沙耕作，只有跟共產主義相比才會顯得金光閃閃。知識分子搭了老幹部復辟的便車，錯誤地以為自己相當重要。鄧小平根據他在匈牙利事件當中提出的原則，區別對待這些意外因素。政治方面，絕對不容任何鬆動。文化方面，控制與放任相結合。經濟方面，在不影響前兩者的範圍內放鬆。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是為黨準備的訓令，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政權。政權以外的事務，控制程度隨著政治關聯度的降低而相應減少。

毛澤東在一九七二的戰略（指中美建交）以封閉蘇聯南翼為核心，劃出一條從圖們江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邊界。邊界一旦封閉，蘇聯就得不到新的麥田。巨大的顛覆開支無法收回成本，油盡燈枯只是時間問題。其實，這個結局本來應該在五十年前出現。

史達林英明的外交政策和世界體系的崩潰，通過二戰和冷戰的機會，給蘇聯送來了東歐、東亞和東南亞的麥田，才給列寧的團體延長了兩代人的壽命。美國和日本的慷慨援助，給鄧小平吃糠咽菜的部下帶來了一個短暫的小陽春，然而好景不長，蘇聯垮臺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預計。鄧小平不像戈巴契夫，不可能將責任推給自己的前任。戈巴契夫只是繼承了恐怖分子血腥的遺產，鄧小平自己就是雙手沾滿鮮血的恐怖分子。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非常害怕，擔心自己會像布達佩斯的同志們一樣，掛在北京的路燈上。戈巴契夫沒有這樣的擔心，紅軍和克格勃的將軍才有這樣的擔心。

無論如何，鄧小平堅持他在匈牙利事件當時就已經下定的決心。蘇聯一垮，共產主義的叛徒就失去了統戰價值。北京的坦克本來是鄧小平所有罪行當中最輕的一次，僅僅因為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又正好趕上柏林圍牆倒塌的鮮明對照，反而引起了最大的公關效果。北約整合東歐真空地帶，花了將近十年時間。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九年，華盛頓在東亞和非洲的帝國開支持續降低。美國遺棄了東亞大陸，洪水隨即開始上升，到

9 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一月鄧小平訪美，兩國在《科學技術合作條約》的框架下進行了數百個合作研究項目。

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一九七九年日本開始對華援助。

九十年代末，內地大部分縣城的公務員和教師都習慣了白條（指中國政府拖欠公務員薪水）。鄧小平一面振振有辭地教育部下「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一面聽任國企女工賣淫為生。

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發動了最後的掙扎，試圖拋棄計劃經濟的巨大包袱，結果導致政策性放水，銀行和企業同時陷入糾纏不清的虧空。他在形勢最惡劣的關頭死去，把爛攤子留給江澤民和朱鎔基收拾。後者借助九一一事變的政治效果和世界貿易組織的經濟效果，暫時推遲了鄧小平留下的債務，但鄧小平本人不可能預計到這些，他的全部政策都是為了將洪水推遲到自己死後而設計的。臨死以前，他已經為自己的家屬做好了狡兔三窟的安排。他以其強烈的投機性格，堪稱毛澤東當之無愧的繼承人，但他對自己投機才能的信心，明顯不如毛澤東。他在一生的終點，又回到來百色起義（暴動）的時刻。無論革命前途如何，他要首先給上海租界的家屬做好安排。如果同志們替他打開了局面，他一定會回來歸隊的，如果天有不測風雲，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情。

近代史的 墮落

劉仲敬評點近現代人物——國共卷

作者

劉仲敬

總編輯

富察

助理編輯

張乃文

編輯協力

袁業飛、一霖

企劃

蔡慧華

裝幀設計

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排版

宸遠彩藝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

曾大福

出版發行

八旗文化／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民權路1082號9樓

電話

〇二二二八二一八〇

傳真

〇二二八六六七〇

客服專線

〇八〇〇三二二〇二九

信箱

gus0601@gmail.com

臉書

八旗文化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蘇文生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初版一刷）

定價

二〇一七年一月（初版二刷）

新台幣三六〇元整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近代史的體裁

國共卷 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
劉仲敬著 北京市人文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三〇〇面 一五×一九·五公分

ISBN 978-986-93562-0-6 (平裝)

一、近代史 二、民國史 三、人物志

627·6
105015444

